钱颖一 著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Modern Economics and China's Economy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作者:钱颖

ISBN:978750867636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作者简介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letv）会士（Fellow）、获得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婆和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中文著作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学的改革》（中信出版社）。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引言

本书收集了我在1995年到2017年6月期间有关中国经济的78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我在2003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续集。那本书收集的是我在1987年到2003年期间的18篇文章。两本书加在一起一共96篇，都是我用中文发表的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的文章。(注)

本书按照内容的主题分为三编十章。在每一章中，文章均注明发表时间，并按此排列。这样便于读者还原文章当时的情景，并展示改革演进的动态感。

开卷第一篇“理解经济学研究”是我在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讲话。我的获奖理由是“对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这篇文章以我的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来讲述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结果和意义。这为理解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依据实例的解读。文章最后还就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谈了我的感悟。应该说，这篇文章所讨论的经济学研究态度和方法适用于全书的所有文章，是全书的一个导读。

第一编“改革与发展”共六章。

第一章“理解改革开放”共四篇。2008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二是发生了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起始于1978年底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是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何概括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如何看待和分析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问题，找准中国自己的定位，是这一章中几篇文

章的主题。也可以说，这一章呈现的是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势的一个整体判断。

第二章“透视经济增长”中有九篇文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中国人应该引以为豪。不过，如果我们用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高速增长既不空前，也不绝后，而是与其他若干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形态完全一致。本章的第二个关注点是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速下行以及相关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同样用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增速下降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历说明，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进入中等收入后经济增速下降不可避免。本章的第三个关注点是提出了分析经济增长不能用“三驾马车”的需求方模型，而必须用现代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供给方的增长模型。这与后来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相一致。

第三章“解析结构问题”中的五篇文章涉及所谓“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既有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有计划经济思想的遗产，就是人们的头脑中总是以一个理想的结构比例作为思考基准。这一章中的第二至四篇，或者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或者通过论理，来甄别真实的经济结构问题。这些文章与当时经济学界的一些主流判断并不一致。在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上，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是中国的投资太多了。但是基于对数据的仔细分析，特别是用投资回报率作为标准，我的研究发现在2005年之前中国并没有过度投资，因此投资与消费结构问题并不存在或并不严重。在产业结构上，我的研究发现，由于服务业被统计遗漏很大，所以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统计数据不准确而夸大了。本章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涉及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关注并深入研究。

第四章“创新、创业、企业家”中的11篇文章是有关市场经济供给方的主要推手——企业家和创新创业的。长期以来，企业家在中国艰难成长，而创新又被禁锢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框架中。直到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终于成为政府的政策导向。这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以及解读自下而上的创新（包括通过创业来创新）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走出思维误区，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活力的真正动力。

第五章“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中有五篇文章，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从来都是与开放连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崛起的重大差别之一是中国经济的体量。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经济，把中国经济放到世界经济中加以分析，对中国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了，世界经济也不再是与中国关系不大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候，也必须要讨论世界经济“新常态”。这正是本章中第四篇文章探讨的问题。本章最后一篇文章提出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六大趋势，以及在此环境中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和企业家的责任。

第六章“改革进行时”中的13篇文章有关改革的操作层面。改革有一个渐进过程，其中包含很多方面。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更要有坚定的执行。改革的操作层面牵涉宏观和微观、金融和实体、政府与市场等多方面，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学的分析有助于改革者在操作中减少改革成本，也有助于使改革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以减少改革阻力。

第二编“制度与转轨”中有两章。

第七章“转轨中的过渡性制度”中的四篇文章分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些制度安排现象。中国的一些经济现象令经济

学家困惑，比如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财政承包制等。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都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应该是改革对象，但在中国却被说成是经济成功的原因。这一章中的文章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在改革进程中，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出现了一些并非规范，但是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改进经济效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这个理论既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度相对于过去能够提高效率，也能说明它们并非最优安排，因为当市场制度健全之后，它们的过渡性效率优势将随之减小。

第八章“市场、政府、法治”中的七篇文章围绕的主题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论说这一关系有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法治。我从2000年开始思考政府、市场、法治的关系，并把法治看作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这一思想延续了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洞见，用这个视角来看中国经济转轨的方向和转轨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基于非人格化的交易，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产权、执行合同、提供公共品等。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有重大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转轨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编“学理与中国”中有两章。

第九章“经济学家的思想”中有16篇文章，介绍了16位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包括15位与中国经济改革密切相关的国外经济学家哈特、米尔格罗姆、罗伯茨、斯蒂格利茨、马斯金、科尔奈、威廉姆森、科斯、哈耶克、麦金农、诺思、青木昌彦、拉丰、霍姆斯特朗、阿罗，以及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这些国外经济学家中，马斯金和科尔奈是我在哈佛大学时的博士论文导师；阿罗、斯蒂格利茨、麦金农、青木昌彦、米尔格罗姆、罗伯茨是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的同事；威廉姆森是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期间的同事；哈特、霍姆斯特朗、科斯和诺思是与我有过交往，与我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师长；拉

丰在法国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一直是激励我的榜样；哈耶克是我唯一没有见过的。除哈耶克之外的这些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浓厚的兴趣。除哈耶克和科斯之外，他们都在过去这些年中访问过中国。他们的学术贡献对现代经济学都举足轻重，除此而外，他们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在多种层次上有重要影响。我于1983年在耶鲁大学结识吴敬琏教授，他是我投身研究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启蒙老师。

第十章“连接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有三篇访谈，围绕我这些年来试图连接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努力，内容包括了前面九章的所有话题。由于是采访中的对话，所以这三篇在风格上与其他篇不同。但是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我如何把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相结合的心路历程。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9年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是伴随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成长的。我们的一生都在学习现代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问题，并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促使中国经济崛起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推动改革开放的现代经济学，就没有这本书。

钱颖一

2017年7月于清华园

理解经济学研究[注]

（2016年12月4日）

我由衷感谢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中国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对我和许成钢多年研究工作的认可。今年首次颁发的这个奖授予将现代经济学前沿应用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研究领域，这让我深受鼓舞。

我首先想说，颁奖词中提到的研究贡献是我和许成钢以及更多经济学者共同做出的。所以我要感谢在获奖理由中引述的我的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们，除了许成钢之外，还有车嘉华、金和辉、刘遵义、马斯金（Eric Maskin）、罗兰（Gérard Roland）、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他们之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感到最为幸运的是能够同这些优秀的学者一起愉快地合作，共同对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进行研究，并且看到这些研究获得经济学界同行们的认可。

35年前我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不仅那时的我没有听说过“供给”和“需求”，而且在那时的中国，“市场”和“激励”（incentives）这两个词也还没有进入经济学的常用词汇。我深感幸运的是我身边的大师们把我带入经济学的殿堂。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科尔奈（János Kornai）、马斯金（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当年除了在哈佛上课，我还去麻省理工学院（MIT）听课，包括当时在那里任教的哈特（Oliver Hart，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梯若尔（Jean Tirole，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两门课。我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期间接触较多的诺思（Douglass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教授都对我的研究有直接影响。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我要特别提到吴敬琏。1983年秋季，我与他在耶鲁大学结识。正是他向我介绍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后来也是在耶鲁我第一次见到来做学术报告的科尔奈。

刚才致辞的四位经济学家对我都有特殊意义，我从他们每一个人那里都学到很多。我从科尔奈那里学到什么是体制（system），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思想的力量。我从马斯金那里学到什么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我从吴敬琏那里学到中国的改革历程是中国和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从哈特那里学到经济学理论的简单性和现实相关性。这些大师不仅给了我研究的灵感和工具，而且给了我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工作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的。

评选委员会宣布我们的获奖理由是“对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下面我想以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谈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结果和意义。

一、研究对象中的问题

20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距离越来越大，而且也无法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竞争。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是这个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

计划经济遇到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二是激励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计划者决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后一个问题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导经济下的“大锅饭”和“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等原因造成的激励扭曲，表现在个人、企业、政府没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当然，资源配置问题与激励问题不是独立的，而是相关联的。比如，科尔奈最早提出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它首先是由激励问题引发的，但是它又进一步影响了资源配置，比如造成短缺这种资源配置的

扭曲。但是，要认识软预算约束的本质，就必须看到它背后的激励问题，不然认识就不会深刻。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就是要以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基于市场的激励奖惩机制，来替代计划经济的一整套制度。在我看来，对所有转轨经济，包括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也都有两条主线：一条线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条线是激励问题，当然还有两者的结合。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的是关于市场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的帮助性作用。价格，包括产品市场价格和要素市场价格，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与激励问题相关的是产权、合同、所有制、治理等问题。当然，激励与价格也密切相关，但是它不仅与价格相关，更同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政府层级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密切。

事实上，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两条线展开的。市场取向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政策推动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这是很自然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极为明显地突出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其实在农业改革中，既有激励改革，也有资源配置改革。农业改革中既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引入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前者既针对资源配置问题又针对激励问题，而后者则主要针对激励问题。90年代中期的价格、财税、汇率、利率等改革，主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也对改变激励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贯穿于整个改革历程的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建设等，都是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激励，不仅是个人激励，也有企业激励，还有政府激励。当然这些改革对资源配置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以上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大的现实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的研究重心放在激励问题上，并由此去深入探讨计划经济的体制性错误，转轨经济中新出现的现象，包括成就与缺陷。这就引导我们去探究制度变化导致的激励变化，激励变化导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表现的

变化。通过研究，就会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直观观察。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的起点。

二、研究的框架和方法

谈到研究的框架和方法就必须要谈现代经济学学理的演变。现代经济学对成熟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激励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理论。先是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理论，从19世纪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为框架的理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不断发展，形成最为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1971年阿罗（Kenneth Arrow）和哈恩（Frank Hahn）出版的《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书，就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激励理论的发展在后，是因为它要基于不完全信息理论。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起步的。同样也是阿罗，正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是他从保险业的术语中引入经济学的。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在70年代和80年代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重要贡献者包括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维克利（William Vickery），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维茨（Leonid Hurwicz）、马斯金和迈尔森（Roger Myerson），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等。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侧重于不同方面，有的是公共财政问题，有的是劳动力市场问题，有的是拍卖问题，有的是机制设计的基础理论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都与不完全信息和在此情况之下的激励问题相关。

需要专门提及的是2014年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获奖理由是成功地将不完全信息理论应用于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政府规制（regulation）等方面。正如梯若尔在诺贝尔

奖演讲中所说，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作为研究必备的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就为研究产业组织和规制问题提供了机会。正是使用这些分析工具，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诞生了，由此也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可以说梯若尔的研究是建立在第一代开创者诸如科斯（Ronald Coase）和威廉姆森的工作之上，是以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基础和工具的第二代产业组织理论。

当我和许成钢等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我们正在学习当时处于研究前沿的这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当然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中国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激励问题。我们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理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激励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最前沿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研究转轨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基本的问题。

因此，一方面是有中国经济改革提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有现代经济学前沿的理论和工具。我们从事的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就是要在两者的结合中创新。

三、研究创新和结果

在具体研究方向上，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上。这是因为从中国的现实经济中我们观察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很大作用，而改革中很突出的变化是地方政府激励的改变，它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这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这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很不同，在那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企业方面，由于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约束，企业改革中既有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又有民营企业发展问题，还有各种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问题，其中的激励问题远比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的要复杂，也比多数发展中经济的情况要丰富，因为体制不同。下面我聚焦获奖工作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的激励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作用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是什么？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财政税收提供重要激励，干部任免机制提供重要激励，地区间的竞争也是重要激励。这些激励可以产生多重效果，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扭曲经济行为的一面，这取决于激励的形式、权力配置的方式等。

我们有两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我和许成钢提出的"M型"（M-form）和"U型"（U-form）组织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的理论框架（Qian and Xu，1993）。"M型"是按照产品或地区的组织形式，"U型"是按照职能或产业的组织形式。这个理论框架最初是用来分析大企业内部组织的，由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威廉姆森提出。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个框架扩展到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整个经济体。

在M型组织形式下，企业更多地归属地方政府控制，加上地方分权的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对发展本地经济，特别是发展新企业有很大动力。相比而言，在U型组织形式下，企业是按照行业归属不同部委控制。虽然后者在规模效益上有优势（这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推崇的），但是在激励上有劣势。

另一个框架是我和温加斯特、罗兰使用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理论框架（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1995；Qian and Roland，1998）。"联邦制"起源于政治学，"财政联邦制"最初是公共财政学中用来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提供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把它扩展到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转轨中政府与促进市场成长的关系。

建立理论框架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做跨国的定量实证比较。比如，在我同合作者做的与俄罗斯的比较中发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本地经济发展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本地经济越发展，该地

方政府的收入越高。但是在俄罗斯，两者是完全不相关的。原因是，地方经济发展越好，中央政府拿走的钱就越多，多到正好全部抵消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好处。这种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它是激励理论的应用，但应用到了新的领域，就是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并且把地方政府的激励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Jin、Qian and Weingast，2005）。

第二个方面是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这个问题在概念上是产权问题、所有制问题。但是，仅仅限于基本概念上的讨论是不够的。到底激励在不同产权制度中、在不同的所有制形态下是如何作用的？如果我们把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的理论看作第一代产权理论的话，那么第二代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激励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后者为我们深入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产权问题提供了新的框架和有力的工具。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环境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规范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显然是很不同的。比如，我们不能假定在转轨经济的环境中，产权有法律保护下的安全性。这就使得现有的模型和结论不能直接适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的分析工具不能用。它们不仅能用，而且非常有用。在我与合作者的研究中，我们就是使用了“不完备合同”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正是由201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特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来的。

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假定产权在根本上是不安全的，这现实地反映了中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特点。“不完备合同”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控制权配置问题。我们的核心想法是，在中国，在缺乏产权的法律保护情况下，产权安全性的实际程度取决于企业产权控制权的配置方式。因此，企业的最终收入索取权的安全性是由控制权的配置而内生确定的。这就导致不同所有制形态下企业行为的不同以及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的表现不同。我们刻画了三类所有制形态：国有、私有以

及有地方政府参与的非国有非私有。特别是第三类企业所有制形态在中国非常普遍，尽管其具体形态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早期是集体所有制，是乡镇企业，后来是混合所有制等等。即便是今天的私有企业，在所有制上也不像发达经济体中的私有企业那样纯粹。

理论就是要从最简单、最少的假设出发，推导出可以检验的具有一般性的结论。同时，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必须要有证据的支持。我和我的合作者在上述问题的理论推导和为推导出的结论提供经验证据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研究（Che and Qian，1998；Jin and Qian，1998）。我们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不仅与我们的一些直觉相一致，而且又深化了我们的直觉。比如，在对20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这些企业中，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企业的比例并非随机分布的，而是有规律的：它们与当地的若干环境变量相关，包括市场环境、国有企业份额、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力量等。反过来，这个比例与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呈直接显著的正相关。因此，作用于企业的激励和作用于政府的激励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严谨的理论与细致的证据相结合往往是一个学术研究令人信服的关键。

第三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和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中的一个共同问题——“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最早是由科尔奈在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时提出的，对应于市场经济中的“硬预算约束”。他由此解释两种体制中的其他各种差别。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解释了计划经济中的特有现象，比如短缺，而且也为比较这两种体制的其他方面打开了新的思路。

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和激励理论为理解软预算约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分析工具。德瓦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和马斯金最先用博弈论的方法为软预算约束问题建立了理论模型，揭示了软预算约束现象在本质上是博弈中的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问题（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比如，当贷款

方发现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时候，仍然会有激励去提供再贷款，因为他事后理性地推断前面的损失是沉没成本，再贷款可以有利可图。所以贷款人事先做出的不给再贷款的承诺是不可信的。由于借贷人事先能够预计到此情况的发生，所以会非常理性地做出扭曲的决策，比如过度投资。这类不可信承诺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又在于政府垄断权力过大而陷入困境的"悖论"。从这里可以看到激励背后的制度根源。

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系统性地分析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的激励扭曲，进而推断出许多在硬预算约束下不会发生和出现的结果。比如，我在用软预算约束解释短缺现象的研究中发现，在软预算约束对企业激励产生扭曲的情况下，用价格机制无法纠正资源配置中的扭曲，造成短缺是必然的。因此，在软预算约束下的价格无法起到在硬预算约束下能够起到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作用。而这个结论即使对于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政府而言也同样成立（Qian，1994）。

在我与许成钢的合作研究中，我们比较了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经济中创新的不同特点（Qian and Xu，1998）。创新是一种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经济活动。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经济）并非完全不能创新，在某些领域（比如核能、航天）中，甚至可以领先，但是在其他多数领域（比如计算机、个人电脑）则很无效，尽管投入巨大。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软预算约束条件和硬预算约束条件下内生的对创新项目的筛选淘汰机制，推导出具有小概率成功的创新在硬预算约束下更有可能实现，因为不成功的项目会很快被筛选掉；而在软预算约束下却很难实现，因为不成功的项目很难被淘汰，使得事先不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平行项目。

我与罗兰合作建立的模型研究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层关系中，不同权力配置导致的三方的激励问题（Qian and Roland，1998）。在有软预算约束的环境中，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增加

政府支出的机会成本，所以可以减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后果，进而可以部分解决承诺的可信性问题。此外，中央政府对货币权力的集权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分权这一权力配置形式可以在减少通货膨胀的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这就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推导出前者的“竞争效果”和后者的“制衡效果”，而这两者是市场治理和组织治理中的两个根本机制。

四、学术研究的深层意义

对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的这些具体研究说明了怎样的一般性道理呢？它们说明了我们对制度、产权、所有制的研究，要放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放在具体的权力配置框架下，来探讨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对人的激励的影响。这些研究在理论创新层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识到在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激励扭曲下，许多理论分析需要遵从“次优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次优原理”为分析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很多问题打开了丰富的空间。

什么是“次优原理”？这要从“最优原理”（first-best principle）说起。它是指，在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这个扭曲就一定会提高效率，即是好事。同样，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增加一个扭曲一定会降低效率，即是坏事。这就是我们通常的直觉，也是我们通常分析问题的路径。我们在各种论坛上对改革问题的推断，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逻辑讲的。我们会先说某个扭曲不好，然后推论说减少这个扭曲的改革是必要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的，特别是在多个扭曲并存的情况下。

所谓“次优原理”，是指在存在多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一个扭曲未必提高效率，即未必是好事；相应的，在存在至少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个扭曲也未必降低效率，即未必是坏事。这里说的是可能性，具体结论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由于我们通常的直觉都是在没

有扭曲或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我们最初不会有“次优原理”的直觉，从而就容易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上面讲到的企业激励问题。在产权安全的情况下，私有企业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因更为复杂的代理人问题会造成更多扭曲。然而，如果是在现实经济中存在其他扭曲，譬如没有法治而导致产权不安全，那么纯粹的私有企业就会支付额外成本，以寻求对产权的保护。在完善的制度下，这是浪费的，但是在非完善的制度下，就有它的道理。因此，改革就有可能选择用一种扭曲去减少另一种扭曲，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保护产权免受上一级政府的侵害，这就有可能提高效率。这是运用“次优原理”的一个具体例子。

进而言之，“次优原理”导致“次优制度”（second-best institution），我也称之为“过渡性制度”（transitional institution）。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新结论，是前人没有讲过的。“次优制度”不是“最优制度”，也不如“最优制度”，这是显然的，因为其中有扭曲带来的成本。但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给定其他制度扭曲的情况下，“次优制度”可以改进效率，起到作为过渡性制度的积极作用。不过这个“过渡性制度”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它既要能提高效率（即把饼做大），同时又要“激励相容”，也就是让利益相关者都受益（即饼的分配可接受）。这在中国的改革中有很多例子。从长远来看，“过渡性制度”既有可能为过渡到更好的制度创造条件，也有可能阻碍未来的改革，这需要具体分析。

这样细致的分析在概念层面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超越经常听到的“中国模式论”与“简单化市场论”的争论。“中国模式论”倾向于认为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就都是好的。而“简单化市场论”倾向于认为凡是不是最优的市场制度，就都是不好的。而在现代经济学前沿分析框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可以既指出中国特色的原因和过渡性制度的意义，又明确它们的成本和局限性。

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直接产生政策影响，但是它会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问题。这对我们想清楚问题，避免陷入误区，十分关键。经济问题是复杂的。经济理论就是通过简单的假设、严谨的逻辑推理，推导出可以用经验证据检验的结论。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经济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比如反腐是最近的一个重大事件，腐败与反腐败都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有重大影响，其各自的结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非显而易见，需要细致的研究。

激励问题并非只是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而是一般性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关注度高的重要问题。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Growth*）一书批评了一个又一个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等，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伊斯特利在分析了大量经验事实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剂灵丹妙药呢？他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理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而我们的研究正是聚焦于具体制度环境中的激励问题，因此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启发。

再回到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这个争论结束了吗？可能没有。不仅一些转轨国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而且随着技术的变化，新的争论也会出现。比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会下意识地又想到计划经济。不过，机器不会代替人，因为机器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没有理想。但是，既然人有激情、有理想、有想象力，那么人就同时也会有激励问题。所以，激励问题是经济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技术如何发达。

其实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辩论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哈耶克在这个大辩论中最先提出了社会中信息使用的问题，特别是“本地信息”（local information）的使用（Hayek，1945）。在此之后，几代经济学家研究信息问题，并深化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以及在这些情况下的人的激励问题。机制设计理论、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等一系列理论都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如果计划经济的问题仅仅就是信息收集和计算的问题，那么随着计算机的进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计划经济似乎又有了希望。然而，只要人的决策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人的激励问题就是不能被忽视的。而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就为我们思考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力量和分析的工具。

***

最后我想谈三点感悟，希望对大家做学术研究、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做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

第一，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科学与工程的区别。学术研究是为了揭示基本道理，而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往往就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所以，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数学。既然是科学，理论就必须要有现实的相关性，必须要经过事实的检验。但是，现实相关性并不等于“立即有用性”，即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性。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后来被应用于无线电频谱拍卖，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并非他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始动机。即便是哈特的合同理论，与现实如此相关，也不是能够马上应用于具体的改革之中。但是，这并不降低他们的学术贡献的重要性。

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就是在理论框架中使用分析工具进行严密的理论和经验论证。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激励理论都是重要的框架和工具。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做出前人没有做出的工作。

第二，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和转轨问题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问题本身并非重要经济学问题的充分条件，当然也非必要条件。中国的经济搞得好与中国的经济学搞得好并不是一回事。要选择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做研究，是做有影响的研究的前提。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占人类1/3人口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会成为世界第一——在这些历史性事件中蕴含着不少重要问题，有待我们从中选出，并去研究，去探索。

现在中国高校中的经济学的知识性和技术性训练比20年前、10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如何做研究的技能也相应提高了。但是，“做什么”研究不同于“如何做”研究，前者是更难获得的。选择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远比学好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内容更难实现。2016年10月我参加求是自然科学奖颁奖，杨振宁在讲到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物理学中要做出伟大的工作，不在于技术训练，而在于选择重要的问题。他举了海森堡的例子：尽管他的论文中计算有误，但是他抓住了重大的问题。杨振宁认为目前中国物理学家做出突破性研究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而后者需要“科学传统”。物理学尚且如此，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是如此。选择重要问题的能力比技术能力更为重要，而科学传统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

第三，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我记得在2010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庆祝科斯100岁生日研讨会上，许成钢引用了《爱因斯坦文集》中《探索的动机》一文（爱因斯坦，1918/2009）。这是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爱因斯坦在讲话中说道，在科学的殿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的。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在我看来，科学探索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基于三种价值观：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发论文、出成果、评职称；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创国内一流、争世界一流、拿诺贝尔奖；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做研究是为了探索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

在今天的中国，具备第一类动机的研究者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研究者也有，而具备第三类动机的研究者就寥寥无几了。第一类研究者，虽然也能出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创造性，因为太急功近利。第二类研究者比第一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标，可以做出创造性贡献，甚至开创性贡献。但是，这不是科学探索动机的最高境界。诸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科斯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具备最高的境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

在经济学学术探寻的道路上，我们应有更高的境界。

部分参考文献

爱因斯坦，“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第170—174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

Che,Jiahua,and Yingyi Qian,“Insecure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Firm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May 1998,113(2),pp.467-496.

Dewatripont,Mathias,and Eric Maskin,“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October 1995,62(4),pp.541-555.

Hayek,Friedrich A.,“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5,35， pp.519-530.

Jin,Hehui,Yingyi Qian,and Barry R.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September 2005,89(9-10),pp.1719-1742.

Jin,Hehui,and Yingyi Qian,“Public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of Firms: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 1998,113(3),pp.773-808.

Montinola,Gabriella,Yingyi Qian,and Barry 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October 1995,48(1),pp.50-81.

Qian,Yingyi,“A Theory of Shortage in Socialist Economies Based on the‘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94,84(1),pp.145-156.

Qian,Yingyi,and Gérar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ember 1998,88(5),pp.1143-

1162.

Qian,Yingyi,and Chenggang Xu,“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Economics of Transition*,June 1993,1(2),pp.135-170.

Qian,Yingyi,and Chenggang Xu,“Innovation and Bureaucracy under Soft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anuary 1998,65(1),pp.151-164.

---

1. 本书中有些文章和讲话中的一些内容重合或相似。由于它们是在不同场合并针对不同受众发表的，为了保持完整性，在收入本书时保持原样。

2. 在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讲话。

第一篇 改革与发展

第一章 理解改革开发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与国际视角[注]

（2008年1月12日）

200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认真回顾和思考中国这30年历程，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十分有益。但更重要的是，思考要有一个合适的视角，因为不同的视角会对同样的事实做出非常不同的解释，并且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认为，如果要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认识，对中国未来进程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就应该采用历史的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践。

用历史的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我得出三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应该引以为豪的。但是，与东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的高速增长时期相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特殊。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还相当不健全，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不少。但是，不少问题（诸如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大致与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相对应，也并不特殊。第三，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也不特殊，那就是改革和开放释放出来的三种并不特殊的力量：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实行对外开放。

这三个结论传递了同一个信息。我们通常会觉得，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是独特的。同时我们也会觉得中国问题很多，引起我们的忧虑。我们还会认为中国的成功原因太复杂，并且都是别国不具备的。

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至今为止经济成功的原因，其实都不特殊。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否认中国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它并不是人们通常想的那些因素，而是在其他方面。我将在其他文章中论述中国的特殊性，而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论证中国的不特殊性。

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增长举世瞩目。图1.1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展示出这一增长的情况。

在这里我用经济史学家的数据，大致勾画了过去1000年按1990年购买力平价的不变价格来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我们从图1.1中看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后中国出现了过去1000年历史上从未见到的快速增长。当然我们要再仔细看一下，会发现有两个拐点：一个是1950年左右，但是最重要的拐点是1978年，所以我想从这一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也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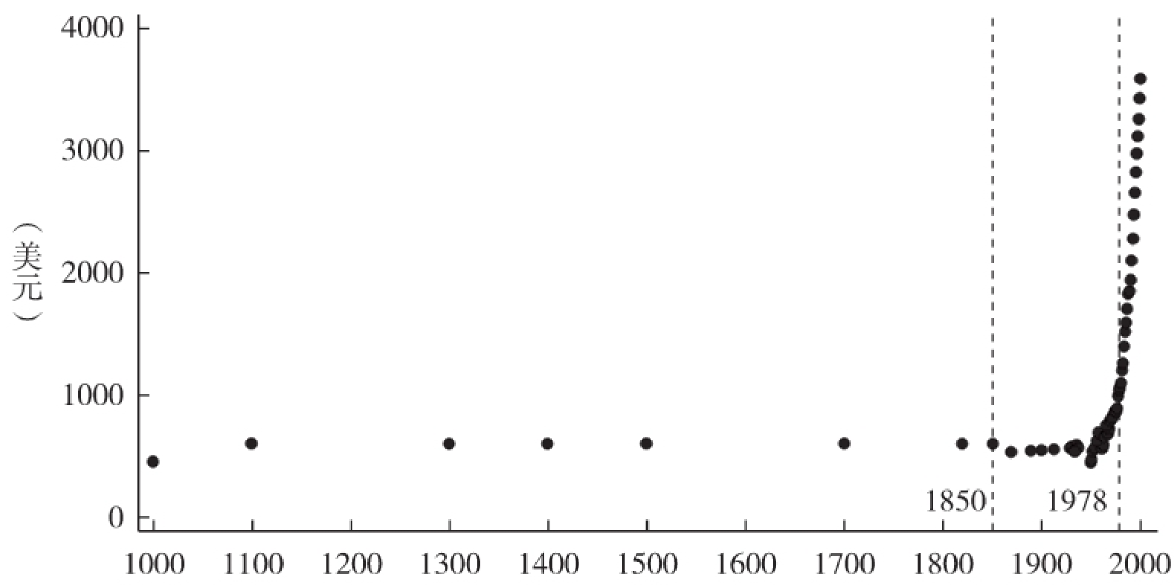


图1.1　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30年vs 1000年

资料来源：Maddison（2003）

图1.2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惊喜，也非常引以为豪，特别是作为中国人，特别是在过去人们并不认为中国可以做出这样成绩的情况下。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需要冷静分析数据和观察事实。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观察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我们拿中国同世界上其他的转轨国家做比较的话，比如波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典型的转轨国家，我们的结论当然就是中国很特殊，中国的增长遥遥领先。尽管波兰和俄罗斯也都在衰退之后有了明显的起色，但还是不及中国的增长。中国的增长似乎是很特殊的。

但是，如果把中国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另外在这三个部分之外加上越南，你会发现，实际上这四个地区增长的态势是很类似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不同的地区加上越南，与东欧国家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是中国和越南都处于东亚，与东欧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同。第二，是这两个国家与东欧国家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在改革初期是低收入国家，而东欧国家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这两个因素或许能够起到一些解释作用。

但是也不这么简单。如果我们拿世界上过去三四十年发展最快的一组国家或地区来比较的话，当然它们都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果从1978年开始来计算增长，并拿中国同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来比较，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是增长最快的，这也是我们通常所得到的结论。图1.2是以1978年为起点，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的增长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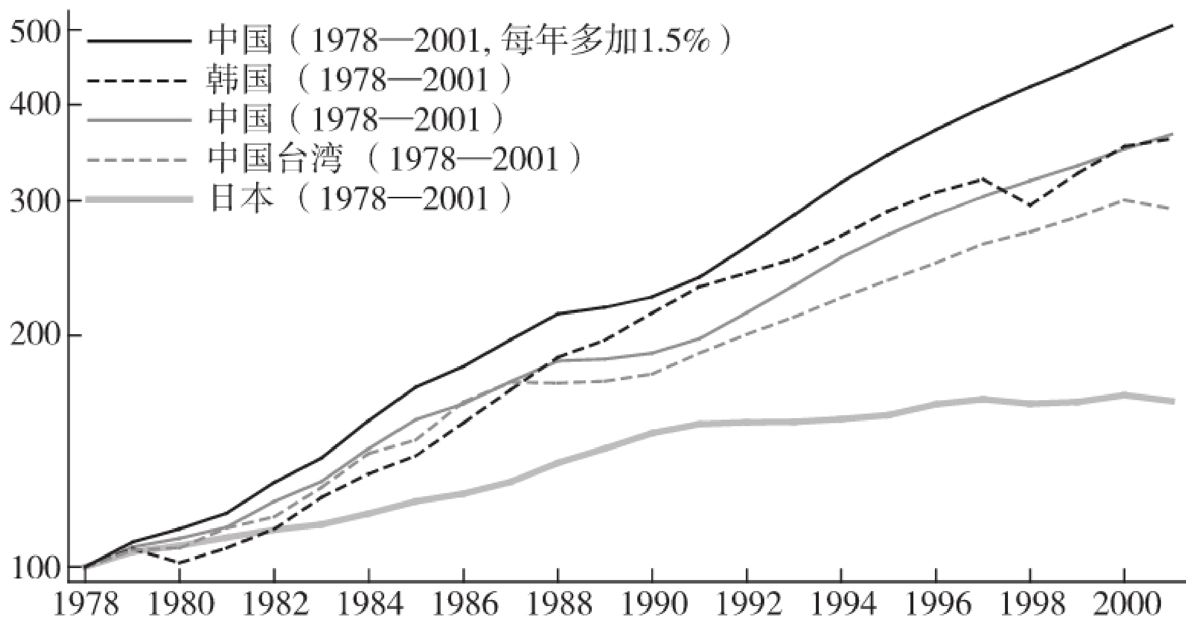


图1.2　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是最快的：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
（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纵轴取对数）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中国的数据有两条线，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对中国GDP范围的估计，上可能不会超过上面的线，下可能不会低于下面的线，因为对它的估计总是有不同的争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即使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

但是经济学家需要稍微想得仔细一点，不能简单地把一个图或者统计数据拿来，就相信从中得出的结论，因为这往往会被误导。事实上，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视角。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1978年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点在时间上是不同的，它们的人均收入和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重新画一张图（图1.3），日本以1950年为起点，中国台湾以1958年为起点，韩国以1962年为起点，中国以1978年为起点，那就很有意思了。这个调整主要是想说明人均收入和发展的起点在各个

国家和地区是不一样的，需要有所控制。还是刚才的数据，只是把起点重新调整，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令人振奋，我们也引以为豪，但是在这一组国家和地区中，表现得并不特殊。按照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非常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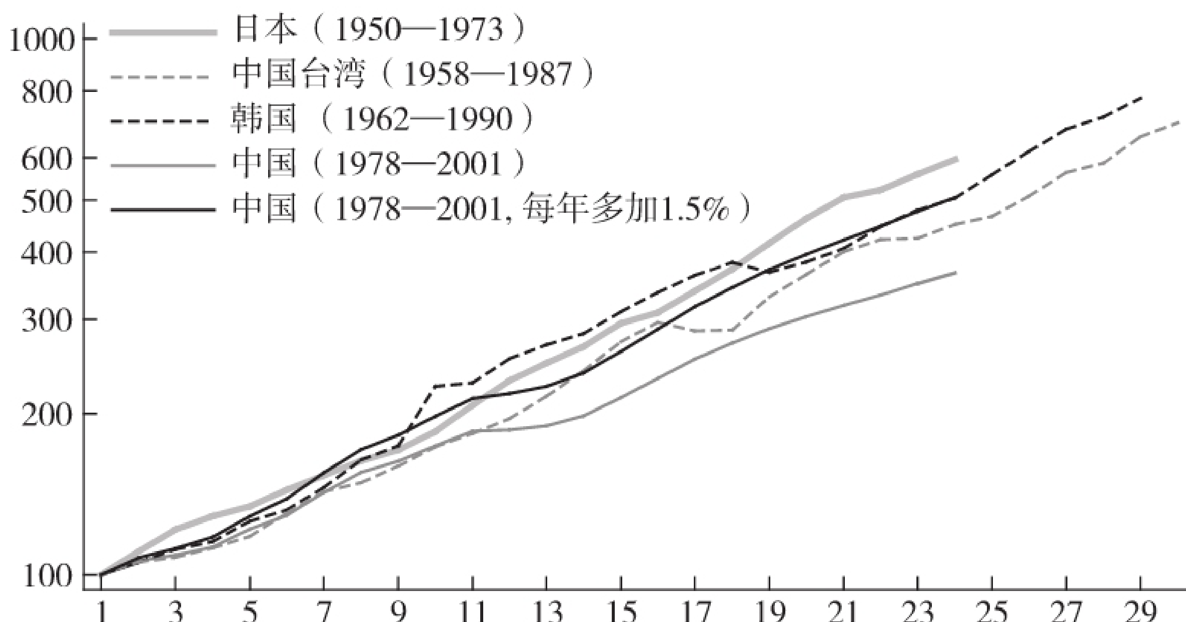


图1.3　重新取零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特殊
（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纵轴取对数）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所以我的第一个结论是，虽然我们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自豪，但是我们如果采用一种比较合适的国际视角，会发现这里面有并不特殊的一面。

二、中国出现的问题并不特殊

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在目前来看仍然相当不健全，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不少。但是如果我们采用国际比较的方式，也会发现，制度不健全或者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程度大致与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一致，

也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尽管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更好，希望我们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更少，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有它的一般性。

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法治指标，是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的法治指标。中国2004年的得分是40.6分，满分是100分。比我们好的有墨西哥、巴西、印度等，比我们差的有俄罗斯、秘鲁、乌克兰等。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分数我们并不感到满意，但是这个分数可能就是反映了我们现在的大致情况。

第二个就是腐败感知指标。按照这个指标，最清廉的有芬兰、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中国2004年排到第71位，在100多个国家当中比较靠后。像墨西哥、泰国这些国家在中国之前，但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在中国之后。这个指标也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也使我们感到中国在廉政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第三个是描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指标。我们都知道我国的基尼系数，无论在农村之内还是城市之内还是总体，都在上升，而且程度还较大。总体的基尼系数，1988年为0.39，1995年0.44，2002年0.45。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使收入更平等，腐败更少，法治更健全。但是，我们自然想问一下，跟周围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很特殊呢?

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来代表发展阶段。我们目前的人均GDP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巨大进步是从当时跟肯尼亚差不多的低收入水平上升到了低中等收入水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具体表现

为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基本上刻画了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

考虑到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如果跟其他国家来做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有趣的现象。首先我们来看法治指标与人均GDP的关系，我们发现两者是正相关的（图1.4）。当然我们不知道里面的因果关系，只知道越发达的国家，对应的法治程度越好，越落后的国家，对应的法治程度越低。中国基本上是在回归线的稍微偏下一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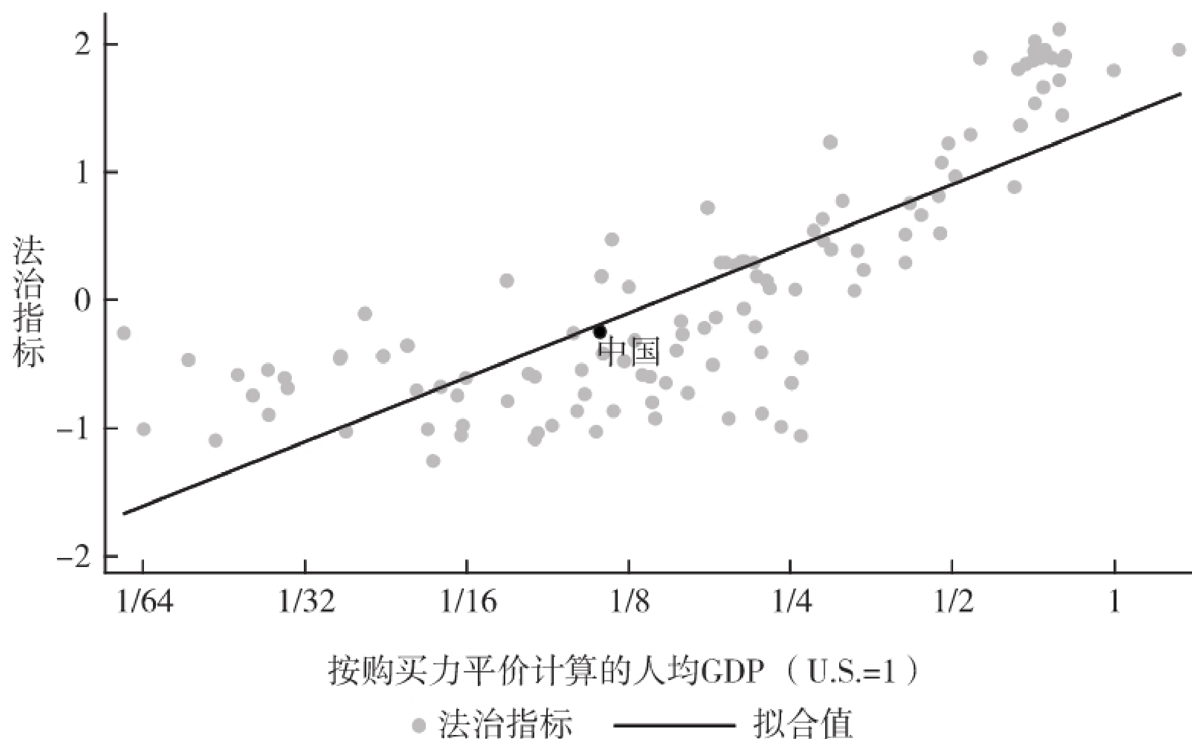


图1.4　法治指标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法治指标数据来自World Bank，人均GDP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

再看腐败感知指标与人均GDP的关系，中国的数据在回归线上（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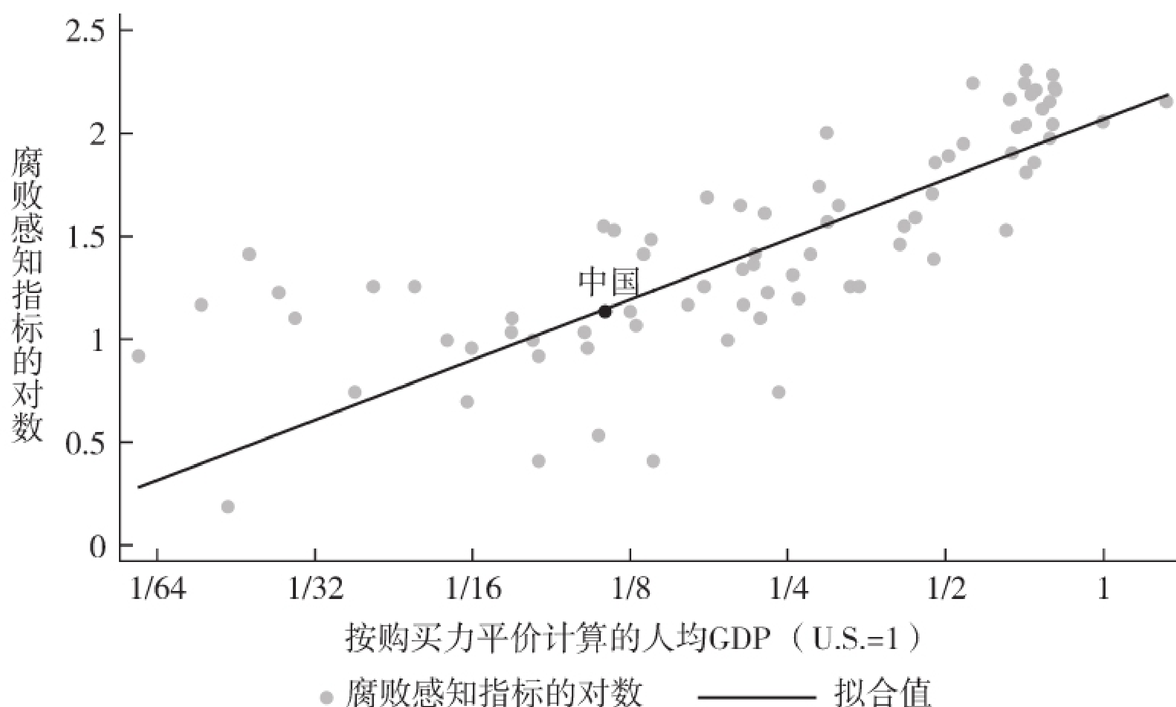


图1.5　腐败感知指标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腐败感知指标数据来自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人均GDP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

再看基尼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这就是“库兹涅茨曲线”。中国略在曲线的上面一点点（图1.6）。

这三个图表示，虽然中国目前有许多问题，很多制度不健全，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大致同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相一致，并不特殊。这一个观察很重要，因为很多国外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评论家，经常会抓住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就很快得出结论，说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我想这些问题多数是对的，比如腐败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分析说明，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目前的问题并不是这么特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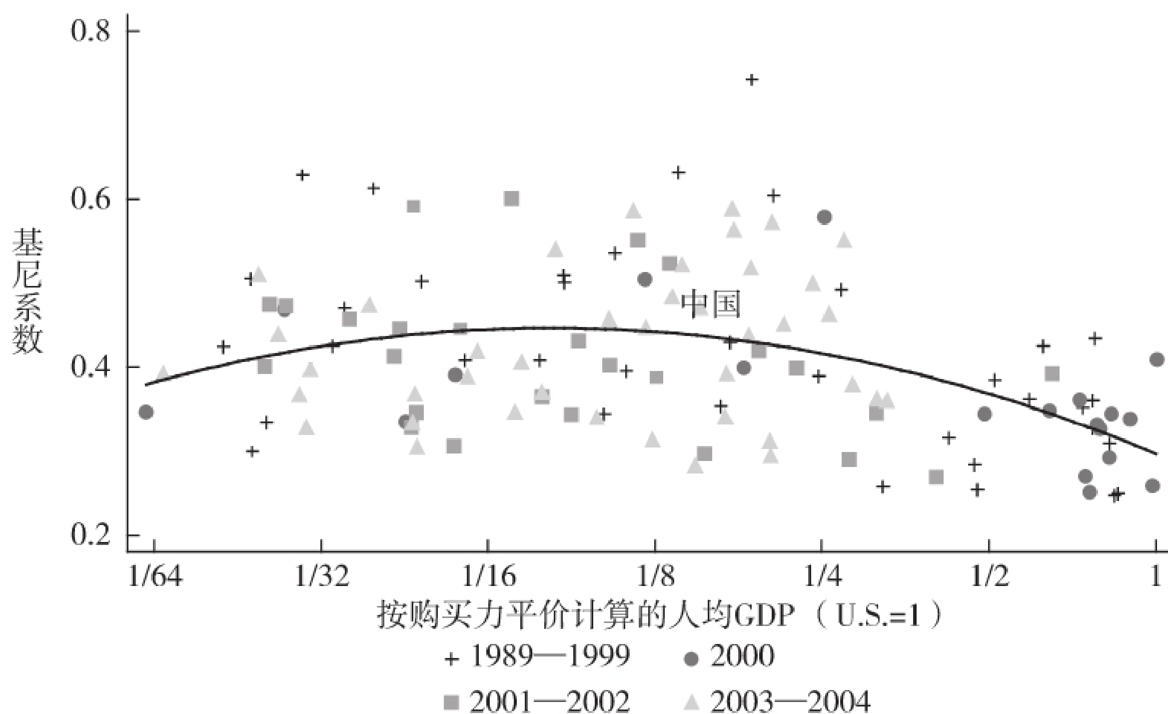


图1.6　库兹涅茨曲线：基尼系数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三、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特殊

中国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大国，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是在我看来，其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根本性的经济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前两项正是改革的内容，后一项正是开放的内容。所以，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是有道理的。

根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这也构成了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把激励搞对有很多种形式，比如放权让利是一种形式，承包是一种形式，产权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公司治理是更为复杂的形式，但是所有这些最终都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给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我们强调产权，强调制度安排的作用，最终它体现在把激励搞对上。在中国的改革中，把激励搞对不仅是对个人

的激励，对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包括对政府的激励。我们不能否认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把激励搞对应该说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清晰。

根本规律之二是让市场起作用，这也是改革的主线之二。什么是让市场起作用？就是用“看不见的手”，即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这里面也是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比如中国曾经采取的价格双轨制，看上去离标准的市场有距离，但是在边际上确实起到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虽然每一个市场发展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在发挥日益增长的作用。我特别想提到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有世界上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它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本规律之三就是实行对外开放，这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往往超过对内改革的程度。比如，我们发现在衡量自由贸易程度时，中国同最开放的国家比较接近，而其他反映对内改革的指标，中国大概在中等位置。中国的外贸总额与GDP之比2006年在66%左右。虽然中国香港、新加坡超过100%，但是它们是小型经济体。大经济体的这一比例自然比较小，因为省际贸易不计入国际贸易之内。美国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是25%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开放与改革相比，我们开放的力度比改革的力度要大。

四、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判断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在30年前没有预料到的话，那么今后30年将会比过去30年有更丰富多彩的结果，但是也将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基于三条主线之上。第一是发展这条主线。过去30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在未来30

年，中国将从低中等收入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为高中等收入国家，尽管还不是一个富裕国家。第二是改革这条主线。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在未来30年将从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基于法治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是开放这条主线。中国经济将从部分开放的经济发展到融入全球经济。

这三条主线中的任何一条，我们都会想到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发展到高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多数人口将成为城市居民，而不再是农村人口，意味着多数人口将成为中等收入者，这正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希望在2020年达到的目标。而其他国家的大量经验表明，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间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挑战。

第二，我们的市场经济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经济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滞，制度水平要与经济发展同步。经济学家们对一些倒退停滞的迹象表示了忧虑，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表示了担忧，所有这些都是在向我们说明，进一步改革的难度相当大。最后，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协调推进？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我想最具挑战性的一条，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一例崛起中的开放大国。虽然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开放的，但它们不是大国。苏联是一个大国，但谈不上开放。可以说，在100年前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开放的国家以后，中国将是第一例正在崛起的开放大国。

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在全球经济中如何调整自己和如何影响世界，将是未来30年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其间，中国将会经历不同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也不同于美国的历程。这里会有特殊性。

---

1. 在北京大学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收入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

改革的两大精髓：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

（2008年12月1日）

改革主旋律是减少政府干预

《第一财经日报》： 有关改革开放30年，有一些有趣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巨大，是因为政府起了特别大的作用，跟其他国家的改革很不一样，对此你怎么看？

钱颖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政府的重要作用是显然的。不过，要想真正认识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究竟是什么，就必须回顾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形。从1958年到1978年，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个时候，政府是无所不管的，没有民营经济，没有市场，有的是计划指令。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间段里，发展得很不理想，有很多波折。由此来看，改革开放重要的新举措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政府减少了干预，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发挥了企业的积极性，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第一财经日报》： 就是说，政府的作用发生了改变？

钱颖一： 是的。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新变化，其主旋律是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这并不否认政府在改革中的作用，一点都不否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改革之后与改革之前相比，主要变化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发挥基本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 也有一些人认为，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就是制度建设的作用。

钱颖一：政府在制度建设中的确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但制度也不完全是靠政府建设起来的。许多情况下，制度建设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比如联产承包制，就是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开始的，然后逐步推广。政府在推广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许多这样的制度创新是自下而上的。

固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也有不少。例如一些财税制度的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但是这些制度创新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往往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变化在先，而政府要顺应市场的变化，做出反应。所以不能说制度创新全靠政府。

以文化特性解释增长需谨慎

《第一财经日报》：有不少人说，中国改革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世界经济史上很少有这么长时间持续高增长的先例。对此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钱颖一：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作为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豪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得更宽一些，也就是说不光看中国，也看看周边的地区和国家，或者是整个世界，我们就会发现以平均9%—10%的增速持续增长二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第一例。在我们之前，如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新加坡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然中国比这些经济体规模大得多，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从持续的高速增长来讲，中国并不是第一例。而且，中国增长的一些基本因素，比如说高储蓄、高投资、注重基础教育、对外开放，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高增长的阶段也发挥过显著作用。因此中国并非特例，而是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一财经日报》：是不是可以说上述因素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普遍，存在一种独特的亚洲价值观？这种亚洲价值观对亚洲和中国

经济的增长有一种推动力，在西方比较少见？

钱颖一：这是一个谈论了很久的话题。我想可以这么说，大家都看到了一些共同点或者规律，就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比较高速的增长。人们想探究这是为什么，简单的一个联想，就是亚洲有独特的文化。但是要想在文化和经济表现之间建立起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家的说法全是反过来的，说为什么亚洲国家的发展不能跟西方比，就因为亚洲文化。现在，因为亚洲经济表现好，就马上说这也是因为亚洲文化。我觉得这些说法都过于简单了。我们看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储蓄率都很高，比如20%、30%，中国现在到了40%，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拉美、印度，过去储蓄率只有10%左右。人们很自然就会问，是不是因为文化差别呢？但是别急，你看看过去几年，印度的储蓄率也上升到了30%，拉美的储蓄率也上升到20%左右，那到底是文化的作用，还是有其他的未知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呢？我觉得简单地归于文化，是一个比较懒惰的做法。我并不否认文化的作用，但问题是文化的哪一部分起了作用？

中国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不是中国独有的，是一个很深刻的话题，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去理解。已有的研究，我觉得还不够，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改革精髓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30年改革开放，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要概括成功的主要因素，你会选哪些因素？

钱颖一：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如何诠释改革开放的精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按我个人的理解，中国改革的精髓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把激励搞对，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产权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改革最初阶段引入的承包制，后来

讨论很多的公司治理等，都是为了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仅仅有很强的激励还不足以发展经济——整个经济是由千百万人组成的，如何使每一个人的利己行为转化为全社会的福利，需要协调。市场通过价格、竞争等，能够使个人分散的活动增进社会的福利。这两条缺一不可。

《第一财经日报》：虽说这两条缺一不可，但在改革的实际过程中，先解决产权问题还是先建立市场机制却争论了很多年，这又是为什么呢？

钱颖一：我觉得，你提到的这种争论，不单单是理论上产权优先还是市场优先的问题。因为改革在实际过程中，要面临很多制约因素。所以在某些阶段，解决激励、解决产权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可能更大。在另一些阶段，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可能更大。除了考虑一定阶段下的收益，还要考虑一定阶段下引入这种或那种改革可能带来的成本。说到底这是一个收益和成本的衡量问题。从理论上说，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激励和市场都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这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和开放是否有主次关系或者先后次序？比如有人认为金融业应该改革在先、开放在后，过早开放有风险。你怎么看？

钱颖一：很难说改革和开放是一个简单的先后次序。我可以给你举出改革促进开放的例子，也可以给你举出开放促进改革的例子。过早开放有风险，固然是一种可能，但另一种可能是，不开放难以推动改革。比如银行改革，现在我们发现中国的银行比五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但是这个改革的成果是怎么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承诺2006年底金融业要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才使得中央下决心对大型国有银行做体制上的改变，如注资、股份制、重组、上市

等。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开放促进了改革的例子。改革与开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财经日报》：但可能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中国金融业还不够开放，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回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假设当时我国的资本项目完全开放，银行业比现在开放程度更高，那么中国也会和亚洲许多国家一起受到重创。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钱颖一：有一个明显的道理：如果你不出门，自然就不会被雨淋到。但问题是你不出门，也享受不到阳光。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相对比较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金融业还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开放，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但如何判断，中国是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相对不开放，还是说要继续推进开放，则是另外一件事。我认为继续推进开放，好处远远大于成本。

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经说过，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对此有些人提出不同看法，说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什么好坏之分。你有何回应?

钱颖一：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大家的讨论都是集中在计划与市场。计划是一种体制，就是资源的配置需要由中央统一部署；市场是另一种体制，大体上是企业、家庭、个人自己做出配置资源的决策。为了不在计划经济里绕圈子，大家都认同一定要有市场经济。但认同市场经济以后，同样也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市场经济，有些搞得比较好，有些搞得不太好?

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即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市场经济表现比较好。达不到这些要求，市场经济可能搞得就不好。我提出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都认同市场经济了，这个问题就更有意义。我们要探究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使市场经济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能够使它在增长以及其他方面都表现良好。同时，我们也要探究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但是表现不尽如人意。只有这样，对理解市场经济的发展、展望将来的政策才会有帮助。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哪几个要素?

钱颖一：这有好几个层次。这个问题同增长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演变是很有关系的。最开始经济学家认为某几个基本要素非常重要，比如投资、人力资本、劳动力的增长等。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等要素。再后来经济学家又发现，这还不够，制度很重要。近来又有经济学家把一些文化的因素也加了进去。这是对经济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现在，大家一般认为制度因素很重要。过去认为资源很重要，后来发现很多资源很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都不尽如人意。而东亚，包括中国，这个资源尤其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反而发展得比较快。这其中很重要的是制度因素。

中国经济还有增长潜力

《第一财经日报》：由于内外冲击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可以说眼前有一个“坎儿”。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无大碍，至少还能有20年到30年的高速增长；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坎儿”还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之前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未来如果没有一个大的突破，要保持过去若干年那样的高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你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何展望?

钱颖一：过去20年，每年我们都听到一些经济学家说，“今年是‘坎儿’”。

客观地来看，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十分可靠。我觉得中国还会有一段时间——具体多长很难说，可能有10年左右——还会有比较高速增长的潜力。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整体而言，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收入比较低的国家，资本整体存量比较少，所以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会比较高。高速公路、机场、铁路还有不少需要建，住宅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包括机器设备等都还有很大的增长余地。所以，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丧失了增长后劲，我觉得不现实。但是不是因为中国过去30年搞得这么好，下一个30年也能维持这么高速的增长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原因也是同样：在未来30年中的某一个时候，中国会超越世界平均水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到那时候，增长速度自然要放慢，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到时候会有一些现在所没有的新挑战。

《第一财经日报》：大约是什么时候？

钱颖一：这个很难说。有不少经济学家建立过不少模型，就我所见，有的说到2015年，也有的说到2018年。用来做预测的数据，都是历史数据，历史数据对预测未来是有一定用处，但要用它准确地预测未来，还是有困难的。很多变化，例如技术的变化，是很难预测的。这次金融危机就体现了这种困难，分析师们用的全是过去的数据，但一些技术创新，没有办法体现出来。在整体经济发展这个层次也有类似的困难。

《第一财经日报》：是不是从经济的几个基本要素，更容易看出经济增长的潜力？比如说劳动力，有很多人认为2015年、2018年或者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会遇到拐点。你对此有何预测？

钱颖一：关于中国的劳动力，我没有做过定量分析，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结果。就我了解到的来说，某一个年龄段、某一类型的劳动力是比较紧缺的。比如18岁到22岁之间的女性工人，可能比较短缺。但这种短缺是可以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得到缓解的，毕竟不是全面短缺。

美国金融危机，此国有化非彼国有化

《第一财经日报》：人们现在经常拿中国和美国来做比较，例如有人说中国在某一天就超过美国了。当前的金融危机似乎又让大家很有信心，有人说你看美国不行了，中国还是生机勃勃。你认为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状况，能不能做这种比较?

钱颖一：首先我想说，中国人喜欢拿美国做比较，或者只拿美国做比较，是有历史和文化原因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上最强的、GDP总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只是最近200年才失掉这个地位。所以中国人的心态是，我们有理由追求世界第一。有这样的志向，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还是应当有平常心。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美国也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但两个经济体毕竟是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按人均收入指标来看，中国现在的水平大致是美国100年前的水平。所以与其跟美国现在比，我觉得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跟美国80年前或者100年前进行比较。因为碰到的问题也很相似，像腐败问题、政府的监管问题等。关注现在的美国也是应该的，可以了解成熟经济体会碰到哪些问题，尤其是我们如何追赶。总之不应该脱离我们现在的基本国情。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之所以爆发那么严重的危机，就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过头了，所以美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比如对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钱颖一：我觉得用"国有化"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点误导性。在危机的时候，各方面都自顾不暇，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最后贷款人"，危机就会没完没了。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承担最后贷款人这个责任的，通常是政府（还有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在这次危机中，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就意味着，政府要出面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为了提供流动性，使整个经济再运转起来，必须注资。注资的结果，当然是增加了政府所持有的股份。但是也应注意到，西方国家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所获得的股份，往往是不包括控制权的一种所有权。这是个很明显的信号，说明目前的所谓"国有化"只是一个措施。所以，"国有化"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太妥当的，至少不应理解为中国人所惯于理解的那种"国有化"。

《第一财经日报》：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没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恰恰是因为中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低，或者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力很强；而美国出现那么大的麻烦，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力量太弱了，所以现在美国也需要加强政府力量。你对此怎么看?

钱颖一：至少是太简单化了，我觉得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比如中国的银行，国家现在持股水平是70%，跟国外完全私有的银行比，政府持股的比例是很高的；但如果跟过去比，过去是——就五年前都还是——国家持股100%。五年过来，从100%降到了70%，而我国银行的表现，应该说比五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这样来分析，可以说减少政府在银行中的股份，能够让股权多样化，是促进银行业绩上升很重要的一种手段。

30年后的中国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否可以为我们展望一下，30年后中国会怎么样?

钱颖一：30年前，可能没有人能想到中国今天会是这个样子。同样的道理，今天也很难想象30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但有几件事情我想可以肯定：如果不出意外，中国一定会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肯定比现在更开放。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会有很多。比如刚才我提到过，中等收入国家有5%—6%的增长就很了不起了。我们过去30年习惯了9%甚至更高的速度，一到8%就紧张。

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要住到城市里，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多数人在农村的，这是几千年来第一次中国多数人住在城市，会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开放也会带来挑战，我们现在的开放程度相当之高。但我们也知道了，开放会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巨大的收益，一定会有它的成本和代价。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绕不过去的，需要我们予以中长期的关注和研究。

---

1. 杨燕青采访，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2月1日刊。

经济转型的本质：政府与市场边界调整[注]

（2008年12月12日）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重新定位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主旋律就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得以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

当然，政府在改革开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政府在改革前后都发挥作用。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要去发现改革前后的不同之处，而不是只看相同之处，也就是要去发现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

在改革开放前，政府对个人、对企业、对经济是无所不管的，个人没有经济自由，企业没有自主权，民营经济根本不存在，市场基本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那就是政府减少了对个人、企业和经济的管制及干预。今天同30年前相比较，几乎所有关于政府管制和干预经济的指标，比如国有制企业的比例、有效税率、关税、对企业的管制、对产权的限制等，都大大下降了。改革之后与改革之前相比，主要变化是政府减少了干预，市场发挥了作用。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原因。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国家目前在最大的几家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大约是70%，这跟国外完全私有的银行相比，政府持股的比例是很高的。但我们能否从此得出政府持股比例高是中国的银行表现好的原因呢？不能。恰恰相反，如果同五年

前比，国家持股比例从100%降到了70%。所以，正是政府减少了在银行中的持股比例，让股权多样化，才促进了银行业绩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不是受命于外国思潮。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孤立的，而是符合世界潮流的。1979年，几乎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也如此。近来，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发现正是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大大减少，使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力大大增强。过去30年，正是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30年，脱贫人口较多的30年，也是创新活动较活跃的30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最近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由此引发的新一轮政府干预市场，并不能改变上述基本事实。这些事件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思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它们是否改变我们对改革开放30年的评价呢？是否修正我们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本判断呢？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必要在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区分三个不同：

第一，我们要区分短期与长期的不同。短期，特别是紧急状况下，政府的作用与长期是不同的。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政府必须迅速提供流动性，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有时还要使用一些不常用的办法，比如注资甚至接管金融机构和企业。这看上去似乎是在“国有化”。但是，这只是短期的“救火”措施，而非改变政府与企业边界的长期政策。比如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往往取得优先股，它不包括控制权。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目前的所谓“国有化”只是一个短期措施，它同我们所理解的政府长期绝对控股不是一个概念。现在并没有迹象表明在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有长期改变的趋势。

第二，我们要区分需求与供给的不同。政府在对待需求不足时的干预政策与政府在对待供给方面的政策是非常不同的，不能混为一

谈。在当前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增加政府的投资力度，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增加政府干预，减少市场的作用。其实不尽然。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方法是减少税收。这是减少政府干预的举措。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增加供给的方式主要是减少政府干预。增加供给的主要渠道是搞活企业，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激励。所以手段通常都是减少政府的过度管制，减少税收负担，提高经济自由度。比如，对于医疗、教育等服务性行业，增加政府投资是需求方面的措施，而放松对这些行业的管制，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则是供给方面的措施。

第三，我们要区分成熟体制的调整与发展中体制的转型。这次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的风暴，提出了政府监管的问题。但它的起因同金融创新有关。金融创新带来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技术创新有风险，金融创新同样也有风险。新的监管措施是为了适应新的创新。危机之后又会迎来新的发展。在成熟的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是受制约的。但即便是成熟的体制，也是要不断改进的。改进的动力仍然是创新。

而正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此不同。在法治还未确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人的意志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规范政府与个人、企业和市场的关系。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还远远不够。我们的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司法公正、市场透明、产业准入（特别是服务业）、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还远未完成。我们的问题是金融创新不足。

以上三点对正确认识中国的问题很有帮助。目前，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最为重要。

总之，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第一，我们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第二，我们的经济仍然是一个大而不强的经济；第三，我们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法治基础仍然很脆弱。

虽然目前大家很关注短期刺激经济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仍然是可持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而可持续增长恰恰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供给的问题，不是一个需求的问题；它所处的大环境是不成熟体制的转型问题，不是成熟体制的调整问题。所以，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要调整，主旋律仍然是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的作用。

---

1. 在2008年财经年会上的发言。

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

（2010年6月1日）

1994年9月，当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首次遇到钱颖一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留美经济学者的骄傲了：清华出身，上过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哈佛博士，而且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一系列的一流背景组合在一起，在当时，对中国人来说是太少了也太难了。

我们那时就成了朋友，常交谈，记得我回国前，他还专门请我去当地最好的中餐馆吃饭。交谈得多了，我受益不小。但对他做事过于认真的方式有些不解——我记得自己约过多次稿，颖一却从不答应，称不愿意轻易写文章。我问为什么，并且举了克鲁格曼的例子，颖一说，那他是成精了呀。我还差得远呢，我只能写想清楚了并且能讲清楚的事情，不敢随便写，所以无法答应你。我只能遗憾——这么成功的人，怎么还这么认真呢?

15年过去了，钱颖一更为成功了。他成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终身教授，接任前任总理朱镕基当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在国内外发表了更多的论文。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或者说较真，不轻易接受采访高谈阔论，很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国和世界重大经济问题进行思考，而且常有振聋发聩之语。他的“出声率”不高，但每出声便引人注目，令我深思。几个月前看到颖一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的讲话，不长，但意味深长，很震动。我明白因为时间限制，他没能展开地谈，更明白他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念缺失时期的中国发展，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终于找到一个周末，我请《比较》执行编辑肖梦“助战”，和颖一有了这次对话。

想说明，在我曾经采访过的许多人中，颖一是罕有的、非常喜欢说“这事我不知道答案”的人。那种决绝有时让提问者失望。不过，他谈“知道答案”的事，总是谈得很清楚。正因为此，在这个刚刚经历了金融海啸、人们多少有些茫然的时代，我觉得他谈中国、谈世界，谈发展方向，许多见解是值得体味的。

路径、目标、价值

胡舒立：我们认为，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而言之，无非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界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发生了不少争议和分歧，你怎么看？

钱颖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最突出，但这三个目标都还没有达到，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都是制度安排，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或价值。人类的终极价值，是诸如自由、福利、正义等最终目的。这些制度安排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机制。历史经验表明，正是在这些制度之下，人可以享受到最大范围的自由，发挥最大程度的创造性，生产力得到最大的提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矛盾能够通过可预见的规则缓和与调解，人有尊严，社会有公正。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受到广泛认可，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实现人的这些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各国在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方式和路径选择上可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各国历史和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改革就有中国特色，它反映在中国的改革路径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

胡舒立：是的，中国距离社会发展的目标还比较远，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钱颖一：中国30多年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从与这之前30年对比中就可以发现，是简单的三条：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再简单一点，可以概括为“放开”和“开放”两方面：前两条是“放开”，后一条是“开放”。当然，改革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我们问，哪些是与改革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那我的回答就是这三条。

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感自豪。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距离，还应继续改革。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应该承认，对于建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我们经验很少，还需要虚心学习。

我看了今年第4期《中国改革》上你的“对话”专栏。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先生提出，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展有“四大不协调”：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二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他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在于政府改革。他的观察是客观的，他的判断也是中肯的。目前，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关键就在于政府改革不到位。具体说就是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中，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约束和监督，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受到阻碍，而政府改革不到位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足。

冷静认识自己

胡舒立：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钱颖一：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表现突出，中国经济的相对实力大大提高，受到举世关注，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沾沾自喜。

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几乎没有悬念。现在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

2009年，中国的GDP接近5万亿美元，美国是14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35%。在未来的十几年内，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以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比率三项之和，其年均值不低于7个百分点的话（比如中国增长速度为8%，美国为3%，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人民币每年相对于美元升值2%），那么需要16年，即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如果不用名义汇率而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8年GDP则是美国的57%。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平均为6个百分点的话，那么需要10年，即到2018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在10年前，当我给出这些预测数字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如果说在10年前这种预测实现的概率为10%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概率就可能成为90%了。但是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持续保持上述这种增长速度。

胡舒立：那经济总量大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

钱颖一：经济总量大是有意义的。总量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关，与公司经营时考虑的市场规模有关，甚至如奥运会金牌总数，也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有关。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总量大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说话分量就不同，更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

但总量大也有大的难处。比如加入WTO时，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入世条件就更为苛刻。同时，经济总量大，国际各方面对中国的预期也不一样，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国家的规模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国内的通信业、银行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确实受惠于国内市场的规模。但是正如“资源诅咒”一样，规模大也会有不利一

面。在国家层面，大往往会带来搞产业政策、制定自己标准的冲动。在企业层面，因为国内市场大，走出去的动力就不足。这些事情在小国，比如新加坡，就不大可能发生，它们更自然地遵从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所以也不容易犯错误。

胡舒立：那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中国的发展可以“休整”一下吗？有些人说，“发展不是硬道理”了。

钱颖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远。30年前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现在算是低中等收入国家，还没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尽管中国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但还是要力求在发展中解决。我们不应被总量所误导。如果今年我们的GDP总额超过日本，由于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0倍还多，所以人均收入仍然不足日本的1/10。即使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时候，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5倍，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的1/4.5。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高速增长30年之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依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世界排名中仍在100名左右。在大国中，中国人均GDP虽然高于印度，但是低于巴西。

胡舒立：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否也增强呢？

钱颖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幸福感的关系比想象的要复杂。已有的研究表明，陷于贫困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但非常富有的人也未必幸福。从跨国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大致与幸福感有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在同一收入水平组之中，情况就微妙了。我看到的民意调查表明，欧洲各国中幸福感最低的是法国人，幸福感最高的是荷兰人；而在亚洲，幸福感最高的是印度人，最低的是中国人。就中国人而言，农村人的幸福感比城市人高，尽管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高出3倍多。

我曾经请教过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这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说这一点都不奇怪，通常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偏低，因为人们不满足现状，期望更好。城市的幸福感比农村要低，是因为城市人觉得，周围的人都比他更富有，而在农村，这种比较就不那么明显了。他说这些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

胡舒立：如果拿中国与外国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发展并不均衡。与国际上比较，城市差不多，但一旦离开了城市繁华地带，不但是农村，即使是城郊，差别都特别大。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钱颖一：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相当繁华，大都是在过去一二十年建设的。一些国内旅游者到了发达国家，发现它们的机场、基础设施、高楼大厦还没有我们的新，没有我们的现代化，于是就忽然觉得中国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全面比较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比较城市的繁华地带，更加客观的是比较“中位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就是把所有人的收入从少到多按序排开，看位居中间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

就“中位收入者”而言，中国的这些人目前还是生活在农村，而在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这些人早已经居住在城市了。解决发展不均衡的唯一办法就是城市化，使“中位收入者”和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

客观看待世界

胡舒立：谈这一切，特别是谈如何认识今天的中国，是离不开现在的全球经济大背景的。这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对中国、对世界，方方面面都有重大冲击。你怎么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钱颖一：过去二三十年中，比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但这次金融危机跟过去二三十年中的危机都不一样，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先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后来演变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最近又蔓延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目前日本的主权债务也很高，经济很脆弱。有意思的是，不仅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多少直接的伤害，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多少伤害。事实上，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表现都不错。所以，这次危机根本就是发达国家的“病”，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病”。

这显然与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中的缺陷有关，也同发达国家的政府不负责任的举债支出有关。相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本来就不发达，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汲取了过去的教训，不再靠通货膨胀来弥补财政赤字，并且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以防范风险。所以这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胡舒立：对，这是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灾祸——成人病吧，但这使市场的弊端暴露得比较清楚，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市场体制的反思。

钱颖一：发达国家应该认真总结教训。不过，我们也应该历史地看问题。这并不是发达国家第一次经历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我想追溯一下80年前的一段历史。那是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我们现在对“老上海”的记忆，就是那个“30年代”的上海，是抗日战争之前的10年。那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美国，1929年股市崩盘，30年代银行大量倒闭，随后是经济大萧条，失业率高达25%。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情况类似。而恰恰在同时，苏联终结了实施若干年的“新经济政策”，于

1928年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又在1933年至1937年期间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计划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暴露，一般人也看不到，而市场经济的弊端，反而看得清楚。但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在西方学术界出现过一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争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哈耶克发展出了他的关于比较经济制度的思想。他认为，评判经济制度好坏的标准是看哪个体制能更有效地运用信息。哈耶克所指的信息，并不是指专家所掌握的“专家信息”，而是指分散在市场的各个“角落”中的“本地信息”，而这些信息浩如烟海。计划经济体制依靠层层上报，最后把信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再由政府层层下达计划指令。哈耶克认为这种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方式成本极高，而且信息扭曲，所以计划经济的效率一定是低的。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分散决策，决策者可以就地及时地使用“本地信息”。市场最奇妙的地方是交易产生市场价格，正是市场价格累加了分散的信息，价格机制是最有效的信息传导机制。

当哈耶克批评计划经济体制并提倡市场经济时，不少经济学家都反对他。但在他1992年去世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计划经济国家都决定走市场经济之路了。他终于活到了共识形成，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

几乎是同时，同是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活力的根本，是在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之外的创新，在于“创造性毁灭”，在于那种颠覆现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创新。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是创业和“企业家精神”。今天，我们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提到如此高的地位，甚至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这一思想要追溯到熊彼特。熊彼特是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经济的优势的，他最担忧的是越来越强的官僚体制会扼杀创新，抑制市场经济的活力。

回过头来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这两大优势：有效地运用分散信息进行资源配置和分散决策引发的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就是在今天，在又一次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减弱。

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哈耶克和熊彼特的观点并没有受到很大重视。倒是凯恩斯的观点受到重视。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政府容易操作，短期内也能见效，因此就受到很大关注。显然，就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哈耶克和熊彼特对市场经济的观点更为深刻。

两种情结

胡舒立：现在处在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看上去躲过了危机，而且对缓解危机贡献巨大，“四万亿”受到广泛肯定。在国内，也有一些人开始热烈谈论“中国模式”，我感觉其中有不少混乱的认识。

钱颖一：我曾跟欧美学者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你们的伤害都在面上，是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经过这次危机相对地位上升了，是受益了，但这不是全部。因为我强烈地感到，如果这种受益使得我们不能冷静地认识自己，不能客观地看待世界，那么我们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就会走入误区，那对中国未来的伤害就会很大。这种伤害源于误读正在发生的事情，源于认识的混乱。而认识的混乱又会误导决策。

这种误读由于中国人从上到下的、普遍的两种情结而变得加重：一种是“大国情结”，另一种是“复兴情结”。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事实。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上领先，后来落后了。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回到历史上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下中华民族在“复兴”，这也是事

实。这两种情结单独来看，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两种情结会互相影响、互相加强，不断膨胀，则容易走向偏激。

如果我们处处以“大国崛起”故步自封，时时用“民族复兴”压倒一切，那就容易蜕变为狭隘民族主义。这既不利于中国融入文明世界，也不利于中国自身的长远发展。

胡舒立：中国还有一些聪明人，希望抑制这种自大情绪。但是，这种“复兴情结”其实挺重的。

钱颖一：伴随着“大国情结”和“复兴情结”的是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只要中国经济强大了，世界就会尊重你。这是搞混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经济不强大，别人肯定不会尊重你。但是，仅仅是经济强大了，也未必能受到别人的尊重。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只是中间产品，并不代表终极价值。

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是否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关键在于自己。只有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戒骄戒躁，才能确保中国改革的事业，以及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步伐不倒退、不停滞、继续前进。

---

1. 胡舒立采访，原载于《中国改革》2010年第6期。

第二章 透视经济增长

把激励搞对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2004年11月）

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热门研究课题。在理论上，“内生增长”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经验实证方面，新的思路、新的数据和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将有关增长的实证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比如，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传统变量外，经济学家也把有关地理的、开放的、制度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文化的变量包括在增长模型中。又比如，在数据分析中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用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应该说，今天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认识比20年前大大提高了。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领域无论从关注的问题到研究的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热点研究方向是发展战略，发展思路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浓厚。后来这些“大战略”多在实践中失败。这导致8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转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微观问题。比如农户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信贷市场的失灵和补救等。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小心求证，结论更为严谨，但多与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关系不大。在90年代以后，部分地受到转轨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重新回到研究重大问题，比如制度、政府和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影响。

伊斯特利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Growth*）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穷国的经济增长

问题。减少贫困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几十年的经验表明，扶贫是一项艰巨和困难的任务。事实表明，仅仅出于好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好的动机还可能引出坏的结果。比如，单纯地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助和外国援助并没有达到好的减贫效果，反而增加了腐败。本书的出发点是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至关重要。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本书所引的经验证据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学家根据对65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数据的研究，发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贫困率快速下降，而经济衰退则导致贫困率上升。比如，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下降9.8%，那么该国的贫困率每年增加23.9%。反之，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8.2%，那么贫困率每年减少6.2%。因此，GDP增长并非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神话，GDP不仅对一国的发展有益，对减贫也非常重要。

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对穷国的经济增长展开分析。由于作者长期在世界银行——世界上最大的以扶贫为目标的国际组织——工作，对国际上主流的政策思路和实施有着直接的了解；同时作者又是这些政策的批评者，这更增加了本书的分量。除了通俗易懂外，在使用的方法上这本书有两大特点：第一，全书紧扣增长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概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贡献。从50年代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到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对其主要思想结合穷国的现实做了讲解。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作者都是以准确地理解理论为出发点的。第二，作者引用大量的实证分析的结论，用数据论证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不少理论推出的政策性结论被事实推翻。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新的数据的搜集，对数据的仔细分析形成近年来研究增长和发展的主题。本书在方法上的这两方面都会对我国的读者有启发。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在这两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一些研究往往对理论不深究，浮于表面，对理论的逻辑推理，不够准确。在事实检验上，我们有的研究不看数据，有的研究即使用数据，也常流于简单的数字，缺乏对数据仔细深刻的分析和解释。这本书就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告诉我们如何做到分析应有理论，理论要有检验。

本书用理论指导，让事实说话。它有两大主线。首先，本书尖锐地批评了一个又一个所谓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这些药方大多是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政策。但事实证明它们大多在现实中是无效的。本书对这些药方，包括增加外国对穷国的援助、增加国内投资、提高教育水平、减少人口、与改革挂钩的外国援助、外债减免等一一做了分析。从对数据的分析上看，它们都没有起到提高穷国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empirical）问题。

为什么呢？作者认为这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是没有很好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有关人的激励问题。这构成本书的第二条主线。作者认为，激励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的激励。如果外援落在一个腐败的政府中，它当然不会提高增长。如果外债减免给予政府今后可以得到更多贷款的激励，这种减免也不会对增长有益。其次是私人部门的激励。如果私人部门从“寻租”中获得的好处大于从生产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这种激励将指挥他们致力于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在不少国家，表面上看似对穷人有利的福利政策，反而成为对穷人努力的惩罚，因为一旦他们经努力脱离贫困，便失去了福利。第三是援助者的激励。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有其他的目的（政治目的、生存目的等），并不同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完全一致。这就使援助的效果受到影响。

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没有“把激励搞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那么“把激励搞对”是不是又一剂灵丹妙药呢？作者认为它只是一个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一剂处方。把这一原理付诸实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这正是本书作者认同的所谓“增长共识”。经济增长和扶贫问题具有全世界的共性，具有一般

性的规律，中国自然也在其中。“把激励搞对”既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没有“把激励搞对”也是目前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坏政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杀手。那么什么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坏政府呢？作者发现多利益集团下的弱政府往往导致“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因此产生坏政府。这是因为缺乏共识，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更可能实施“杀鸡取卵”的经济政策，摧毁私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本书通过事例说明，这种情况在多种族国家（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国家（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更容易产生。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这本书对关心增长和减贫问题的读者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虽然它没有分析中国的情况，但由于中国面临类似的问题，它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领略经济学理论的魅力和经济学家对数据的实证分析的力量，从而理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结果之间真正的关系。我希望这本书对思考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

1. 为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中文版）所作的序。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2005年3月21日）

近年来关于GDP的批评日益增多。即使数字没有弄虚作假，GDP仍受到两项指责：一是GDP片面反映经济发展，二是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不好。不过，当我们更深入地考察GDP时，发现它所反映的比想象的要更多。

作为反映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GDP比任何其他描述某一行业或产业的指标更能反映经济全貌；GDP衡量的是全部生产和服务创造的增加值，比衡量总值的指标（比如总产值）更少重复计算；又因为GDP不用成本、利润等会计方法，因此计算时较少“灵活性”，尽管不能完全避免。虽然GDP并不完美——比如它不包括闲暇、环境质量和家庭内部经济活动——但是目前它仍然是在可比的、单一的经济总量指标中最好的。

GDP没有直接反映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其他因素，这是人们认为它片面的原因，并试图引进更为全面的指标。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引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它除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还包括了“健康与寿命”和“教育与知识”两项内容。该署2004年的报告按照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和人类发展指数分别对177个国家和地区做了排名。从图2.1中我们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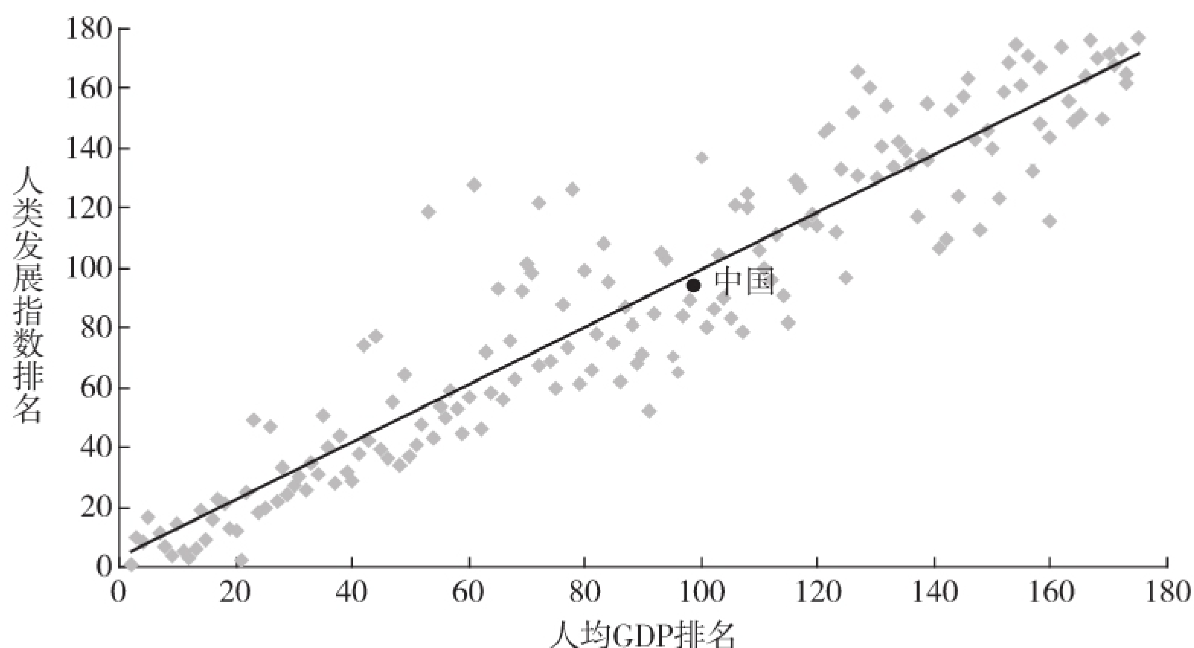


图2.1　各国和各地区人类发展指数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UNDP

第一，两项排名的相关度非常高，人均GDP高的国家或地区人类发展指数也高，反之亦然。这一正相关性不无道理。虽然高GDP并不自然导致高人类发展指数，但是高GDP使得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变得更为可能，因为人均GDP越高的国家越有经济条件提高健康水平、延长寿命、增加教育投入、提高知识水平。而低的GDP使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变得困难。

第二，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580美元（2002年数据），排名99，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则为94。代表中国的点非常靠近世界的“平均线”，并在其下方。这说明当前中国广义的发展水平与GDP水平并不偏离世界的平均状况，而且GDP水平相对于人类发展指数水平稍微拖后。因此，至少这并没有显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发展已经失衡。

GDP增长速度的重要性，不仅仅由于它衡量经济总量本身的发展状况，还因为它与我们关注的其他因素相关。比如，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推动力。世界银行的一项对65个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的研究发现，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下降9.8％，该国的贫困率每年增加23.9％；反之，如果一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1.6％，贫困率每年减少0.6％，如果人均收入每年增长8.2％，贫困率每年减少6.2％。中国的贫困率在过去26年中大幅下降，正是经济高速增长所致。

比较中国与印度时，人们总会问——“印度能超过中国吗？”答案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印度的人均GDP是中国的2/3。印度和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1980—1990年分别为5.8％和9.3％，1991—2000年分别为5.6％和10.1％，在2001年、2002年、2003年印度为3.9％、5.0％、7.2％，中国为7.5％、8.3％、9.3％。印度的GDP增速仍然低于中国，人均GDP增速就更低了，因为印度的人口增长率高于中国。因此，到目前为止，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只是扩大的速度在降低。一旦有朝一日印度的GDP增长速度高于中国，那么印度超过中国就会变为现实。

中国过去26年的年均9%的增长速度并不过高，也非奇迹。因为一国的增长潜力与人均GDP水平有关，穷国的潜力比富国的高。发达国家年均增速3%左右，中等水平国家年均增速5％左右，低收入国家年均增速7％左右，都是值得敬佩的增长速度。东亚国家和地区往往在此基础上高出1—2个百分点。中国仍属低收入国家，又地处东亚，8％—9％的年增长率并非异常。把中国的增速同发达国家或世界平均比较没有意义。

在国际上，中国当今之所以受到空前的尊重和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要用一个数字来概括中国的成就，那就是超过10亿人口的经济年均9％的GDP增长。从国内政治来看，经济的高

速增长是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经济增长越快，社会越稳定，政权也越稳固。

虽然GDP高速增长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高速增长是万万不能的。

---

1. 原载于《财经》2005年第6期。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注]

（2005年5月11日）

今天我想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为9.4%，也就是说到2003年我们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9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也增长，大概平均每年增长1.3%左右。按人均GDP来看，如果以1978年为100，到2003年的时候也将近6倍多到7倍的水平。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怎么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没有办法来对它进行解释？跟它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非常怀疑态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对中国经济情况并不了解的人，另外一种是对中国非常了解的人，他们看中国的问题非常深入。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家里的问题，但是也许不知道每个人家里都有类似的问题。

不过，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适当地放在世界经济之中，并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来做一个评判的话，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下面将中国跟三个地区来做比较：第一个地区即苏联、东欧和其他转轨国家。一个很显然的原因是我们跟这些国家有相近的计划经济历史，但是有非常不同的转轨经历。第二个地区是与我们相邻的东亚地区，因为东亚地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业绩。把中国放在这里面来看的话，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东亚整体增长中的一部分，尽管人口上我们是其他东亚国家的3倍（我们是13亿人口，其他东亚国家有4亿多），但是从增长的性质以及增长的持续性等方面来看我们都有非常类似的地方。第三个地区我想讲一下美国，为什么要讲美国？现在美国是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这

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在比较经济增长方面，国外的经济学家不会拿中国和美国做比较，只会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印度来比较。我们拿中国和美国相比，这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因为我们曾经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大国，所以这种比较在我们的心理上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我们主要与美国100多年前的情况做比较。

中国是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似乎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仔细琢磨，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主要取决于你的起点是哪年。中国人喜欢把起点放在1978年，即改革开放的前一年，但是如果你选1965年做起点的话，中国就不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了；增长最快的国家应该是博茨瓦纳，非洲南部的一个国家。就因为起点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两国增长率的差异。博茨瓦纳有着非常不利的经济环境。它在非洲的地理位置不利，它是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其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钻石，然而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资源丰富容易造成寻租和腐败。

经济学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增长率跟美国和欧洲比，原因是两者比较的基础不同。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能达到3%的增长率就相当不错了。中等发达国家像波兰、巴西、俄罗斯能达到5%的增长率已经非常不错。比较穷的国家7%—8%的增长率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不同水平的国家有不同的增长标尺。我们知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穷国的增长潜力大于富国，这是报酬递减规律。由于富国的资本已经很多，而且处在了技术前沿，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它的资本回报就比较低；而穷国的初始资本很少，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它的边际产出、资本回报率会高。它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发明的已有技术，这叫追赶效应。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所有穷国都会比富国增长快，这取决于其他因素。事实上，你若把100个国家的增长率和它的人均GDP做一个回归，就会发现中间的关系不大，也就是说，理论上的“绝对趋同论”不成立。但是，当国家采取了比较开放和市场导

向的政策时，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确实比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要快。

一、转轨国家

下面先讲转轨国家。这些转轨国家分布在三个地区：一个是亚洲（中国和越南）；一个是苏联地区（以前有15个加盟共和国，后来变成了15个国家）；再一个是东欧地区。每一个地区选取一个最大的国家，在东欧地区里面选取波兰，苏联地区选取俄罗斯，亚洲地区选取中国。假定波兰以1989年为100，俄罗斯以1991年为100，中国以1991年为100，那么你可以发现中国的增长当然是非常快的。从东欧的情况中你可以看到波兰经过一个阶段的衰退之后有比较持续的增长。而俄罗斯的情况远不如波兰，即使到转轨后的6年或8年还在谷底，根据官方的数据，直到去年俄罗斯还没有恢复到1989年的经济水平。

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三类情况：一类是完全恢复到甚至超过转轨前水平的国家，波兰在这里面是表现最好的。中间这一类国家则是像俄罗斯的情况，俄罗斯虽然得到很好的复苏，但整体情况不够好。还有一类国家的情况更糟，其中包括乌克兰，你可以发现它们的经济水平大大远离1989年的水平。中国的增长，事实上也不平衡。东部沿海11个省，西部12个省，中部8个省。东部沿海39%的人口占57%的GDP，而西部这么广阔的地区只占17%的GDP，非常不平衡。如果以1978年为100，东部的增长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去年我去过目前跟中国80年代经济水平非常接近的越南，它的发展趋势跟中国的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中国跟东欧有许多地方是不可比的，而跟越南之间则有很多可比的地方。特别要说明一点，中国和东欧的比较需要非常小心，两地确实初始条件和环境非常不同。中国的起点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东欧国家是工业化国家，只不过它们的工业化结构非常不合理。

东欧的情况值得进一步分析。经济学家或许会说计划经济激励非常低、资源配置非常差，这个错误决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效率低

下的经济，改革就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为了使市场发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作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改革以后经济会出现蓬勃发展，绝对不会出现我们后来观察到的经济大衰退。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东欧国家的转型期衰退有多种原因：第一，是1989年或者1991年，也就是改革转轨前的估计可能过高；第二，是外贸体系崩溃；第三，是过紧的宏观调控；最后，是经济学家比较新的说法，就是计划经济崩溃之后，市场体制未能有效工作。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复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文献发现，不管是中国还是波兰、俄罗斯都存在共同的一点，就是创新自由企业的崛起。在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国家，搞快速私有化，事实上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帮助，真正的增长点都是那些新进入的企业而不是私有化的企业和已有企业，这个规律在各国都成立。后来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中国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比如通过上市和股份制改造等，还是在苏联和东欧那样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都不那么重要，真正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是科尔奈（János Kornai）所说的“有机增长”。

因为多年来关注制度建设问题，现在关于制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经济学家们不仅仅停留在说制度很重要，而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你怎么衡量制度，要定量化而且还要有可比性？第二，到底制度与经济水平、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第三，好的制度从哪里来？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举一例子：经济学家一直想要找到证据来说明实验对象，比如明晰产权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可惜的是，经济学不像物理学那样容易随机找到一些实验对象，然后通过做实验来证明。但是偶尔也能找到这样的机会，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在秘鲁就找到了这样的机会。

秘鲁土地产权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土地确权，让人们拥有土地的产权，在推行这一改革的时候，采取随机的办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通常的理论，包括国内关于土地改承包制为可转让的很多讨论，都认为土地不流动、不私有化是效率上的损失。土地不能转让、不能买卖，就不能用作抵押，进而银行就不能贷款给农民，这样农民就不能扩大再生产。所以土地产权不清晰就会影响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运作不灵，资本市场不灵就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后来有经济学家用很多数据证明，经验数据中找不到这种关系。但是，这位教授发现了另外的效应：土地确权对节省劳动时间有帮助。为什么？因为农民看管土地的时间减少了。原来土地产权不清晰时，他们要经常看管土地，因为怕被别人侵占。这个例子表明，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于我们原先所想象的结论，也就是说做研究可以发现新的事实。

接下来讲关于衡量制度质量的指数。东欧一些国家的制度水平跟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水平相比较，质量是很高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地理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很多关于增长的模型中，经常要把纬度的变量放进去，纬度也可解释很大一部分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同。我们以前总是说南方和北方，北方是发达国家，南方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地理划分。其实，这里面也有很简单的经济学道理。在南方，天气非常炎热，在科技发展前的年代，细菌容易生长，人容易得病，因而寿命就短。所以，比较冷的地方更利于生产的发展。这也是发达国家比较靠北的原因。由此看来，地理和环境与经济增长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在以前我们很少发现在赤道附近的国家能发达起来，所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是奇迹，当然这和空调的发明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谈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时，有人说是网络，有人说是电力，而新加坡人说是空调。后来经济学家又把这个变量稍加细化，加了二次项，发现纬度变量也不是单调上升（即越北越好）的，我们知道北极圈里并不好，最优的点在北纬32度上下。

关于中国的增长是不是所谓的奇迹或者是不是特殊情况，经济学家一般的办法就是分解增长的原因。在过去十几年中，很多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有中国，还包括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根据其中的一种计算，物质资本的增加在增长的原因中是第一位的，大概占62%，劳动力的增长也有相当大的贡献，约占10%，当然还有20%多是剩余量，经济学家喜欢把这个剩余量叫作技术进步或制度变化。

总之，跟东欧相比我们确实起点非常不同：第一，是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收入水平非常低，而东欧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第二，是我们当时的开放程度不如东欧国家。当时我国跟西方国家断绝了经贸往来，也跟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断了联系，当然，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日本和联邦德国进口了一些工业设备，像四川有些三线工厂里有很多设备都是联邦德国的，但整体而言我们是非常封闭的。第三，当时我们的工作重点是阶级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以及改革开放的决定。第四，基本没有物质激励机制。

如果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评价中国的市场发展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从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灵活的，这个灵活程度不仅仅相对于发达国家，也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常发达国家有更多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性措施。第二，绝大多数市场（包括产品市场）都是非常有竞争性的，特别是出口，有些甚至变成了恶性竞争。第三，我们的资本市场虽然效率还是非常低，但幸运的是，储蓄率非常高，占GDP的40%多。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一个补偿。

接下来看一看中国的制度质量。以腐败、最高边际税率、政府规模、自由贸易和政府监管等指标来看，中国目前的制度质量水平和世界高水平相差甚远，但其中有一个指标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即自由贸易指标（图2.2）。我国开放的步伐远远快于改革的步伐，而开放的

效果往往比我们设想的要好，制度改革方面我们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制度质量指标最高的是新加坡、中国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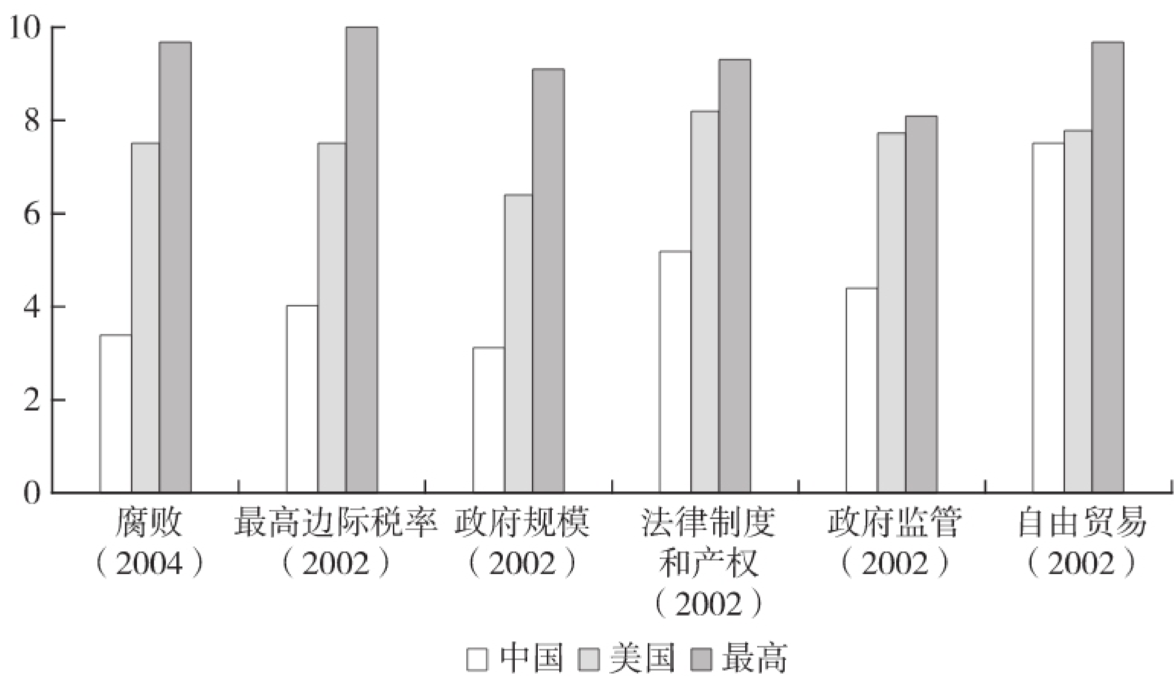


图2.2　制度质量的比较

资料来源：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二、东亚

第二是拿中国跟其他东亚国家比较。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东亚奇迹》一书，因为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确实没有一组国家有二三十年超过8%的增长。在非西方、非基督教、非白种人的经济体中，日本第一个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这是开创性的。后来还有韩国、新加坡等，这些经济体非常快速的增长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为7%的增长意味着每10年就翻一番，20年就变成了4倍，这是非常快的增长速度。像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整个20世纪100年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2%左右，每35年翻一番，100年一共翻了三番，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但是，这些国家居然能每10年翻一番。后来中国也复制了这样的成果。

把中国放在东亚国家里面看，其实一点都不特殊。麦迪森（Angus Maddison）把中国官方公布的年增长率减掉了1.5—2个百分点，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数据过高地估计了实际增长率。然后你看图2.3中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若用麦迪森的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增长太慢了，所以中国的增长并不特殊。特殊的是我国拥有13亿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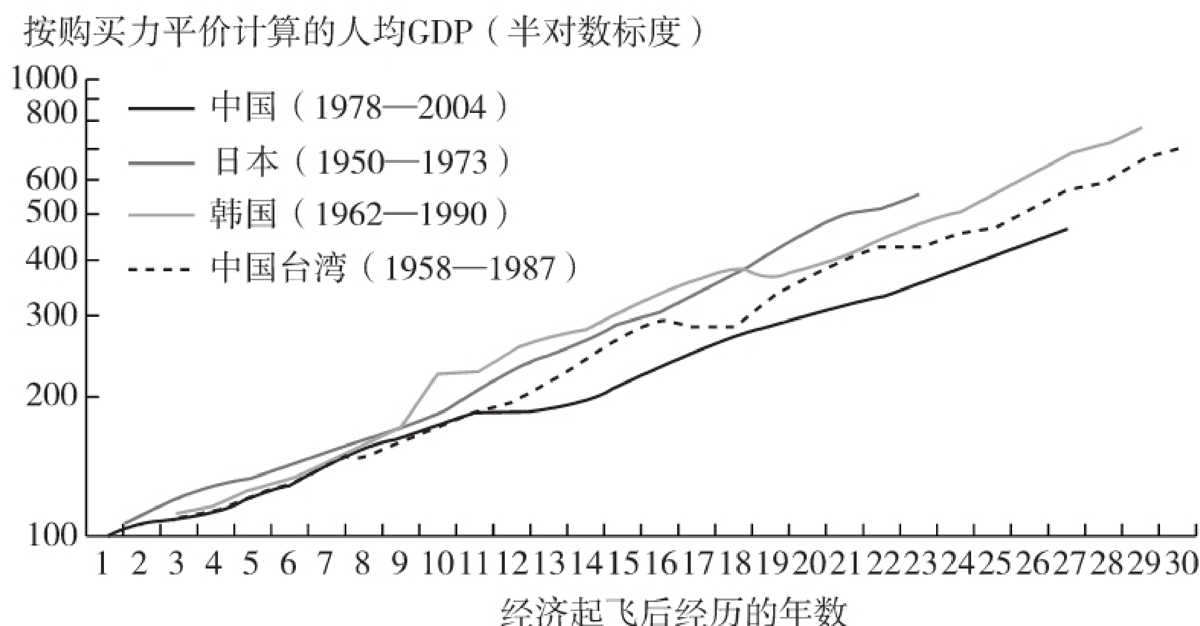


图2.3　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取起飞年为100）

资料来源：*Financial Times*

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经济体有同样稳定的宏观经济，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非常高的投资率。中国现在投资率是40％，这是非常高的，其他东亚经济体一般都是35％左右。在东亚经济体中，高投资率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而在拉美和印度被认为在15%和20%的投资率也是正常的。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都非常注重基础教育，使得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上工人的素质比较高。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出口比重较大，劳动力市场都很灵活。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问题相当多。有人说是经济增长太快了，金融体制才出现问题。支持这一观点的是一

个简单的事实，印度的金融体制坏账特别少，主要是因为银行对贷款对象审查非常严格。美国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银行倒闭非常多，那时候正好也是经济增长非常快的时候。当然还有其他解释，例如可能这些国家都缺乏法治建设等等，所以金融市场就需要法治的支持。此外，金融市场的回报有时间差，投资都非常分散，因而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所以必须有一套制度环境来保障。

三、美国

最后同美国比较一下。美国是在1900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在10年后按购买力平价超过美国，这也是麦迪森教授的研究结论。图2.4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1821年仍然是世界第一，鸦片战争之后就一直衰落。1952年后逐渐增加，改革开放以后加快。根据图2.4，到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又会成为世界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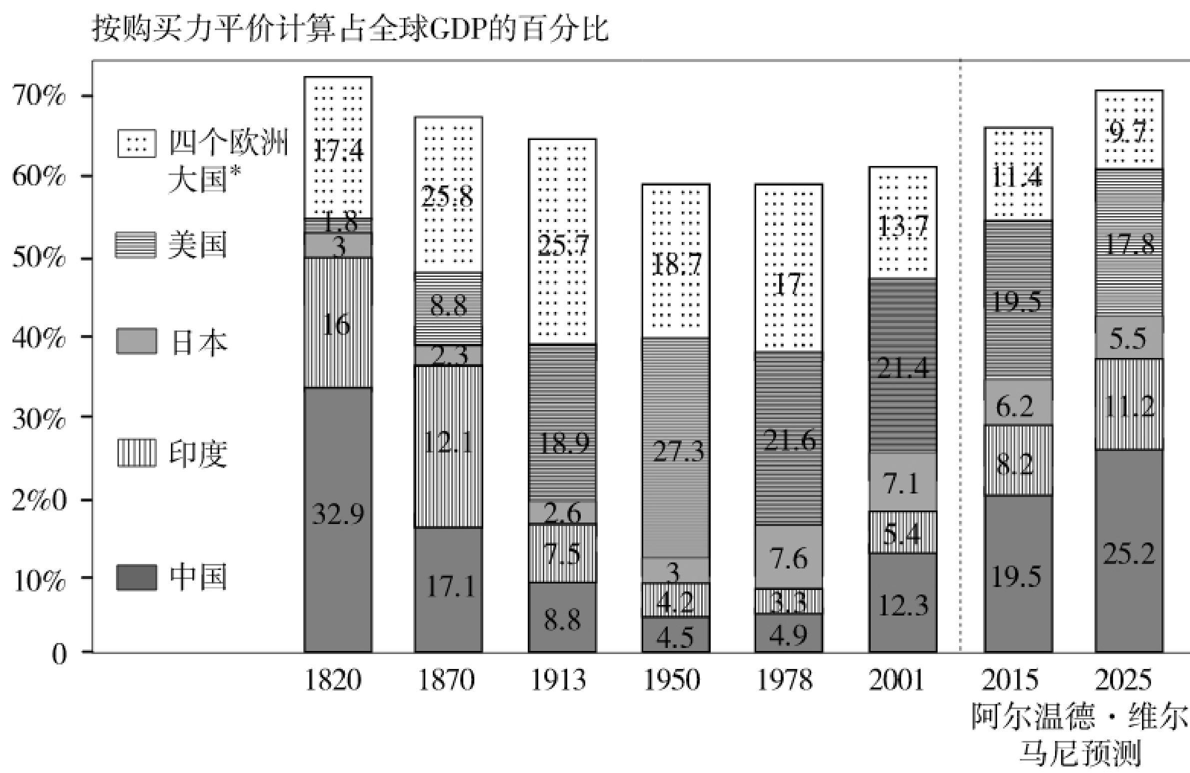


图2.4　麦迪逊预测中国在2015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按照PPP）

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2003）;Arvind Virmani（2004）

我们生长的年代“恰巧”落在了这个区间。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在经济上几乎都是第一大国。而恰好在我们出生的前后，总共不到200年的时间，中国“一不留神”落在了世界后面。但是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重新回到历史的水平，这也是麦迪森说的。他在1997年的时候给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在2015年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

1. 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演讲。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2010年8月22日）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比较狭义，就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另一个层面比较宽泛，不仅关乎经济问题，还包括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甚至还有文化问题。这两个层面紧密相关，因为如果没有中国30年来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其他方面也不会有人注意。接下来，我主要谈谈狭义的层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

一、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

如何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增长非常显著，确实值得我们自豪。但我认为，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长并非独一无二，其他东亚经济体发生的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

第一，就经济增长态势和性质而言，中国没有特别之处。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是追赶性质的。增长快是因为起点非常低。从时间上讲，在一国还处于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利用国际上已有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是可以实现持续高增长的。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落后国家都可以实现高增长，还要靠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推动，在中国就是改革开放政策，这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我们追赶了30年，目前人均GDP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经济增速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反比，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一个人7岁的时候，长个儿的速度和15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15岁和20岁的时

候又不一样。所以，拿中国经济增速与发达国家比，就好比拿一个在青春期的人的长个儿速度与一个成年人比，完全没有可比性。我们应该跟同类比，与我们最接近的就是东亚的一些经济体。我们总是说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速是9%，但实际上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也是这个速度。而且在环境资源方面，有些经济体比我们要恶劣得多。所以看过去30年的数据，中国除了规模超大之外，就经济增长态势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

第二，就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言，中国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入、高储蓄，这些跟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情况都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还有开放、出口等，粗看也是类似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开先例。关于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非正式的参照就是承办奥运会的时间，中国是2008年，韩国是1988年，日本是1964年，大致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中国现在的平均发展水平也就相当于日本60年代、韩国80年代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均GDP的情况都很类似，甚至于现在中国人的感觉都可能和60年代日本人、80年代韩国人的感觉类似。

我之所以不局限于谈中国，是因为我很认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话，“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意思是那些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只有超越一个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规律，什么不是规律。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表面情况和东亚其他经济体并无太大不同，但在深层次上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发展的起始点不同，特别是制度环境不一样。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起始点应该是1978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不允许私有制，意识形态很强，封闭程度非常高。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经济要克服很多障碍，包括意识形态、体制上的障碍，而东亚其他经济体并没有

这样的障碍。直到今天，中国国有经济的比例，也远远超过韩国80年代、日本70年代时的水平。因此，历史是不一样的，它对后来的发展路径有很大影响。

其次，中国人口是其他快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人口总数的3倍还多，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其他东亚经济体，导致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影响也不一样。

再次，中国的政治、军事独立自主。直到上个季度，日本一直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政治、军事并不完全独立。

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其他经济体的异同点是很重要的。在分析经济增长情况的时候，要分析出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

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经济增长模式调整

如果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来代表发展阶段，当一国人均GDP超过中等收入和世界平均水平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未来10年内，中国人均GDP肯定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真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现在是低中等收入国家）。这对于人民生活而言是好消息，但是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下来，不可能再保持此前的速度。

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会放缓，自然就引发了一个问题——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和改变。这个问题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讨论，但在当时还没有那么紧迫，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非要调非要改的时候。但现在或很快这个问题就会变成现实问题。我并不认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马上就要下降的观点。经济增速下降会有一个渐进过程。所以我们也不能算出哪一天就要转变增长方式，而在这之前就不用转变。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发展前景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考虑。

一是时间维度。15年前，甚至10年前、5年前，经济增长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还没有到。未来10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我们将面临真正的挑战。

二是空间维度。中国太大了。有人说，中国既有像纽约那样发达的地方，也有像非洲那样落后的地方。不用走远了，从北京城里往外开车30分钟就可以看到很穷的地方。因为这种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我们无法用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型规律来衡量。有些地方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大量投入，把路修好，把水弄干净；而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情况却完全不同。从空间维度看，中国不同于除了少数大国之外的多数国家。

三是市场维度。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总在强调全球平衡、再平衡的问题，对此我很怀疑。实际上，全球“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必然。中国、印度、俄罗斯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加入全球经济活动，全球可流动的资本和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劳动力陡增，一定会产生所谓的“不平衡”现象。即使金融危机过去以后，这种现象照样会存在，这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基本事实。

四是政策和体制的维度。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两大影响。一个影响是让中国的相对地位有所提高。例如我们的银行排到了全球前列，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上升。这些显性指标都很好。另一个影响表现为那些潜伏在“水面”以下的事情，比如金融危机之后呈现的政府干预增加、国进民退、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等。这些问题外国人看不清楚，可我们国内的人可以看得更清楚。长远来讲，这对于中国不是好事。

举一个例子。有调查数据显示，现在大学毕业生最渴望的工作，第一选择为公务员的超过60%，其他的选择都在10%左右和以下。过去显然不是这样。这个指标说明了一些问题。因为人是理性的，做公务员一定好处很多，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做呢？而且公务员的现金收入并不高。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权力很大，也意味着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其他收入很多。通过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偏好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这个指标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长远的和深层次的影响。

我的结论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超出一般经济规律之外，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有所不同，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制度起点不一样。第二，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很大，但这几年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深层次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危机，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把短期措施认为是长期的解决方式，把个别案例认作是一般规律，那就会陷入误区。

---

1.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的发言。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0月16日刊。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2010年11月5日）

我们这一节是2010财新峰会的第一节，主题是认知，中国认知自己，中国认知世界，世界认知中国。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都是从正确的认知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基于30年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当时中国、对当时世界有着不同于过去但是正确的认知。那就是当时的中国经济不是“莺歌燕舞”，而是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的世界局势也不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是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正是基于这个认知，我们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点，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因此也就有了之后3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完成了两个飞跃：一个是前十几年成功地摆脱了“贫困陷阱”；另一个是后十几年在此基础之上使人均收入上升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8000美元左右，达到了低中等收入水平，站在了中等收入水平的门槛前。

现在，中国正面临对自己未来经济要有新认知的时刻。准确认知自己和世界是正确决策的前提。我认为，这个新认知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中国经济未来一二十年是迈入人均中等收入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在此之前面临的问题非常不同。我在此提出两个问题，同大家一起探讨和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以及如何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0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停滞或变得非常缓慢，以至于无法使经济增长持续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即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

越20000美元。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拉美的一些国家。这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50—70年代增长很不错，但是到了80—90年代就出现了增长停滞，失去了20年的时间。只是在最近的10来年中，它们才又恢复了新的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的性质显然不同于“贫困陷阱”，应对的方法也很不同。在拉美国家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众说纷纭，我在这里不做讨论。但可以说的是，严重的两极分化、政府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以及社会和政局的不断动荡，这三角关系之间的恶性循环应该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中国在未来的重要任务是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应该说我们是有希望的。看一看我们周边的一些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它们都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都成功地进入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也必须面对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在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即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约在13500美元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放慢。日本在1971年之后，中国台湾在1988年之后，韩国在1992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下降到了7%以下，而在此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内，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8%以上。有趣的是，它们都是在人均收入达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3500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日本的东京奥运会在1964年举办，韩国的汉城奥运会在1988年举办，而中国的北京奥运会在2008年举办。也许是巧合，这三场奥运会都是在各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8000美元左右时举办的。日本是在举办奥运会的7年后，韩国是在举办奥运会的4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我在这里并不想由此预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哪年开始会放慢。但是，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确是经济规律。事实上，这是经济成熟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成熟，人口红利将消失，资本回报将下降，这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准备，这就要转变发展方式。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高速增长，因此这种转变并不容易。虽然我们讲了多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我们将在不久后面临真正的挑战。

以上是从人均收入角度得出的认知。人均收入比较好地刻画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但是这对于认知中国还远远不够。更好地认知中国，还要在人均收入上乘以13亿，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今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目前的GDP总量大约是美国的1/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GDP总量大约是美国的2/3。因此，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在未来2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则有可能在未来的七八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无论是按照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超过其人口份额，即超过1/5。一个占世界经济体量超过20%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显然是举足轻重的。

这样大的经济体量，使得中国如何认知世界变得极为重要，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也极为重要。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大国，从来都有一种“大国心态”。1000年前，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人均收入也在前列。那时的世界连接不便，中国被称为“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那时中国具有领先世界的文明，因此那时中国的心态是“优越心态”。12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仍然是世界第一，但是人均收入已经远远落后。那时中国在衰退，面临外国列强的侵略，因此那时中国的心态是“危难心态”。

今天，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又将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回到历史的常态。但是今天的中国既不同于1000年前，也不同于120年前，情况完全不同了。因此今天我们的心态，既不应该是“优越心态”，也不应该是“危难心态”。对我们来说，具有一个

正确的“大国心态”至关重要。在一个“平”的世界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曾经的领先大国，后来的危难大国，今天的复兴大国，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那就是中国要适应世界，世界也要适应中国。

---

1. 在2010财新峰会中国如何认知与适应新角色专场上的发言。

增长与转轨㊟

（2010年11月20日）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学术问题，一是关于增长，二是关于转轨。我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一些问题，跟大家一起探讨。

我的探讨是通过数据进行的。我们怎样理解所看到的数据，经济学理论有哪些解释？有哪些困惑的地方？哪些方面是可以澄清的？

一、增长

首先是关于经济增长。我想看一下经济增长的数据。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就是，根据不同的国家，看不同的发展阶段。简单地看，我们可以把经济体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一是低收入阶段，二是中等收入阶段，三是高收入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增长特性是不一样的。如果要做跨国比较的话，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是不可比的，和高收入阶段也不可比。同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不同的阶段，也不可比。用这个视角看数据，就会对理解中国快速增长有新的体会。

第一组可比的国家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起点都比较低，而且都人口众多。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四个国家，第一是中国，13亿，第二是印度，11亿，第三是美国，3亿，第四是印度尼西亚，2.4亿。这四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把它排除在外，排在前面的三个国家就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前的一年，中国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经过30年，大家可以从图2.5上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确非常令

人瞩目。中国的起点是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按照人均来讲，经过30年，不仅超过了印度，也超过了印度尼西亚，超过印度尼西亚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所以，同这两个国家相比的话，显然中国是遥遥领先的，这是第一个比较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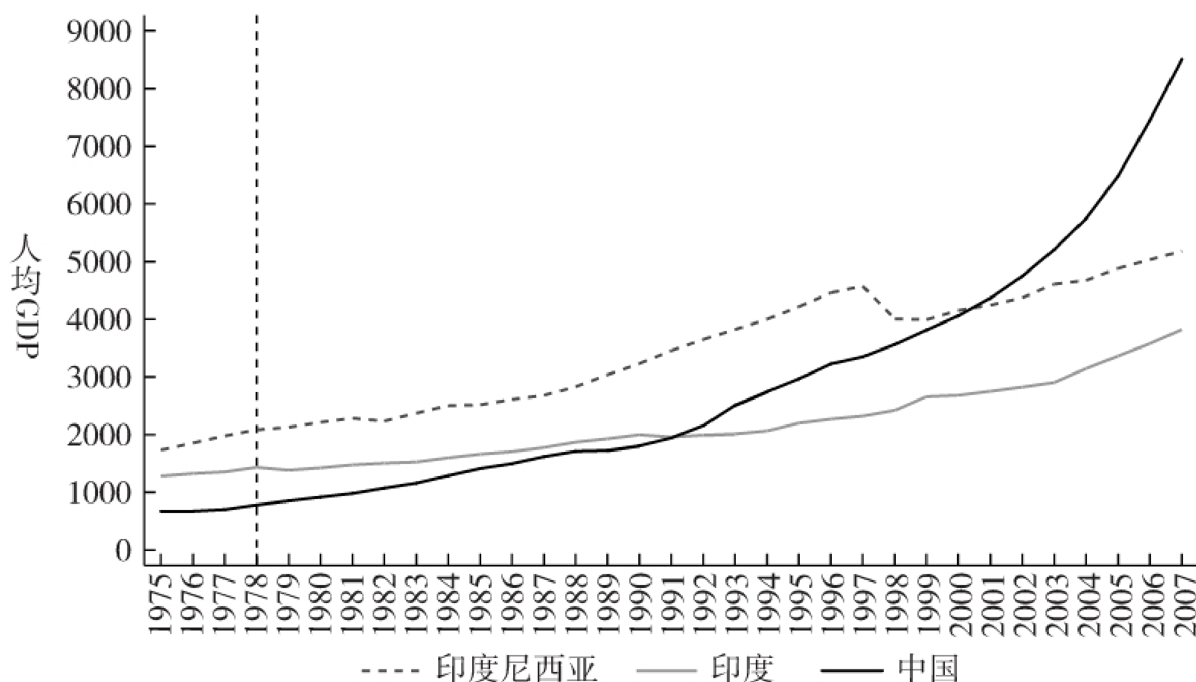


图2.5　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人均GDP增长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6.3，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第二组比较是拿中国同东亚的其他经济体相比。我画了几个经济体，一是日本，第一个取得工业化成功的非西方国家，从1950年开始。二是中国台湾，从1958年开始。三是韩国，从1962年开始。中国很自然是从1978年开始。后面还有印度，从1991年开始。从图2.6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经历高速发展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同周边地区的高速发展态势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我们的前面有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我们的后面也有很多其他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没有在图中标出来）和印度，最近的发展态势也是相当好的。事实上，从发

展阶段来看，中国台湾和韩国相对于日本大概有十几年的滞后，中国相对于中国台湾和韩国又有一个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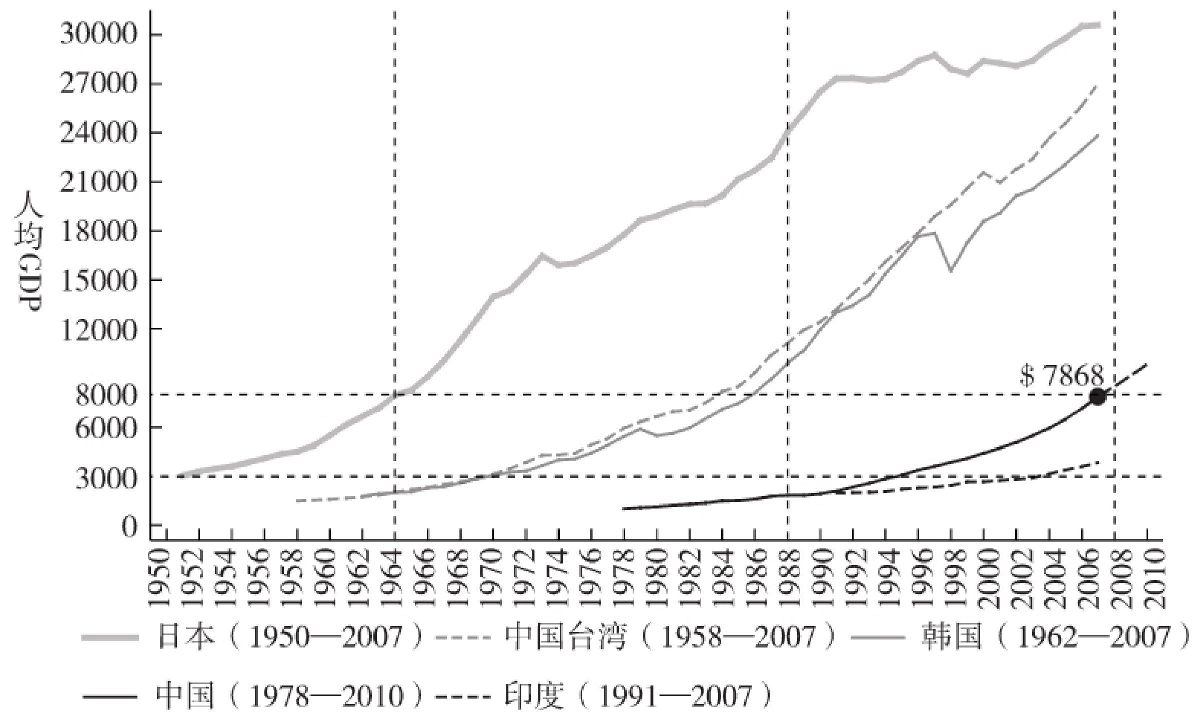


图2.6　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亚洲经济体比较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6.3，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2007年后为按1995—2007年平均增速推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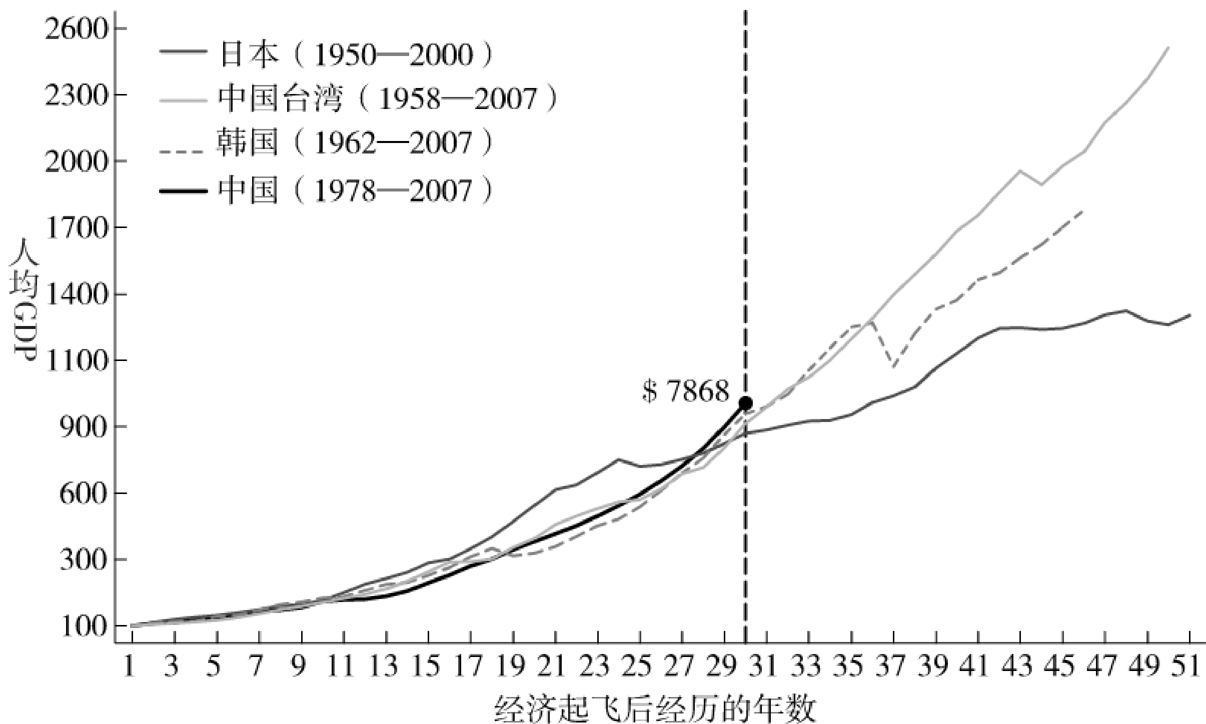


图2.7　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亚洲经济体比较（取起飞年作为100）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6.3，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我们再来看同样的数据，在横轴上做一些调整，可以得到图2.7。我们取起飞年作为100，将之对齐，按照购买力平价，2007年中国人均GDP到了7868美元。这四个经济体的增长态势非常吻合。这就意味着有共同的规律需要我们探索。图2.7说明了，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少见的，但若放在这样的数据比较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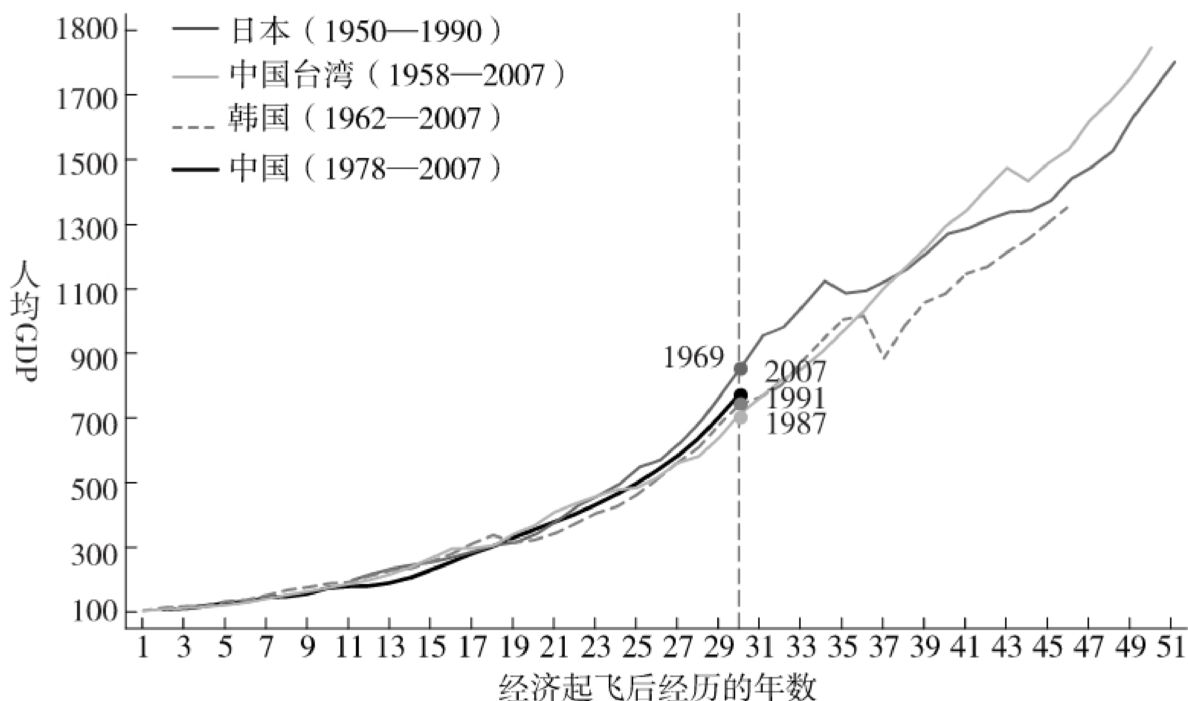


图2.8　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亚洲经济体比较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6.3，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展望未来，中国的增长是不是就到了极限呢？如果用其他经济体做参考，就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图2.7拟合不是特别好的是日本。这里有一点人为因素，我把1950年当作日本的起飞年，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有问题。因为日本在“二战”之前已经相当工业化了，程度高于所有其他这些经济体。如果考虑这一点，我们应该把1950年日本的发展水平往后移，其实相当于10年之后的中国台湾和韩国。图2.8还是同样的数据，日本的增长就比图2.7所示的更准确。如果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2007年大致相当于日本的60年代，中国台湾的80年代末，或者韩国的90年代初。

二、转轨

转轨是非常大的题目，既有经济转轨，也有社会转轨、政治转轨等。我们只看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两大类问题，

一类问题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类是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在过去一二十年中，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上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也存在很多问题。那么，我们怎样分析这些问题呢?

第一是数据，讲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常用到的数据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是宏观数据，统计年鉴上就有。这个比重的最低点是1995年的11%，之后一路上升到20%。财政收入在过去10年中增长得非常快：1999年是1.14万亿元，去年（2009年）是6.85万亿元。从财政收入这个指标来看，现在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今年（2010年）的这个比例与1985年时的比例相似。问题是怎么理解它。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含义。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普遍超过30%，但是其中有相当大部分是社会保障、养老金等，与中国的情况不太可比。

在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常用的另一个指标是注册企业所需的天数。一个国家要有活力，必须要有新企业，政府和企业的第一个关系就是企业进入市场的可行性。在北京和上海，注册企业需要30多天，而新加坡、纽约甚至首尔，只需要5—6天。这一点也很说明问题。

第二是关于大学生的就业偏好。来自人民网的数据表明，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中，政府机关遥遥领先，占63%，国企是11%，剩下的不超过10%。在大学毕业生择业优先考虑的因素中，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职业稳定性、发展空间是最主要的因素。虽然这些数据并非科学样本，但它们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学生在政府、国企和民企之间的选择中，非常倾向于政府和国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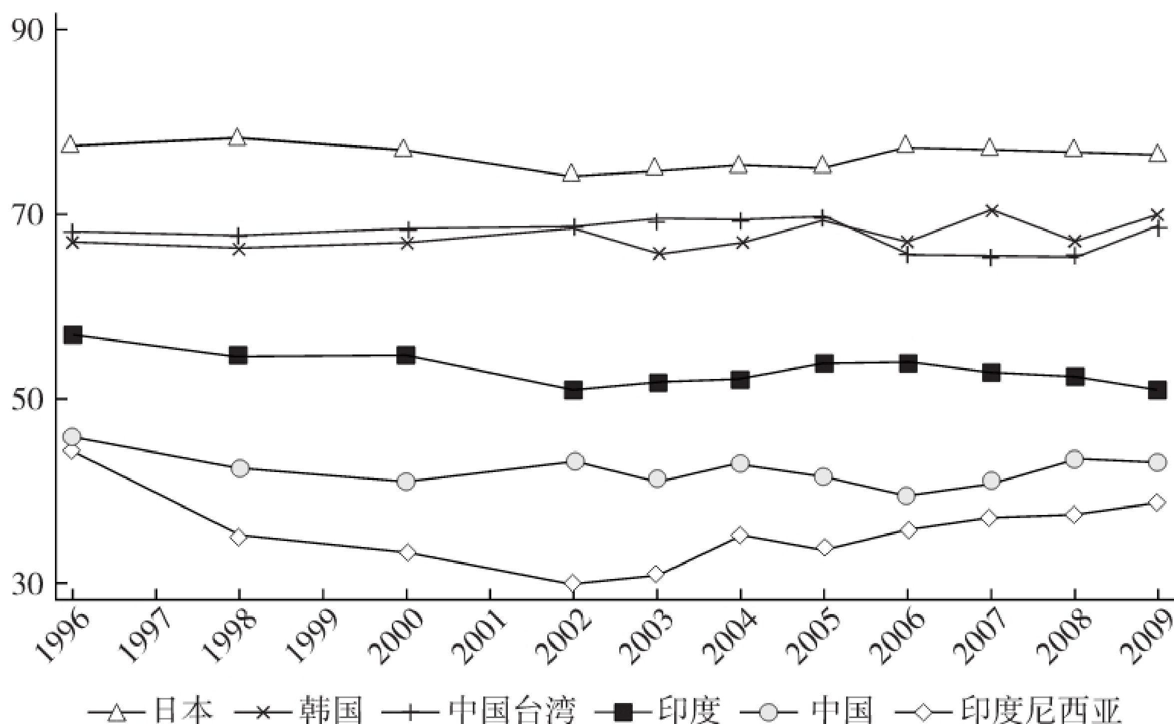


图2.9　法治指标

资料来源：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2010，Rule of Law

最后是关于法治建设的指标。这方面我找到一个指标，叫作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它是关于合同履行、法律有效性的指标。如图2.9所示，前面是三个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下面三个就是比较类似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从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信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确实是处在上升和改善的阶段。印度的情况和我们很不一样。中国的情况整体来讲在过去10年间没有什么变化，尽管经济增长了很多倍。

总之，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是通过一些数据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关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问题。

1.　在"中国经济学创新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此次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分析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注]

（2014年7月16日）

分析和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判断经济走势，思考政策工具和力度，总会遇到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短期与长期的权衡。我从三个角度和三个方面来谈短期与长期的问题，希望可以澄清一些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并非矛盾的分析和判断。

一、经济增长本身

通常我们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为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前者是长期的，后者是短期的。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减缓，首先是有趋势性的因素，比如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再比如相对于一二十年前，累计资本存量（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机器设备等）的增加。趋势性的决定因素是我们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从而带来了与低收入水平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规律。同时，任何市场经济体都会经历周期性的波动，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从国际因素看，其他国家的经济周期也影响我国的经济周期。从国内因素看，各行业都有自己的周期。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有周期性因素，但这是第二位的。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一类，它们既不是趋势性的，也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由体制和政策带来的扭曲，通常体现为结构性扭曲，或是由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这通常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之所以把这些长期因素归为另一类，是因为它并非完全客观的外部因素，而是人为的，是受人控制的，特别是与制度和政策有关。比如缺乏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结构调整，就会降低增长速度；而加强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结构调

整，就会提高增长速度。但是这些变化都要花时间，具有时间上的滞后。同样，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也需要时间积累，也是长期才见效的。

长期经济增长与改革开放、结构调整、创新创业的关系，大多属于第三类。

二、分析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当我们分析经济增长时，所用的理论框架几乎都是经常说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从中推导出的政策结论是显然的：由于出口很难控制，消费一时又上不去，所以只有增加投资。这个理论框架的好处是简单，又具政策操作性，还见效快。但是，这个框架完全是基于凯恩斯的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短期，二是需求决定。在凯恩斯理论中，经济周期的某些阶段，会出现有效需求小于供给的情况，而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快速地发挥作用。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增加投资、消费或净出口，以此增加有效需求，从而提高经济增长。它是一个用来分析周期性经济波动带来的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框架。

然而，经济学家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时，并不用这个理论框架，也就是说，不用我们熟知的“三驾马车”的理论框架。经济学家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是基于生产函数的供给模型。生产函数可以包括前面所说的趋势性因素，比如人口、资本存量等因素，还可以包括前面说的第三类因素：改革、开放、结构、创新。这些因素可以定量地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即经济效率上。因此它可以包括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创新红利等来自供给方面的效率提高因素。

利用这个理论框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8年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比较高，但是在2008年之后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同时还发现，在2008年之前，经

济增速较高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也较高；但是到了2008年之后，经济增速较高时，全要素生产率却较低。一种解释是经济增速加快并没有更加有效地使用资源，反而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如果不改革不调整，较高的投资可以拉动较高的短期增长，但是会加大结构扭曲，影响长期持续增长。这是"三驾马车"的理论框架推导不出来的。

所以，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长期效应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三、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

对于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出现的问题，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应随之而不同。对于短期的周期性波动，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总量减缓周期性波动的程度。这里的总量政策是指宏观变量，比如货币供应、利率、汇率、财政支出、税率等。总量政策不是针对行业的政策，更不是针对个别企业的政策。那种以为产业政策或其他微观经济政策可以调控周期性波动的认识是一个误区。

对于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总量政策通常是无法解决的。那种以为总量可以调控长期经济增长的认识也是一个误区。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主要靠供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增强企业和个人激励，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这只能通过改革开放、结构调整以及鼓励创新创业来实现。比如，减少政府行政审批、制定政府权力清单这一改革，虽然不能解决短期的周期性波动问题，但是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为它减少了企业的成本。

所以，认清政府政策工具的不同作用，并在适当情况下使用适当工具，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结论

在短期，保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两者之间可能会产生张力。但是，确保可持续的长期增长，不仅与促改革、调结构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以促改革、调结构为前提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时间范围有多长，这决定我们的定力有多强。长期与短期的经济规律是不一样的，政策选择也不一样。

在我们分析季度、半年的经济形势之时，也应该关注长期的影响。

---

1. 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注]

（2015年3月9日）

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如何看？

三个原因让我们感到有心理压力：对比30多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增长；7.4%低于年初制定的7.5%的目标；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增长率7.5%，超过我国的7.3%。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我认为，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大致有三类原因：

第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多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经济体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体对应中等的潜在增长率，而高收入经济体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定量分析下降速度则需要科学、细致的研究。

第二，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过去这些年中，特别是2008年之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表现为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由此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体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的增长模式，这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看作是延期支付的成本。

第三，激励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还要靠激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积极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市场的扭曲以及伴随而来的腐败，效率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也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我们正处在转型期的中间状态：就是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也是导致增速下降的原因。

如何办？先说不应该如何办。第一，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第二，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性改革措施。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结合去杠杆的结构调整，才有了经济回升。当前欧洲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必须结合结构调整，才能最终见效。我们也一样。

应该如何办？我提三条建议。

第一，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很有“韧性”，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高。当人生病时，除了吃药外，人的自我调节，包括改变生活方式的本领是很强的。经济调整也是如此。要给市场自我调节的空间，给个人和企业调整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调整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要浪费这个调整的机会。

第二，发挥政府在供给侧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当今技术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降低了进入门槛，又可满足个性化需求，非常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但并

不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是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第三，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在法治经济的框架中，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

---

1.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三驾马车”，是创新[注]

（2015年4月1日）

最近一两个月，经济增速下行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话题。而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看上去是一个相反的话题，就是在这种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是什么？

我记得去年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我讲的主题是法治在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话题中，市场和法治是两个关键词。我今天在想，市场仍然是一个关键词，再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新动力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创新，这已经是共识，但是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今天我想用非常短的时间做一点个人解读，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每逢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三驾马车”。这在全中国深入人心。什么是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经济学普及到这种程度也让我们经济学家感到吃惊。因为你到美国去问美国的出租车司机，什么叫三驾马车？没人知道。问美国总统，他也未必知道。但是在我们国家，连出租车司机都能跟你侃个半小时什么叫三驾马车。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这些都不是动力，而是拉力。消费也好，投资也好，净出口也好，在经济学的供给需求框架中，都是需求方。需求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它们不推动经济增长。今天我们讲经济增长的动力，动力是供给方的。讲到动力，这里面有很多方面。在过去30多年中，我们的动力主要靠资源动员，包括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这些都是增长的动力。但那是“旧常态”。在“新常态”中，这些因素仍然是动力，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中等收入经济体，还不是高收入经济体。在高收入经济体中，只有一个动力，那就是创

新。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还可以利用过去这些动力，因为资本积累还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多，在劳动力方面，虽然过去那种红利没有了，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多空间。新常态新就新在只靠过去这些动力是不够的，要逐渐转向新的动力，而这个新的动力，就是创新。当然还有改革，改革是制度上的推动力。

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在观念上要有一个重要转变：经济增长不能仅仅靠需求方的拉力，即三驾马车，还要靠供给方的动力，那就是创新。

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创新机会中。这个机会我不能说是以前从来没有过，历史上有过很多类似的机会，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机会有其特点，而且中国的环境和文化特别适应当前的创新，尤其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为什么互联网后面可以加一个行业，或后面可以乘一个行业，变成“互联网+”“互联网×”？这是因为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以及相关的大数据、云计算等，可以引发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是多个产业的变化。我们有时候拿高速公路来做比较，但是，我更愿意拿它跟历史上发明电带来的变化做比较。在发明电之前，产业布局取决于动力源的地理位置，比如在水的旁边。但是有了电以后，一下子所有的布局都转变了。同样，互联网也会带来类似的变化。

互联网还有一个特点，与我们中国的特点和文化有关。我们想一想，德国工业4.0、日本制造业，都非常精密。我们的制造业可以改进，但是我们做不到那么精致。不仅我们做不到，美国人也做不到，因为文化特点不同。但是互联网有网络效应，效果是市场规模N的平方（N_2）。所以我们的人口众多就变成了优势，是很多别的国家比不了的。在这一点上，美国与我们类似，它也是大国。跟我们能比的还有印度。

再有，互联网相关产业中不少是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当进入门槛很低的时候，就不需要很高的固定成本，只需很少数人就可以搞出创业公司。这是供给方。从需求方看，互联网使个性化成为可能。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阶段，你有什么特点，你的个性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我一直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我在硅谷的一个朋友十几年前告诉我，他们跟美国的风险投资人开了20次电话会议，说要投资中国的短信业务，20次会后仍然被否决，美国人不能理解短信怎么能挣钱。在中国，短信下载铃声，是十几年前的个性化需求，而在国外是没有的。个性化的需求，再加上进入门槛很低，就使中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一盘散沙、每个人都想当老板的特点，在新技术下，可以变成优势，而且可以尽情发挥。这也是为什么像互联网、物联网等，在中国很受欢迎的原因，而且对下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会起到超出我们想象的作用。

最后，我想说现在的本科生和硕士生都是90后。新一代的创业文化与过去不同。举一个例子，我们学院每年毕业典礼都要找一位本科毕业生代表讲话。以前选择的标准多是考试成绩好的学生。今年学生们自己推荐了一位姓马的女生。那天我们正好请马云来做学院毕业典礼演讲，他坐在台上。这位女生一上来就说，说到马总，名副其实的马总坐在我后面，但是在我们宿舍楼里，说到马总，就是我。这位学生的爱好是做APP（应用软件），而且很有创意。她说她大三在欧洲交换学习，虽然课程没有学好，但是背着背包走了20多个国家。所以她还是很有一些想法的。总之，我想说的是，文化正在变化，大学生创业、女性创业、二次创业等，这些都是在过去不多见的。

---

1. 在2015年中国绿公司年会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第三章 解析结构问题

分析收入分配的视角[注]

（2005年12月10日）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2005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在过去20多年中，我一直在美国，大多数时间是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但是我一直关注、研究并部分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也许是由于这一经历，我在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上，更多一点国际的视角和国际的比较。我想就这次会议的第一个主题“重新认识中国”发表一点看法，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新意。

2005年是非常奇特的一年。如果一个火星人来到地球，观察世界上各国的经济情况，如果他到了中国，他会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空前繁荣。他看到了拥挤的餐馆，得出了消费旺盛的结论；他看到了繁忙的建筑工地，得出了投资强劲的结论；同时他也看到了非常繁忙的港口，知道中国的出口非常强盛。于是，这位有过经济学训练的火星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的确是非常繁荣。

但是，如果你去询问中国国内的人，你会发现国内的人似乎感到空前的困惑，不仅企业家感到困惑，政府官员感到困惑，连一贯非常自信的经济学家们也感到困惑。人们在怀疑，媒体也在质疑。当然，我们可以说火星人了解的东西比较表面，我们可以看到深层次的问题。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也不完全如此，因为我们身在其中，我们看的东西太细，往往有可能使我们对一些东西看不太清楚，这个时

候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距离，反而会看到一些我们原来看不到的东西，发现我们原来没有发现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横向的国际比较，还需要纵向的历史回顾。这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引出一些新的启发。

今天我要说明几个问题，表达一些想法。有一些我们引以为豪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特殊；有一些我们感到特别困难的，其实其他国家都存在，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却不知道是我们特有的。刚才柳传志先生讲了三个分量很重的字，做企业要“想清楚”。当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现状时，也非常需要想清楚。想清楚的一个办法就是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比较，其实我们并不缺乏比较，我们同东亚比，同俄罗斯比，同拉美比，同印度比，同美国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比较本身，而在于如何比较，不正确的比较往往会起到很大的误导作用，而正确的比较却可以使我们有新的思路，甚至可以挑战所谓的常识。

举一个备受关注的例子，就是收入分配。现在，特别是在这一两年中，大家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非常关切，衡量收入不平衡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在逐年增加，已经达到了0.45，这个数字意味着相当不平等的状况，甚至超过印度，由此引起了社会上的很多忧虑。但是对此也需要仔细分析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世界的一般问题，什么是中国的特殊问题。

首先，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的研究发现，在过去20多年中，也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大国，包括中国、印度、美国、欧洲国家、非洲国家，内部收入分配都变得更不平等，按人口加权平均的国内不平等指数都在上升，这就是说不平等的加剧是一个世界现象。为什么？有两个基本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一个是技术变化，一个是全球化。技术变化使有技能的人与无技能的人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变大，因此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收入差距会变大。

全球化使得全球资源重新配置，很多工厂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中国和印度，也就使发达国家的工人收入相对降低，而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人可以到高工资的企业工作，就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是共同的经济规律。

不过，大家可能不会想到的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每一个国家内的收入差距在变大，但是全世界的收入差距在变小。这是悖论吗？不是，理由很简单，造成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一国之内的收入差距，而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中，穷国（比如中国和印度）在贫困线上的几亿农民的收入大幅提高了。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讲，尽管每一个国家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在缩小。有趣的是，常人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往往只看到周围人，不能看到全球。

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如果把整个中国经济看作很多经济的联合体，其收入差距主要是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如果我们把贫穷地区和乡村的收入提高的话，尽管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全社会的收入差距仍然有可能缩小。

刚才我讲到世界性的趋势和一般经济规律，那么中国有没有特殊性呢？有！我们现在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都是当年的基尼系数，当年的收入，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只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它是不完整的，甚至会误导。设想一下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0.3，相当平衡了，另外一个国家基尼系数是0.5，相当不平衡。而五年以后，0.3的国家仍然是0.3，0.5的国家仍然是0.5。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前者比后者更平等呢？不能。因为完全有可能，前面那个国家五年前的富人，五年后仍然是富人，五年前的穷人，五年后仍然是穷人；而后面那个国家五年前的富人变成了五年后的穷人，五年前的穷人变成了五年后的富人。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它告诉我们，当我们分析数字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

美国一个经济学家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他根据中国1990年与1995年的收入状况，把人们分成五个等分。表3.1给出了他的研究结果。第一行是说1990年你是最富的1/5，到了1995年你不再是最富的1/5的概率是多少？0.562（1-0.438）。1990年你是最穷的1/5，到了1995年你不再是最穷的1/5的概率是多少？0.508（1-0.492）。这就是收入流动性的概念，也即动态地衡量收入分配变化的情况。

表3.1 1990—1995年中国的收入流动性

		1995 年				
		Ⅰ	Ⅱ	Ⅲ	Ⅳ	Ⅴ
1990 年	Ⅰ	0. 438	0. 219	0. 174	0. 114	0. 055
	Ⅱ	0. 277	0. 260	0. 203	0. 158	0. 102
	Ⅲ	0. 187	0. 242	0. 229	0. 210	0. 132
	Ⅳ	0. 079	0. 206	0. 249	0. 247	0. 219
	Ⅴ	0. 019	0. 073	0. 144	0. 271	0. 492

资料来源：Khor and Pencavel（2006）

我们可以跟美国来做比较。美国的收入流动性相对比较大，而很多国家的收入流动性相当小，比如在印度，社会等级制度就使得社会流动性小得多。大家可以看到，即使在收入流动性比较大的美国，所有这些数字全部小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更大。

这样的比较可以使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这个国际比较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那么有没有坏消息呢？也有！中国的腐败指数相当高。收入分配中相当大的一个问题是腐败造成的不平等。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泛泛的对不平等的忧虑中走出来，把目光集中于打击腐败、鼓励竞争、帮助扶贫、创造机会。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用崭新的视角，用合适的视角，特别是用扎实的分析，会如何改变我们所持有的常识。我也希望这能为我们准确

认识中国提供新的思路。

---

1. 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演讲。

从GDP数据看经济结构问题(注)

（2006年1月2日）

在2005年12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人们等待已久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我国GDP数据进行了重大修正。修正后的2004年GDP现价总量为16万亿元，比修正前的数据增多2.3万亿元，增加了16.8%。在2.3万亿元的修正量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的修正量为2.13万亿元，占总修正量的93%。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修正前的31.9%上升到修正后的40.7%。这是一次非常显著的修正。这些结果为我们认识中国经济，特别是认识中国的经济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新信息，将对未来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值此即将启动“十一五”规划之际，这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是十分及时的，也具有长远意义。

一、从跨国比较看GDP数据修正

这次普查对GDP数据的修正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但是与我们在2005年7月所做的题为“从第三产业国际比较看对GDP与经济结构的误估”这一研究中所得到的结果惊人的一致。

我们一直怀疑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大约1/3）被低估，于是，决定通过国际比较来发现问题，寻找可信的证据。国际比较的第一步是选取比较对象。通常我们习惯于把中国同诸如欧洲、美国、日本等经济体做比较。但这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还远远落后于这些经济体。在我们看来，印度是一个理想的比较对象。首先，印度的经济发展阶段比欧美日与我们的距离近很多。其次，印度和我们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印度统计

数据的质量相对比较高。他们从英国殖民统治年代继承了比较完善的统计体系，统计工作质量得到国际认可。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印度政府统计与项目执行部网页上所公布的2002年的可比数据，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在我国是34.3%，而在印度是50.7%，相差16.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但差距来自哪里呢？我们对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内部按行业进行了比较。表3.2中的数字是2002年两国第三产业整体与分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

表3.2　中印第三产业概况（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

	中国	印度	差别
第三产业整体	34.3	50.7	–16.4
批发、零售和餐饮	8.1	14.8	–6.7
房地产	2.0	6.7	–4.7
交通运输和仓储	3.5	6.1	–2.6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2.7	6.2	–3.5
金融和保险	5.7	7.1	–1.4
邮电和通信	2.6	1.6	1.0
其他服务	9.7	8.3	1.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印度政府统计与项目执行部网页

表3.2中的第一行数据是两国第三产业的整体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其他行是第三产业中各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两国行业分类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些行业不完全可比。比如，印度的统计将房地产业和商业、法律服务归为一类，而中国不是，所以印度的数字可能高估了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尽管为了增加可比性我们的分类只能很粗，但我们仍然从中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发现。

我们知道，中国的服务业有些方面确实比印度落后，比如软件、金融。这些差距确实反映在表3.2中的数据里。但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差距最大的行业并不是我们预先设想的，而是批发、零售和餐饮，净差6.7个百分点。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的软件业不行，也可以相信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不行，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中国的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会落后于印度，更不要说落后这么多了。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的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在统计数据中被严重低估了。

第二个令人吃惊的差距来自交通运输和仓储。国际专家公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比印度有优势。不少印度经济学家把印度制造业发展困难的原因归咎于交通运输的落后。我们也很难想象中国在交通运输和仓储上的增加值比印度净差2.6个百分点。更大的可能是我们没有把许多这方面的经济活动统计进来。

第三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只贡献了GDP的2%。在很多地区，房地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印度房地产业占GDP的6.7%，尽管其中包括了商业、法律服务，但这两项服务占GDP的比例可能不会太大。完全有可能的是，中印之间房地产业占GDP比重相差4.7个百分点主要来自中国统计数据对房地产业的低估。

上面这三项差距加起来是14个百分点。所以，中印两国第三产业差距的大部分都可以由这三项来解释，而这三项差距很有可能是由统计缺陷造成的，并非真实的差距。中印两国第三产业的比较显示，中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可能被大大低估。如果我国GDP中的农业和工业的统计基本正确，那么我国的GDP也被严重低估。

这次经济普查的结果证实了我们在2005年7月做出的猜测。普查的结果证明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以前被大大低估了，GDP也被大大低估了。更为有意思的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的修正量恰恰主要来自上述三个行业，即交通运输和仓储、批发零售餐饮业和房地产业。它们的增加值向上修正了近1.5万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总修正量的70%。

可以说，普查的结果证实了我们在去年7月份的猜测都是相当准确的，包括对GDP被低估程度的猜测、对第三产业占GDP比例的猜测、对第三产业中哪些行业漏报最严重的猜测，等等。这样的结果证明了我们的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反过来，我们的研究也支持了调整后数据的可靠性，因为最新数据相对于调整前的数据同我们根据跨国比较研究所预测的结果更为接近。

调整后的数据使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更接近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在我们看来，这并不奇怪。在第三产业的大多数行业里，特别是一些较为传统的服务性行业里，中国同其他类似发展阶段上的经济体相比，并没有显著的更严重的市场失灵或政策失误。比如，从要素市场来看，第三产业的很多行业里有形资产较少，因而融资比较困难。然而，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的高级专门人才储备不足，但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存在，而且这种问题主要影响一些现代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里都不是很高。

二、从GDP数据修正来重新审度中国的经济结构

这次普查所发现的更可靠的新数据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一种观点否定新数据有任何实质影响。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不管老数据还是新数据，它们所度量的都是同一个实际经济，新数据的出现并没有让它所要度量的实际经济变得更好。这种观点似乎有道理，但它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实际经济深受经济政策的影响，而经济政策又受到数据的影响。因此数据的调整，特别是像这次的重要调整，会影响政策的讨论与制定，并由此对实际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用关于经济结构的政策讨论为例，来说明准确数据的重要性。在近年来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讨论中，似乎有一种共识，也即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特别是要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在这些讨论中，一些重要的统计数据被用作关

键的论证依据。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在过去两年，有关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些重要指标如表3.3所示：

表3.3　我国经济结构的若干重要指标

经济结构指标	2003 年	2004 年
第三产业/GDP	33.57%	32.01%
资本形成率	42.40%	44.20%
储蓄/GDP	44.07%	46.03%
出口/GDP	31.08%	35.95%
能源消费总量/GDP（吨标准煤/万元）	1.46	1.4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这些数据和其他国家的相应数据相比都不正常。其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尤其引人关注，我国的数据不仅比发达国家的低很多，即使和经济发展比我们还更落后的印度相比，2004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32%也远远低于印度的50.7%。如果这些数据反映了我国经济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确实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这种共识的形成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按照新数据我们得到的经济结构指标同旧数据相比有显著不同。用新数据重新计算的2004年的几个结构比例如表3.4所示：

表3.4　数据调整前后的结构比例（2004年）

	以前的结构比例	新的结构比例
第三产业/GDP	32.01%	40.70%
资本形成率	44.20%	37.84%
储蓄/GDP	46.03%	39.41%
出口/GDP	35.95%	30.78%
能源消费总量/GDP（吨标准煤/万元）	1.44	1.2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整体来说，数据调整后的各种比例关系都更接近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或者说我们的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问题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轻得多。首先看第三产业。尽管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仍然较印度低，但这种差距随着新数据的出现一下子降低了很多。中印在第三产业占GDP比例上的差距本来占到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例的将近60%，然而，根据新数据，这一数字大幅降至不到25%。这么大的改变，不得不让人们对第三产业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对第三产业发展有明显障碍的问题应该解决。比如因为统计不完善所带来的GDP数据不能充分反映第三产业的贡献从而影响各级政府发展第三产业的积极性问题。这次普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我们不应再觉得第三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经严重到我们必须采取极端措施的程度。有趣的是，在印度，目前讨论的话题之一是印度应该如何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降低第三产业的比重。

其次看资本形成率。新的数据是37.84%，尽管不低，但和其他一些东亚经济体的历史数据相比并不是高得出格。比如日本在1968年到1974年间的平均资本形成率是37.14%，韩国在1990年到1995年间的平均资本形成率是37.35%，马来西亚在1991年到1995年间的平均资本形成率是39.44%，新加坡在1970年到1987年间的平均资本形成率则高达44.70%。虽然这些数据都取自这些国家资本形成较快的阶段，但是我

们也没有理由说现在不应该是中国资本形成较快的阶段。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即使调整后还是较高，但是资本形成率下调6.4个百分点不可否认是一次重大调整，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经济结构的其他方面如储蓄率、出口率、能源消耗率等在数据修正后都有显著下降。所以我们关于促进消费特别是促进国内消费的政策讨论，以及降低能耗的政策讨论都需要进行重新评估。

总的来说，这次经济普查对GDP数据的修正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必将对政策制定和受其影响的经济运行产生冲击。我们在五个月前的研究结果和普查结果非常吻合。这使我们对我们的研究方法更有信心，也让我们对普查结果有更好的理解。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面对新数据，经济学家们应该对经济现实有新认识，对各项政策重新评估。这必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1. 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月2日刊。与白重恩合著。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注)

（2007年1月）

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已超过40%，从全世界范围看，这个投资率已属于最高水平。面对如此高的投资率，我们自然会问，中国的投资是否已经过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资本—劳动比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投资的潜在回报理应很高。另一方面，正如卢卡斯曾指出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技术落后、制度环境恶劣等其他一些约束条件，可能会限制发展中国家潜在的资本回报率（Lucas，1990），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可能存在。我们经常看到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的事实，表明穷国的资本回报率并不总是比富国高。

中国存在过度投资的含义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自然指标是资本回报率。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即使投资率很高可能也不会引起资本回报率的降低。换言之，中国的高投资率，恰恰可能是因为它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于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年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否有显著的降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否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我们要考察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投资配置：中国在某些行业或地区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而在另一些行业和地区又存在投资不足呢？中国各行业和省际的资本回报率是否有很大的差别呢？这些差别随时间改变的趋势又是如何？

本文测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具体而言，我们用资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按市场价值计算的资本产出比、折旧率以及产出对资本的相对价格增长率来计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这一方法，尽管在概念上

一目了然，但是其主要的难度在于数据，因此在给出估计结果前，我们将先介绍这些数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专门估计中国的总资本回报率的文章还不多，不过许多文章在估计中国的生产率时对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Perkins，1988；Chow and Li，2002；黄永峰等，2003）。本文的资本存量估计与这些文献的区别主要有两点。首先，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我们在估计时使用了调整后的数据；其次，我们采用按现价计算的资本存量而非按不变价计算的资本存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要计算的资本回报率，实际上是按现价计算的资本产出比的函数。

首先我们要讨论估计资本回报率的方法，然后介绍数据，以及一些测算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将给出中国总资本回报率的估计值，开始对总资本回报率进行基础估计，然后计算考虑不同情况后的资本回报率。这些情况包括不同的部门范围，例如从计算中剔除城镇居民住宅、农业或采掘业；计算固定资本存量的不同方法，例如考虑存货价值，或假设固定资本的折旧率发生阶段性变化；计算从总资本收入中剔除税收收入后的资本回报率；以及将资本回报率的基础估计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最后，本文考察了资本回报率在三次行业和各地区的差异，分析了中国资本配置的效率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我们的基础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总资本回报率在1979—1992年约为25%，在1993—1998年逐渐降到了20%，并自1998年之后保持在20%左右。事实上，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用同一方法测算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剔除城镇居民住宅部门和在资本存量中加入商业存货后，我们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最近几年甚至有上升的趋势。总之，本文对包括所有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形式的总资本回报率的测算，并没有找到中

国投资率过高的证据。而对资本回报率部门差异的初步分析还表明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比过去提高了。

一、方法

资本回报率有几种计算方法。一种是估计金融市场的资本回报率，然后从中推算出总资本回报率。对那些金融市场发达的经济体，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显然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尚不适用这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用产出对资本进行回归。不过这种方法得到的资本回报率是有偏估计，因为回归中遗漏的变量通常会同时影响总产出和资本存量。

本文采纳的方法很简单，事实上，它的基础主要包括一个假设和一个核算等式。首先，我们考虑一个企业购买一单位边际资本用于生产。假设企业是产品价格的接受者（在后面我们将放松这一假设），那么该交易的名义回报率是

$$i(t) = \frac{P_Y(t) MPK_j(t)}{P_{K_j}(t)} - \delta_j + \hat{P}_{K_j}(t) \qquad (1)$$

这里，i是名义资本回报率，$P_{K_j}(t)$是j类资本品的价格，δ_j是其折旧率，MPK_j是其边际产品，$\hat{P}_{K_j}(t)$是j类资本品的价格变化率［（1）式实际是霍尔—乔根森资本租金公式的一个变化形式］。这个公式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如果资本品市场运行有效，每种投资品和每个投资者的投资收益都应相等。显然，资本市场也可能运行无效。其次，决定资本回报率的不是资本的边际产品，而是资本边际产品收入与资本价格之比。

通常我们无法观察到资本边际产品，因此不能用（1）式直接估计名义资本回报率。不过利用总产出中的资本份额可以反推出资本回报率，这里总产出的资本份额用1减劳动报酬份额来计算，也就是$1 - \frac{W(t)L(t)}{P_Y(t)Y(t)}$，

其中W是工资，L是就业人数。另一方面，总产出中支付给资本的份额可以表示为

$$\alpha(t) \equiv \frac{\sum_j P_Y(t) MPK_j(t) K_j(t)}{P_Y(t) Y(t)} \tag{2}$$

把（1）式代入上式，我们得到

$$\alpha(t) = \frac{P_K(t) K(t) [i(t) - \hat{P}_K(t) + \delta(t)]}{P_Y(t) Y(t)} \tag{3}$$

这里，$P_K(t) K(t) \equiv \sum_j P_{K_j}(t) K_j(t)$ 为总资本的名义价值，$\hat{P}_K(t) \equiv \sum_j \left(\frac{P_{K_j}(t) K_j(t)}{P_K(t) K(t)}\right) \hat{P}_{K_j}(t)$ 为资本价格的平均增长率，$\delta(t) \equiv \sum_j \left(\frac{P_{K_j}(t) K_j(t)}{P_K(t) K(t)}\right) \delta_j$ 则表示平均折旧率，它取决于资本的组成成分而随时间变化。利用（3）式，我们可以得到实际的资本回报率$r(t)$，

$$r(t) = i(t) - \hat{P}_Y(t) = \frac{\alpha(t)}{P_K(t) K(t) / P_Y(t) Y(t)} + (\hat{P}_K(t) - \hat{P}_Y(t)) - \delta(t) \tag{4}$$

在后面，这个等式将用来测算中国的实际资本回报率（后文简称为“资本回报率”）。

注意（4）式的关键是，它采用了按现价计算的资本产出比，因而考虑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化，显然这个价格变化也是资本回报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卡塞利和费雷尔也在测算各国资本回报率的差异时提到了这一点（Caselli and Feyrer，2006）。当资本品价格和产品价格相等时，两者的增长率也相同，（4）式退化为我们通常看到的资本回报率表达式，即资本占收入的份额与实际资本产出比的比值减去折旧率。

在（4）式中，我们假设企业是产出品价格的接受者。当产出品价格超出其边际成本时，资本收入包含利润π，反映了不完全竞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边际产品收入为$\frac{P_Y}{\mu}MPK_j$，其中$\mu \geq 1$为价格与边际成本之比（或1加上利润率）。此时，（2）式变为

$$\alpha(t) \equiv \frac{\sum_j \frac{P_Y(t)}{\mu}MPK_j(t)K_j(t)}{P_Y(t)Y(t)} + \frac{\pi(t)}{P_Y(t)Y(t)} \qquad (5)$$

由于$\frac{\mu-1}{\mu}$表示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此时实际资本回报率变为

$$r(t) = i(t) - \hat{P}_Y(t) = \frac{\alpha(t) - \frac{\mu-1}{\mu}}{P_K(t)K(t)/P_Y(t)Y(t)} + (\hat{P}_K(t) - \hat{P}_Y(t)) - \delta(t) \qquad (6)$$

上式表明，如果忽略不完全竞争，我们用（4）式测算的资本回报率会被高估。

这个误差到底会有多大呢？若假设资本的价格与产出品的价格以相同速度增长，而劳动份额为0.5，折旧率为10%，按现价计的资本产出比为1.67，(注)若企业作为产出品价格的接受者，其真实的资本回报率为20%。放松了价格接受者的假设后，并假设边际成本的利润加成为10%，则真实的资本回报率将降为14%。在后面估计中国的真实资本回报率时，我们将不考虑利润加成这个问题。因为本文的目的是比较中国资本回报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以及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的结果。只有在不完全竞争带来的误差在中国会随着时间改变，或与其他经济体相比程度有不同时，用（4）式计算的实际资本回报率，才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

二、数据

计算资本回报率，我们需要三类数据：总产出，总资本，以及资本收入的份额。我们将逐一介绍这三类数据的来源和选择。

1.总产出

我们在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估计值时，与使用其他经济数据相同，首先必须考虑其准确性。中国统计制度中两个具体制度与这个问题有重要的关系。

首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使用的基础数据，来自地方统计局向国家统计局的上报资料。由于担心地方政府有高估本地GDP的动机，许多学者质疑GDP的准确性。这确实曾是一个问题，但国家统计局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便通过建立独立渠道来获得数据，对地方上报的数据进行调整。同时，地方政府也不总有高报GDP的动机。例如，近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对宏观经济进行降温，导致地方政府有低报GDP的动机，以规避中央实行紧缩型宏观经济政策。

第二，国家统计局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经济普查，并据此调整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注]普查完成后，国家统计局会对其报告的GDP进行追溯调整。显然，如果经济增长一直很快，那么离开最近的普查年份越远，未经调整的数据将越不准确，同时追溯调整对离普查越近的年份做出调整也就越大。所幸的是，2004年经济普查刚刚过去，国家统计局已经基于这次经济普查对1978—2004年的GDP进行了调整。调整后，2004年GDP上调了16.8%，是固定资本形成调整幅度（上调了4.4%）的好几倍。我们的估计使用了调整后的数据，因此我们得到的投资率与以前的研究显然有差别。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对省际GDP进行了调整，使得各省GDP之和等于全国GDP。

麦迪森对中国官方报告的GDP提过两点评价：一是1978年的官方报告的GDP被低估了，二是GDP价格指数的增长率过低（Maddison，

1998）。显然，1978年GDP估计值可能存在的问题，只会对该年的资本回报率有影响，并不会影响最近年份的估计值。GDP价格指数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名义资本回报率，因为我们计算时采用了现价而非不变价的GDP，但确实会影响实际资本回报率。不过，注意到2004年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同时对GDP的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我们在估计时使用了调整后的价格指数。

可能还会有人担心企业报告的利润数据是否准确，特别是担心企业有高报利润的可能性。例如，跨国公司在中国享有比其本国更低的税率，它们很可能故意通过内部定价策略来转移利润，高估它们在中国取得的利润和增加值，以减少其在本国的纳税额。不过，有几点理由可以说明这可能并不成其为问题：首先，在中国，企业向政府统计机构报告的数据不会用来作为征税的依据。(注)其次，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所纳的税额在本国可以要求抵扣。第三，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只适合于跨国企业，中国企业不一定有高报利润的动机。事实上，蔡洪滨、刘俏和肖耿的研究表明国内企业为了避税倾向于低报利润（蔡洪滨等，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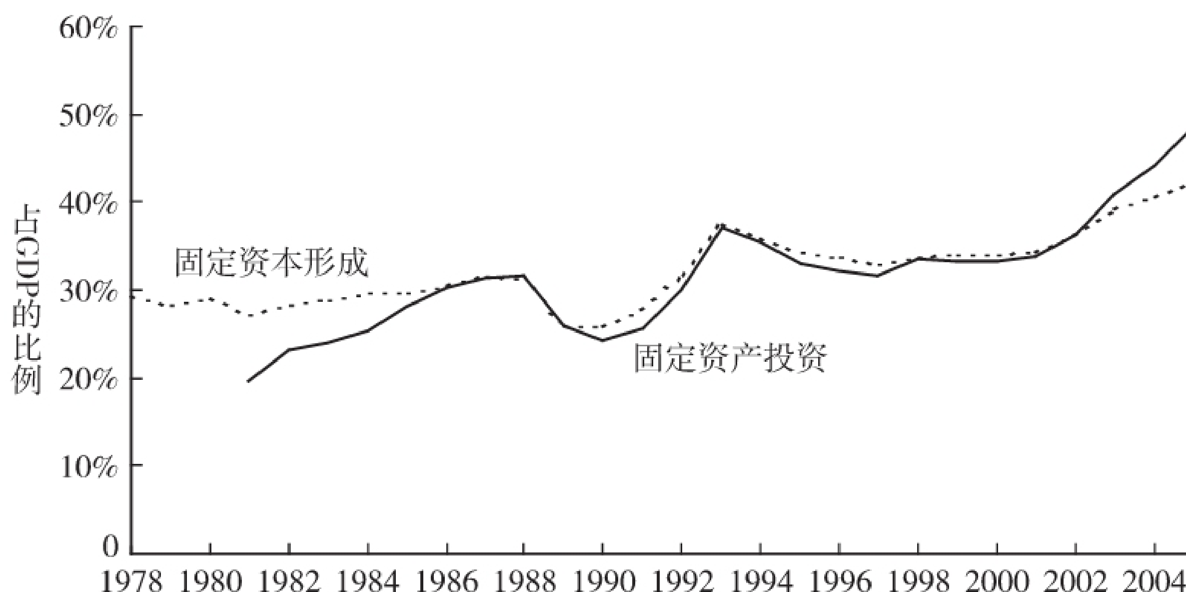


图3.1　1978—2005年中国的投资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资本存量

我们要测算的第二个数据是资本存量。中国国家统计局（以下简称“国家统计局”）按月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政府用来度量总投资的官方指标。从图3.1中，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率从1981年的20%增加到2005年的略低于50%。许多人就是据此判断中国的投资率过高，并指出现在投资率不断增加的这一趋势在中国不可能持久。

但是，有两点原因使得这一被广泛采用的数据不能用来准确测算中国资本存量的变化（许宪春，2000）。首先，这一指标包括购买土地和购买旧机器和房屋的支出。显然，这些支出都不能增加中国的可再生资本。其次，这一指标只统计了一定规模以上的投资项目，显然低估了总投资。[注]

另一个较少被使用到的、可供选择的投资指标是“固定资本形成”，不过统计局按年而非按月公布该指标。国家统计局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中减去土地使用权、旧机器设备和旧房屋的购置价值，然后再加上未纳入固定资产投资报表统计范围的项目价值，得到固定资本形成。在图3.1中，以固定资本形成占GDP份额计量的投资率，其增长速度明显要比固定资产投资率慢得多，仅从1978年的30%上涨到2005年的42%。由于固定资本形成能更准确地测量中国可再生资本的变化情况，我们将用这个指标来测算中国的资本存量。

这一指标的主要缺陷是，它没有对固定资本形成进行分类统计，不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却分别提供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和机器设备购置投资的数据。[注]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在固定资本形成中，这两类投资的比例与它们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相对比例完全相同。

接下来要解决投资品价格指数的问题。自199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分别报告建筑安装工程和机器设备购置的价格指数。对于1978—1989年的价格指数，我们假设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价格指数为建筑业增加值的价格指数。(注)相似的，我们假设这一时期的机器设备购置投资的价格指数等于机械制造业的出厂价格指数。对于1978年前，我们假设两者的增长率都等于固定资本形成的价格指数（Hsueh and Li，1999）。

有了名义投资和投资品的价格指数，我们用永续盘存法分别估计两类资本存量。1952年的初始资本存量，用1953年的投资（投资数据最早可得的年份）比上1953—1958年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来估计，而建筑安装工程和机器设备的折旧率分别为8%和24%。(注)

我们计算资本存量的方法与其他人的方法有一定区别。珀金斯（Dwight Perkins）使用国家统计局在“物质生产体系”（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公布的资本积累数据（该指标自1993年后不可得），假设资本的年折旧率为5%，初始（198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3。邹至庄和李巨威用总资本形成（包括存货和总固定资本形成）作为投资序列，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会计折旧率，以及邹至庄的自有数据估计得到初始（1953年）资本存量（Chow，1993；Chow and Li，2002）。我们的估计方法与黄永峰、任若恩和刘晓生（2002）以及阿尔文·扬（Young，2003）的相似，不过在细节上略有不同。黄永峰、任若恩和刘晓生的建筑安装工程和机械设备购置投资序列直接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序列，并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两个投资序列进行平减。阿尔文·扬则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总固定资本形成来计算非农部门的资本存量，但并不区分两类投资，不过他采用的投资价格指数是非农部门产出价格指数扣除消费和出口品价格指数后的残差。

3.资本份额

最后，我们还需要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即资本份额，其中资本收入是指国民收入剔除劳动者报酬后的部分。国家统计局提供各省劳动者报酬数据，以及各省分三次产业的劳动者报酬数据，但没有提供全国的劳动者报酬数据。[注]因此，我们用各省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按其GDP加权后得到的平均值来代替。在表3.5中，我们可以看到，由此估计得到的资本份额基本在46%和50%之间，不过从2003年到2005年间有很快的增长。

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可能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如果没有包括非工资收入，那么公布的这些劳动者报酬就很可能被低估，从而高估资本份额。但是，国家统计局显然在公布的劳动者收入中包括了非工资收入。例如，在工业增加值中，非工资收入大约占20%，而工资性收入大约占30%。[注]

其次，如果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劳动者报酬不包括企业主的劳动报酬，那么对劳动者报酬的估计值将被低估（Gollin，2002）。在2005年之前，国家统计局把企业主的所有资本收入都计为劳动者报酬。因此，实际上2005年之前劳动者报酬被高估了，因此低估了真实的资本份额。不过，从200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用企业平均工资来代替企业主的劳动收入。遗憾的是，国家统计局并没有报告这一调整的具体数量，因此我们不能据以追溯调整2005年之前的资本份额。

表3.5　估计中国资本回报率所用的变量，1978—2005年

年份	资本份额（百分比）	GDP（10亿元）[a]	资本产出比	年折旧率（%）	增长率（%，年）		资本回报率（%，年）[b]
					投资品价格指数	GDP价格指数	
1978	50.33	364.52	1.39	12.06	0.94	1.92	23.15
1979	48.62	406.26	1.37	11.93	2.14	3.58	22.04
1980	48.85	454.56	1.36	11.77	4.98	3.79	25.40
1981	47.32	489.16	1.44	11.38	1.79	2.29	20.92
1982	46.43	532.34	1.45	11.00	2.35	-0.25	23.65
1983	46.46	596.27	1.43	10.76	3.77	1.00	24.47
1984	46.32	720.81	1.34	10.60	4.81	4.94	23.91
1985	47.10	901.60	1.24	10.63	8.61	10.21	25.74
1986	47.18	1027.52	1.32	10.81	7.53	4.75	27.83
1987	47.47	1205.86	1.34	10.75	6.99	5.16	26.57
1988	48.28	1504.28	1.28	10.78	12.50	12.08	27.45
1989	48.49	1699.23	1.41	10.82	9.52	8.51	24.55
1990	46.64	1866.78	1.49	10.94	7.31	5.84	21.89
1991	49.97	2178.15	1.44	10.85	9.06	6.85	26.08
1992	49.91	2692.35	1.36	10.73	15.53	8.24	26.37
1993	49.63	3533.39	1.31	10.65	29.37	15.12	27.92
1994	48.89	4819.78	1.39	10.59	10.25	20.61	24.86
1995	47.44	6079.37	1.37	10.68	4.97	13.74	24.05
1996	47.20	7117.66	1.39	10.65	4.52	6.44	21.38
1997	47.11	7897.30	1.48	10.55	2.13	1.51	21.99
1998	46.88	8440.23	1.57	10.55	0.02	-0.86	20.18
1999	47.58	8967.71	1.64	10.53	-0.14	-1.26	19.56
2000	48.52	9921.46	1.63	10.53	1.61	2.06	18.71
2001	48.54	10965.52	1.65	10.50	0.71	2.05	17.50
2002	49.08	12033.27	1.67	10.49	0.38	0.58	18.61
2003	50.38	13582.28	1.66	10.49	3.10	2.61	20.43
2004[c]	54.49	15987.83	1.63	10.48	6.87	6.91	22.82
2005[c]	58.60	18308.48	1.72	10.47	1.43	3.92	21.04

注：a.按现价计。b.用文中提到的方法调整1992—1995年的GDP价格指数的增长率。如此调整前得到的资本回报率在1992—1995年这四年分别为33.30%、41.47%、14.26%和15.16%。c.初步估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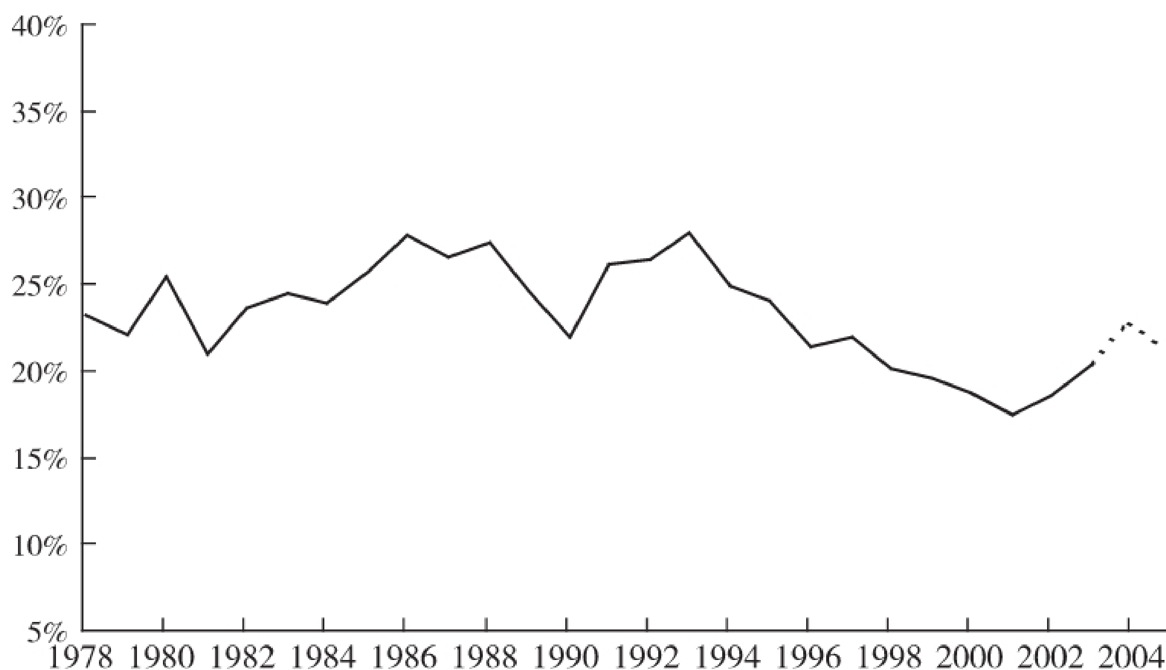


图3.2　1978—2005年资本回报率基础估计

注：虚线连接各点为初步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估计

三、资本回报率的估计值

在图3.2中，我们给出了根据（4）式计算的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基础估计，并在表3.5中给出了所有数据。这一估计值对以现价计算的、由建筑安装工程和机器设备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加总，得到总资本存量，并计算了以现价计算的资本产出比。在图3.2中，我们看到中国年资本回报率在1993—1998年从25%下滑至20%。自1998年以

来，年资本回报率一直保持在20%附近，尽管在这一时期投资率上升了8个百分点（见图3.1）。因此，我们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但其资本回报率并不低于世界其他经济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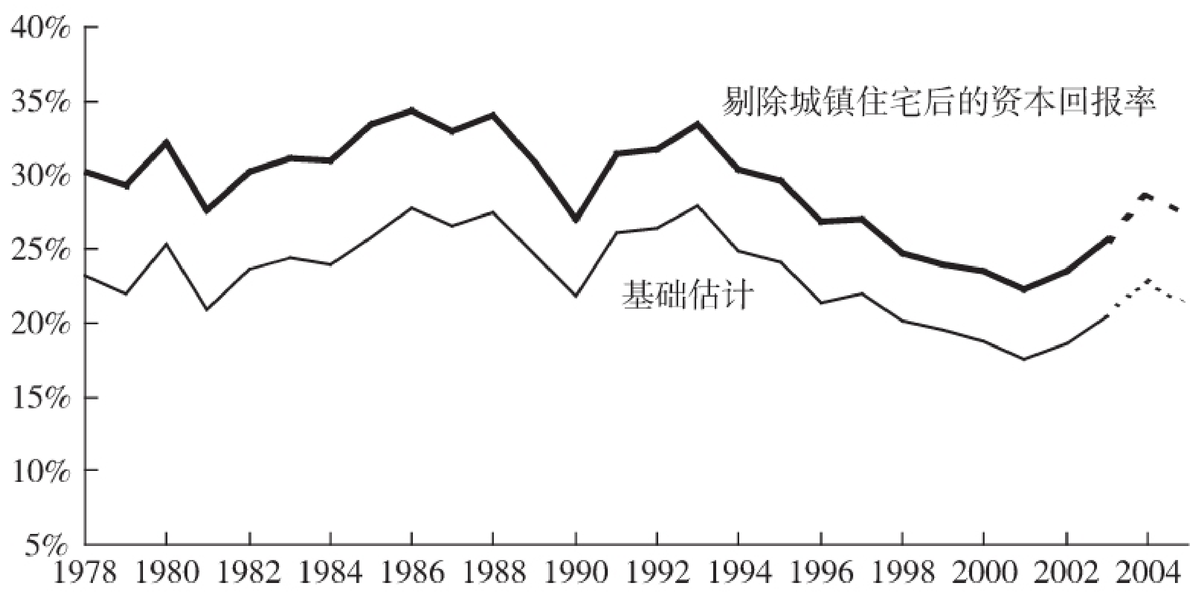


图3.3　1978—2005年剔除城镇住宅后的资本回报率

注：虚线连接各点为初步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估计

我们对图3.2基于的数据做出两点说明。第一，1992—1995年，投资品价格指数与GDP价格指数的增长率的差别波动非常大：从1992年到1993年，投资品相对价格指数增加了约10%，而从1994年到1995年，却又降低了10%。在其他年份，投资品相对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一直较平稳地处在低于3%的水平。为消除投资品相对价格的过度波动对资本回报率估计值的影响，在保持1992—1995年GDP价格指数总增长幅度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假设GDP与投资品价格指数在这一时期成比例地增长，并据此调整了GDP价格指数。

第二，基于三点原因，2004年和2005年的估计值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一是国家统计局没有提供2004年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因此我们用2003年和2005年的平均值来替代。二是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即2005年的劳动者报酬不再计算企业主的资本性收入，但并没有对2005年以前的数据进行相应调整。三是2005年劳动者报酬数据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很可能会在今后的年鉴中被进一步调整。

这个基础估计与我们通常引用的其他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具有较好的可比性。使用需要更多分部门数据计算的资本回报率的不同估计值在某些情况下更有用，但这些数据的可信度会小一些。不过，在数据可得时，计算这些估计值仍有意义，因为它们能反映一些影响到基础估计的概念和测算问题，包括与商业投资有关的资本存量的测算问题，以及对应的资本收入的测算。下面我们来计算不同的估计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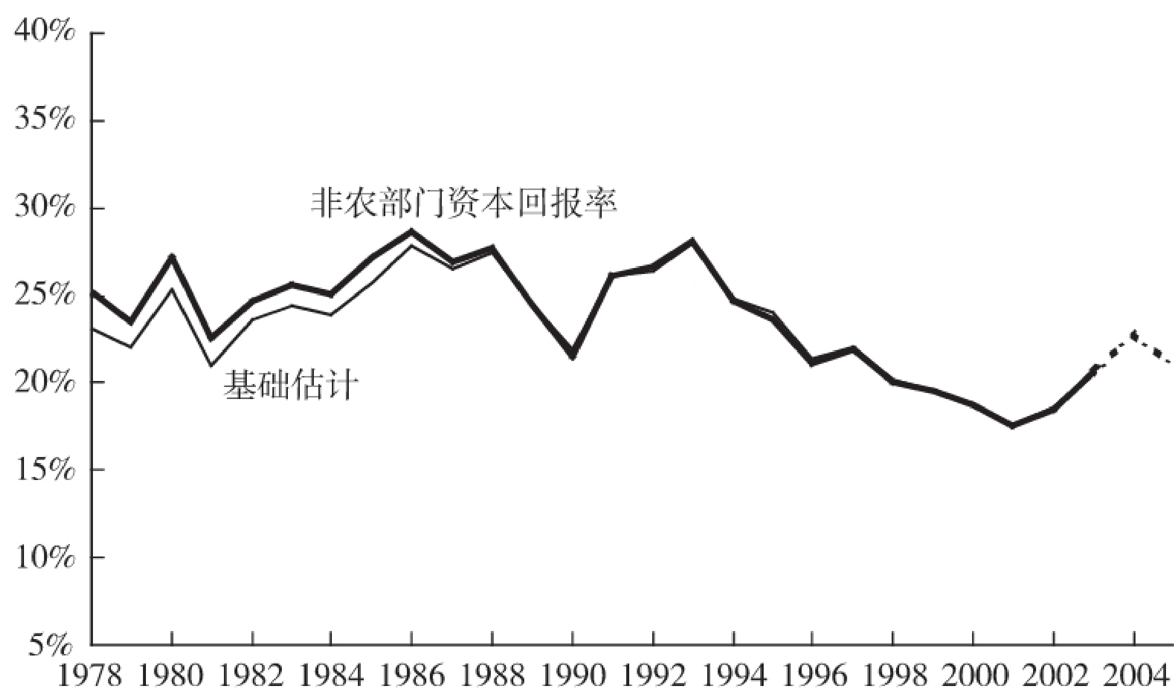


图3.4　1978—2005年非农部门资本回报率

注：虚线连接各点为初步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估计

我们首先来计算排除了居民住宅的资本回报。居民住宅投资在中国增长很快，但是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可能低估了这些住宅资本提供的服务价值。具体地，国家统计局在GDP核算时假设城镇住宅资本的租金收入为其原价值的3%。图3.3给出了剔除城镇住宅后的资本回报率，我们在总资本存量中剔除了城镇居民住宅资本价值，并相应地剔除了总资本收入中城镇居民住宅的租金价值。如图3.3所示，剔除城镇住宅后的年资本回报率比基础估计高出约5个百分点。㊟

在基础估计中，资本收入通过从收入法GDP中扣除劳动者报酬来估计。但非劳动收入中既包括农用土地和矿产资源，也包括可再生资本创造的收入。最理想的是剔除资本收入中不可再生资源的租金收入，但受数据限制，我们只能剔除资本收入中农业和矿产资源（包括石油）的影响。即在总资本存量中剔除农业部门和矿产资源部门的资本存量，并从总资本收入中剔除了这两个部门的资本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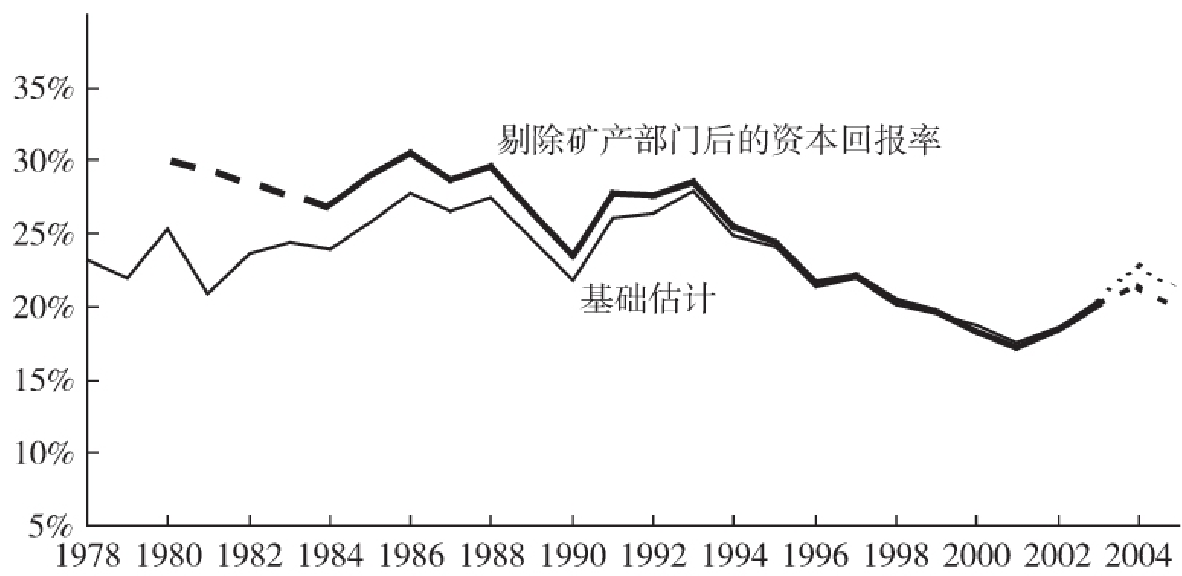


图3.5　1978—2005年剔除矿产部门后的资本回报率

注：虚线连接部分为初步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估计

在图3.4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非农部门的资本回报率略微高于总资本回报率，但自1988年之后，这两个回报率几乎相等。类似的，图3.5所示的非矿产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在20世纪80年代也比总资本回报率高，因为在这一时期，政府压低了矿产资源的价格。但是，在90年代，矿产品和石油价格迅速上升，这个差距缩小了。在最近这段时期，这两种算法得到的资本回报率与我们的基础估计差别很小。

我们的基础估计假设两类资本的折旧率不随时间变化。但是，既然折旧率不仅反映物理上的消耗，也反映技术上的淘汰，而1978年之前由于技术进步较慢，我们认为技术淘汰的速度可能较低。考虑到这一可能性，我们假设在1952—1978年这段时期的折旧率比1978年以后的低4个百分点，对总资本存量重新估计后，再计算资本回报率。图3.6表明，在早期，这一资本回报率比我们的基础估计要低，但是到了后期，两者已非常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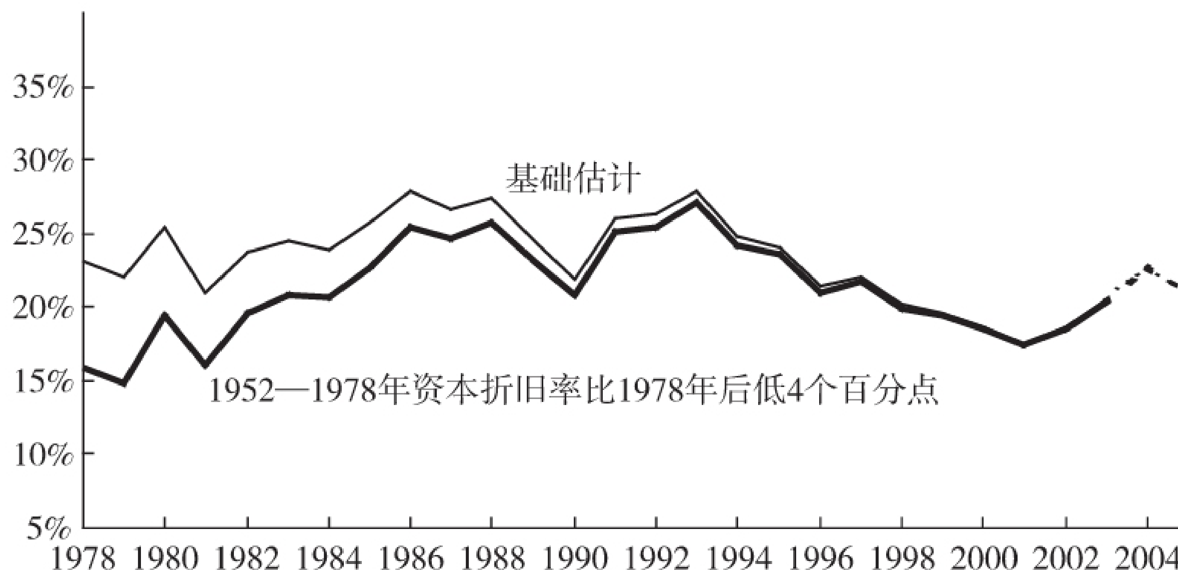


图3.6　1978—2005年不同折旧率下的资本回报率

注：虚线连接部分为初步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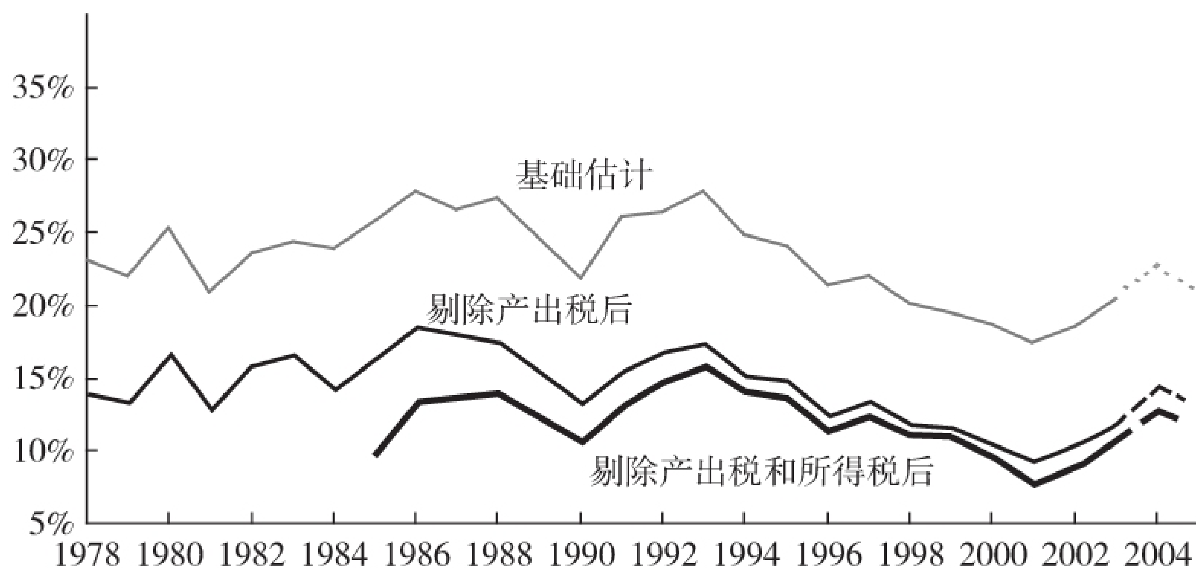


图3.7　1978—2005年剔除税收后的资本回报率

注：虚线连接部分为初步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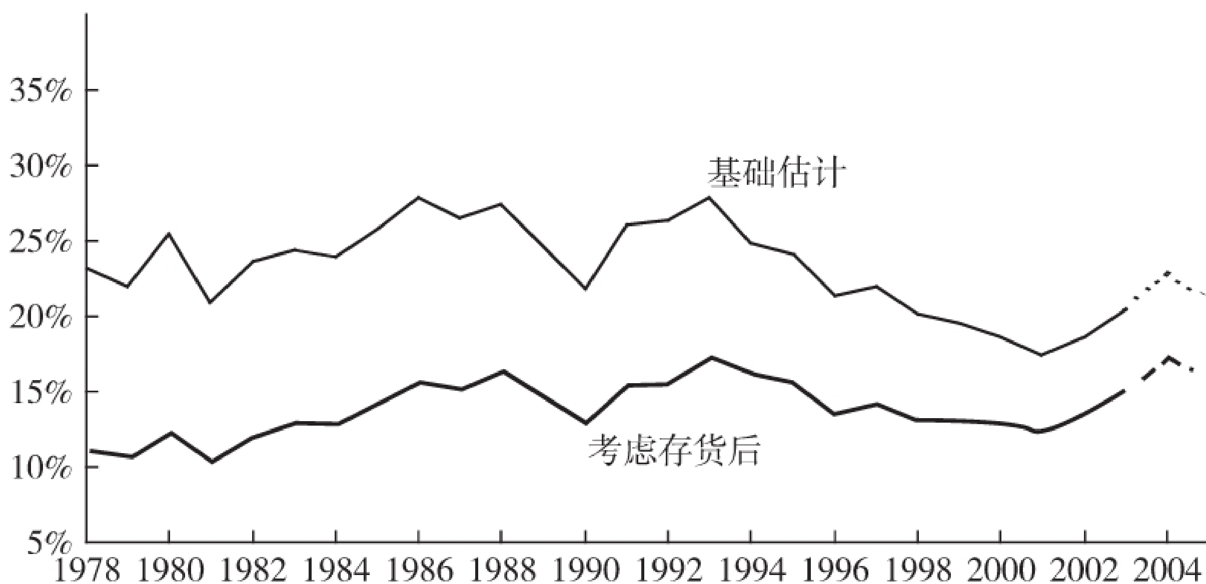


图3.8　1978—2005年考虑存货后的资本回报率

注：虚线连接部分为初步估计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估计

在基础估计中，资本收入包含税收，即生产税（如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尽管就社会整体而言，资本收入应包括税收部分，不过企业投资主要由税后资本回报率决定。图3.7中给出了根据税后资本收入计算得到的资本回报率。如图所示，税后资本回报率大约比税前资本回报率低10个百分点。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认为资本收入是由固定资本投资带来的。但是企业还有存货投资。实际上，把所有资本收入作为固定资本投资的收入，隐含假设为存货不产生收入。然而，多数情况下，存货可能是企业总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我们的下一个估计，是计算总再生资本的回报率。在图3.8中我们看到，考虑存货后得到的资本回报率与基础估计相比，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降低了10%，而近年来却仅降低了5%（我们用GDP的价格指数来平减存货价值，并假设存货折旧率为0）。这是因为早期的存货增加占总资本形成的比例要比现在高很多（1978年为22.1%，而2005年为2.6%）。或许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考虑存货后，2004年的资本回报率比1978年略有增加，而在基础估计中却恰好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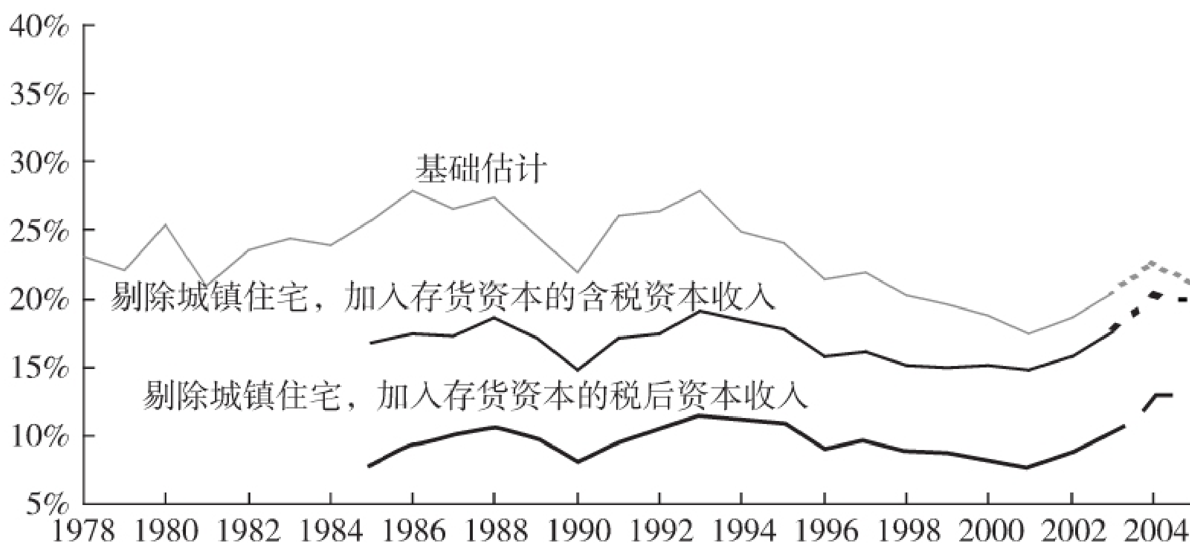


图3.9　1978—2005年税前或税后剔除城镇住宅但考虑存货后的资本回报率

注：a.虚线连接部分为初步估计结果。b.1985年之前的企业所得税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估计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城镇住宅资本、存货以及税收等问题，发现与基础估计相比，考虑这些问题后，得到的资本回报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或水平都有很大的变化。图3.9对1985—2005年期间的基础估计和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得到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比较。在中间的曲线中，税收没有从资本收入中剔除，其年资本回报率在15%到20%之间，而且近年又上升到新的高度。在最低的曲线中，税收已经从资本收入中剔除，此时得到的年回报率在10%左右波动，而且近年来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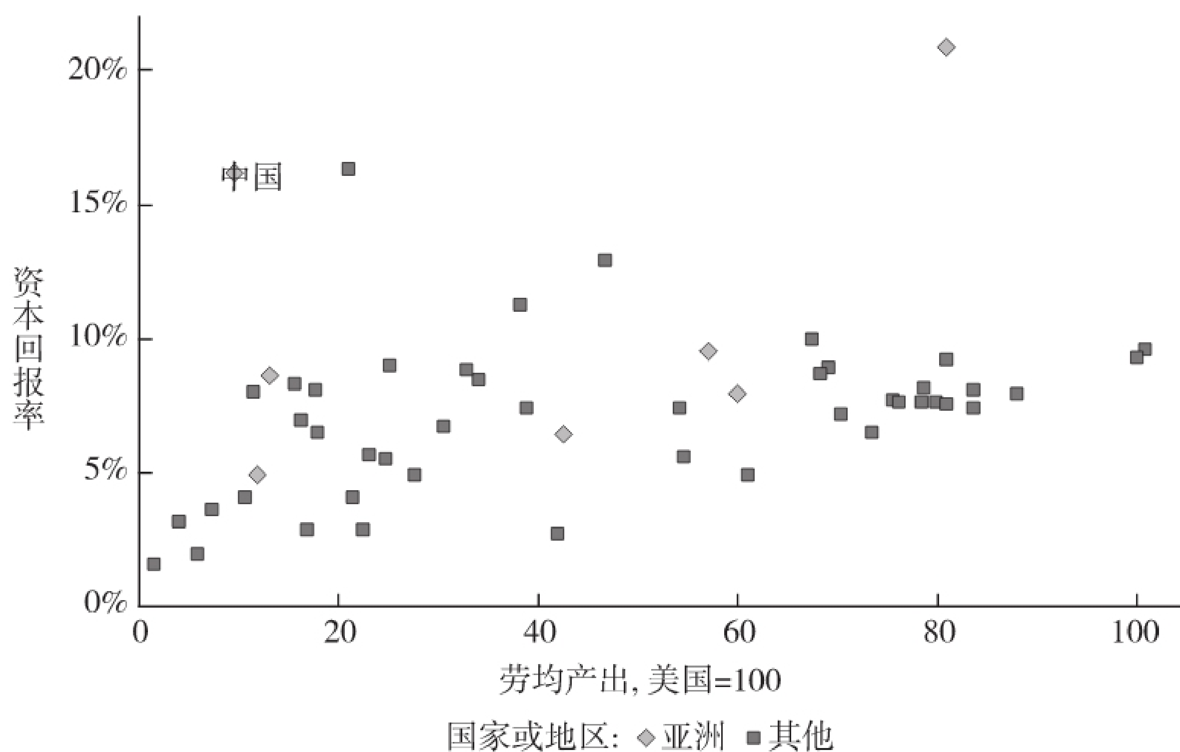


图3.10　1998年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与劳均产出

注：数据为对52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计算结果。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Bernanke and Gurkaynak（2001）；作者的计算

OECD利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微观工业企业层面的统计数据，也对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计（Dougherty and Herd，2005），我们可以把本文的估计值与之进行比较。国家统计局的工业统计数据的统计区间是1998年到2003年，包括所有年销售量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和所有国有工业企业的数据。在这些工业企业中，OECD计算的1998年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为6.1%，2003年为12.2%。OECD的数据口径与我们在上面使用的资本中包括存货并剔除城镇住宅的口径相对应。我们的估计值分别为8.8%和10.1%，与OECD的相近。

但是，对于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测算得到的资本回报率，我们应该特别小心。首先，企业层面数据几乎总是按账面价值计算资本存量的。第二，这些数据涵盖的范围有限，很难用来判断整个经济的资本回报率。第三，因为企业层面的数据只包含现存企业的信息，没有考虑已经退出企业的资本回报。而采用宏观数据，得到的总资本存量自然会包括那些已经退出的企业的资本存量。因此，我们用宏观数据进行的估计会捕捉到经营失败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但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却无法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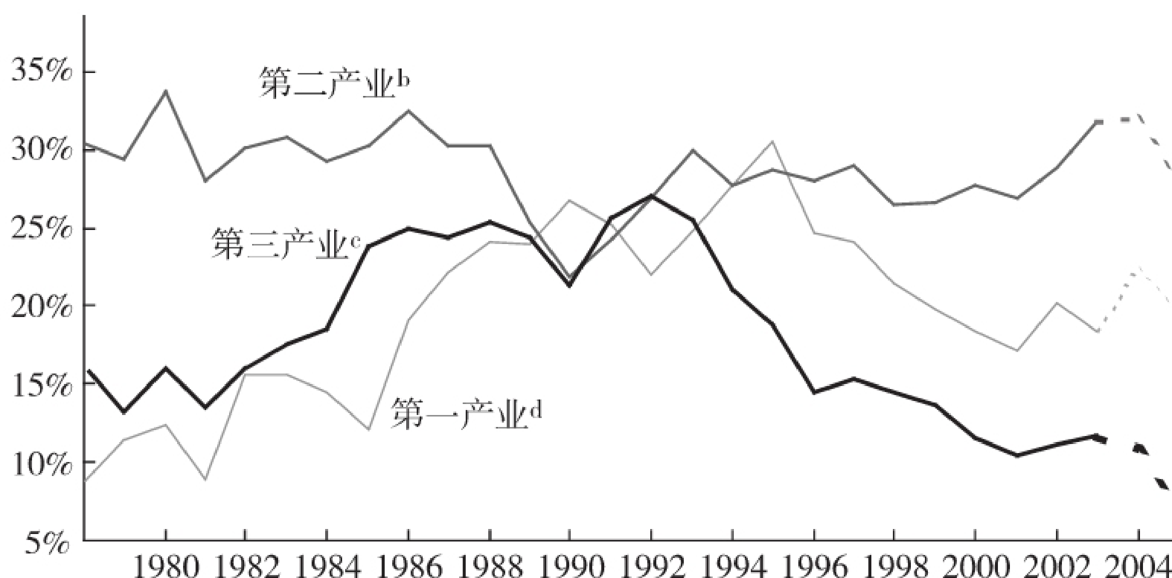


图3.11　1978—2005年三次产业中的资本回报率[a]

注：a.虚线连接部分为初步估计结果；b.建筑、采掘和制造业；c.服务业；d.农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及作者的计算

最后，把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比较也很有意义。理想的做法是，用与本文相同的详细程度，测算世界上所有经济体的资本份额和资本产出比，但这样相当费时。为简便起见，我们用佩恩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中提供的各经济体数据，计算资本产出比。而资本收入份额则根据伯南克和居尔卡伊纳克在2001年中给出的劳动收入份额计算得到，并假设每年的折旧率为6%（Bernanke and Gurkaynak，2001）。这样得到的中国资本回报率与我们前面计算得到的不太一样，不过用同一个数据集更有利于我们对各经济体的情况做比较。图3.10画出了用（4）式计算得到的各经济体资本回报率与各经济体劳均产出的散点图。从图中我们看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世界上其他多数经济体。

四、分行业和地区的资本回报率

下面我们讨论中国资本回报率在地区间与行业间的差异。先看资本在各行业中的分布情况。图3.11是分三次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第二产业包括建筑业、采掘业和制造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资本回报率。在中国改革初期，第二产业的回报率最高，而第三产业较低，第一产业最低。到1989年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回报率有大幅上升，而第二产业的资本回报率略有降低，使得三次产业的资本回报率几乎完全收敛到同一水平。但是，自1991年开始，三次产业资本回报率再次发散，其中第二产业的资本回报率有所提高，第一产业略有下降，第三产业则有明显下降。我们的估计采用了经全国经济普查调整后的GDP，其调整主要涉及服务业增加值。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第三产业内的投资（例如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第二产业的回报率，但并不一定会提高第三产业本身的回报率。也有可能是因为第三产业投资带来的生产率和产出增长存在滞后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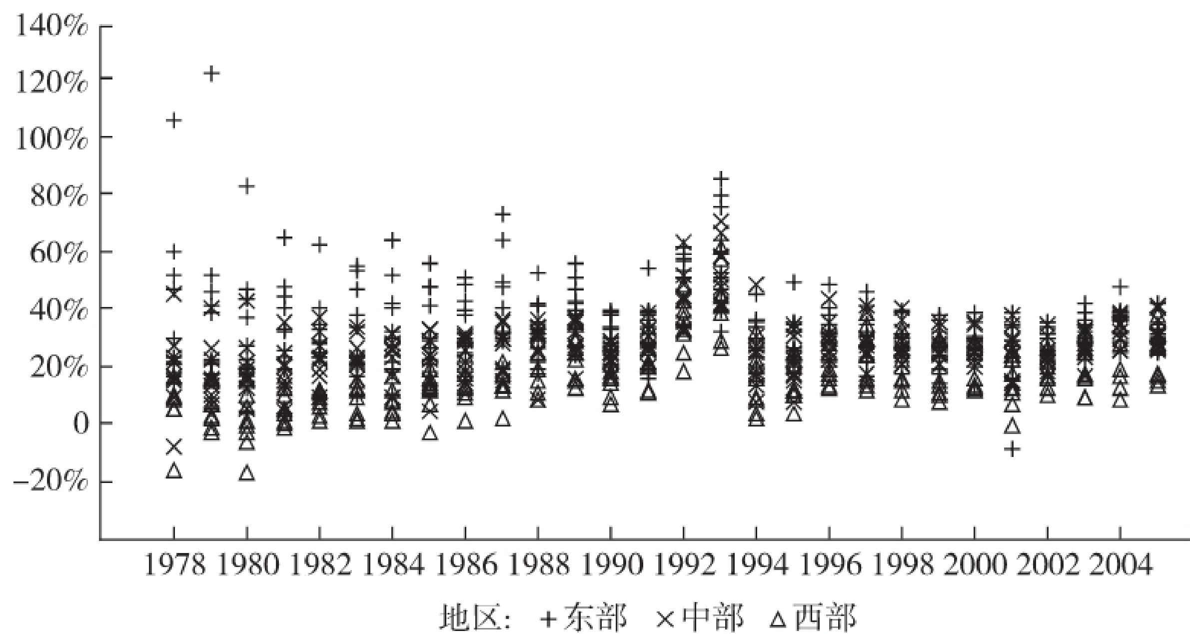


图3.12　1978—2005年各省资本回报率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及作者的计算

注：2004年和2005年为初步估计结果；每个观测值代表中国28个省的资本回报率估计值。

图3.12绘出了利用（4）式计算得到的各省1978—2004年的资本回报率。把中国28个省级行政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与自治区，不包括西藏，重庆与四川合并，海南与广东合并）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每个地区分别用一个符号表示。从图中我们能得到两个结论：第一，资本回报率在东部一般比较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第二，各省间资本回报率的差距随时间在减小。尽管在改革初期（1978—1982年），上海的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其他省份，到后期这一差距不再明显。图3.13是各省资本回报率的标准差，我们看到它随时间有下降的趋势。

我们在表3.6中，给出的是各省资本回报率的转移矩阵。我们首先计算了28个省级行政区域在四个时期（1978—1984年，1985—1991年，1992—1998年，1999—2005年）内的平均资本回报率，然后分时期对各省平均资本回报率排名，从高到低分为4组。然后考察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过程中，各组成员的变化情况，计算成员继续保持在原组的概率，以及转移到其他各组的概率。结果表明从1978—1984年到1985—1991年期间，各省的分组情况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那之后，分组情况有了显著变化，例如，1985—1991年期间到1992—1998年期间，大约有60%的省份的排名发生较大变化，转移到其他组。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各省排名分组的变化主要在前三组间进行，平均资本回报率排名最低的那组，所有时期内的排名只在组内变化，不太可能上升到其他分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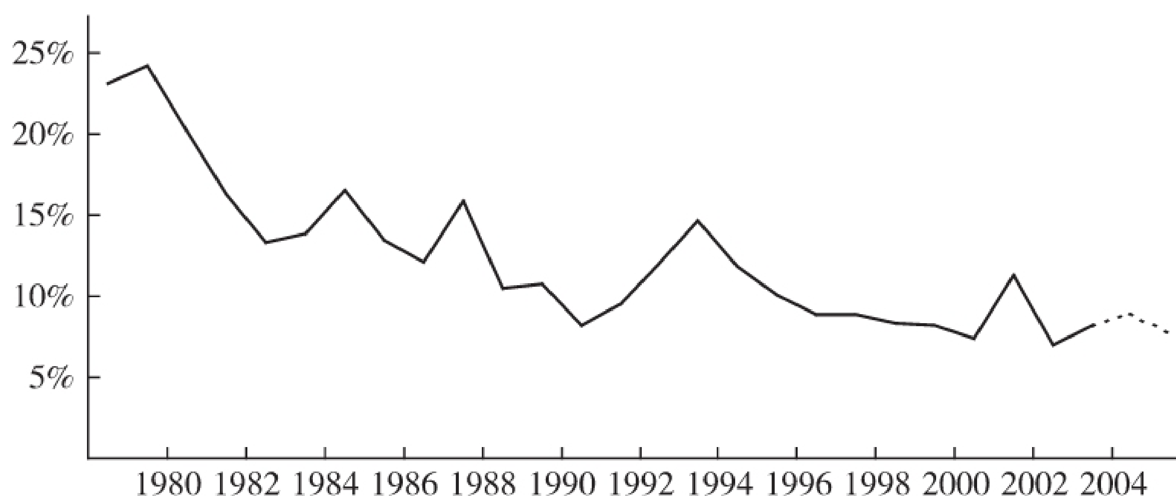


图3.13　1978—2005年各省资本回报率标准差

注：虚线连接部分为初步估计结果；28个省的资本回报率的标准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及作者的计算

五、结论

本文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计算发现，尽管中国的投资率相当高，其资本回报率依然高。在基础估计中，我们得到的中国目前年总资本回报率约为20%，比20世纪90年代早期略低一些，但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并不低。我们调整了存货、城镇居民住宅、税收后得到的估计值有所降低，但在最近几年呈现上升趋势。

为什么如此高的投资率，却没有造成中国资本回报率的降低呢?我们认为有两点原因：首先，由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推动的产出，有相当快的增长。因此，资本产出比并没有因为投资率增加而有过多的增加。其次，总收入中的资本份额自1998年以来逐步增加，而在此期间恰好出现了显著的投资增长。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中国工业部门内的渐进式重组使其向资本密集型工业转变，因此要求中国

有更高的稳态投资率。受数据限制，我们无法找到自1998年以来资本份额提高的源泉，但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显然很有意义。

表3.6 中国各省资本回报率的转移矩阵

期末四组	期初四组			
	1	2	3	4
	从 1978—1984 年到 1985—1991 年			
1（最高）	0. 71	0. 14	0. 14	0. 00
2	0. 29	0. 71	0. 00	0. 00
3	0. 00	0. 14	0. 57	0. 29
4	0. 00	0. 00	0. 29	0. 71
	从 1985—1991 年到 1992—1998 年			
1	0. 43	0. 29	0. 29	0. 00
2	0. 43	0. 29	0. 14	0. 14
3	0. 14	0. 43	0. 14	0. 29
4	0. 00	0. 00	0. 43	0. 57
	从 1992—1998 年到 1999—2005 年			
1	0. 43	0. 29	0. 14	0. 14
2	0. 57	0. 14	0. 14	0. 14
3	0. 00	0. 43	0. 43	0. 14
4	0. 00	0. 14	0. 29	0. 57
	从 1978—1984 年到 1999—2005 年			
1	0. 43	0. 29	0. 14	0. 14
2	0. 57	0. 14	0. 14	0. 14
3	0. 00	0. 43	0. 43	0. 14
4	0. 00	0. 14	0. 29	0. 57

注：本表给出了某个省份在初始期所处的组别到末期转移到其他组别的概率。1组是资本回报率排名为1—7的省份；2组为排名8—14的省份；3组为排名15—21的省份；4组为排名22—28的省份。

资料来源：作者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得到的估计

本文对中国投资的配置效率没有给出完全的回答，但为分析投资在三次产业和各省的配置效率提供了一些证据。我们发现了明显的资本配置无效率的证据，也发现这种配置的无效率在随时间缓解。不过，大量的资本配置效率损失可能发生在省内和三次行业之内。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用到企业层面和农户层面的数据。不过，我们注意到，利用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谢长泰和克雷诺发现，自1995年以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已有提高（Hsieh and Klenow，2006）。

参考文献

Bernanke,Ben,and Gurkaynak,Refet,2001.“Is Growth Exogenous? Taking Mankiw,Romer,and Weil seriously?”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Boyreau-Debray,Genevieve,and Wei,Shang-Jin,2005.“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The Case of China,”working paper,World Bank.

Caselli,Francesco,and Feyrer,Fames,2006.“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orthcoming.

Chow,Gregory C.,1993.“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Vol 108,No.3.

Chow,Gregory C.,and Li,Kui-Wai,2002.“Accounting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1952-1998,”working paper.

Dougherty,Sean,and Herd,Richard,2005.“Fast-Falling Barriers and Growing Concentration: The Emergence of a Private Economy in China,”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471,OECD,December.

Gollin,Douglas,2002.“Getting Income Share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pp.458-474.

Hsieh,Chang-Tai,and Klenow,Peter,2006.“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UC Berkeley mimeo.

Hsueh,Tien-Tung,and Li,Qiang (eds),1999.*China's National Income*:1952-1995,Boulder:Westview Press.

Lucas,Robert Jr.,1990.“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80(2),pp.92-96,May.

Maddison,Angus,1998.*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OECD.

Perkins,Dwight H.,1988.“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XVI,pp.601-645.

Young,Alwyn,2003.“Gold into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1,No.6,pp.1220-1260.

蔡洪滨、刘俏、肖耿（2006），“竞争会加剧公司隐瞒利润么?——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经济学报》，第2卷第1辑，第15—45页。

龚六堂、谢丹阳（2004），“我国省份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第45—53页。

国家统计局（NBS），2006，《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NBS），2001，《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2—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NBS），2003，《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黄永峰、任若恩、刘晓生（2003），“中国制造业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估算”，《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

王益煊、吴优（2003），“中国国有经济固定资本存量初步估算”，《统计研究》，2003年，第2期，第40—45页。

许宪春，2000，《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根据发表于美国《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论文》（*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6年第二期上的英文稿翻译而成，与白重恩、谢长泰（Chang-Tai Hsieh）合著。本文作者感谢钱震杰在我们的研究中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助理工作以及对本文的翻译，也感谢Olivier Blanchard、Richard Cooper以及其他参与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讨论会（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的学者对本文的讨论。我们还要感谢国家统计局的许宪春先生与我们就统计数据所进行的讨论。原载于《比较》第28辑，2007年1月。获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 后面会看到，这些取值来自中国实际数据。
3. 两次经济普查分别对GDP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整。1993年普查主要对第三产业进行调整，2004年经济普查对所有非农产业进行了调整。
4. 在《中国经济普查条例》第33条中明确规定：“经济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经济普查的目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经济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

5. 确切地说，在1997年之前，固定资产投资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5万元以上的项目，从1997年开始，调查范围从5万元以上调高到50万元以上。
6.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研究者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估计资本存量的原因（例如，黄勇峰、任若恩、刘晓生，2002；王益煊、吴优，2003）。
7. 自1990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两个价格指数数据都有官方报告），建筑行业增加值价格指数和建筑投资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95。
8. 房屋建筑物和机械设备使用寿命的估计值分别为38年和12年（王益煊、吴优，2003），利用这两个数我们估计得到两类资本折旧率。
9. 1978—1995年的分省劳动者报酬数据来自Hsueh and Li（1999），1996—2002年来自国家统计局（2003），2003年和2005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和2006年，不过2004年的数据不可得，我们用2003年和2005年的平均值代替。1978—1995年各省分三次产业的劳动者报酬数据也来自Hsueh and Li（1999），1996—2002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3），2003—2005年的数据用各年前三年的移动平均值代替。
10. 利用2003年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我们加总了各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支出以及各企业的增加值，得到工资支出占这些企业增加值的比例约为30%。用分省数据计算得到的制造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包括非工资收入）大约为50%，因此国家统计局将制造业收入中的20%归为非工资性劳动者报酬。
11. 参见Poterba（1999）对OECD国家资本回报率的比较。
12. 城镇居民住宅的投资数据的来源为：1981—1994年取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95—2005年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53—1980年则假设其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等于1981—1982年的平均，然后用这个比例和各年固定资本形成推算这期间的城镇居民住宅，其价格指数和折旧率与住宅资本相同。城镇住宅的租金用城市人口和城镇居民人均住宅租金（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支出之积代替。
13. 其他的研究考察了投资资金和各省资本边际收入之间的关系（龚六堂、谢丹阳，2004；Boyreau-Debray and Wei，2005）。

经济结构调整的制度性困难和挑战㊟

（2012年3月17日）

“十二五”规划的内容非常多，不过，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今天上午的大会发言中，也显示了其他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或者说再平衡。不过，中国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容和遇到的困难，恐怕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甚至在有些意义上是正好相反的。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内容有很多，通常我们会说三个方面，就是经济结构失调表现在投资过高、消费过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在很多其他国家，可能问题正好是相反的。

对这样的调整的必要性，从领导到企业到经济学界，认识是一致的。可是在实际执行中却碰到很大的困难，效果不十分明显。提出经济结构调整是16年前的事情，“十二五”规划中再次提出，并作为核心内容，但仍然遇到巨大的困难和障碍。我想说的一个看法就是，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是这三方面比例的调整，它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深层次的改革，那就是要调整政府与居民、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这个任务不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就很难实现。

我在这里想举一个例子。三天前，中国的“两会”结束，3月14日，对四个提案做了表决，分别是《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案，以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报告。非常有意思的是，预算报告所收到的反对票和弃权票都是四个报告中最高的，并且反对票和弃权票第一次超过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报告，加起来占到投票数的2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大代表对政府预算案的极大关注和担忧。这里问题很多，仅举几个数字。200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1.3万亿元。2011年，中国的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名义数值大幅增加了。我想可能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会为此欢欣鼓舞，但是在中国情况很不一样。我们再看，2011年的财政收入比2010年增加了24.8%，非常大幅的增加，而且超出了预算的15.6%。预算本来已经有增加的部分，但仍然比预算增加了1万多亿元。然后，去年仍然有赤字8500亿元，只比原来的预算减少了500亿元。这样一些情况，刚才我说放在其他国家觉得很好，但在中国，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些年来的扩张性财政及其背后政府对资源控制力度的增加。不仅去年这样，今年预算的赤字仍然是8000亿元。

这从一方面反映了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会这么困难。其原因就在于政府与居民、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调整，反而变得更加扭曲了。比如消费低或者储蓄高的结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居民或消费者的储蓄率高，而是因为政府的储蓄率高，这些数据我们都很清楚。投资过高，也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国企的投资行为。

因此，我想，当我们回望“十二五”规划第一年的时候，当我们担忧经济结构调整不十分理想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制度性的困难、障碍和挑战。我们必须要有深层次的改革，以调整政府与居民、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包括进行深刻的财政税收改革，这样我们才有望看到经济结构调整的成功。

---

1.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的发言。

财富分配与社会公平㊟

（2014年11月26日）

非常荣幸再次来主持今年财经年会的“年度对话”，这已经是我主持“年度对话”的第四年了。在年度对话中，我们邀请的都是学者，就当今重要话题做深入的学术探讨，甚至是争论。来到年度对话的学者，学科、观点和方法都很不一样，这就是对话的活力所在。

参加今年年度对话的六位学者是：秦晓、姚洋、李强、王绍光、王希、汪晖。他们中有经济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人文学者等；有来自北大的，也有清华的；有来自北京的、香港的，还有美国的。他们各自都有强烈的观点和倾向，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严谨的学者。

今年《财经》年度对话的主题是“财富分配与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几个世纪的老话题，但是今年讨论这一话题有一个新背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由法语翻译成英语在今年4月15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本书的法语版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出版，在法国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应，但英语版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在亚马逊上至今仍然保持着最畅销的经济和商业类书籍的地位，尽管这是一本近700页的经济学学术著作。我昨天查看，在1312条评论中，超过一半给予5星级赞扬。

该书也获得不少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的好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It seems safe to say that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the magnum opus of the French economist Thomas Piketty,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s book of the year—and maybe of the

decade.”（皮凯蒂的巨著将是今年最重要的书，可能是这十年最重要的书，这样说似乎并不为过。）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索洛（Robert Solow）也对这本书有很多正面评价。当然，经济学家中也有很多不同意见。这很正常。

我早就认识皮凯蒂，他几年前就到清华经管学院来做过学术报告。他的合作者，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也是法国经济学家，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当时我也在那里任教，他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相邻。赛斯研究美国和加拿大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一些是同皮凯蒂合作的），发现过去30年，美国收入最高人群（比如最富的1%）的收入占比越来越大，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水平。这些研究继续了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20世纪50年代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但是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库兹涅茨根据20世纪前50年的美国数据，描述并预测了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在工业化初期变得更加不平等，但在工业化后期变得更加平等。但是赛斯发现这只是一个暂时和特殊的现象，只是在40—70年代由于特殊原因（主要是战争）的特殊现象。赛斯因此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2009年授予的克拉克奖（Clark Medal），这是美国经济学会授予40岁以下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的最高学术荣誉，声誉仅次于诺贝尔奖。有人甚至认为它比诺贝尔奖的荣誉还要高，因为它更难得到：在2009年之前每两年评一次，之后每年评一次，而且每次只能颁给一位，而诺贝尔奖每年评一次，一次可以颁给最多三位。不少获得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

皮凯蒂的研究超出了赛斯的研究：他不仅研究了收入分配，还研究了财富分配，而且从美国和加拿大延扩到其他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数据还推到了过去的200年。

中信出版社及时翻译出版了它的中文版，书名是《21世纪资本论》。在上个星期，皮凯蒂访问中国，为本书做宣传。该书在中国也热销，至今销售将近20万册。这个话题对中国也是极其重要的、相关的。可以从多方面来解读。

这一书名使人联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两者在研究的问题和对象上有相同点。但是，《资本论》是以19世纪为背景的，是理论研究，而《21世纪资本论》是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背景的，主要是数据的、实证的研究。

从现实来看，在中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不仅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扩大，同时绝对水平也很高。不过，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也有重大不同。首先是人均收入普遍的快速提高，人均GDP从20世纪70年代末低于印度到今天的7000多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也许高达11000美元。特别是这30多年来，几亿人脱贫，几乎所有人都比30年前要更加富裕。在这种背景下，收入和财富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很不同：在那里，中位家庭收入并没有增长很多。另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中国存在强大的国有资本和政府的力量。所以，讨论资本回报和收入分配，就不能仅局限于家庭和个人。

从价值观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在近代，占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思想，更是追求平等和公平正义。1992年中国宣布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2013年中国又宣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是否注定导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今天的对话嘉宾来自各个学科领域，而且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可以使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讨论这一重要话题。

按照原计划，今天皮凯蒂教授将到场加入我们的讨论。但是他的行程安排使得他已经在上周离开中国了。我先来把皮凯蒂这本书的内容简单介绍几句。这本书一共有四部分，英文版685页，其中脚注等附录108页。据统计，绝大多数写评论的人阅读没有超过26页。这本书有这么几项主要贡献：

第一，运用过去100年的收入数据（主要是个人所得税数据）和过去200年一些发达国家的个人财富或资产数据（主要是遗产税数据），表明收入和财富分配在过去30年变得更加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水平回到了19世纪时期。因此，“二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收入和财富趋于平等的情况只是一个暂时现象，现在又回到了通常情况，就是市场的自然倾向是分配不平等的扩大。

第二，收入和财富分配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趋于更加平等（比如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性、人们技能水平的提高），另一种是趋于更加不平等。本书认为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扩大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回报率大于整体经济的增长率。这就使得资本回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越来越高，使得财富分配更加不平等，也导致收入更加不平等。不仅如此，当财富可以在代际继承时，就形成了作者所谓的“世袭资本主义”（Patrimonial Capitalism）。这种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不同于因优越才能和努力不同而形成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不是由于才能和努力，而是由继承造成的。这是对人们价值观的挑战。

第三，对这种现象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全球的，而非一国或若干国家的，就是要对资本和遗产征收累进税。（1）全球征税。因为在一国征税是没有用的，资本可以流动到其他国家。（2）对资本而不是对资本收入征税。（3）累进税。最优税率是50万美元或100万美元以上年收入征收80%的所得税。这个税的目的不是政府税收，而是减弱高管争取更高薪酬的议价激励。这种税对边际生产效率没有影响，而好处很多。

我们接下来从三个方面来深入地讨论和分析：

第一，实证问题。

（1）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事实是什么？产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现行市场经济制度是否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我们注意到在过去30年中，在一国内部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的同时，全球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平等了。这是我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首先发现的。

（2）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是资本回报造成的还是劳动造成的？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的高收入人群多数是CEO（首席执行官）和私募基金管理者，不能完全归于资本，可以说是劳动或人力资本。资本回报是有风险的，风险越高，回报越高，是对风险的补偿。

（3）全球化的影响是什么？马斯金（Eric Maskin）和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理论研究表明，全球化是导致不平等的一个原因。这里的全球化不是指贸易全球化，而是指生产全球化。

（4）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什么？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时代，网络效应、规模收益递增以及“赢者通吃”等都导致财富的集中。

第二，价值问题。

（1）平等的价值含义，公平、正义的价值含义。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含义是什么？一种价值是事后的平等，即结果的平等。另一种价值是机会的平等。还有一种是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定义的公正：让最穷困的人获得更高的福利，而不是收入和财富差距本身的缩小。“济贫”和“扶贫”不同于“仇富”和“杀富”。这些都是不同的价值取向。

（2）平等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平等是一种价值，另一种价值是自由。平等和自由之间可以是互补关系，也可能是对立关系。

第三，政策问题。

（1）应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政府政策是什么？其后果是什么？这里既有价值判断，也有实证问题。对于正在转型和发展的中国而言，推进哪些关键的制度性改革，以减少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平？

（2）提高所得税，增收财产税、资本税、遗产税这类应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政府政策是否可行，能否解决问题？国有化能否解决问题？它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

1. 在《财经》年度对话上的主持词。

第四章 创新、创业、企业家

硅谷创新创业模式注

（2000年12月）

从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边竖立着醒目的广告牌——美国有硅谷、苏格兰有硅峡、英格兰有硅沼、以色列有硅溪，中国有硅湖！——吸引人们到苏州投资。近两年来，中国的许多地方把规划高科技园区和硅谷连在一起，希望能够创建自己的高新技术发展的热土。一些技术公司比较集中的地方更是已经把自己比喻为中国的硅谷。“硅谷”似乎是这两年见诸国内各媒体频率最高的词，建立中国的硅谷——信息中心或高科技中心（港、城、园）是多少中国人热切的目标与梦想。

硅谷成功的源泉在哪里？硅谷模式的要素是什么？复制硅谷能否成功？风险投资怎样在硅谷运作？面对这些问题，国内的科技界和教育界怀着深厚的兴趣，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中央各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以期促进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

然而，在“硅谷热”的浪潮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误区：科技界和教育界往往把“硅谷”仅仅视为“高科技”发展和“教育兴国”问题，因此往往热衷于向政府要更多的资金。而政府又比较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老办法搞规划，办园区，找“专家”确定高科技含量，靠行政部门审批资金，或政府直接出面办“风险投资基金”。目前在“硅谷热”中的最大误解就是以为只要有名牌大学，划定一片土地（高科技园区），再加

上足够多的资金，就能开发出我们中国类似于硅谷的高新技术成长的新天地。

迄今为止，在探讨“硅谷”的问题上，我们听到的更多是科学家、工程师、金融家和政府部门的声音，却较少有经济学家的声音。事实上，经济学家有他们较宽阔的视野和强有力的分析方法，他们对硅谷模式的研究已经多年，对硅谷地区的创业文化、法律环境、公司治理结构、风险资本运作以及历史成因，都有文献成果。经济学家还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比较硅谷和美国国内其他高科技区域，比较硅谷与美国以外的科技园区。这些研究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更深层次地了解硅谷，并借鉴他国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这对帮助我们走出误区显然是有极大意义的。

针对我们目前对硅谷认识上的种种误区，本书做了三个部分的探讨。

第一部分，叙说硅谷模式。作为开篇，钱颖一从经济学家的视角讲述了硅谷的故事，使我们对走进硅谷、走出误区有了一个全盘了解。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从事硅谷研究多年，她的文章介绍了新移民（主要是来自中国和印度）在硅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青木昌彦用博弈论模型分析了硅谷模式的信息结构和创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这三篇文章以经济学视野分析硅谷模式，对我们超越局限于工程技术和资金的思维方式将会有意义。

第二部分，回顾复制硅谷的经验和教训。莱斯利（Stuart W.Leslie）和卡冈（Robert H.Kargon）的文章介绍了被称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特曼（Frederick Terman）教授在美国的东部和西南部推销硅谷模式的失败经历，而他在韩国的努力却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萨克森尼安的文章比较硅谷和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特别是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说明了新竹取得成功的因素。印度近年来在软件开发和出口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此，多塞尼（Rafig

Dossani）的文章客观地批评了印度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的得失，描述了印度高科技发展和工业园区的状况，并对台湾新竹和以色列的经验进行了比较。这三篇文章生动地说明了硅谷之外（包括美国国内和国外）的“硅谷”成败史，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这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大有益处。

第三部分，用硅谷引来的思索探讨我国高科技发展的新思路。吴敬琏的文章强调当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应该重视的是制度建设。李剑阁的文章，从他最近的硅谷之行的所见所闻，对中国高科技发展中正在遇到的认识误区做了一番思考。最后一篇是吴敬琏在北京小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中国发展高新技术要避免的盲目和问题。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结合我国现实，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值得所有从事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予以关注。

本书的上述三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强有力地说明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绝不能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能再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政策手段。要使我国高科技产业有一个健康的发展，我们应该正确全面地理解硅谷模式，汲取其他地区复制硅谷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开创新局面。最近几年，不仅仅是台湾新竹，尤其是过去落后于我们的印度，在班加罗尔等几个地区，吸引了大量硅谷的风险投资，正在迅速成为高新科技发展的一个耀眼的亮点，这些新发展都使我们感到紧迫的压力。我们编辑这本书：《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就是希望给所有关心、研究和从事我国高新技术发展战略的人提供新的信息，开拓新的视野，并引发新的思路，从而促使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沿着正确的方向腾飞。

---

1. 钱颖一和肖梦主编《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前言。与肖梦合著。

硅谷是创新创业精神的栖息地[注]

（2001年12月）

《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顾名思义是一本关于硅谷的书。但是，它并非一本普通的关于硅谷的书。首先，本书的编者和其中19篇文章的作者都是硅谷的“内部人”——他们长期生活、工作在硅谷，因此对硅谷有着第一手的感受，他们是硅谷腾飞的见证人。更有意义的是，本书的作者们一半是在硅谷的实践者，他们中有创业者、风险投资家、管理顾问、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而另一半是在硅谷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其研究领域从工程到商业管理，从社会学到法律。这就使得本书独具特色，它既包含了实际创业者们丰富而又真实的故事，又有学者们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概括。

而这两方面又是不可分离的。这从本书的两位主要编者——威廉·米勒和亨利·罗文——自身的经历中便可见一斑。他们两位的职业经历非同一般，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他们对硅谷热衷的根源。他们都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资深教授，却不仅是学者，也是非常有建树的实际工作者。事实上，他们两位都有一半的职业经历是从事非学术工作。米勒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分别担任过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和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在80年代他是硅谷著名的咨询公司SRI International的总裁。罗文教授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美国著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担任经济学家，并在1968年至1972年间担任该公司的总裁。他还多次在美国联邦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包括预算局助理局长。在90年代，他们两人又都回到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任教，此时正值硅谷最新一轮腾飞的时刻。这个时期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与这两位教授颇有来往。特别是罗文教授，由于他对东亚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兴趣浓厚，我们之

间的交流更是频繁。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看问题的方法。我感到，他们二人既有学者的头脑，又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因此常常会有与众不同的思想。

这特别表现在他们致力于研究硅谷的问题上。由于他们的推动，斯坦福大学的亚太研究中心在90年代末相继启动了“硅谷网络”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地区”的研究课题。前者侧重于硅谷本身，后者则把研究扩充到印度的班加罗尔、中国台湾的新竹，以及中国大陆、韩国和日本。这一研究课题的特点是把企业家、创业者与学者、政府官员请到一起，来共同探讨硅谷成功的经验和如何将其推广到其他地区。这一课题研究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硅谷发展的生成条件，二是类似的高科技地区之间通过技术、资本、人才和创新想法的流动而形成的全球网络。这个课题在近期举办了两场研讨会，一场是1999年6月举办的“硅谷：创新的中心”研讨会，另一场是2000年6月举办的“亚洲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研讨会。而这本书则是该课题的第一本研究成果总结。

本书英文版出版在2000年硅谷的顶峰时期，而中文版的出版恰逢美国经济衰退和硅谷发展的调整期（硅谷在70年代初、80年代中和90年代初都经历过低潮）。其实熟悉硅谷历史的人都知道，硅谷的发展经过多次波折，有起有落，产业在起落中不断更新，每一次调整都是为新的突破做准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到它的高峰与低谷，使我们能更冷静地从其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借鉴。在硅谷火爆的时候，各种关于硅谷的书让人眼花缭乱，这本书可能会被淹没。而在这个时候，这本有关硅谷的深层分析的书，更会得到人们的关注。

这本书的视角的确与众不同。在探讨硅谷的成功之路时，作者们并不认为硅谷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特殊之处是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的突破。硅谷作为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企业聚集地区的优势在于，它有一种使企业家精神转换成科技创新的环境条件，本书概括为“栖息

地”（habitat）。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我们准确地认识硅谷的一把钥匙。根据我的理解，这里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是硅谷成功的精髓，而技术突破只是其结果。这一点愈来愈被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学家中，熊彼特以注重企业家精神而著名。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活力是企业家的创新，他称之为“创造性毁灭”。在他看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业和创业公司，是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歧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是不会有活力的经济。那种把硅谷仅仅视为高科技园区而忽视它背后的企业家精神的看法显得太肤浅了。那种以政府的力量取代企业家的创造力的企图也注定要失败。

第二层含义是，在一个不大的地区内能够集中地将企业家精神成功转换为科技创新需要的环境条件。栖息地本来是生物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栖息地这一环境条件包括了多个方面。

首先，地方政府的规制对新创企业的支持起很大作用。地方政府并不一定要直接投入资金，但它的政策往往起很大作用。比如旧金山东湾的伯克利市政府的政策对新创企业限制颇多，也不利于它们的成长。结果，虽然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工学院亦是顶尖级，其师生也创办了不少创新企业，但即使在那里开办企业也很快就搬到旧金山的南湾即硅谷地区。类似的比较也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两个县：西面的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Fairfax）和北面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前者的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发展，结果吸引了大批新创企业，成为“小硅谷”；而后者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相形见绌，即使著名的美国健康研究院（NIH）就坐落在此县内，那一地区的新创企业与它的潜力相比，也相去甚远。

其次，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与本地企业的关系非常重要。熟悉硅谷历史的人都知道，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产生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即斯坦福的师生和校友创办的企业，

其产值约占硅谷产值的50%—60%。斯坦福大学师生创业已形成一种风气，硅谷的有些公司就是一些正在斯坦福就学的学生创办的。我们由此看到斯坦福大学对硅谷这一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作用。虽然波士顿附近地区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但是显然在整体上，这些大学与周围企业的关系远不如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企业的关系密切。

第三，高质量、高度流动的人才为创业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本。在美国的其他地区，高质量的人才亦很多，但是他们的流动性却远不如硅谷。在其他地方，不少人在一个公司干一辈子。硅谷特别对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印度的新移民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大都是高学历，同时又具有较高流动性。

第四，一系列专业化的服务行业，诸如金融、法律、会计、销售、人才征召等，在硅谷都很齐全，这为企业的创新和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用“栖息地”这一概念来理解硅谷对我们很有启发。硅谷的红火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学习、复制硅谷的热情。中国大陆对科技园区的建立更是豪情万丈。有意思的是，在当今中国，各级政府对高科技不是不积极，而是“太积极”了，因为他们的思路往往不对。我在两年前就指出，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意思就是政府像搞计划经济那样搞高科技是搞不出硅谷的。从本书的19篇文章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硅谷的成功的确源自企业家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硅谷不是政府造出来的，也不是产生于僵化的体制。只有自由的创业体制，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创造出硅谷这样的奇迹。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创业的栖息地。

按照这一思路，政府应该做的是大胆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调动企业家创业积极性的政策。要想方设法创造一种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环境，让一大批新创企业能够在中国生根、成长，这才是中国科技企

业崛起的希望。我们要反复说，中国人不缺企业家精神。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释放企业家精神，并把它转化为企业和科技创新，这就不容易了。在我看来，我们最大的制约因素仍是在我们的体制上，在政府身上。政府要做的事是给企业“松绑”，给企业家“松绑”。遗憾的是，不少政府部门在“规范化”的旗号下，却反其道而行之，肆意“加绑”，各种“规定”、“证书”、“许可证”铺天盖地而来，压得企业和企业家们喘不过气来。归根结底，不是中国缺乏企业家精神，而是我们的体制把企业和企业家都捆死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这本书对于我国的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风险投资家、政府官员和学者准确、全面地认识硅谷，思考如何在中国开创科技企业新局面，都将十分有益。我相信，用心的读者一定会从中领悟出硅谷成功的真谛，并找到适合我国科技创业的答案。

---

1. 为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和亨利·罗文（Henry Rowen）《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中文版）所作的序。

语言是挡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征途上的一座山注

（2006年9月17日）

《环球企业家》杂志召开2006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作为唯一的学术支持机构，参加这次盛会，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与在座的各位致力于全球化的企业家一起探讨全球化对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带来的挑战。

谈起全球化，我不由想起去年非常走俏的那本书《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平的吗？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eedman）这一突发奇想发生在他在被誉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访问的时候。今年夏天，我有机会访问印度，走访了四座城市，从德里飞到加尔各答，又飞到班加罗尔，最后到孟买。如果在中国做类似的飞行，我们早就听到播音员讲述我们将要飞跃的山脉。但是令我惊讶的是，在印度，如此长的旅程，我并没有看到山，世界真的是平的。

我在这个过程中猛然想到，弗里德曼会在班加罗尔想到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平的吗？对于有的国家而言，是的。而对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可能不是。在我们国家，穷人都在山区，所以我们讲“上山下乡”，但是在印度，穷人多在森林之中。国家之间的地理环境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地理因素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其程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几年前，《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在美国大为流行，它向人类展示了地理是如何决定人类命运的：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后来非洲的落后是因为地理因素造成的，而非人的基因不同。

回到弗里德曼的主题，他在描述世界是平的时候，当然并不是指地理条件，而是指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个地区变得相互连接了。的

确，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源可以跨越国界，重新组合。经济学家过去关心的是产品间的贸易，这叫国际贸易。也关心资本的流动，这被称为国际金融。但是全球化的概念不止这些：全球化不仅仅是产品的流动、资金的流动，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所以在我看来，在全球化中，企业本身可以全方位地利用全球的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金融资本，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跨越国界文化的重新配置，对全球化的企业而言，是不同于国际化的重大挑战。

正是在这里，在人力资源的全球配置问题上，我要进入我所演讲的主题。世界对致力于全球化的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并不是平的。至少初始条件不是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力资源能够在全球进行配置，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必须使用世界商业运作中的工作语言，即英语。而英语并不是中国人的母语。这是挡在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面前的一座山。当我们探讨全球化各种热点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讨论跨国并购、跨国管理、全球化新思维的时候，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能不能用英语作为一种工作语言？

英语之所以成为商业中的工作语言，并不仅仅是因为英国经济的成功，而主要是因为英国过去的殖民地在当今世界的成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例子。法国经济本身也不差，但法国当年的殖民地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毫无分量。这些讲英语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世界的经济和商业中的地位超强，不可避免地使得英语成为商业中的工作语言，也使得过去英国的殖民地，比如印度，在语言上受益。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香港除外。所以在语言这个平台上，中国人感到世界不是平的。我强调这一点是想说，历史条件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其实，英语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优势，它既不容易学，也不一定好听，语言学家创造了世界语，尽管它有许多语言学上的优势，但是至今没有人用。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经典的被经济学家称为“网络外部性”的现象：我之所以用某种语言是因为多数人用，正像大家都用微软的文字处理软件，都在使用MP3的音乐格式一样。这是一个语言经济学的问题。究竟是让中国的企业家学英语的成本高呢，还是让所有外国企业家学中文的成本高呢？法国人无疑热爱自己的语言，为自己的语言自豪。但是，当法国政府要求所有学术报告必须用法语的时候，受损失的是法国人自己。所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没有选择。只有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至少把它作为其中一种工作语言。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中国人不知不觉地已经付出并且正在付出直接和间接的因为语言不通的巨大成本。这些成本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它不仅仅是我们不懂英文需要请翻译的成本，更多的是经济学家称之为“机会成本”的成本。就是那些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机会。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它确实是成本。

下面我举四个我所熟悉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成本给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损失。

第一个例子。去年麦肯锡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中国正在到来的人才短缺”。麦肯锡调查了很多在华的跨国公司，发现一方面我国的大学生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招不到合适的人选，第一原因是现有的英语水平够格的毕业生（主要是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太少，连现有在华的跨国公司都满足不了。所以麦肯锡的报告推论，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发展出较大的外包产业。我们的外包服务就这样错失良机。我们更多的毕业生不能进入跨国公司，这不是我们的损失吗？

第二个例子。我在美国硅谷生活、工作了十几年。在硅谷，两个国家的移民最多，中国和印度。仅仅是清华的毕业生就有上千人。论

智力和技术训练，中国人不应该比印度人差，但是在不少公司中做得不如印度人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英语水平是基本的一项，因为语言影响沟通，沟通影响关系。我们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不能在像硅谷这样的创新基地做强，这不是我们的损失吗？

第三个例子。我现在在两家大型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担任独立董事。这两家公司都有外国人担任独立董事，也有外国战略投资者派出的股权董事，有来自美国的，也有来自欧洲的。应该说，这些外国董事们开始发挥作用了。但是，因为语言不通，他们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这同样对我们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带来了损失。中国银行聘用了一名美国人做首席风险官，他原来是汇丰的高管人员，在风险控制领域很有威望。遗憾的是他不久提出了辞职。他需要带三名翻译，还是无法与我们的管理层沟通。中国银行已经是我国最国际化的银行之一了。我们的企业不能使用经验丰富的外国管理人员，这不是我们的损失吗？

第四个例子。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一些管理工作，今年夏天清华经管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合作开设高级经理培训班。我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考察了一个星期的课程，全部课程配有同声翻译，应该说是水平最高的翻译，其中一位是我80年代在哈佛留学时的中国同学。在这个课程中，我很有感触。其中一位哈佛来的教授，第一堂课用英文教授，学生反映效果不好。碰巧的是这位教授原来是复旦毕业的，第二堂课改用中文，效果就很不一样。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说明单纯语言的效果。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很少能找到被称之为自然实验的东西，能从多种因素中分解出某一因素的单独作用。当一堂课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无法分清究竟是这个人教书不行呢，还是他的语言沟通有问题。但在这个例子中，我确切地知道，尽管我们有最好的翻译，但同样的一个教授用英文和中文讲课，效果竟是如此不同。当用英文讲课时，语言不通，使得讲课效果被大打折扣，这不是我们企业家的损失吗？

语言是挡在我们企业和企业家们走向世界的征途上的一座山。为了看到一个平的世界，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正在努力，联想集团是一个范例。联想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驱。联想现在的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只有一人不说英语。英语是联想的工作语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不说英语的优秀创业者也不得不走出去。这也是我们的成本。联想并不是孤独的，日本的索尼、日产也聘请西方人担任CEO，他们也并不懂日语。反过来的例子也有。最近美国的百事可乐公司任命了一位印度女性担任CEO。有一天我们也会看到，中国的企业家在国外的500强当中担任CEO。这会实现吗？我想会的，但是我们需要培养有全球化能力的管理人才。能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是一个必备条件。

我们清华经管学院致力于这一教育事业。我们的老院长朱镕基多年来反复建议我们用英语授课。我们正在努力，但是差距还非常大。我们以印度为例做比较。印度领先的商学院是印度管理学院（IIM），其中有七个校区。我做了一些了解，他们毕业的MBA学生如果在本国内就业的话，平均工资与清华经管学院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是差不多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毕业生一部分可以直接到纽约、伦敦的金融机构工作，这样就使他们的全体MBA平均工资远远高于我们的毕业生平均工资，因为我们的毕业生很少能去纽约、伦敦直接工作。

当然，有经济学分析头脑的人，马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双语能力的回报如此之高，对语言的训练就应该有需求。不错，我完全同意。我们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投入不能说是不大，我想大家都有亲身体会。但是我们也许都体会到，我们学语言的过程可能是我们经历过的各种生产过程中效率最低的一种。我们在外语学习上花了很多小时，最后结果却令人失望。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少学生学习外语，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运用。我在美国的大学工作时，每年招收博士生，中国学生出国时考的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托福的考分比美国学生还高，但是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其中的

一部分无法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非常有才华的学生不能发挥他们的潜力。这真是非常遗憾。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英语教学的一个失败。所以，我们不仅仅要重视英语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学习方式。

这次全球化企业家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球化的下一步。我认为在全球化的下一步中，人才配置的优化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点是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平台，这里的语言是狭义的语言概念。可以想象，一个只讲上海话的企业很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企业。同样，不能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之一的企业，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企业。我们在全球化当中遇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还是文化间的差异，但是文化之间的沟通，要从语言开始，如果语言不能沟通，文化又怎么能沟通呢？在座的都是致力于全球化的企业家们，对你们来说，在思考全球化的下一步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回过头来再想一想上一步，那些我们未完成的事情。

削平语言障碍这座山，世界在中国企业家面前应该是平的。

---

1. 在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原载于《环球企业家》2006年10月17日刊。

硅谷的移民企业家㊟

（2007年4月12日）

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伯克利加州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教授研究美国高科技产业创新模式、硅谷经济已有20多年，也是此次关于移民企业家报告的联合作者。钱颖一教授在硅谷一带的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多年，曾以中国学者的比较眼光对硅谷模式进行过解读，对萨克森尼安教授的研究成果早有了解。

《中国企业家》借发布这份“移民企业家”报告之机，特请正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钱颖一教授与萨克森尼安教授对这份报告做了一次漫谈式的对话，意在解读，给读者提供报告之外的更多信息和更全面的视角。

从中印比较看中国移民创业者的特征

钱颖一：这次报告结果和你八年前研究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在硅谷，印度移民创业者数量超过了中国移民创业者（大陆与台湾之和）。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否与这段时期中国国内创业机会增多，导致更多的中国人归国创业有关？

萨克森尼安：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来美的中国台湾留学生从1987年后就开始大批回台湾创业；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再加上一些台湾风险投资商开始去上海寻找机会，促使一部分大陆的留学生也回到北京、上海创业，但是印度人同样也有一批回到印度创业。所以我并不认为“回中国创业”足以解释最近十年来硅谷印度移民创业者相对剧增这个变化。

至于各国从美国回去创业的人数，没有人掌握准确数字，我认为从硅谷回中国大陆和回印度创业的人可能都只占各国在本地移民数量的10%左右。

钱颖一：从报告中可以看到的另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中国创业者相当集中地聚集在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我注意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创业园”里，印度移民参与创立的企业占了所有移民参与创建企业的25%，而中国移民该数字为零。关于这个现象，我个人推测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地理因素。你看地球仪，与印度正对面是美国中部。从印度向东飞到西海岸和向西飞到东海岸为等距。而从中国飞，向东飞越太平洋到西海岸，路途相对近。一个是语言因素。印度人在英语上的优势使他们无论在哪里都能更加容易地融入美国社会，中国人则爱去有更多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萨克森尼安：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英语有优势，印度移民在从事市场开拓、服务这一系列工作时也更加轻松。中国工程师才华过人可英语不是很好，这使中印移民创业者在创业产业选择上表现出差异性。在计算机/通信领域以及半导体这些硬件制造领域，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移民创业者数量之和远超过印度移民，而在创新/制造产业相关服务领域，情形正好颠倒过来。

此外，印度的殖民历史对于印度人的迁居也有影响。很多印度人曾移民到英国，然后又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所以在那些地方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媒体与交际圈，不断自我强化。印度移民的圈子与氛围比台湾和大陆移民都要形成得早。

即便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部分第一代中国技术移民在新泽西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地方工作，后来很多人都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了。中国人更喜欢“扎堆”。他们通过华人组织分享信息，找到资金与合作。在硅谷，一切都变化得非常快，所以创建与拥有自己的社交网络，从别人那里听到意见与信息，对于商人来说非常重要。

较之东岸，加利福尼亚州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国人更容易融合进来。加利福尼亚州湾区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开放与多元的地区，不同出生背景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成功，不管你行为举止如何怪异，是否有博士文凭，只要你足够有创造性、足够聪明。

除了分别偏重于软、硬件产业的差异，在硅谷，印度移民创业者和中国移民创业者的另一个不同是后者有各种不同主题、名义的社团；而前者主要只拥有一家联合会，尽管就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来说，印度人内部的多元化程度其实远大于中国人。

钱颖一：就你的研究来看，来这里较早的台湾人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在此创业的大陆人?

萨克森尼安：如果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相当紧张，他们在背景与文化上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我观察到，他们现在从商业角度考虑，开始更紧密地合作，甚至合伙创办公司。

关于中国移民的特征，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拥有专利方面，中国移民领先于其他国家移民。

钱颖一：如果我以经济学的思维来想，我揣测这里面是否有个人激励因素，即要得到H1B（临时工作）签证和绿卡的强烈动机促使中国人和印度人更为积极地申请专利，因为拥有越多的专利，越可以证明他们的专业能力。

萨克森尼安：哈哈。这种解释很合理。另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是，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只有在拿到美国绿卡、来去自由有了保障之后才会回国创业，而且他们一定不会放弃这里的圈子。这使他们如果在本国创业失败，依然可以回来。

现在技术移民创立企业的资金问题并不是很困难，这跟原来那些在唐人街开店的创业完全不一样，后者完全是求生存，前者都是工程专业毕业、在美国公司工作过的技术人才。也许早期技术移民开公司的资金来源是个问题，只能通过各自的社会网络、家庭、朋友来获取创立公司的“天使资金”，但是90年代后期后，云集在硅谷的上百亿风险资金都知道“我们想找中国人或印度人”。

钱颖一：东部情况如何？

萨克森尼安：我想东部对这群人来说还是有天花板。那里从实业家到资本家的圈子更保守、更封闭。移民即便创立的是高科技企业，也不易在那里成功。

美国社会对“移民创业”的焦虑

钱颖一：现在美国社会对这些移民创业者的主流看法是什么？

萨克森尼安：有一些美国人乐见其成，而有一些人则感到受到莫大威胁。我们收到过一些威胁邮件，这些人相信移民在抢美国人的饭碗。

钱颖一：但是这群移民和以前人们说的那些身无长技的移民完全不同，他们都是高素质的技术移民。

萨克森尼安：美国人现在对中国、印度或多或少怀有某种焦虑，他们并不就事论事，总是觉得移民来美国会取代他们的工作。事实上我很早以前的研究就表明，移民的到来会给本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财富。还有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领先，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愚蠢，我想现在美国社会还是对本国经济存有担忧，有一点点惧外。

钱颖一：这种心理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对日本的心理有可比性吗？

萨克森尼安：是一种类似的焦虑。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形。首先，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其次，当年日本跟美国是“硬碰硬”地竞争，看谁领先，不是我们赢就是他们赢，对美国确实是个威胁。但你看在产业上，硅谷受益于中国台湾的硬件制造商、以色列的软件工程师……硅谷与中国台湾、以色列、印度建立起了一种互补关系。同样，中国人也可以担当类似角色。这些分布于全球的不同产业集群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把它们串联起来，就能产生价值。

钱颖一：与五年前相比，能说美国人更加开放和理性了吗？

萨克森尼安：很难说。美国经济确实在增长，美国人也更自信。问题是这五年里，所有的媒体天天都在说外包、中国……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没办法接触到具体、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像我妈妈那样的美国人，他们接触不到足够多的信息，她只读、只相信《纽约时报》，所以难免对媒体报道惊叹不已、反应过激，这非常可笑。

如果你跟硅谷中国或者印度移民的小孩交谈，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今后不想做工程师，他们想从事律师、医生等职业。

钱颖一：“工程师”是第一代移民独有的现象。

萨克森尼安：是的，我的父亲就是来美移民，他就是工程专业出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的书。

钱颖一：为什么会这样？

萨克森尼安：我想这是一个以求能在美国生存下去的选择。做工程师你可以脱离贫困、你可以找到工作，同时它也并不要求你与这个社会有太多、太深的联系。我的中国台湾学生对我说，“我爸爸跟我

讲‘你必须学工程’”。但第二代移民（即第一代移民子女）就不一样了。

“移民创业者”对于全球化的价值

萨克森尼安：1965年前，美国对亚洲移民的额度非常少，1965年后，对技术移民放宽了额度。但是效应并没有立即显现。1970年后，移民开始增多，八九十年代后，移民潮才开始涌现。最大的移民潮出现在1990年以后。像硅谷，20世纪70年代只有10%的人是移民，到2000年，移民数量在硅谷已占到一半。移民融入硅谷，而后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到本国（地区），使硅谷的各种产业得以跃升为全球化。我相信硅谷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全球化，就是因为这些移民。全球化并不就是那些跨国大企业，它们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些移民企业家不但在科技创新方面对美国经济贡献巨大，而且推动了全球化。当他们回到台湾地区时，他们帮助台湾地区将政策聚焦在教育改革、风险投资的培育上；当他们回到以色列时，他们在以色列建立了产业集群，由此和硅谷产生了联系。现在上海、班加罗尔，也是这样，在它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节点之前，还需要进行一些改革。

钱颖一：值得注意的是，每天占据媒体要闻头条的都是跨国大公司、《财富》500强的名字，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那些众多的创业小企业，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创造了巨大价值。我们是否可以说，不管欧洲国家如何努力，但由于不是移民国家而使自己在移民创业中吃亏?

萨克森尼安：我想这是它们在全球竞争中的一大不利之处，因为创业者需要与当地建立联系。人们是否能来去自由，是否在当地有可信任的人，是否能快速启动项目、建立公司，这很重要。

钱颖一：这点很重要——报告里说硅谷初创企业里有印度移民创始人的占15.5%，有中国移民创始人的占12.8%。这不是指15.5%的硅谷初创企业中每个创始人都是印度人，或者12.8%的创业公司中每个创始人都是中国人。事实上，是移民与美国本地人共同创业。

萨克森尼安：是的，这些创始人必须和其他不同长处与技能的人合伙、合作。纯粹由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创立的公司非常少，事实上那些只在自己种族、社交网络里找合伙人或者雇员的企业通常会变得很糟糕。风险投资商基本上也不会投给团队只由一个种族构成的企业，他们知道企业的视野因此会变得很狭隘。

钱颖一：硅谷成功企业由移民与美国人共同创建的例子很多。比如雅虎（Yahoo），由中国台湾移民杨致远和美国人创建；比如谷歌（Google），由出生于莫斯科的俄罗斯移民布林和美国人创立；等等。

萨克森尼安：这正是硅谷的魅力所在。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

---

1. 原载于《中国企业家》2007年4月12日刊。

关注企业经营环境[注]

（2007年12月8日）

这一场是商学院年度观点。其实商学院本身是没有观点的，也不应该有观点。商学院的观点实际上是商学院教师们的观点，教师们作为学者，他们的观点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也不同于老百姓。由于他们以研究企业、研究经济、研究市场为职业，根植于现实，直接接触到企业家、政府官员，所以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有100多名教师，我们这个学院同在座的南京大学商学院有共同之处，但和其他商学院不太一样的是，我们这个学院包含了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其他的一些商学院只有管理学科。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优势。我们在研究企业、研究商业、研究管理中，很难脱离对整个经济环境的分析。另外，我们这个学院是海内外教育背景的学者很好的融合，我们的教师中有1/3是海外博士，2/3是国内博士。清华的风格是严谨、务实。为了准备今天的论坛，我专门召集了十几名教师开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听到了教师们的很多精彩观点，选出一部分，同大家分享。

第一是对整体宏观经济走势在2007年第四季度和2008年的判断。我们学院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做了一个预测模型，连续做了好几年，采用了世界先进的模型，并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政府制定的目标、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等因素，主要有四个结论：一是中国的GDP增速在今年第四季度达到一个高峰，明年四个季度增速将持续缓慢下降，但是明年仍然会以10%的速度增长。二是尽管现在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居民消费品价格仍将在明年上半年上升，年中达到顶峰，然后缓慢下降。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四是出口

增速回落，进口增速加快。总体而言，这个模型的预测对明年的宏观经济走势是比较乐观的。

第二，不少教师预测企业的经营成本将出现全面上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性成本，这个我们无法控制，都是国际定价。二是要素成本，特别是土地、劳动力，这里既有市场供求关系的因素，又有政府政策的影响。例如土地政策对地价有影响，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的成本也会有影响。三是企业支付的社会成本，企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要为环保支付成本，要为和谐支付成本。这三个成本加起来，是在慢慢上升的，我们的教师认为会使企业的整体经营成本上升。企业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怎么应对？有两条路：一是从成本优势变成技术优势，二是改变商业模式。

第三，我们的一些教师对企业所处的大环境表示担忧，主要是法律环境和政府监管环境，正在出现一些对企业长期发展不利的倾向。我们商学院研究企业有比较好的角度，我们并不是仅仅站在企业家或者投资者的角度，而是把企业看成各种利益相关者共同体，他们包括投资者、管理者、雇员、客户，甚至也一定程度上包括政府的利益，因为政府要收税。

我们从两方面说明大环境正在发生值得关注的倾向。一方面，我们的一些教师发现，我们的法律从过去对企业进入施加限制，转到对企业行为加以干预。这个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讲有好的一面，过去我们限制企业不能进入这个领域不能进入那个领域，由于我们加入了WTO，由于我们放松了管制，民营企业能够进入很多领域，外资企业也能够进入很多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但是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就是现在的干预变得覆盖面极广，对所有企业都是如此。这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明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覆盖了所有企业，包括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不仅包括大企业，也包括所有中小企业。这部法律的动机是好的，保护劳动者，但是效果会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最终伤害劳动者、伤害老百姓，同时也伤害企业，甚至会伤害国家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一些社会舆论不利于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尽管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比如我们有一位教师做了一个调查，关于企业职工对经营班子的收入上升问题的看法。他发现，民营企业中有80%的雇员认为这是剥削。国有企业中有79%的人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可以想象这样一种观念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确实会造成一些影响。又比如，在昨天的大会论坛上，柳传志提到了《劳动合同法》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他说他提出这个问题很紧张。为什么紧张？这本身反映了舆论环境的问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四，我们的教师也关注一些潜在的事情，非常有意思，比如互联网对人的行为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近期与此相关的三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今年我国手机用户突破5亿；二是明年我们的上网人数将达到2亿；三是明年中国将实现对奥运的承诺，3G运营将开始。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样规模的互联网将引发行为革命。其实我们已经体会到了，比如说手机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在你们听我讲话的同时可以通过手机处理其他的事情。手机也改变了生活方式，电影《手机》描述了它对社会、家庭的影响。

但是手机带来的更深刻的影响恐怕还没有到来或者正在到来，比如移动商务、团体购物，特别是今年兴起的所谓虚拟社会——Second Life（第二人生）。网络对传统经济的管理和经营模式的影响正在引起更大的兴趣，非常值得我们关注。2007年7月27日世界权威科学杂志《科学》专门刊登封面文章，讨论虚拟社会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许有一天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现实社会举办的同时也在虚拟社会举办。

1. 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

世界500强不该只有一家中国民营企业[注]

（2008年9月6日）

美国《财富》杂志不久前公布了200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单，沃尔玛以3787.99亿美元年销售额蝉联榜首。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上榜企业有35家，比2007年增加了5家。除了中石化以1592.6亿美元年销售额连续两年杀入前20名以外，这次最大的亮点无疑是联想以167.8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499位，首次杀入《财富》世界500强。为什么是联想而不是其他民营企业？联想的经验如何借鉴？中国企业全球成长的空间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

很多事情柳传志想到了前面

《中国经营报》：今年7月，联想历史性地进入世界500强榜单，虽然排名为第499位，但是目前榜单上唯一一家没有国字头的中国企业，对于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钱颖一：我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排行榜，联想排到499名让我眼前一亮。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国内通常翻译成500强，但是英文原文是"The World's Largest Corporations"，所以《财富》杂志评选的确切说法是世界500"大"企业。我们应该注意到"大"和"强"是不一样的。这个排名的标准是按销售收入，其中世界第一大企业是美国的沃尔玛。我仔细阅读了这个榜单，也观察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排名，联想能位列其中，非常有意义。事实上，这是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第一次进入世界500大的行列，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

《中国经营报》：中国企业海外突围成功典范不多，联想目前看相对成功，你怎么看联想的国际化策略，对国内公司而言有哪些借鉴意义?

钱颖一：联想和IBM个人电脑的整合，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我记得当时IBM的一些日本员工就明确表示合并后要离开。这一整合的成功，在我看来，最有借鉴意义的是人力资源整合的成功，它远比资本的整合更艰难，也更有意义。联想在这方面有过人之处。比如，在完成对IBM个人电脑业务的并购后，联想就把总部迁到了美国。杨元庆担任董事长，但CEO一直都是由非原联想的外国人担任，先是原IBM的人，现在是原戴尔的人。不仅如此，现在的高管层中非原联想的人的比例很高。也就是说，在用人方面，联想实现了国际化。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对比一下，早期日本在海外发展的企业，都用日本人。联想能在三年的时间内把一个本地企业整合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企业，要归功于这些战略步骤。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系列举措，联想才会有今天的收获。

《中国经营报》：联想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你觉得整个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对它起到哪些作用?

钱颖一：的确如此，联想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联想是在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办的一家企业。当时中关村有不少新兴企业。前几天四通的段永基来清华演讲，四通也是当时在中关村的著名企业。现在，联想闯出来了，这与柳传志有很大关系。企业界把柳传志作为一面旗帜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能够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比别人想得要超前一步。比如，联想的改制比别人先走了一步；又比如，海外并购，尤其是这么大手笔的并购，联想也是比别人先走了一步；再比如，当一些跟柳传志同时代创业的企业家还冲在管理第一线的时候，他已经“退到二线”做投资了。

回望起来，很多很多的事情，柳传志都会想到别人的前面。他有超越常人的办企业的愿景（Vision）。一位卓越的企业家，不仅能把他现有的企业经营好，而且能够起到引导潮流的作用。他的愿景，再加上强有力的执行力，就使他获得了成功。联想在几年前就提出了要进入世界500大，也积极赞助本次北京奥运会，还较早地看到了走出去这个方向，并且采取了非常果断和大胆的行动。方向确定之后，执行力就很重要。比如让谁来做整合后的联想的CEO，高层里面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非联想的人员参与进来，这一系列战略如果没有操作层面的强力保障，联想的国际化之路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中国经营报》：但这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钱颖一：当然是阶段性的。现在联想进入了世界500大企业的行列，这就是一个重大的阶段性成就。至于你说这个成就是否能评判整个联想成功与否，这是后话，最终的成败要很多年以后再看。

遗憾这样的企业太少

《中国经营报》：向海外扩展市场，是中国培育出排名靠前企业的唯一出路吗？现在看来，并购似乎是一条捷径。

钱颖一：不能说是唯一出路，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这条路有它的特殊成因。为什么我们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大的民营企业是通过到海外去发展，而不是通过在国内发展而壮大？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在中国，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单在国内发展，会有重重困难。今天，我们一方面为联想进入世界500大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感叹像联想这样进入世界500大的民营企业太少了：目前是唯一的一家。今年世界500大企业中一共有29家中国企业（不包含台湾地区）。但是除了两家香港本地企业外，其余的都是国有企业，只有联想一家民营企业是例外。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只有这一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大，而且它的总部还搬到了海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营企业所处

的环境。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中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现在的政策环境有什么缺陷？

钱颖一：通过联想的例子，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事实上，现在的一些改革是停滞不前的，甚至有倒退的倾向。虽然党的十五大已经明确了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民营经济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障碍，近年来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正在变得更加艰难。

我不认为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只有向海外发展这一条路。也许新加坡只能如此，而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多条道路，不一定非要到海外去才能做大。但前提是国内的政策环境必须改变。中国的企业可以在很多层面上成长起来，可以做价值链上的各部分。中国是一个大国，跟小国不一样，有很大回旋余地。中国的企业在许多行业的许多环节上都有的做。只要不给它事先设置各种各样的框框，中国的企业会做得很好。

《中国经营报》：2008年，联想最新一季度财报销售额是42.13亿美元，但净利润只有1.1亿美元，像刀片一样薄。

钱颖一：的确如此。我们要意识到，《财富》杂志只是评出了世界500大企业，不是500强企业。以投资银行高盛为例，高盛在世界500大中排名第61位，去年的收入是870亿美元，利润是116亿美元，只有30000名雇员。这是强的标志。

《中国经营报》：作为经济学家，尤其是你还在主持国内著名的经济管理学院，你觉得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经济学家的职责是什么？

钱颖一：经济学家的职责之一是督促政府和社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使企业家们可以大显身手。具体到企业的经营战略这样的问题，我不会对企业应该怎样发展和应该怎么做说三道四，因为我觉得企业家们在这方面掌握的信息比我多。政府应该努力创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也不要给予企业太多的“指导”。至于企业究竟要走哪条发展路径，应该让企业自己去选择。中国的潜在机会太多了，中国企业的潜在发展空间太大了，但要把潜在变为现实，需要的是给企业家们更宽松的制度环境。

---

1. 原载于《中国经营报》2008年9月6日刊。记者：丁飞洋。

颠覆性创新下的发展战略㊟

（2011年4月21日）

在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期间，我到了中国移动建立的九个业务创新基地中的六个基地（以下简称为基地）进行实地调研，包括浙江手机阅读基地、广东移动互联网/移动应用市场（MM）基地、湖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基地、重庆物联网基地、四川手机音乐基地以及辽宁位置服务基地。根据在这些基地的调研，并结合当前有关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状况，我对中国移动所处行业的总体状况、基地运营模式以及体制和制度约束等方面提出一些问题，请大家一起来思考。

一、关于当前行业发展状况的特征

在移动通信行业，当前时代是一个严峻的时代，甚至会是一个严酷的时代。仅仅在过去的一年中，iPad和iPhone4相继问世，风靡全球并引来众多复制者；4G亮相开启了无线通信的新纪元；社交网络进入新阶段（Facebook创始人成为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度人物）；中国的“微博”爆炸式发展。这是围绕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移动终端的一系列创新革命，其发展速度和深度超出一年前的想象。即使互联网的权威研究人士，比如摩根士丹利的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在那份2009年12月发表的有关移动互联网的著名研究报告中，也未能充分预料到这些变化。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普通创新，而是一种“颠覆性创新”。我们正处在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时代。所谓“颠覆性创新”，就是这种创新不仅改变技术，而且改变行业，改变多数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它不同于普通创新，它带来的影响不仅可以改变某一行业的格

局，而且会改变和颠覆整个行业。“颠覆性创新”的出现为整个时代带来了冲击。

回想起中国移动的发展历史，它正是受益于“颠覆性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被“颠覆上来”的：是移动通信技术颠覆了固网通信技术。所以，中国移动的快速发展和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受益于上一轮“颠覆性创新”的结果。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新一轮“颠覆性创新”的到来，无疑给中国移动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移动也面临着被“颠覆下去”的危险。风险巨大，但机会也巨大。这是对当前行业环境的一个判断。

在对六个基地的实地调研之后，我对这些基地现状的整体感觉可以概括为喜忧参半。每一个基地都有了较好的开端，在基地建设和运营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优势不明显，前途不明朗，不少当前的优势实际上很脆弱。下面分析在调研中发现的两大共同问题。

二、关于两种类型基地管理模式和发展定位的问题

我所调研的六个基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基础设施型，包括物联网基地、位置服务基地；另一类是应用型，如阅读、音乐、移动应用市场、手机支付等。从调研结果来看，这两类基地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应该用不同的模式来运营。但目前还没有区别对待这两种类型的基地。

基础设施型基地的性质是为全公司的业务搭建平台，因此它们的业务性质是跨省的。由于目前这些基地完全采用省公司投资、管理、运营，在投资额度、关键绩效指标（KPI）考核方式、成本分配等各管理层面，还都是以省为单位的。以省基地为主体做基础设施显然力度不够，省分公司也很难有全集团的考虑。因此，这就很难做好对全网平台运营的支撑。因此，对这类基础设施型基地应该采用一种专门的运营模式，比如采用由集团负主要责任的运营模式，或采用由集团

和省公司联合运营的方式，后者可以兼顾调动积极性和保证资源的运用。

虽然不同的应用面临不同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面临新兴民营企业的强有力竞争。从最终产品的角度看，中国移动没有能力同民营企业拼应用。民营企业的激励和对市场的感悟与反应速度及其灵活性都是中国移动不能比的。中国移动最大的优势是规模和平台。所以，在应用型基地方面，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开发什么新的应用，而是在价值链上到底应该占据哪一段。我们应该在价值链中选取最能发挥我们优势的部分，而不是把目光局限于在某一个应用上暂时获利的多少。

所以，我们应该至少对这两类基地——基础设施型和应用型——确定不同的经营模式，相应地在管理模式、战略定位等各个方面给予不同的思考和布局，分别制定它们的发展战略。

三、关于如何突破制度约束的问题

在调研中我发现这些基地面临着两种制度约束，从目前来看这些约束制约了基地的有效运行，从长期来看会产生严重后果。

第一种制度约束关系到投资与组织模式。我们的基地是“业务创新基地”。移动通信行业正处于密集而又快速的技术创新时期。同时，这些创新的风险又非常大。所以，从业务性质上说，基地的性质就应该是风险投资，是高科技类的风险投资。而中国移动目前的定位是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通常被称为“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y）。从运营角度看，这是最保守、最稳定的一类行业。一方面是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是最稳健的经营，两者正好是两个极端。于是，这些基地都面临着极为矛盾的经营环境：在最“保守”的行业环境中要做最“创新”的事情。这涉及企业性质的定位：中国移动究竟是“公用事业”企业，还是“高科技”企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基地是各分公司数据部门的一个子单位，或者是从数据部门分出来的一个子单位。这种投资和组织模式不能适应高风险投资。选择何种组织模式更为合适和有效，需要研究。比如，股权投资（取得部分所有权，但是不要控制权）是一种形式，采用外包则是另一种形式，两者各有利弊。如果是股权投资，那就应该成立独立的投资公司。但是这可能带来另外的问题，外界（比如国资委和民众）会质疑中国移动“不务正业”。

第二种制度约束来自企业的国有性质。股权激励对于高风险的高科技企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制。我在调研中发现，基地员工的平均年龄都是二十几岁。这个领域是年轻人的领域。年轻人的激励不是薪酬或升迁，而是股权、期权或控制权，他们期望的是上市，或被收购。因为这个行业的创新存在巨大风险，所以必须靠巨额奖励来补偿这种风险。但是，这在国有企业中很难实施。在股权激励缺位的情况下，风险承受能力就很有限。此外，国有企业的性质也决定了高管不敢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因为国家和民众不能容忍较大的投资“失误”，尽管这个“失误”带来的损失远小于其他的成功投资带来的盈利。

在这种体制的制约下，与其全部自己开发，不如有时收购别人开发的成果。可以事先做带有“认购期权”（call option）的股权投资，以保证将来的收购。这就需要对投资形式有更多思考，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尽可能激活创新机制，分担投资风险。

综上所述，第一，移动通信行业正处在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时代，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可能还是一个严酷的时代；第二，下一步要思考如何区分基础设施型和应用型这两类基地，采用不同的运营模式和战略定位来推动基地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面对体制和制度上的约束，要深入思考如何采用多种股权和合同形式，规避风险，提供激励，享受成果，寻找国有企业在密集创新时代的出路。

最后，我想说的是，时不我待，希望中国移动能够迅速行动起来。

---

1. 在中国移动战略咨询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后来形成中国移动业务创新基地调研报告。

发展新动力的“双引擎”注

（2015年3月7日）

《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5年工作总体部署提出把握三点，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前两点，第三点是新亮点，就是发展新动力。在第13页上的这一段，只有400多字，但很有新意，很有深度，也很接地气。

首先，新动力不同于新增长点。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的习惯性思维是寻找新增长点，而且在投资、消费、出口中寻找新增长点。这都是从市场需求方面思考问题，是受凯恩斯短期经济波动模型的影响。

新动力的关注点不是增加需求，而是增加供给。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短期波动问题，而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问题，是增强供给动力和提高效率的问题。动力需要引擎，新动力需要新引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打造新的“双引擎”。一个引擎是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个引擎是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民间和政府共同发力的双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创新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政府主导，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创新模式，“两弹一星”是突出代表；另一类是来自民间的、草根的，通过创业方式的创新。这两类创新都需要，目前在我国，后一类创新更需要大加推进。

事实上，2014年全国已经开始了新的创业热潮。与之前曾经出现的“下海潮”和“公司热”不同，这次创业热潮的基础非常广泛，不仅有大学生创业、90后创业，还有女性创业、二次创业等。这次创新创业

热潮的一个背景，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进入门槛低、适合产品和服务个性化需求的平台。而今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深度也使得技术传播和市场拓展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往。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2013年创建的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清华x-空间（x-lab），在2014年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在第一线见证了当今大学生和研究生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创业可以带来创新，可以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创造财富。除此而外，《政府工作报告》还特别提出了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可以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很多创业者，特别是获得巨大成功的创业者，他们创业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财富，而是实现改变世界的梦想。创业的意义也超出个人，正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创业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这容易被忽略，但是非常重要。我们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平等或不平等，但这是一种静态的度量。同样的基尼系数，动态地看，有社会纵向流动比没有纵向流动更加公平。通过创业致富是增加纵向流动的有效途径，因为创业者通常都是白手起家的。在一个创业的国度，公平正义能更好地得到体现。

新动力的第二个引擎来自政府，来自政府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种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活动中，政府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今年我提交的政协提案，就是关于政府如何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政府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不要做什么，二是要做什么。一方面，政府要避免过去在推动创新时的习惯性做法，避免犯以往的错误，这就要明确政府不做什么。比如，各级政府不应该做风险投资，更不要搞贷款。政府不要做创业企业的管理者（General Partner，简称GP），最多可以跟投，做小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简称

LP）。政府如果要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一定要慎重，严格控制其规模并明确其使命。我们有过惨痛教训：20世纪90年代，政府主导的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破产。几年前，一些地方政府动用大量地方资金支持光伏企业，也损失巨大。在当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政府在过去的这些传统做法上要“不作为”。

另一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要创造法治环境，改善监管环境，搭建竞争平台，扫除政策性障碍，这就需要对政府自身的革命和创新。政府要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法治环境和对创业友好的监管环境，用互联网思维修订以往的法律和条例，并建立新的法规。这就需要清除一批不适用创新创业的法规，促进创新创业企业的成长。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技术对“中介”产业和一些服务业的直接冲击最大，比如金融、商业、新闻、教育等行业。即使在一些传统行业，比如出租车、酒店等，新的互联网技术也带来了过去不可能的进入机会，并对传统的行业监管提出了挑战。政府应该适应新形势，制定新法规，以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利益至上。同时，政府要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这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软件”，而不是直接投资和建立科技园“硬件”。这些“软件”包括降低创业企业的准入成本；促进或至少不阻碍创业和就业人员的流动；保护专利；疏通企业上市、并购等各种产权定价和转移方式的退出机制。

总之，发展新动力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发展思路。新动力来自民间和政府的“双引擎”，民间要靠草根创新创业，政府要靠转变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

---

1. 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36组和37组联组讨论上的发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化建议㊟

（2015年6月29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草根活动，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依靠市场机制。但是，它的健康发展又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一方面，需要扫除过去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改善创业和创新的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的环境，搭建开放竞争的平台，同时还要构建服务型政府。

本报告是有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化建设研究的总结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创业活动特点基于国际比较的一项评估。第二部分是对当前中国创业中一些突出问题的概括。第三部分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化建设提出了10条政策建议。本文依赖的数据和信息主要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创业研究中心从2002年起至今参加并完成的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中国调查数据和研究报告；与中央电视台《致富经》栏目合作完成的“中国百姓创业致富报告”的调查；与中国就业促进会合作完成的“创建创业型城市的创业环境评价”的调查；以及2015年4月8日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化研讨会上的讨论汇总。

一、中国创业活动特点的国际比较

“全球创业观察”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由大学研究机构参加的研究项目。这个研究项目自1999年开始，目前覆盖近70个国家，每年对各国创业活动进行定量调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创业研究中心

从2002年起至今，作为唯一的中国大学，每年参加全球创业观察在中国的调查并完成《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注

《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创业活动在参加全球创业观察的69个国家和地区中，整体评分排在第36位，正好居于全球中等水平。这与我国的人均GDP目前处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位置大致吻合。这项评估中排在最前面的是瑞士、芬兰、美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是人均GDP处于高水平的国家。

从分项目的指标来看，中国在“研发转移”和“市场开放程度”这两项上分别排在第18位和第19位，处于相对靠前位置。但在“教育培训”和“商务环境”上分列第54位和第56位，处于相对靠后位置。与美国相比较，在创业环境的市场变化和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政府政策上，中国的创业环境优于美国。但是在商务环境、文化与社会规范和政府项目上，即在软件、规范的环境方面，则是美国优于中国。从这项调查中发现的这种差异与我们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

我国与创业活动领先国家相比的另一显著差别体现在创业者教育背景的差异上。在全员创业者中，我国创业者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重为9.2%，而美国的比重为51.7%，相去甚远。我国创业者中拥有专科学历的比重为21.6%，而美国为33.5%，也有不小差距。以18—44岁青年创业者为例，2013年，我国青年创业活跃程度在全球创业观察的70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属于活跃的；我国的青年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为18%，高于全员早期创业活动指数15%。所以，青年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更为重要。在我国，青年创业者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本科或大专）的创业者比重超过60%。相比较而言，在美国的青年创业者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创业者比重仅为14%。

创业者教育背景的这一差别直接导致创业性质的不同以及创新程度的不同。从创业动机看，通常研究者把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by

necessity）和“机会型创业”（by opportunity）。前者是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选择创业，而后者是看到了比目前事业选择更好的机会而去创业。受教育多的创业者更多的是“机会型创业”，而受教育少的创业者更多的是“生存型创业”。调查中发现，小学学历的创业者，“机会型创业”的比重为22.2%；初中学历的创业者，“机会型创业”的比重为55.2%；而高中或大学学历的创业者中，“机会型创业”的比重为70%以上。相对于“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能带来更好的创新、更多的就业、更新的市场和更大的成长潜力。因此，与美国相比，在我国的创业活动中，创新程度相对较低，这与创业者教育背景欠缺直接相关。

二、中国创业活动中的突出问题

根据进一步的调研，我们归纳出当前中国创业活动中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分别是：1.创业质量不高；2.创业活动区域不平衡；3.创业环境改善缓慢。

1.创业质量不高

中国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在趋势上表现为活跃。全员创业活动指数（早期创业活动指数）在2001年为12.3%，2014年上升为15%，表明中国在近年来有更多的创业企业出现和更多的人参与到创业活动中去。虽然我国的创业活动较为活跃，但是质量还不够高，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创业企业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011年，仅有14.1%的新创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新颖性；超过70%的新创企业采用的是五年之前的生产技术；不足3%的新创企业属于中高技术企业。因此，我国新创企业的长期增长潜力明显不足。

二是在就业促进方面，在“机会型创业”企业中，超过30%的企业预期五年后可以提供2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而在“生存型创业”企业中，仅有不足15%的企业具有这种预期。

三是在创业活动的国际导向方面，我国新创企业一直以国内客户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国际化程度处于发展中国家后列。在2011年，我国86.5%的新创企业没有任何国际客户，国际客户比例在25%以上的企业在新创企业中所占比重不足1.5%。

2.创业活动区域不平衡

中国的创业活动在区域上严重不平衡，其绝对差距还在扩大。当然，创业具有明显的区域特性，世界各国皆如此。但是，提高整体创业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不能依赖于少数地区。在中国，创业活动的区域差距不仅严重而且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2002年，中国发达地区的每万人拥有的创业企业数为24家，而非发达地区的同一指标为3.9家。到了2011年，中国发达地区每万人拥有的创业企业数增加到53.6家，而非发达地区的同一指标为16.9家。虽然非发达地区的增长率高于发达地区，但是绝对数的差距仍在扩大。

3.创业环境改善缓慢

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间，中国创业环境有所改进，体现在创业环境综合指数从2002年的2.69（满分是5分）提高到2012年的2.8。但是显然这种改进不但不明显，而且从1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改善得相当缓慢。

衡量创业环境有九个方面，分别是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务环境、市场开放程度、有形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规范。在这九个环境指标中，中国的创业环境条

件排在全球创业观察参与国家和地区中后50%的有金融支持、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商务环境。从简单的数量指标看，有近50%的创业环境条件有待明显改善。

第一，金融支持涉及的六个方面都缺乏应有的水平。首先，最低的评价项是创业投资的退出市场，包括创业企业获得或者实现IPO（首次公开募股）的机会。其次是为创业企业提供的贷款支持。对支持创业的权益资本、创业投资和政府补贴的评价也不高，表明我国在支持创业方面，金融要素和机制还存在严重问题。

第二，研究开发转移所涉及的六个方面中，有四个方面严重不足，分别是接触新技术的机会、技术转移的速度、技术购买和政府资助。相较而言，在实现技术购买和获得政府资助方面的环境条件更差一些。

第三，政府政策和政府项目是否在有效推动创业，主要取决于创业者是否从中获得有效的价值，比如，降低风险和成本，这里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从评分看，促进创业的政府政策中，在规范行政、高效行政和政府优惠方面还不够令人满意，表明创业企业获得政府政策不仅在优惠上，而且在自我改进上，还存在差距。

孵化器和科技园对创业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已经起到积极作用，但政府项目缺乏广泛性和多样性，既没有充足的政府项目，也没有有效的覆盖面。另外，政府项目在惠及创业企业上，也缺乏有效的代理机构。

第四，在创业环境条件中，教育培训不足是最为明显的弱点。中国的创业者中，具备创办企业技能和经验的人在40%左右。与提高创业能力直接相关的创业教育与培训是我国创业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创业教育培训不仅是创业者的基本需要，由于它对人生品格、素质养成的积极意义，也是整个人生教育中应有的学习内容，只是不同的年龄

段，关注的重点不同。目前来看，我国的创业教育在中小学和大学都是极为缺乏的。

第五，在商业基础设施所涉及的五个方面均表现不佳。改善商务环境的核心是要提高为创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水平，主要是提高技术、市场、融资、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水平。这方面虽然日益受到关注，但依然是我国创业环境中的脆弱项。各级政府在促进创业上容易考虑到建设“可视性”强的硬件，而不在具有内在强化作用的软环境上精心设计和建设。

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根据对中国创业活动的多方面调研，并结合与创业者、投资者、创新创业园区负责人以及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科研成果转化工作负责人的交流，本报告提出以下有关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化建设的10条政策性建议。

1.政府职能转变，致力于建设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去在推动创新创业方面的工作重点是招商引资，建立基础设施，比如孵化器和科技园。今后，政府职能要转变到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为主。具体到创新创业方面，就是要致力于建设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而非直接投入到创新创业的具体活动之中。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要鼓励新型创业服务业态的产生和推广，并给予相应的扶植政策。建议政府研究相关部门服务创业活动的方式、方法和机制，大力提高行政办公效率，简化并规范行政管理；针对政府项目缺乏广泛性和多样性，通过深入调研扩大政府项目的覆盖面；针对创业企业不能及时、机会均等地获得政府项目的情况，加强对代理机构的管理，加强信息渠道的建设。政府要加强对服务于创

业的公务员的素质培训，提高其管理和服务的意识与水平。要提高为创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水平，主要是提高技术、市场、融资、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水平。

2.调整和优化财税政策，降低创新创业的风险成本

按照目前的税收政策，创业者的投资需要缴纳很高的税。创业者的投资回报是按照工商个体户（即个人所得）纳税的，最高税率为45%。而中国的银行储蓄利息和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回报是免税的。两者相比，大大降低了创业投资的积极性。不仅如此，按照现行税收政策，创业者或风险投资人所投资的企业在上市后，还没有变现就要缴税，比如现在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后还没变现就要缴税。这些税收政策都很不利于创业。建议创业投资回报的税率应该与银行储蓄利息和证券市场投资回报的税率相一致。建议建立风险投资在投资初创企业时的税收递延制度，也就是说，应该在投资收益变现后才缴税。知识产权转让收益也应该变现后再缴纳所得税。

另外，需要增加政策的持久性。很多省市前几年都出台过鼓励创业投资的政策，但后来又都取消。公司按照原政策做好成本核算，政策一旦有变化，很可能造成公司亏损。对此，国家和地方应该建立稳定的财税政策，且政策统一透明。这不仅有利于投资公司，更有利于创业企业。

3.进一步改革商事制度

目前的商事制度已经有明显简化。但还有一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简化。比如一个典型的问题是更换股东需要所有股东面签的要求。根据各地工商部门的规定，企业每次股东变更都要求所有股东当面签字，这对新创企业极不方便。工商部门表示这是因为此前出现过股东伪造签字，造成工商部门负有连带责任。但伪造签名是违法事件，理应司

法部门处理。建议商事制度一定要定位于服务，商事的归商事，司法的归司法。

4.调整知识产权相关政策

现有的知识产权转化审批程序依旧复杂。按照目前的规定，党员干部不能在企业持股或投资，这也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开展。建议进一步简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审批程序。对目前规定的党员干部不能在企业持股或投资的问题，应该开展专门研究。建议在此政策上应该区别对待高校校级领导和高校其他教职人员的科技转化及其相关的创业活动。

盗版猖獗严重扼杀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尤其对初创企业的打击是巨大的。目前很少有律师愿意接手初创企业知识产权遭侵权的案件，因为反侵权的成本负担极高。对于创业企业面临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应该在立法和制度建设上，对初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给予更大的支持。

5.放宽企业上市政策

关于企业上市制度，应该尽快以注册制代替目前的审批制。企业上市的审批制极不利于具有创新能力的初创企业。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企业上市不利于发挥市场的作用，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打击尤其大。实行注册制有利于小型企业上市，疏通风险投资资本的退出机制，从根本上改善创业环境。

建议考虑发展“新四板”。新四板对建立创业企业的融资和资本退出机制，解决区域资本市场与企业需求对接等问题，有所帮助。建议尽快出台“新四板”和区域融资平台的规范政策。

6.规范政府引导基金

政府引导基金不应该直接做风险投资，政府也不要做创业企业的管理者（General Partner，GP）。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主导的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破产。前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动用大量地方资金支持光伏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建议政府引导基金只做母基金（即基金的基金），而把直接投资交给民间的专业投资机构，减少政府资金的风险。

政府引导基金的介入方式与比例问题。目前在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中政府引导基金介入的比例通常为1:3，即政府引导基金投入1元钱，在使用中就可以放大到4倍。目前政府引导基金多出现在半导体产业，在其他产业领域中还比较少见。建议政府引导基金在半导体行业和PPP模式中的探索和尝试，应尽快推广到其他产业。同时，政府引导基金的介入比例不要随意制定。政府引导基金也要保证政策的稳定性。一些企业表示不太敢用政府的创业投资，担心政策前后不一致给企业带来额外风险。

7.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

目前国有资本融资有一个红线问题。国有资本参与民企融资后，国有资本在合并报表后需占51%的股份，并在董事会上占绝对多数，这是很多民营企业做不到的。所以国有企业现在也基本上被民营企业排除在融资对象之外。此外，在管理体制上，工商部门、证监会、发改委等多个部门都在管国有资本，都设置备案等门槛，权力归属很复杂，出现多重责任主体。建议放宽国有资本参与民企融资时的红线要求，厘清国有资本的管理部门和备案制度，降低民营企业寻求国有资本融资的难度。

8.修订和放松行业管制

建议修订一批不适用创新创业的法规，促进创新创业企业的成长。特别是要用互联网思维修订以往的法律和条例，并根据需要建立新的法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技术对“中介”产业和一些服务业的直接冲击最大，比如金融、商业、新闻、教育等行业。政府需要尽快修订一批法规，切实为互联网金融、网络商务等新型行业发展创造好的环境。即使在一些传统行业比如出租车、酒店等，新的互联网技术也带来了过去不可能的准入机会，这对传统的行业管制也提出了挑战。政府应该适应新形势，制定新法规，以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利益至上，不能让过去的法规成为阻碍创新创业进程的绊脚石。

9.推动大学创业教育平台

应该更多地扶持高校的创业教育（即大学的众创空间）。大学的创业教育既不是孵化器，也不是科研项目，而是教育平台。现在来自政府的很多扶持政策的衡量指标对这类教育平台都不适用，比如注册实体所在地、办公面积、注册公司数量等。建议政府加大对高校创业教育平台的扶持，可以给予配套资金的支持，比如达到运营经费的50%，剩下50%由教育平台面向社会募集筹措。

有关大学生创业的规定。虽然大学生创业是少数人，但是应该有一些明确规定，比如关于学生休学期限的规定，对学籍、学位、学分等的规定。建议教育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有利于大学生创业。

10.探索新型教育模式，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

大学教育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特别是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创造性人才是具有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的人，而并非仅仅是毕业后就要创业的人。因此，大学教育要从创意入手，培养具有创意、创新、创业（简称“三创”）能力的人，而不是单纯鼓励学生创办

企业。这里的关键是要遵循人才培养的教育规律，培养人的创造力。因此，建议把创意、创新、创业思维和能力培养作为我国教育模式改革的重点。

同时，也建议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提高创业教育的有效性和覆盖面。有效性是指克服简单沿用其他学科和现有教学法的弊端，探索新的创业教育方法。覆盖面是指不仅理工科学生需要创业的学习和实践，文科学生同样需要创业的学习和实践。不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外的各级教育也同样需要。

---

1. 发表于《国务院研究室决策参考》。与高建合著。
2. 《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由高建负责撰写，自2002年以来已经发布10期。

自下而上的创新注

（2015年12月）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不过，什么驱动创新，却不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维，那就是创新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少数精英。而他们的背后是政府的力量，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举国体制的优势。

但是，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与当今全球创新趋势不一致。在全国上下拥抱创新的时刻，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对创新思维的创新。黄亚生、王丹、张世伟的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正是这样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创新思维的书。

这本书通过丰富的事例为我们展示了作者称之为"社会创新"的创新趋势。作者定义的社会创新是"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创新范式。这一创新范式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创业来创新是最自然的一种形式，微软、苹果、Facebook等都是我们熟悉的通过创业成功创新的例子。即使大公司，除了直接组织研究开发外，也进行不太为人所知的社会创新，比如这本书中列举的思科的I-Prize和IBM的Innovation Jam。政府也一样，不仅是直接参加创新的主体，而且也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力量。本书中介绍的美国国防部的DARPA（高等研究项目局）和美国航天局的开放创新工程（Open Innovation Project），都是政府推动社会创新的成功范例。

当然，社会创新不仅只发生在国外，也不仅只是在技术和产品领域。本书特别介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1978年开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并把

它列为中国社会创新的第一例，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像小岗村的农民那样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所推动的。去年在全球风靡的“冰桶挑战”也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创新，它不仅是一种筹款形式，而且也让千家万户关注患有某种疾病的群体。本书也把今年年初柴静的“穹顶之下”作为社会创新的例子。这部电视片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力量，揭示中国突出的环境问题，获得了空前的震撼效果。

20世纪的市场与计划之争，产生了哈耶克关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著名理论。哈耶克的洞见是，市场效率来源于分散决策可以充分利用分散信息，而计划经济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无法有效率地使用这些分散信息。21世纪不再争论计划与市场，全球都认同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最终力量。熊彼特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预见，终于获得了人们的共识。不过，创新究竟是自上而下的由专家、精英、政府驱动的封闭式过程，还是自下而上的由大众、草根发起的开放式过程，却还没有共识。熊彼特一开始就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联系在一起，并把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体制看作创新的制度障碍。如果我们把哈耶克关于市场可以充分使用分散信息的洞见运用于创新，自然就会得出自下而上的开放式创新一定是可以最好地利用分散信息的创新这一结论。有趣的是，哈耶克与熊彼特都是奥地利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型，然而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不过现在，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已经被经济学家广为接受。

在中国，尽管从1992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取代计划体制，尽管在2013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被写入最权威的文件，但是根深蒂固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思想依然无处不在。在创新领域，那种对政府主导创新和政府支持创新的渴望，不仅在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而且在企业中也十分强烈。

值得庆幸的是，自下而上的开放式创新的思想在中国开始替代自上而下的封闭式创新的思想。2015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入官方语言的第一年。虽然我们并不期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医治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对我们过去有关创新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思维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是极有价值的。恰在此时，《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一书出版。这的确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为合适的人群，提供了合适的内容的一本书。

---

1. 为黄亚生、王丹、张世伟所著的《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一书作的序。

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

（2016年2月19日）

今天给我的题目是“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我围绕这个话题讲三个观点。

第一，关于效率（efficiency）与活力（vitality）。有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帮助我们认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哈耶克，他论述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于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得到有效使用。哈耶克在1992年去世，正是中国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那一年，而如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在中国成为共识。由于20世纪的一个核心争执是计划与市场，所以哈耶克很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另一位是熊彼特，他是最早论述企业家精神（或称创业精神）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在1950年去世，他的影响在他去世之后日渐变大。由于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问题，所以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说，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从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的效率，到熊彼特的市场经济的活力，深化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效率与活力，既相关，又不同。效率更多的是指在现有技术和生产方式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结合。而活力更多的是指改变现有技术和生产方式，使得企业

更有生机。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供给侧的。效率与活力的结合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关于企业管理（management）与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讲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需要区分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区分管理者与企业家，这在商学院教育中是明显的。一方面，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也不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把企业管好，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创新。企业家精神不是单纯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要创造出与前人不同的产品或生产过程。反过来，一个好的创业者也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

比如乔布斯，他起初是一个创业者。但是1985年他被苹果公司解雇，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接替他出任苹果公司CEO的斯卡利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但他不是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在1997年重回苹果时，乔布斯的企业管理方法有了很大改进，成为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好的管理者。我讲的第二个观点是，要注意到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在我们重视企业管理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提倡企业家精神；在我们鼓励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同时，更要推崇优秀的企业家。

第三，关于企业家精神与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bureaucracy）。企业管理是很难避免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的，而企业家精神却与官僚主义是不相容的。熊彼特当年在推崇企业家精神时，就担忧日益增强的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主义会扼杀企业家精神，从而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今天，虽然企业家精神仍在，但是他当年所担忧的官僚主义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在我们提倡企业家精神，提倡创业精神，注重企业活力的时候，必须减少官僚主义，就是要减政放权。这也是为什么减政放权与倡导企业家精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理论上讲，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创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可包括已有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不过，由于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束

缚，所以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活力需要更大努力。我们的计划经济传统使我们更容易依赖政府推动创新。但是企业活力必定主要靠企业家精神。在激发企业活力时，虽然政府应该发挥推动作用，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依然是压抑企业家创新活力的主要障碍。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观点，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必须减政放权，减少官僚主义带来的束缚。

最后，我通过举例说明，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最集中体现的地方是深圳。深圳是企业有活力、创业企业多、企业家精神强的地方。同时深圳也是政府行政干预少、政府服务意识强的地方。深圳经济在当前全国经济下滑中表现突出，深圳的案例极具启发性。当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验区，是践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先行者。如今，深圳也成为倡导企业家精神和释放创新活力的先行者。深圳用事实说明了企业的活力来自创新驱动发展的供给侧，创新更多地依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所以，我今天讲的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理论，也有事实依据。

---

1.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的主题发言。

第五章 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

用世界和历史眼光看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2010年2月26日）

今天，我非常荣幸，第一次来到亚布力，参加中国企业家论坛。这次已经是第十届论坛。亚布力十年，从2001年到2010年，是黄金十年，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更是中国企业家成熟的十年。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时代。一方面，经过这次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上。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也出现了很多困惑，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思路。从历史中学习，是保持清醒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多种原因，不少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似乎觉得历史是从1979年开始的。

非常幸运的是，中国企业家论坛并没有忘记历史。在我收到这次论坛的邀请函的一开头，三位组织者——田溯宁、陈东升和张维迎——就特别提到了80年前中国企业家的“黄金十年”，那是在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民族企业家。在座的企业家们，对那个十年的中国企业发展史和中国企业家的思想和创业经历，比我更加熟悉，我不再赘述。

但这一番话让我想到了那个十年，从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今晚，我同大家一起分享那个时期世界上发生的三件事，它们对后来的历史都有着重要影响，它们或许也对80年后今天的我们，有着某些启迪作用。

第一件事是大家熟悉的，是正好发生在那个时期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危机。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随后是银行体系崩溃，紧接着是30年代的大萧条，失业率高达25%，出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后带来了罗斯福新政等政府干预。应该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与之相比就显得小了很多。

第二件事是大家可能已经忘记的，也正是在同一时期，准确地说，就是在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放弃了在此之前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即市场经济政策。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28年到193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33年到1937年，这十年恰好就是1928年到1937年。那是计划经济开始的十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黄金十年。而这个时期恰恰是西方市场经济一片衰退之际，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高歌猛进，蒸蒸日上。从1929年开始，苏联大规模实行农业合作化，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都是过去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过的。人们似乎觉得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诞生。那时欣欣向荣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陷于危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鲜明反差，我相信比今天的中国与西方的反差只大不小。

第三件事大家可能不知道，是那个时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出现的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场著名的学术争论。哈耶克等人为争论的一方，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人为另一方。争论的焦点是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这个重大的问题。理论上的争论通常都很难在理论层面有定论，最终需要由经验事实和实践来检验。这一检验历时60年，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了结论。到那时，全世界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哈耶克在1992年去世的时候，他看到的世界已经与30年代争论时截然不同。

正是这场争论催生了哈耶克的若干名著，其中194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一文在学术界最有影响。他把经济体制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分散在个人那里的信息作为判别好经济体制与坏经济体制的标准。由于个人自由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把个人自由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哈耶克的这个思想让我们对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有了深刻的认识：分散信息的有效使用是市场经济有效率的关键。

如果说哈耶克的思想是关于市场经济静态效率的话，那么在同一个时期，同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熊彼特的另一个思想，则让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动态活力，有了新的认识。熊彼特认为，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来源于企业家精神。即使计划经济可以取得暂时的静态效率，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落后阶段的赶超时期，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动，经济发展迟早会走向停滞。我们今天对创新和创业的高度重视，都源于熊彼特的这一思想。

思想家的大智慧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改变世界”正是亚布力论坛信奉的理念。这让我又一次想到20世纪的另一位重要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那段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为有力。的确如此，这个世界是被思想统治的。那些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影响的实践者，其实通常就是某些过时的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

今天，我们身处亚布力，在第十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回顾刚刚过去的十年，回想80年前的十年，也思考过去80年间的起伏。1928—1937年确实是中国企业家的黄金十年，可惜，它只延续了十年。我相信，在亚布力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将会是更加辉煌的另一个十年。

因为，我们有思想的力量。

---

1. 在黑龙江亚布力举行的第十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开幕主题演讲。

全球化下的中国和世界[注]

（2010年12月）

在2010年末来思考全球化下的中国和世界，不仅关系到中国，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走向。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估计GDP总量大致接近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也会接近1/10。这在十年前的2000年末还不可想象。2000年中国的GDP只有1.2万亿美元，那年是中国加入WTO的前夜。

展望未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由于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大约是美国的35%，所以有可能在20年以后，中国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由于中国2009年GDP总量约是美国的2/3，因此，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就有可能在七八年内实现。

无论是按照汇率计算，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会达到和超越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达到并超过其人口所占份额，即超过1/5。一个占世界经济总量20%甚至更多份额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显然是举足轻重的。

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两个过程将决定世界历史的走向。一个是世界如何适应中国，另一个是中国如何适应世界。

世界如何适应中国这个问题，在最近受到了西方意见领袖的密集关注。举两个例子。2010年11月底，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先生（Lawrence Summers）的专访。他在采访中说：50年或100年后人们写我们时代的

历史时，不太可能谈及2008年的经济衰退，甚至也不太可能关注21世纪10年代美国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是世界如何适应历史舞台向中国转移的变化。同一时间，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撰文论述中国崛起。他推测，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会有三种结果：一是“正和”结果，世界经济彼此互相依赖，共同繁荣。二是“负和”结果，全球经济混乱，各国争夺稀缺资源。三是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展，世界形成均势格局，但孕育着新的危机。可见中国之于世界的问题变得如此重要。

从中国自己的角度看，中国如何适应世界这一问题更为重要。我认为，中国如何适应世界的起点首先是我们看自己要有“世界眼光”。所谓“世界眼光”，就是应该具有“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思路，这正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宗旨。“世界眼光”具体落实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历程放到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考量。

用“世界眼光”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对中国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如果用世界眼光来看，正是多数国家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过程。所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着比我们通常认识的更多的共同点，今天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主体更接近了，而不是更疏远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世界眼光来看中国，我们会摆不正位置，看不清方向，就谈不上如何适应世界。

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中国完成了经济发展上的两个历史性飞跃：在前十几年，中国成功地摆脱了“贫困陷阱”；而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中国又使人均收入上升到了低中等的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8000美元），从而站在了中等收入的“门槛”前。中国的下一步就是要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并在此之后保持持续的增长，进而进入高收入水平。这是多少年来中国人的梦想。

在未来十年中，我认为有三件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转折性的事情会发生。

第一件事是中国的人均GDP，按照美元现价计算，会上升到1万美元以上。这里既有实体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有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也包括通货膨胀的因素。这意味着我们真正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长期习惯的一些用语，比如“脱贫”、“温饱”等不再是日常词汇。1万美元平均生活水平时的消费行为、投资理财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会与今天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二件事是将有50%以上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中国是农业社会，是农民社会，其基础是多数人居住在农村。它都将成为历史。多数人是城市居民意味着超过7亿人口的中国人是城市居民，它大致是美国加欧盟各国城市人口的总和。这个消费群体的衣食住行、社会活动，都将与过去不同。我们长期以来的众多习以为常的观念将被改变。

第三件事是中国的人口“抚养率”将会出现“拐点”。“抚养率”是指未成年人加退休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多年来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但在未来十年内将变为上升，也就是社会中被抚养人口占比将逐年上升，即出现“拐点”。我们至今所习惯的“人口红利”将终结，逐渐出现“人口负债”。

这三件事在未来十年内同时发生的概率很大，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对中国之于世界都有重大影响。

一个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当一国人均GDP超过中等收入的某个水平之后，即大约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3500美元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放慢。事实上，日本在1971年、中国台湾在1988年、韩国在1992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从此前的8%以上下降到了7%以下，有

意思的是，它们都是在13500美元左右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的。

如果要认识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直观的参考，那就是一些东亚国家承办奥运会的时间。日本是在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韩国是在1988年举办汉城奥运会，而中国是在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巧合的是，这三个国家在举办奥运会时各自的人均GDP都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8000美元上下。并且，无论是从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居民的生活感觉等方面来看，还是从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即对高投入、高储蓄、高出口、人口红利的依赖来看，中国都和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很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发生在其奥运会举办七年之后，韩国则在其奥运会举办四年之后。当然，我并不想根据这些信息就预测中国的增长速度何时放慢，也不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马上就要下降的观点。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一条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各国都适用的，也就是说，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

中国必须制定好应对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转变。这个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讨论，不过，当时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非调不可、非改不可的时候。可是现在或很快，这个问题就会变成紧迫的现实压力，这一次，中国将要面临真正的挑战。在习惯了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接受经济增速的放缓。这也是经济体变得成熟的标志。正是因为成熟，人口红利将消失，资本回报将下降，这就是经济增长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速度下降的根本原因。更何况，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的GDP平均每年9%的增长本身就是具有追赶性质的，因为起点非常低，就可以利用国际上已有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实现持续的高增长，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但是，如同不能要求

20岁的成年人和15岁的青少年有同样的长个子速度，当一个经济体开始成熟以后，我们也要逐渐适应一种新的增长方式，接纳一种新的生活观念，虽然这很不容易。

应对经济增速放慢措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相对地位是上升了。但是，我感到，如果这种受益使我们不能冷静地评价自己，那我们就难有决心和动力去推动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也就很难应对将要到来的经济增速放慢的挑战。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就在于不断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今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加需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因为已有的成就而遗忘了这条主旋律，认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不成熟体制的转型，而只是现有体制的调整，甚至因为某些错误的“经验总结”而否定了这条主旋律，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国是一个大国，历来都有一种大国心态。1000年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人均收入也名列前茅。那时，中国具有领先的文明，而世界又较为封闭。那时的中国被看作“中央之国”，那时中国的大国心态是一种优越心态。直到1890年，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那时的中国在衰退，又受外强侵侮、国难当头，那时中国的大国心态是一种危难心态。

今天，我们处于全球化时代。同时，中国又将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一种“历史常态”。然而，今天既不同于1000年前，也不同于120年前，中国和世界的情况都已经大不相同了。因此，我们既不应该试图找回1000年前的那种“优越心态”，在“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情结牵绊下，故步自封，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也不应该陷于120年前那种身处国难之中的“危难心态”，时刻担忧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坐失和平发展的良机。对我们来说，具有一种正确的大国心态

至关重要。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曾经的领先大国，一度的危难大国，今天的复兴大国，应该有一种平和心态。一方面，世界要适应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适应世界。

---

1. 原载于《全球化》创刊号。

世界经济变局：问题与思考(注)

（2012年11月16日）

我想围绕这节的主题“世界经济变局：问题与答案”谈四点。

第一，世界经济变局。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10年前的2002年1月1日，欧元货币正式开始流通，人们寄予很高期望。11年前，金砖四国（BRIC）由高盛的奥尼尔（Jim O'Neil）提出，引起极大关注。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在去年70万亿美元的全球GDP中，粗略地说，欧盟占24%，美国占22%，中国占10%，日本占9%，其他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占35%。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表现为：（1）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比例从过去的80∶20改变为70∶30，并且继续向60∶40的方向发展，因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长超过发达经济体（不过当某一发展中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被划为发达经济体，比如韩国，从而又增加了发达经济体的比重）。（2）在发达经济体中，欧洲和日本的近期表现令人失望，日本出现负增长，又陷入衰退，德国也出现了衰退。相对而言，美国经济出现的复苏，尽管还不够强劲，但是给全球经济带来希望。（3）金砖四国中似乎中国最为突出。中国经济也经历了相对困难的时期，只是在最近一个月看到了企稳回升的征兆。（4）欧盟、美国、中国经济的总和超过世界GDP的一半。

在世界经济变局中，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因素。这与几年前不同。在2008年，那时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陷入困境，而金砖四国都很辉煌。今天，尽管欧洲和日本困难重重，美国正在重整旗鼓。而中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仍远好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

第二，问题。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问题，但也有共同点。大家关注的是全球化的冲击。不过，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各国的问题都不仅是单纯的经济、金融问题，而且与各国的政治、政府密切相关。比如欧盟经济的问题，是一体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有些类似于我们中国人说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到货币、银行、财政、政治的一体化问题。而中国的增长问题、结构问题，实质上又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居民”的分配关系、权力关系、所有权关系。稳增长和调结构，没有政府的调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到2020年的两个倍增目标中，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比GDP倍增更具挑战，也更具意义。

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政治”（politics），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是，“It's politics，stupid”，即“愚蠢的政治”。美国经济必须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财政悬崖、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收入不平等，都体现在政治妥协中。在哈佛商学院对其校友所做的调查中，把“政治”、“税制”列为对美国经济竞争力最不利的两大因素。

第三，答案。正因为经济问题与政治和政府连在一起，即使答案从经济学上是清楚的，结果也不一定清楚。以美国为例，美国人认为，美国政治的两极倾向是多年来最为严重的，并且意识形态化，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我们远在中国都能感受到。10月23日，是清华经管学院一年一度的顾问委员会和“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上午论坛的时间正好与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一场辩论时间重合。在我们的顾问委员中，明显地分成两大派，金融界的委员们都支持罗姆尼，而高科技企业和大学的委员们都支持奥巴马。而在四年前金融界的不少人都支持奥巴马。

第四，答案中的不确定因素不能忽视。在世界格局变化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创新带来的变化。举一个关于能源的例子，页岩气（shale gas）和页岩油的开采。技术创新使开采变得经济上可行了。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准确的数目，但是这似乎足够对我们的思维和判断形成冲击：能源不再会短缺。在清华管理全球论坛的第一场分论坛“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上，BP前CEO约翰·布朗勋爵（Lord John Browne）语出惊人：他判断页岩气的开采将改变全球能源供给，不再有过去那样的担忧，即使中国经济崛起，也足以应对。这种技术变化还会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当年北海油田的发现就拉动了英国经济的增长。

就在这周一（11月12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预测美国将在2017年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石油产出最多的国家，在2020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在2035年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并成为能源净出口国。是什么引发了如此大的变化？是页岩革命（Shale Revolution）。

另一方面，中国是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页岩气储藏量最大的国家，这是好消息。但是，坏消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开采技术。由此可见，创新多么重要，它可以改变我们担忧的制约因素。

回到今天的主题，世界经济变局的问题与答案。给我们的启示是：问题很多，有些答案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但结果不清，而有些答案可能不在我们的预想之中，需要开阔思路。

---

1. 在2012财新峰会上的发言。

理解经济“新常态”注

（2015年9月24日）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三是创新创业“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年和2015年这两年对中国经济来讲可能是一个转折时刻。在此之前的35年经济呈现一种发展态势，在此之后的20—30年可能是另一种态势。所以当前我们正处在转折之中。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增速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关于增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左右，这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趋势性的，有内在原因的，并且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关于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发生。

经济增长潜力的一般规律

首先，经济增长存在各国通用的普遍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原因是在有资源制约条件下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只是先后的问题，由于穷国可以有追赶效应，所以最终各国经济水平会趋同。当然在现实中，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收入水平很低，但是经济增速并不快，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使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

人均GDP水平与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人均GDP分成五个阶段，即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那么从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来看，大致可以得出收入阶段与潜在增长率的以下对应关系：低收入国家有8%以上的潜在高增长率，低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6%—7%左右的潜在中高增长率，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5%—6%左右的潜在中等增长率，高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4%—5%左右的潜在中低增长率，发达国家对应的是只有3%左右的潜在低增长率。

中国目前属于低中等收入到中等收入之间，所以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是6%—7%左右。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目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人均GDP是多少，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

影响经济增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见表5.1），中国劳动人口占比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2014年还有两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一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0%，二是60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5%。

表5.1　人口结构变化

	人口总数（百万）	其中 15—59 岁人口（百万）	15—59 岁人口占比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2000	1267.43	846.39	66.80%	10.33%	6.96%
2005	1307.56	898.29	68.70%	11.03%	7.96%
2010	1340.91	940.52	70.10%	13.26%	8.87%
2011	1347.35	940.72	69.80%	13.71%	9.12%
2012	1354.04	937.27	69.22%	14.32%	9.39%
2013	1360.72	935.00	68.71%	14.88%	9.67%
2014	1367.82	929.82	67.98%	15.53%	10.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借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缺乏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但从短期来看，单从就业方面来考虑，劳动人口的下降减少了眼前的就业压力。因此，长期和短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此外，虽然我国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仍有很大的结构调整潜力，因为我们仍然有2.4亿劳动力在农业，而农业并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但是要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工业或者服务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经济结构调整

1．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希望调整能够更快些。其中第三产业占比在逐年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6.1%，经过第三次经济普查后调整为46.9%。事实上每次普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会往上升，因为服务业容易被低估。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8.2%，很快就会超过50%。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9.2%，30%的劳动力只产生了9.2%的GDP。1/3的生产率对应的收入当然也只有

1/3。因此，第一产业的问题是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报酬就无法提升。

2.需求结构调整。从GDP支出分解来看，消费、投资、进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需求的马车也在调整。2007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9%，非常之高。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降到了3%以下，已经属于正常范围。此外，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消费有可能被低估。因此，需求结构也在调整中。

3．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从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以后基本上逐年下降，2014年降到0.469。尽管这个数字还是比较高，但确实在逐年下降。这些年的一个现象就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较快，有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而这个上涨跟前面所述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吻合的。劳动供给在减少，而经济还在不断增长，因此工资就会上涨。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上涨是基尼系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世界经济“新常态”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2013年11月，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预测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率时用到一个词“secular stagnation”，中文翻译为“长期停滞”。他认为原来预期美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为3%，但现在看来，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是2%。一个证据是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远远低于预期，没有出现4%—5%的反弹。同时，经济学家普遍预测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会低于美国，而日本会低于欧洲。假定这些预测成立，那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增长环境就会与过去10—20年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是自己一家的事，而是在世界经济环境中的。在我们考虑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候，要考虑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

造成发达国家进入这种经济增速“新常态”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类是萨默斯强调的需求方面的原因。他认为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非常欠缺，但是因为政治问题、环境问题、体制问题等种种原因，很难解决。另外就是工资增长停滞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美国过去20年的中位数工资基本上没有提高，而美国百分之六七十的收入都是劳动收入，而消费又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工资增长缓慢或停滞将导致消费增长缓慢或停滞，进而使得整个经济增长缓慢。

第二类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J.Gordon）所提出的供给方面的原因。他预测美国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2%，主要原因是供给问题，其中有人口、教育、债务、全球化、环境、收入分配等几大问题，这些制约因素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在他的预测中，他假定美国在未来30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与过去30年持平，既不多，也不少。

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

2014年是一个有意思的年份。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和美国的相对经济总量发生了变化。按照名义汇率计算，2014年，美国GDP总量是17.4万亿美元，占全球22.5%，而中国GDP总量则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占全球13.4%。如果按照IMF公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GDP总量仍为17.4万亿美元，占全球16.1%，而中国GDP总量则变成了17.6万亿美元，比美国还稍多一点。因此，如果按照IMF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已在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再来看人均GDP。2014年中国人均GDP按照名义汇率计算是7589美元，为美国的13.9%。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2014年中国人均GDP是12880美元，为美国的23.6%，大约为1/4。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人均GDP从美国1/10以下上升到接近美国的1/4，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把发达国家的G7（七国集团）、亚洲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放在一起比较，用IMF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GDP（见表5.2）。首先，我们看G7，这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7个国家。如果把美国的人均GDP作为100%，那么德国和加拿大都超过美国的80%，法国和英国超过美国的70%，日本和意大利超过美国的60%。所以，进入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要求人均GDP达到美国的60%以上。

其次，我们来看亚洲四小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中国香港正好同美国相等。当然这两个地方比较特殊，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与德国的人均GDP一样，而韩国与意大利的人均GDP一样。韩国已经与日本非常接近，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68%，韩国是美国的65%。

表5.2　G7、亚洲四小龙、金砖四国2014年人均GDP

国家/地区	美元（PPP）	美国的%	国家/地区	美元（PPP）	美国的%
新加坡	82762	152%	日本	37390	68%
中国香港	54722	100%	意大利	35486	65%
美国	54597	100%	韩国	35277	65%
德国	45888	84%	俄罗斯	24805	45%
中国台湾	45854	84%	巴西	16096	29%
加拿大	44843	82%	世界平均	15147	28%
法国	40375	74%	中国	12880	24%
英国	39511	72%	印度	5855	1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第三，我们来看金砖四国。俄罗斯的人均GDP是美国的45%，巴西是美国的29%，中国是美国的24%，印度则是美国的11%。因为世界平均水平是美国的28%，所以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对应前面所说的，人均GDP达到美国60%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所以韩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俄罗斯人均GDP为美国的45%，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巴西人均GDP为美国的29%，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人均GDP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处于中低收入，接近中等收入。如果中国到2020年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的体量很大，当中国增长的时候，世界平均水平也跟着往上走，所以这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未来20年

因为70除以3.5是20，所以根据“70法则”，3.5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得每20年翻一番。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伏，中国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相差为3.5个百分点，那么20年后，到2035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就会在目前是美国的24%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美国人均GDP的48%，接近美国人均GDP的一半。实现两国增速之差为3.5个百分点的可能情况是：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5%，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达到6%；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达到5.5%。这是有可能的。

三、创新创业“新常态”

经济增长的原因

从供给来看，经济增长有两类原因，一类是在已有技术条件下增加资源的使用，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这类增长中，后进国家可以从

先进国家学习新技术，并不需要自己开发。第二类就是发明新的技术，即创新。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很高，没有剩余劳动力（除非有大量移民），因此只能靠创新驱动增长。另一方面，贫穷国家则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它们离世界技术前沿还很远，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的靠创新驱动。中国目前正是处于这个阶段。所以，当中国与美国相比的时候，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我们还不够富，中国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4%，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比美国高。但是同中国自己的过去相比，潜在增长率下降了，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从0到1和从1到N

美国企业家和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出版了《从0到1》一书，中文版在中国销售了100万册。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时机非常好，正好赶上今年“两会”结束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但是这本书没有讲N的力量，没有讲从1到N。在中国，市场的规模N是非常大的，这是中国的优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快的等公司，它们使用的技术应该说都不是从0到1。阿里巴巴之前有亚马逊，腾讯之前有ICQ，百度前面有雅虎（Yahoo）和谷歌（Google），滴滴快的之前有优步（Uber）。微信之前有韩国的Kakao Talk，但韩国只有5000万人，而中国有13亿人，所以微信远比Kakao Talk成功，这就是因为N 的不同，是N的力量。不能说只有从0到1才是创新，从1到N只是简单的照抄。事实上，从1到N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创新，因为要使外来的原始技术适合中国文化、适合中国市场。在中国，N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不能忽视。在中国，从1到N大有可为。

创新创业新模式

中国这一轮的创业热潮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创新创业与全球特别是美国的创新创业正在直接而又快速地融合。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把研发的初级阶段放在美国，比如放在硅谷。美国的创业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全球人才的集中地。这就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创新创业模式：在硅谷做最初研发，之后在中国进行进一步开发，并充分利用中国市场的N的力量。在网络中有个梅卡菲定律（Metcalfe's Law），即网络效应的平方法则：网络价值= N_2。因此在互联网时代，N的力量不是N的线性关系，而是N的平方关系，这就把N的力量更加放大了。

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创业聚集地有哪些突出的地区？在美国有三大主要地区：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前两者存在很长时间了，而纽约是新兴的。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受到较大打击，但随后出现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它们与纽约的商业中心、广告中心、媒体中心相关，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也有三大主要创业创新的聚集地区：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来这六个地区将很可能是全球创业创新的聚集地。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三个地区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未来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

1. 在中央党校学员论坛上的演讲。原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11期。

未来经济六大趋势与企业家精神㊟

（2016年4月23日）

2016年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10周年。作为经济学者和商学院院长，我担任俱乐部顾问，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企业家们在一起，深感荣耀和自豪。巧合的是，我自2006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今年也是10年。

这10年间的变化，估计10年前没有预测到。在2005年，中国人均GDP不到1800美元；10年后的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是2.3万亿美元，不到当年美国GDP的20%；10年后的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接近美国GDP的60%。10年前，没有“双十一”，没有微博、微信，没有小米。当然，10年前也没有预测到2008年会出现全球金融危机。

10年后会怎么样？接下来10位企业家将谈他们心目中的未来10年。企业家们永远是有梦想的，因为就像马云所想的，万一实现了呢？类似的，一些经济学家也会做预测，因为他们会想，万一说对了呢？

我不做预测，只说说可能性。10年后的中国经济会是怎样呢？一种视角是拿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做比较。我们以今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60%为基点，来考虑两国每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之差+通货膨胀率之差+汇率升值之差的总和。如果这三项之和是3%，那么10年后中国GDP是美国GDP的80%；如果这三项之和是4%，那么相应的数就是90%；如果这三项之和是5%，那么10年后中国GDP就会与美国GDP相当。比如，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美国经济平均每年

增长2%，相对通胀加汇率变化为1%，这样6%-2%+1%就是5%。这是有可能的。当然，也还有其他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受到有关中国和全球经济中若干重要因素的影响。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影响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六大趋势，其中前两个有关中国，后四个关乎全球，包括中国。这六大趋势中，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既有张力压力，也有推动力。下面我就聚焦这六大趋势，谈谈其主要特点和内涵。

第一，中国经济转型。过去10年，中国从低中等收入迈向中等收入。今后10年，中国从中等收入迈向中高等收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就是告别低收入和高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常态。这种新常态是长期的，但未来10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转型，消费会提升，服务业比重将扩大，制造业要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种流行观点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同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第二，中国新型政商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商关系的显著特征是一种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紧密型关系。新型政商关系则要达到政府和企业的“亲”和“清”境界。要实现这种境界，就必须把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建立在透明、规范的法治基础之上。我在两年前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发言，主题是法治在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中起决定性作用。今天我想进一步说，法治也是决定新型政商关系的制度基础。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决定中国的新型政商关系的进程。

第三，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首先是发达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2016年成为畅销书的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是美国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的《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它分析了自1870年至2015年的145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并预测未来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进入2%以下区间，而不是通常期望的3%左右。在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经济增速可能比美国低，日本可能比欧洲低。在金砖四国中，巴西和俄罗斯今年是负增长，今后前景也不乐观，亮点是印度和中国。IMF最近调高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同时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大于加快的可能性。

第四，全球化趋势减弱。过去10年间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全球化在经历快速强劲发展之后，开始出现减弱甚至逆转的态势。去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下滑，以本币计价的全球贸易虽然增长，但增速低于经济增长。不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都有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倾向。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主张维护劳工利益的“左派”批评全球化，打着维护本国利益旗号的“右派”也质疑全球化。全球化继续向前推进，并不乐观。

第五，科技创新推动发展但效果复杂。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鼓励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但它所带来的效果并不简单。之前的科技创新主要以机器替代人的体力，这一次科技创新则是以机器替代人的脑力。上个月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高手，突显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潜力。两年前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预测，这一轮科技创新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可能会造成大批人失业或无业，这尤其会发生在有知识的人当中。所以我们为科技创新鼓舞，对其效果的复杂性也不能掉以轻心。

第六，收入分配不平等张力持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学术著作。可见人们对这本书的中心话题——收入和财富

分配不平等的关注程度。尽管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在缩小，但是每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在扩大，一些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回到了19世纪末的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张力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因为它影响政治走向，从而也影响经济走向。

以上这六大趋势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一定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走势。但是，企业和企业家并不只是被动地等待和应对。回顾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有两条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二是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市场根据供求关系配置资源，以此达到资源在已有技术条件下的有效配置。而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来源于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就是创新产品，创新生产过程，改变技术条件，改变资源组合和利用的方式。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动带来企业发展活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国新型政商关系、全球经济增速、全球化进程、科技创新以及收入分配，都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企业家们关注如何被这六大趋势所影响的同时，也应思考自己将如何推动世界的改变。如果说这六大趋势将塑造世界，那么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将改变世界。当我们展望未来10年的时候，洞察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六大趋势，思考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和企业家的责任，比单纯预测更有价值。

---

1. 在2016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第六章 改革进行时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注

（1995年4月）

中国在经历了16年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1995年改革的重点将会转移到企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域，诸如银行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公司治理结构将成为企业改革的中心议题。本书共有8章，从比较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改革。我们希望本书内容对中国的读者，包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以及银行家来说，是及时的并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的英文原版共包括12章以及导言，这是基于世界银行的研究课题“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而产生的。我们二位在1993年末和1994年初参加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又有幸于1994年8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由多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参加的、颇有成果的国际研讨会——“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即“京伦会议”）。该研讨会是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办，其中心议题是企业制度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会议结束后，我们感到把产生于世界银行研究课题的这本书中的一些章节介绍给中国读者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中文版包括7章以及原版的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公司治理问题的理论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历，以及日本战后重建时期的经验。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与中国现时的改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当

然，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必须重视其自身所处的特殊环境，但是上述研究仍可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

公司治理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论题，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有关中国公司制度改革的合理方式也有很多不同观点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基于我们对有关经济理论和其他国家经验的研究，以及我们对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目前状况的有限了解，在此，我们试图针对中国目前讨论中引发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是公司化。我们认为，参照1993年12月颁布的《公司法》，规定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某个特定日期前，如1996年末，实现公司制改造是一项可取的措施。在企业最初实行公司化时，企业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股权可由国家持有，以此来维持转轨时期的平稳性和渐进性。公司化的优点在于：（1）公司化后企业必须接受透明的外部审计。（2）企业必须组成董事会，企业管理层的选择要按既定的程序进行，并需经董事会通过。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随意干预，从而避免不以管理者能力而以其他原因为由任命或罢免企业管理层的情况发生。（3）财务上有活力的企业可以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来源。

第二，国有资产管理。企业公司化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将代表国家行使表决权并执行监督企业管理人员的职能。一种观点是引进多层控股公司结构。对数量众多的国有企业来说，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必须要拥有多个母控股公司，母控股公司控制下属的子控股公司，子控股公司再控制已公司化的原国有企业。然而，这种体制只会重现那种过多行政干预的机制。因为在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由于子控股公司的业绩无法用诸如其证券价格等客观标准来衡量，因而母控股公司对子控股公司的评估不可避免地带有随意性。此外，由于母控股公司远离市场，很难得到关于企业的有经济价值的信息，因此会产生无效率。再者，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控股公司的经理人员可能会抵制将来必要的进一步改革，因此这一结构可能变

得十分僵化。国家股可以直接由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除去一些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的企业（如国防企业）由国家政府控制，其他与国家股有关的控制权的执行最好下放到较低层级的政府。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乡镇企业表明，较低层级的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以有效率的方式来控制其企业。

第三，坏账问题。在不妨碍国有企业健康部分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坏账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现有的国有企业规模太大，活动领域太宽，其中一部分有活力而另一部分则没有活力。因此在公司化过程中，必须对国有企业的健康部分与不健康部分加以区分。一种方法是把国有企业的健康部分分离出来，作为该公司化企业全部或部分拥有的子公司，只需将其目前营运必需的资产划拨给这一子公司即可。其他资产，尤其是价值较高的不动产，则可由母公司保留再出租给子公司，以防子公司管理层和职工对资产的不公平剥夺。这样，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有活力部分就得到清理，而不必受遗留问题的困扰。将原国有企业缺乏活力部分实际内部消化的母公司可在指定的期限内（比如3年），在政府有限的支持下进行重组。这样一个过程会涉及痛苦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组成本和/或清算成本，然而，与整个国有企业，包括健康的部分和不健康的部分一起进行重组相比，坏账问题的“局部化”要好一些，前者很可能导致失败。

第四，银行改革。银行具备了适当的激励机制后，可以成为企业的有效监督者。从这个角度看，允许银行持有企业的一定限度的股权是可行的。银行持有了公司的股权，它就有权加入公司的董事会，从而获得必要信息来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理人员的能力，帮助公司在可能出现财务危机以前纠正其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临时的管理层接管（management take-over）、债务—股本转换等方式，在公司出现财务困难时施以有效的控制。

在这方面，有两种对银行持有公司股权的错误理解必须加以澄清。第一个问题是银行持股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政府管制其实并不相违背，该法要求商业银行业务必须与证券业务如承销、经纪业务等分开。从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和对存款人的保护来看，设立这样的管理措施是应该的。但是，即使银行被禁止参与证券业务，它们也可能被允许在其账户上持有一定限度的股权（如最多拥有公司股权的5%）。这样的制度就是日本的制度，是介于德国制度和美国制度之间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银行贷款偏向的可能性。这可以通过两种情况表现出来：一是被管制的贷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二是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专一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企业的寻租行为可能导致银行信贷员的腐败，因此，反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对发展健康的银行机制是十分必要的。第二种情况可以通过规定一家银行对企业的贷款限额来缓和，这最终会导致贷款银团的出现。

最后，我们想强调转轨经济中多样化和试验的重要性。转轨时期，一个允许不同所有权安排，如大部分国家所有权、乡镇企业、合伙企业、合作企业、内部人管理的企业、合资企业、公众持有和封闭公司等形式的体制是非常可取的。有效的所有权形式会在众多不同的尝试形式中脱颖而出。作为公司监督机制的银行导向制（bank-oriented system）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优点，也即它与不同所有权安排是相一致的。这是因为所有企业都需要为其业务经营而借款，如果它们无法偿还债务，那么控制权必然自动转移给债务持有人（银行），即使大多数股权由国家、内部人、外国人或其他法人所拥有。

当讨论公司化企业的国家所有权时，人们通常会提出究竟“谁是企业的所有者”，这个问题也许有误导性。如果所有生产要素（除“企业家能力”外）都有完全竞争的市场，那么，所有要素获得市场收入（market-determined income）后的剩余最大化是与内部配置效率相一

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区分企业“所有者”和企业家（“剩余索取者”）是有意义的。然而，在日本和中国这样的经济体中，人力资本一般由企业专有而不能在企业间完全流动。比如职工通过专业训练掌握了专门知识和技能，他们的价值也不能通过市场得到估价。因此，在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中，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并不存在，把一个企业视为各种不同经济资产，包括人力、无形资产、组织管理、金融以及实物等的集合体，似乎更有意义。因此谁是企业“真正的所有者”这类问题会引入误区。企业应被视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联盟，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工人、股东、银行、供应商以及社会（即国家）。高层经理人员的任务就是要合理地平衡这些成员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企业需要一个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存在不同的所有权安排，特别是部分由国家所有，部分由职工所有，并非是不可行的。

本书的出版是在许多机构和个人的努力下得以实现的。我们感谢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以及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出版。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本项目协调人和中文版编辑肖梦女士的出色工作。

---

1. 青木昌彦和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文版）序言。与青木昌彦合著。译自英文。

宏观调控不是市场监管[注]

（2005年3月7日）

2004年中国的宏观调控达到了目的，年底时的各项宏观指标趋于稳定。但是这次宏观调控历尽艰辛。宏观调控给企业带来了困难，给地方政府出了难题，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中央政府更是辛苦。这一点政府已经明察，因此提出了今后要改善宏观调控。

那么症结在哪里？我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过26年，宏观调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别，进而还未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做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针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有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也就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

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做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前者通常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者则是其他部门。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

区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有利于合理地横向划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它是政府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

1. 原载于《财经》2005年第5期。

竞争才刚刚开始[注]

（2007年1月20日）

五年前，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我和当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黄海洲先生一起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的稳定和发展”。这篇文章依据国际上各个国家在过去50多年中的经验教训，考察中国当时面临的金融风险问题。我们把金融风险问题上升到非常高的层次，特别提出要关注银行的情况，因为这是根据国际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

五年前，经济学家对中国金融，或者更具体地讲，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判断出奇一致。大家一致认为，银行的坏账数量如此之大，中国银行业问题相当严重。用海外经济学家的话来讲，从基数上说，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已经破产了，光看账面资产的话，是空的资产。美国经济学家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世纪90年代末写了《中国未完成的经济革命》。这本书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它主要就是讲中国的银行业问题，应该说，他的分析大致上没有错。他过分悲观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海外的经济学家和银行界，这在以后的若干年中，都反映得非常清楚。

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使国外的大多数人对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并做出一系列金融开放的承诺持相当悲观的态度，我想这也是很有道理的。中国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入世”，并且承诺五年后要全面开放中国的金融业。五年过去了，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也已经结束，尽管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全面开放了，但是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再来问这个问题，和五年前相比，我们银行的风险是大了还是小了？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风险的确比五年前小，甚至可以说小了不少。2005

年9月，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碰到了拉迪教授，他说，过去他对中国的银行业是悲观的，现在他是谨慎乐观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也说明这五年中国的银行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

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这段刚刚过去五年的历史，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段改革的路程并不是一条显然的路径。至少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海外的经济学家当时提出了这样一条改革银行的路径，即动用外汇储备入资，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整体在海内外上市；也没有人能够想到，一些在金融上破产的银行，五年后市值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股票受到追捧。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另外一条路，比如把银行拆分，再比如把其中的一部分拿来上市，也可能把另外的很多公司留在集团公司或者银行。在转制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卖给外国人，也可以选择不去找代表少数股东利益的、代表独立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我们还可以走另一条路，就是派国外监事，这些都是可能的方式。但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走到了今天。

不仅海外人士，国内也有不少人对现在这条路有不同意见。而且走这条路，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银行在找海外战略投资者之前，首先询问了国内有资金实力的大企业，但是没有人愿意投资，这足以说明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再比如，2005年3月，中国建设银行的董事长出事，当时正在谈的一家外国大银行立即停止了谈判，这也足以说明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风险看得有多重。再比如当皇家苏格兰银行入股中国银行的时候，消息一传出，皇家苏格兰银行股价大跌，说明市场对这一投资并不看好。仅仅半年多以前中国工商银行准备上市的时候，由于担心A股股市的反应，也在最后一刻减少了上市市值。之所以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在银行改革的过程中，曾经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走到今天实属不易。

我觉得在看待中国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时，回顾这段历史，理解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正确地把握背后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有三个基本原因决定了我们在银行改革中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阶段性成就。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者坚信市场的力量和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空间和机会，所以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开放的姿态来设计改革方案，寄希望于通过开放、上市，按市场化运作，给投资者带来了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这样一个坚定的改革信念，对开放的乐观态度，不可能有后来的操作性方案。任何操作性方案都以根本的理念为基础，这是第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时机。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非常稳固，过去连续四年经济增长超过10%，这个背景非常重要。因为对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与整体宏观经济的起伏相关性非常大，大家对银行有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信心。在这种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信心的条件下改革，会比另外的情况下有利得多。

第三个原因，就是在过去五年中，国际金融环境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即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金融危机屡屡出现，特别是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就发生在我们的家门口，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包括俄罗斯和拉美的金融危机，而这样惊心动魄的事情，在过去五年中没有发生。过去五年，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发生有影响的金融危机，最后一次是2002年10月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市场中，流动性非常多，全球不平衡非常严重，这为银行上市筹集资金，为银行业的开放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然，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我们未能有准备地做出前面一系列改革，也不可能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这个机会未必永远存在。

第一是改革者的意志和技巧，第二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三是国际金融的稳定局面，这三个原因是我们得以使改革走到今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思考下一步金融改革时应该时刻记住的。有些因素，比如第一条，虽然我们仍对改革者的意志和技巧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过去两三年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完全有可能降低改革的速度，或者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应该总是认为改革一定会这样进行。第二，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四年10%以上的增长，今后几年更多的可能是增长速度下降，因为任何经济都是有周期的。有的外国分析家认为，2007年到2008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有1/3的概率会下降到5%，这也许过于悲观，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将来的五年经济增长仍然会在10%以上。第三，国际金融的稳定，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未来五年内，这个世界还会像过去五年那样的平安。

我认为，经过过去五年的努力，中国银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但是转折点并不意味着改革已经完成。事实上，竞争才真正开始。从现在起，中国的银行才真正开始以国际最佳实践作为标杆来衡量，因为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的银行。一旦我们用这个标杆来衡量，立即就会发现我们的短处。这完全没有否定的意思，但是我们的标杆变了，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跟世界上最好的银行、最佳实践的银行来竞争，我们会发现与它们之间的差距，这绝不是市值能反映的，不要忘记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按市值计算的大银行当中，日本占一大块，但这并不能掩盖日本的问题。

现在大部分银行已经上市，上市后银行确实面临很多挑战，如经营战略、经营能力和经营创新等。我在这里想讲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银行的风险管理。也许大家会说，现在的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下降，而且我刚才也说了，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确实提高

了，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不完全意味着风险管理的水平。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海外的很多经济学家和专家仍然不信任中国银行业的管理水平。第一，不良资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剥离，但是剥离本身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第二，现在银行的各种指标经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我想是真实的，但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快。增长比较快，坏账的比例就变得比较低，这一点本身也不能证明我们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了。事实上所有人都在说，如果经济走软，问题就会暴露，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贷款分类，第一类是正常，后三类是坏账，但是第二类叫关注账，比例都在10%以上，这一类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很有可能变成坏账，虽然现在它们不是。像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俗话说，只有当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但是，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有多少分析呢？

国外的银行做压力测试，分析在不同的情况下经济减速百分之多少，坏账会增加多少，但是中国的银行业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风险管理水平。

第二个问题是公司治理。我们总是讲入世以后，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就好比“狼来了”，中国的银行要与狼共舞。有什么办法与狼共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变成狼。自己要变成狼，就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律，按照竞争的规律提供激励。没有这样的激励，优秀人才就会流失，特别是高管人员；没有足够的基于市场的激励，非经济激励也起不到重要作用。这与建设世界一流银行的目标相违背。

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董事会能不能决定高管激励机制？是根据市场竞争和效率来决定还是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受到政府的非经济目标的制约？这是中资银行中常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政府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其非经济目标。国际经验表明，通过税

收等方式往往比直接干预企业或者银行的工资基础更有效，而且更规范。

公司治理背后的问题确实非常复杂，尽管现在海外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价，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者说评论家仍然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持怀疑态度。这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事实上，他们讲的问题也都是我们国内经常讨论的，主要就是制度上的一些制约因素。简单地套用国内的话说，就是有两条“高压线”：一条是国家绝对控制，也就是说国家保持2/3股份；另一条是党管干部，我们的银行高管是干部，所以要接受这样的管理。这两条在海外经济学家看来，甚至在国内经济学家看来，确实都是对公司治理的制约，至少我们在国际上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待创新。

最后我想说，竞争已经开始，中国银行业有很多过去没有的机遇，比如很高的市值。这就使我们的银行在海外兼并或者扩容成为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信心，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经济的增长都有高涨的时候，也有消退的时候。国际金融环境有稳定的时候，也有动荡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为过去五年的成就感到惊喜时，更应该知道哪些是我们的努力，哪些是环境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今后的改革中继续前行。实际上，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机遇，我们已没有退路，但我们也不必畏惧，只要将改革进行到底，五年后，我们仍希望看到中国的金融在开放中变得更成熟、稳定，并获得更快的发展。

---

1. 在2006年观察家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7年2月5日刊。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注)

（2007年12月11日）

关于经济改革，十七大报告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我的理解是，中央在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决心极其明确，改革开放不能停步，不能倒退，而且要前进，因为不进则退。不过，在我看来，具体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如何落实改革开放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有一些新的问题，在此，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

原因是空前的繁荣——GDP增长连续多年超过10％，今年超过11％，企业的利润大幅上升，仅国有企业今年可能就有近万亿元的利润，财政增收可能达到1.2万亿元，上市公司市值更不用说。世界上十大市值公司在中国就有五个：中石油是世界上市值第一大的石油企业，中国移动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人寿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

当然，这些都是好消息。不过，从改革的角度讲，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危机才能催生改革。最好的例子是印度，1991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后的大幅度改革。事情可能不必这么极端。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危机感”能够催生改革。30年前，当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时，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

强烈危机感，一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开启了中国的全面改革。

最近的例子是三年前，银行业面临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开放所带来的危机感，由此促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深刻改革，才有了今天的繁荣。今天的繁荣是好事，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没有危机感，就会对改革造成阻力。

我觉得“危机感”应该来自我们对目前繁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从全球范围看，我们仍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大约为2000美元，是一个成就，但离全国小康还有很大距离。世界银行最新的有关购买力平价的国际比较研究即将发布，有可能将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在原来估计的基础上缩减40％——当然，这仍然远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我们的后面有越南，特别是印度的追赶。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仅仅初步建立，与一个基于法治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距离。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都应该使我们有危机感。

空前繁荣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大。部门利益也是推动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比如，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到空前的水平，财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但每项改革都需要各部门间的利益协调，而这种协调的难度，如今无疑是增大了。从卫生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到电信行业重组，我们都可以看到部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认为下一届政府需要认真考虑，是否能够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工作。过去的体改委、体改办在某种程度上曾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在上一届政府中，体改办并入了发改委。当然，是否恢复体改委另当别论，这里的关键是为了推进改革，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以减少改革的成本。

第二个观察是，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这也是由于新时期的新变化而产生的。不仅要注重效率和发展，还要关注公平。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识，以为改革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与公平是对立的。所以，在关注公平的时候，减少改革的力度应该成为自然。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

改革的精髓很简单，在我个人看来就是11个字——“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也就是要给个人、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让市场运作起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都表明，这是推动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唯一道路。计划经济的历史决定了改革的大方向一定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给个人自由，为企业松绑。50年前，这可能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论，因为那时不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效率上谁胜谁负还未有定论，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对政府在经济中的制高点作用也还争论不休，高税收、严管制、国有制也曾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1980年后的历史已经用事实给出了结论，只有市场经济才有效率，才能发展。

虽然人们现在大都接受市场的效率优势和对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人们似乎也都在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总是存在着“得失替代”（trade-off），由此得出“关注公平就要牺牲效率”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改革有利于推动效率和发展，改革与公平就是对立的，发展与公平也是对立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相替代关系。不错，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有对立的替代关系的一面，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互补的。实现公平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其中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往往都是成本较高的方法，而且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通过改革、通过提高效率，往往会产生成本较低的方法，达到公平的目的，而且有时甚至可以达到既提高效率又改善公平的结果。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有很多原因，经济学家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程度的不同。因此，如果仅仅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来缩小差距，那么，它会导致效率低下，因为人们就会没有激励投资自身的教育。相反，如果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所有人的教育水平，这样既可以达到机会公平，又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

第二个例子是对劳动者保护的问题。最近，英国经济学家贝斯利和伯格斯（Besley and Burges，2004）研究了印度1947年《劳资关系法》出台后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法律对解雇做了严格规定。这两位经济学家用印度各个邦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看这一法律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结果，他们有两个主要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制造业的发展在此后比较慢；而干预较小的邦，发展则比较快。有趣的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恰好是过去制造业曾经较为发达的地区，因为那里的工会势力较大，而几十年后，这些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滞后于过去落后的地区。

第二个发现是关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毕竟，立法动机是为了提高劳动者收益，如果牺牲一点发展换来劳动者利益的提高，也许是值得的。但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立法管制过严的邦，劳动者收入也受损失，失业更为严重。这个研究说明，即使动机是好的——想提高劳动者收入，但如果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结果是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这就是为什么自1991年来，印度在经济改革中放松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

所以，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之路，而且当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也应该用改革的思路来思考问题。

---

1. 在2007年财经年会上的发言。

改革是商业银行的根本出路㊟

（2008年9月23日）

自2003年12月汇金公司成立并注资中国建设银行（简称建行）和中国银行（简称中行）450亿美元开始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转制以来，至今将近五年。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业绩有目共睹。以中国工商银行（简称工行）为例，不良贷款从百分之二十几降到百分之二点几；工行按营业收入《财富》全球排名2008年第133位；市值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总利润今年上半年也是同期内世界最高的；等等。国内其他几大国有控股银行的情况类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巨大动荡，更突显了中国商业银行的成绩。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豪的。

但是，不仅工行，而且其他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都一样，虽然已经很大，但还并不强。做强是未来的奋斗目标。在我看来，只有继续改革，才是商业银行做强的根本出路。我今天只从一个方面，即银行的公司治理方面，来具体阐述我的观点。

工行在2005年10月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一年后上市。我有幸在第一届董事会中担任独立董事，并担任多个委员会的委员和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所以在过去的三年中，我参加了所有的董事会和各委员会的活动。对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有亲身体验。这一届董事会即将结束，对银行目前的公司治理如何评价？简单地说，在几个方面很不平衡：在一些方面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没有突破。

第一，先来看银行公司治理的实质性进展。

目前大型商业银行董事会的组成都是由执行董事、非执行非独立（股权）董事、独立董事组成，形成三类董事的格局。同时，在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后，外国投资者的股权董事进入董事会。

我的经历告诉我，有三个委员会的运作，应该说有了实质性的提升。一是审计。以工行为例，内审局直属总行，直接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独立审计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顺畅。应该说达到目前的国际水平。二是风险管理。在四大类风险的管理中（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工行的控制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从去年开始的美国金融风暴，无论是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还是雷曼兄弟的债券，工行持有的量都很少。在海外投资中，工行也很谨慎。工行还受益于战略投资者高盛，也学习高盛的一些方法。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充分显示高盛的风险管理有其相对优势。三是关联交易委员会对关联的信息披露及时，操作合规、合法。这三方面的进步保证了工行这样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化解风险，纵向同工行自己五年前比，横向同国际的大银行比，都是可称赞的。这并不是说将来不出问题，没有改进空间，而是说工行的审计和风险管理，上了一个台阶。

第二，再来看银行公司治理没有进步的一面。

在公司治理的另一面，却没有进步。严重的不平衡表现在，虽然在公司治理的一些“事”的方面有了重大变化，但是在“人”的方面没有进展。比如，在董事和高管的聘任这些重大的公司治理问题上，在过去几年中，完全沿用传统的任命方法，改革停滞不前，没有实质性进展。

我今天想着重来谈一下银行高管的薪酬确定这一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在股份公司成立之初，董事会通过了期权激励方案，但是被无限期搁置。在过去三年中，薪酬委员会多次试图为高管制订有激励作用的薪酬方案，但都受到来自政府和大股东的各种干预，无法执行。

最近的发展更让人担忧：董事会不能制定银行高管的薪酬，要等政府出台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薪酬标准。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位。确定高管薪酬是董事会的职责，这是公司治理的问题，不是股东的权力，也不是政府监管的问题。公司治理要求董事会（根据薪酬委员会的建议）决定高管薪酬，是有道理的。董事会根据市场竞争和效率的原则来制定高管薪酬。银行的情况千差万别，银行的董事会比政府和出资人更具有评价管理人员的信息。所以各国的公司治理都是由董事会确定高管薪酬。

我们常听到三类理由，说明政府确定国有银行高管薪酬的必要性。第一，银行的业绩是政府保护的结果，甚至说银行业是垄断行业，所以即使银行赚钱，也不是管理人员的经营业绩，没有理由给他们支付高薪酬。第二，政府内部需要摆平：银行行长是干部，而非市场上招聘的银行家，他们同省长、部长一样都是组织部门任命的干部，所以没有理由银行行长就比其他同级干部高好几倍的薪酬。第三，为了社会公平：压缩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有利于社会和谐。

这些都是现实中的问题，而且都是好问题，但是得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第一，我们不去争论银行业是不是垄断行业，如果说银行业的竞争还不够充分，那么正确的政策是减少壁垒，增加竞争。第二，如果说干部之间摆不平会影响其他干部，那么正确的政策是把银行管理者从干部转化为银行家。我们的不少股份制银行的高管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大型国有银行更加需要大银行家。第三，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应该在社会层面解决，而不是在薪酬制定层面解决，因为这样对所有银行都是一视同仁的，不然就是对国有银行的歧视。

由政府来规定银行管理人员的薪酬，其结果会怎样呢？在一个已经开放的经济中，在一个有多种所有制竞争的经济中，这不仅不能使国有银行做强，反而是让国有银行做弱的有效办法。不要说外资银

行，就是中央不直接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可以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来决定薪酬激励。它必然带来三个结果：一是促使现有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人才流失到股份制和外资银行；二是很难再从市场上招聘新人才；三是给留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错误激励，使他们继续或加倍追求非商业的政治目标和利益。

金融服务业最大的资产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人才。银行业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根本上也是在人的方面。已有人才的流失，新的人才招聘不到，任免和薪酬体制对人的激励的扭曲，是造成银行风险的深层次原因。不解决人的问题，银行只能做大，不能做强。

最后，银行改革的未来途径只有一条，就是继续改革。

五年前开始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转制，为今天的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者坚信市场的力量和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空间和机会，所以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改革和开放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变革。现在，我们有绝好的机会，是要抓住机遇，把银行做强的时候了。

关于银行改革路径的未来，需要有战略性的长远思维，而不应受短期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应被一些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左右，为了某些短期考虑而错失改革良机。中国商业银行未来的唯一出路是继续坚持改革，特别是在有关人的问题上，不能停滞和倒退。停滞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

1. 在新浪金麒麟论坛中国金融新时代上的演讲。

严守财务纪律㊟

（2011年11月11日）

当我们探讨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的时候，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做好中国的哪些事情？目前国内外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或称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国内经济学家认为它非常重要，连许多外国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帮助。

本文谈的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严守财务纪律（financial discipline）。严守财务纪律是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我这里说的财务纪律既包括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既有财政的（fiscal），也有货币的（monetary），还有金融的（financial）。

事实上，严守财务纪律不仅是中国应该做的事情，也应该是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如果我们比较2008年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现，虽然它们两者的表现形式迥异，起因也非常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同层面上的财务纪律松弛，最终引发了全球性危机。

美国的财务纪律松弛首先发生在微观层面，即在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次级债券。问题爆发之后政府为此提供救助和刺激经济，又连带产生了政府的债务和赤字等问题。而欧洲的财务纪律问题首先发生在宏观层面，一些国家的政府做出的承诺和提供的支出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财政能力，政府的债务危机又威胁了银行系统，甚至把整个欧元区都拖下了水，并波及全球。美国和欧洲的这两种情况在发生机制上非常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问题都是没有严守财务纪律。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目前看上去似乎还是不错的，但是潜在的危机非常值得关注。

先说财政。10年前，中国的财政收入是1万多亿元，今年会冲向10万亿元，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会看到这样快速的财政收入增长。如果与GDP相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平均每年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10年前财政收入大约占GDP的14%，10年后上升到25%左右。

财政收入成绩斐然在一定意义上是好事，但同时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其一，财政收入增长如此之高，政府却仍然每年有赤字。这说明承诺和支出的比收入的更多。

其二，在财政收入增长这么高的情况下，仍然还有很多地方财政困难，社会矛盾和社会稳定问题仍然在加剧。

其三，更关键的是，今后1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能再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了，它总会有极限的。随后，这个增速必然会放慢。但是如果政府继续以过去的支出方式做事，矛盾会更突出，还可能引发大的危机。现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以后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不至于惊慌失措。

再看货币。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在2003年达到150%的高峰后，接下来的五年都缓和下降，这本来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但是，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结果导致M2与GDP之比有较大幅度的反弹。而且，这个趋势仍在继续。

再看金融，情况有喜有忧。有些方面我们的财务纪律非常严谨，比如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首付非常高。这与我们的文化有关。中国人

喜欢现金支付，而且越早付清越好，这与西方许多国家非常不同。银行做过压力测试，即使房价大幅下降，这部分贷款对银行的影响远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大。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一些行业一些贷款类型，特别是涉及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地方融资平台、民间信贷、体制外循环等。

从宏观到微观，从财政到货币，再到金融，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往前看中国经济确有很多值得担忧之处。

最早提出财务纪律问题并把它作为一个制度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他从20纪50年代起就研究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从中概括出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财务纪律松弛的现象。他早在1979年系统性地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专门引进了一个术语，叫作“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这在20多年前的中国和其他原计划经济国家是非常流行的术语，被广泛认为是计划经济中的严重问题。意想不到的是，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已经终结，这个术语也越来越少听到，但计划经济时弥漫的软预算约束被传染到市场经济，而且造成了全球性的问题。

软预算约束的根源是什么呢？在研究计划经济时得出的一个判断是，软预算约束与企业所有制有关。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更可能出现松弛的财务纪律，而私有企业不太会出现软预算约束，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目标不单纯是财务的。除此之外，造成软预算约束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融资过于集中；企业规模过大，即大而不倒等。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是在非公有制下，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照样会产生软预算约束。比如，如果金融机构不按照市场规律借贷，如果政府过度承诺和不切实际地推行福利政策，同样是导致财务纪律松弛的根源。

回到全球治理问题。对于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救助是治标之策，根本的治理是要严守财务纪律。不论家庭、企业还是政府，不论

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要硬化预算约束。

有趣的是，在过去，财务纪律松弛的问题更多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目前这样的问题却大规模地发生在发达国家。现在看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类似问题。这值得我们分析和汲取教训。

先看美国，它的情况比较特殊。其特殊性是因为美元的特殊国际地位：美元全世界通行，美元资产流通性又超强，目前还没有其他资产能与之相比。因此在货币和金融意义上，美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面临硬预算约束。

再来看欧洲。希腊如果不在欧元区，根据它的经济基本面，货币早就该大幅度贬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就是想建立一个硬预算约束的机制，比如政府赤字与GDP之比就设定了3%的上限。但事与愿违，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危机。

这里的基本原因是欧元区只有货币的统一，并没有财政上的联邦制，结果导致整体上的财务纪律付之阙如，导致3%的上限成了一句空话。财政联邦制是指“中央”与“地方”之间在财政权力上的一种划分，使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相互制衡，共同严守财政纪律。在欧洲，是指欧盟或欧元区与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关系。财务纪律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货币纪律、财政纪律以及金融纪律缺一不可。欧洲的金融危机说到底是治理结构的设计上出了问题：只有统一的货币，没有财政联邦制的制约，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无法受到约束，随之金融纪律也就难以严守。所以，严守财务纪律根源于制度约束。

在反思金融危机、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归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的原则，也即要有严格的财务纪律，包括财政纪律、货币纪律和金融纪律三个方面。归根到底，家庭、企业和政府都

要有硬预算约束，那就是既不能超越当前的支付能力做事情，也不能超越未来的支付能力做承诺。

---

1. 在2011财新峰会上的发言。

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注]

（2013年10月31日）

我提三条建议。

第一，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从长期来看，一定是改革为发展服务，为发展创造条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调整经济运行机制，使它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目的是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从短期看，特别是近期来看，就不一样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推动这些改革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更需要有比较宽松的环境，同时也要给企业、政府改革的动力和激励。因此，在近期内，经济发展要为改革推进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在我看来，在近期，保改革措施顺利出台和到位要优先于保经济增长。这是与前几年不同的优先顺序。

这就引出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我的一个看法是不宜把增长速度定得太高，7%左右的预期增长速度就不低了。其实，6%—7%的年增长速度已经能够完成2020年的指标了。我的另一个看法是，给出一个增长速度的区间，比如7%—7.5%，比给出一个数字，比如7.5%，更合适。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的增长速度不能完全由中国自己的因素所决定，而是要受不可控的国际经济金融因素影响。这是与几年前不同的情况。在遇到不利的国际经济金融影响时，硬要保持达到某一个增长速度的话，付出的代价太大。当然，国际社会更希望中国经济的增速快一些，这对其他国家经济有利，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会太大。

第二，究竟是什么驱动增长？从短期来看，驱动增长的是需求因素，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需要注意的

是，这是基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个模型是短期考虑。从长期来看，驱动增长的根本因素不是需求，而是供给，具体地说，是资本量的增加，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是生产力的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依靠创新和创业带来的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组织方式、新商业模式。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基于供给的理论，不是基于需求的理论。尽管我们面临大规模产能过剩，似乎是需求可以驱动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

我们用行政的办法限制进入产能过剩的行业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想一想：如果一项新技术使得成本降低一半甚至更多，为什么不允许它进入呢？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无一不是在已有的旧技术为支撑的"产能过剩"下，开辟了新的技术，提高了效率。这正是熊彼特说的"创造性毁灭"的含义。

进一步说，创新和创业的支持关键是机制和激励，不是政府多给资金。而机制和激励中的关键，又是要给企业松绑，创造自由空间，不怕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出台的一些经济政策是在供给上做文章，方向是对的。比如在经济增长下滑时没有进行大规模需求刺激，这是对的。又比如大张旗鼓地减少行政审批，减少行政管制，包括上星期出台的取消公司注册最低资本限制的规定。这些都为创业减少成本，是增加供给的措施，是驱动增长的根本。所有这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都非常认可，但它们同时担心地方政府的反应，害怕地方政府又把中央政府减少的审批变相恢复。地方政府应该比中央政府更多地减少行政审批，为企业松绑。

第三，让市场起作用，让市场决定价格，让市场竞争制约企业。这就是让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减少价格扭曲。就是让竞争制约经济人的行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人的行为。这里说的价格，不仅是产品价格、要素价格，还有许多价格，比如教育价格、学费。不能一

说公益性，就无视价值规律。教育不能一概而论。有基础教育，也有非基础教育。有普通高等教育，也有职业教育。现在的就业市场中的结构问题严重。有些学费受管制是应该的，但是另一些就没有理由要限制。比如MBA这样的专业学位，没有理由以成本来作为制定学费的计算依据。再有医生的工资，也是要素价格。

---

1. 在李克强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发言。

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注)

（2013年12月3日）

我想谈一点与改革实施相关的问题。据我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经济方面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整体设想，就是市场、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新定位，那就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更好作用，以及企业所有制的多样性和平等性。二是提出了一个较全面、较清晰、较具体的“待办事项清单”。这个清单大量地吸收了各界多方面的建议，是问题导向的。仅经济体制部分就有六节，此外在社会体制部分中还有两节与经济密切相关，就是关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医药卫生改革。这样，就有了改革的战略。接下来需要的是“行动计划”。

这个行动计划不容易。《决定》要求在2020年结束之前，在关键领域取得决定性成果，只有7年时间，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行动计划就是设计如何以较低的成本、较小的风险、较快的速度实施这些改革。我想谈三个相关问题：（1）改革侧重点（某一时期）和改革顺序（整个时间段）的选取；（2）推动改革的激励措施；（3）风险预见和应对预案。

一、改革顺序与起始期的侧重点

第一年尤其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后来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会示意改革者的可信度（credibility）、执行力（capability），并建立改革势头和惯性（momentum）。因此，在齐头并进的同时，必须有标志性的改革事件在第一年也就是明年上半年推出。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回想20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那是1993年11月出台“50条”。1994年1月1日的两个标志性改革：汇率并轨、国税局和地税局分离。这两项改革的特点是：显示度高，前者对企业、居民，后者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改革力度较大。它成功地开启了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改革内容更多，更复杂。选取头一年改革的重点推进领域更为关键。我建议的是三件事：

第一，金融，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弹性与形成机制。原因在于：金融改革在前几年就一直在进行，贷款利率已经全面放开，存款利率事实上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不受管制。金融业的市场化水平和人才水平都是较高的，有很好的准备。金融改革在国内外都有很高显示度。利率市场化先做存款保险制度，汇率可先放宽浮动区间。另一个原因是金融业有潜在的风险，先行改革可以提早暴露隐患。

第二，财政，特别是预算管理制度和中央与地方事权重新划分。明年“两会”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考验。两会期间应该显示预算改革的初步力度，不然就错过一年，将会对改革伤害很大。制定一个更为详细的事权清单。对此，决议中有原则性的定义，但需要具体化为中央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地方事权。特别是重新划分有代表性的事权，比如社会保障是否可以变为中央事权，有利于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高调取消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不仅是中央的，更关键的是地方审批。这一改革是有显示度、涉及面广且操作性强的改革。与20年前不同，现在，有了一批法律。因此要区分行政法规和法律，前者可以立即开始清理，后者要尽快启动修改法律的程序。

二、推动改革和实施改革的激励

改革的推动要靠各方面力量。激励从哪里来?

第一，来自上面的激励：把推进改革作为考察干部的标准之一。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一种压力。与此同时，也要有正面激励：谁能成功推动改革谁就应该被提拔，而不是那些既不出事也无进展的干部。

第二，来自地区间竞争的激励：有些改革，比如废除行政审批，应该在各地区间有比较，有竞争。过去地区间攀比GDP，今后应该比政府职能转变。建议编制地区行政审批指数和市场进入负面清单指数，用以度量改革的力度和深度。这样，地区间的竞争可以提供改革的激励。

第三，政府与市场的相对激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浪潮中，一大批官员"下海"，因为市场比政府更有吸引力。过去这些年，出现了人才从市场向政府的逆向流动。减少政府权力和干部福利是推动向市场方向改革的激励。如果在未来几年我们看到官员大量下海，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数量大量减少，那就表明市场开始真正起决定性作用了。

三、风险预见和应对预案

改革有风险，除了自身的风险以外，改革也会有外部引起的风险，比如会被一些外部突发事件干扰。比如经济增速较大的变化（放慢或过热）、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国内局部金融危机以及非经济的突发因素。对此，应该有预案：哪些改革可以暂停，哪些可以放慢，哪些必须继续。

---

1. 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与顶层设计主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十三五”规划建议：培养创新型人才[注]

（2015年3月）

“十三五”规划的时间段到2020年。2020年除了要实现“翻两番”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创新型国家就是以创新为动力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只有这种发展模式才能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步入高收入的经济发展阶段。

创新的各种要素中，最稀缺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资本，而是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是那些有想象力、有创造力、能够改变现状的人。创新型人才的大量涌现是创新型国家的必要特征。这些人才既要靠引进，但主要是通过教育系统的培养、发掘、熏陶。教育是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渠道，虽然社会也是重要渠道。

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严重不适应创新型人才的产生。教育改革滞后，制约创新型人才的产生，也逐渐成为共识。当然，教育改革有多方面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但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应该把以教育改革促进培育创新型人才列入“十三五”规划，并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超越2020年。具体有如下六条建议：

第一，减少死记硬背，进一步改进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途径与方法。整体来说，中国教育的优势是，学生的基础知识较为扎实，对知识掌握的平均水平较高。这种优势的结果是模仿能力强，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强，并具有在边际上改进的能力。但是，我们获得这种优势的成本很高：它主要是通过学生在获取知识上的大量时间投入实现的。过多的时间投入不仅挤压了从事其他更有创造性的活动的时间，而且以“文科死记硬背、理科大量做题”的学习方式学习知识，严重限

制了人的思维的创造性。因此，必须改变知识获取和考核的方式。课程改革方面需要精简课程，只讲授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同时，还需要区分学校的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基本和核心知识的要求不能一样。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减少学生花在记忆知识上的时间，把时间集中在获取最基本的知识上。

第二，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等的发展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目前教育方式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结果是杰出人才少，怪异人才少，创新少，颠覆性创新更少。这里既有教育理念问题，也有社会环境问题。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中，教师把教育简化为知识传授，学生把学习简化为考试成绩。这种教育模式造成短期功利主义，是急功近利的做法。这种教育模式特别压制创新型人才的产生。学校应该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是训练学生思维的地方，是发现学生潜能的地方，是点燃学生梦想的地方。创新型人才产生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是要有宽松的学习环境，因此这应该是教育改革的重点。具体而言，就是要鼓励学生敢于提问题，善于提问题，敢于争辩，能够标新立异。教育改革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超越传统的知识传授。

第三，减少同质化现象，给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学生发展路径要多样化，要鼓励“个性发展”，特别要宽容“异类”（outliers）。历史上的创业者，特别是颠覆性创业者中多是“异类人”，比如曾经的“嬉皮士”（hippies）或是“业余爱好者”（hobbyists）。人天生就有很多差异，也有很多想象力。但是，我们的教育在后天把这些差异和想象力压缩了，由此出现了“同质化”。所以，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首要措施，还不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而是如何改进妨碍有创造力的人才“冒出来”的环境。要减少“同质化”，鼓励“个性发展”，容忍“异类”。

第四，改革学制，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学生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和研究生创业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引擎。创业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思想最为活跃，并且敢于冒险。这其中大学生和研究生又是中坚力量，他们现在大多是90后的学生。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不是要所有学生或大部分学生都去创业，创业的毕竟是少数。营造创业环境也不是要学生都去办公司。营造创业环境，主要是鼓励学生的创业精神，创造一种创业文化，减少创业学生的成本。比如应该建立学生休学制度，在休学期间保留学籍，之后想回到学校仍然可以获得学位。再比如应该开设创业课程和讲座，请有创业经历（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历）的人与学生分享。

第五，鼓励和支持创建三类高水平有特色的民办大学。创建多类型民办大学，探索多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目前的民办学校就业导向，集中在一些短期实用的学科。虽然这也需要，但是对培养创新型人才显得急功近利。应该推动创建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民办大学。以下三类大学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是文理学院。这一类学院不以研究为导向，也不偏重应用型学科，而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创新型人才，特别是产生颠覆性创新的人才，大都是介于“文”和“理”之间。乔布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理学院看上去不够应用，但是对培养学生跨学科思维、文理交叉思维很有意义。二是民办小型研究型大学。在美国有加州理工学院的例子。三是创业学院。由阿里巴巴创办的湖畔大学是一个创业学院，尽管目前这个“大学”没有学位授予权。以创业为导向的学院是一个全新尝试，值得探索。

第六，创造更加宽松的交流制度，建立更加开放的教育体系。在当前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时代，创新是“全球创新”，人才是“全球人才”。必须建立开放式的教育体系。美国的研究生中很大比例来自美国之外，而硅谷的创业者中很多是留学生移民。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之一是留学生移民。贝宝（PayPal）的六位创始人中四位是留学生移民。

SpaceX和特斯拉（Tesla）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是留学生移民。很难想象，如果美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这些留学生，美国是否还有这些创业企业。所以，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要大量吸收留学生，包括原来在国内，后来到国外留学，之后又回国来读书的学生。但目前的政策限制很多，比如中国籍学生在海外大学就读期间，不能来国内大学交换学习。应该尽快减少政策性限制，吸引各国留学生，包括国内出去的学生再回国就读，扩大潜在的创新型人才群体。

总之，创业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新思维、新举措、新突破，但体制改革是一个关键，特别是需要给地方和学校充分的自主权。建议“十三五”规划中把以教育改革促进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具体列出几条突破现有教育思路的方向性措施。

---

1. 国务院参事室建议报告。与谢维和合著。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要把激励搞对[注]

（2016年1月20日）

供给侧改革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三期叠加”判断的回应。供给侧改革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纠正经济中各种扭曲（包括结构性扭曲），二是以创新激发增长新动力，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改革正在成为共识，我今天想说一个进一步的观点：供给侧改革有一个根本，就是要把激励搞对。只有把激励搞对，才能纠正扭曲，才能激发新动力，才能提高生产率。

先说纠正扭曲。“三去一降一补”是纠正这种扭曲要达到的效果。纠正扭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方式，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市场方式，而后者就不能用行政命令，只能由企业自行决定，那么根本就是要把激励搞对。把宏观上的产能过多、库存过多、杠杆过高变为正确的微观行动，去该去的产能，减该减的库存，降该降的杠杆，非有正确的激励不可。刚才发言中提到石油企业不停产，可能是企业没有激励去这么做，尽管生产成本远高于市场价格。

再说激发增长新动力。新动力的基础是创新，而创新需要很强的激励。一方面，创新在技术上和市场上都会失败，创新也会面临制度、监管上的不确定性，所以非有很强的正激励不足以抵消风险，所以激励中必须包括风险溢价。另一方面，创新也要求政府、企业和社会有对失败的包容，对犯错误的宽容，对冒险的认可。

再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是指经济增长中在排除所有可度量的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力、资源等贡献之后额外的增长。最简单明了的例子就是改革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投入不变、人工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

农业产出大幅上升，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激励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民对产出有了安全可靠的剩余索取权之后，就有激励提高产出了。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激励机制。

以上是从供给侧改革要达到的三个目的来说明激励的根本性作用。下面再从供给侧相关主体来看如何把激励搞对。供给侧主要是由企业推动的。在谈到供给侧改革时，我们通常会想到降低生产成本，包括融资成本、劳动成本、投入品成本、税费负担等。这些固然重要，但我近期在企业家中调研时发现，当前企业家更关心的首先是产权安全、契约执行、公平竞争，这些因素远比生产成本更影响企业家的激励。研究也表明，比税收过高、贷款利率过高更阻碍企业家激励的因素是产权的不安全，契约执行中的任意性，以及竞争的不公平。这种情况不改变，即使生产成本降低了，也很难想象企业家有激励做出正确的决策。

企业家反映，今年1月5日，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以及主要业务厅局负责人一行登门拜访全国工商联，与企业家座谈沟通，是一个好的做法。在座谈会上，企业家们通过自己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安全感和稳定的预期是当前最重要的。同时，最高检的领导们也表示，唯有法治，能让非公企业家有安全感，唯有法治，能让非公企业家有稳定的预期。这些都说到了关键之处。有了安全感，有了稳定的预期，企业家们就有信心，具体的调整措施就能正确地推进，供给侧改革就能成功。

决定供给侧的另一个主体是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他们的激励同样重要。对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既要有正激励，也要有负激励，也就是既要有奖，也要有罚。乱作为是因为没有负激励，做错了不受惩罚。不作为是因为没有正激励，做好了没有奖励。不敢作为是因为正激励不足以抵消负激励。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

反应，正确激励导致正确行为，错误激励导致错误行为。这对企业家如此，对政府官员也是如此。

比较中国经济改革前后的不同，我看到两条基本经验：一是让市场起作用，二是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是指用看不见的手平衡供给与需求，达到资源有效配置。把激励搞对是让供给更加有动力，更加有效率。经验表明，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就要受到市场的惩罚；类似的，如果激励扭曲，经济发展也要付出代价。

最后，我想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国际和国内压力，相比之下，国内因素更为主要。在国内因素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供给侧改革更为重要。而在供给侧改革中，根本是要把激励搞对。

---

1. 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的发言。

读“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2016年3月8日）

过去一年，我有幸作为发改委“十三五”规划专家组成员参加了若干次“纲要”意见征求会，经历了这个纲要的演化过程。读这份草案的最终版本，我谈三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这个规划的特殊意义。

中国从1953年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63—1965年调整期没有编制，在“十三五”规划之前有12个五年计划，规划期有60年，是一个甲子。国家五年计划是苏联发明的，从1928年开始编制。苏联一共编了12个五年计划，苏联解体后就没有了。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主要大国经济中唯一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国家，受到国际上很大的关注。

这个规划的特殊意义在于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所谓经济发展新常态，我的理解就是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这个发展阶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不仅仅是这五年的，可能要管二三十年。发展主线是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长期的。“十三五”规划是第一个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重要阶段性目标的纲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应于需求方管理的。总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的、应对周期性经济波动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中长期的，是发展动力问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结构性改革指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比如自由贸易、劳动力市场效率、基础设施、金融市

场、创新等。降低成本，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比如减税降费）和交易成本。

我想提出，应该强调结构性改革还不等于结构调整。我们习惯于结构调整的概念，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传统。计划经济强调有计划按比例，比例失调就要调整。比如投资与消费比例，制造业与服务业比例，实体经济与金融比例等。这些都只是现象和结果，不是根源。我们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来调结构。根本问题是要纠正市场扭曲，扭曲来自过度管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发企业活力，结构调整的结果应该是水到渠成。

第二，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的解读。

对指标关注是自然的，特别是集中在GDP增速指标。这需要认真解读。专栏2中给出的主要发展指标分“预期性”和“约束性”，25个指标中预期性指标12个，约束性指标13个。GDP增长速度大于6.5%是一个预期性指标，不是约束性指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和所有资源环境指标是约束性的。

GDP增长速度大于6.5%是根据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倒推出来的。2010年中国GDP增速是10.6%。目前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别的不说，单说国际经济环境就与五年前非常不同。当时，人们对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非常有信心，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增长也很有期待。过去这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今年卖得非常好的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是戈登（Robert Gordon）的《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这本书记录了从1870年至2015年145年间的经济增长，并预测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将进入非常低的增速阶段，不是通常认为的3%，而是2%以下。欧洲不如美国，日本不如欧洲。所以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有利。2015年我们的指标都达到了，只有进出口都是下降的。这是一年前没有预

计到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外贸，因为中国已经深刻融入了全球经济。

所以，把GDP增长定位于预期性指标是有道理的。同时，在现阶段，确定一个预期性的GDP增速指标是必要的，可以聚焦发展目标，凝聚信心。此外，还要看大局，看大趋势。还需要注意的是，GDP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并不是一回事，后者除了GDP因素外，还有居民和企业、政府之间的收入划分，这与民生更直接相关，应该受到更大关注。

第三，创新发展作为单独一篇，共五章，是这个规划的亮点。

在这一篇中，既讲了科技创新，又讲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讲了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第一次提出包容非共识创新，也提到增加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比例。

我想着重谈第九章。用专门一章讲人才发展战略，这也是第一次。在创新的各种要素中，最稀缺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资本，而是创新型人才。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是极其重要的。规划还列举了人才战略的三个具体措施：一是培养，二是引进，三是有效配置。

一是人才培养。规划要求改革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还特别提出了要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教育界有争论，创新型人才到底能不能培养出来？有一点共识，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人天生就有很多创造性，不过我们的后天环境把人的差异性压缩了，所以才出现了人才的“同质化”。所以，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首要措施，是如何改进妨碍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冒出来”的环境。

二是人才引进。“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快完善高效便捷的海外人才来华工作、出入境、居留管理服务”。在重大人才工程中，列举“千人计划”。这是2008年开始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最初计划是1000人，目前已经几千人。他们在创新创业各领域已经做出了不小成绩，有的“千人”当了院士，有的担任高校、科研院所的主要负责人，还有的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创业企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次“十三五”规划中把千人的规模扩大到1万人。这不仅是肯定“千人计划”，而且还要进一步发展。

我们对美国硅谷的创新非常赞赏。硅谷靠的是全球的人才，不仅是美国本土的人才，还有大量中国人、印度人、欧洲人、拉美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旧金山湾区有好几所法语学校，就是服务于来自法国的创业者。根据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介绍，在硅谷工作的仅清华大学毕业生就有1万多人，北大毕业生还有5000多人。所以，我们要用更大的力度、更宽松的政策来引进人才。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对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不进则退。

三是人才优化配置。有了人才，还要把人才配置到最有成效的地方和岗位。“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建立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包括横向和纵向流动，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的单位和不同地区之间有序自由流动。这方面的挑战更大。因为这就涉及经济学家说的“人才市场”的运作。它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类，但属于高端劳动力市场。区别在于：普通劳动力市场是不跨国的，而人才市场，特别是高端人才市场，是国际化、全球化的。所以要用全球视野、全球竞争的观念来落实人才配置问题。

最后我想说：“十三五”规划，连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过去三年中两个最重要的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文件。方向已经明确，关键是要落实，要靠人干出来。

---

1. 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36组和37组联组讨论上的发言。

产权安全是一件大事[注]

（2016年7月8日）

刚才多位专家谈到民间投资下降的问题。其实这里涉及一个更大、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问题，其中重要的是产权安全性问题。

总书记在今年政协联组会上关于新型政商关系中“亲”和“清”的讲话，是一个战略定位，得到了企业家们的热烈拥护。

根据我们从多个渠道、各类企业家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发现他们目前最为关心的是产权安全性问题。产权安全性就是企业家对投资回报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监管环境等有稳定的预期。产权安全性也包括企业家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推动者受到社会的尊重、国家的保护。因此，出台产权保护法律和政策就很重要。

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是靠人干出来的，人的激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源泉。只要产权安全性得到保障，中国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无穷的，信心就自然有了。所以，产权安全是一件大事。

---

1. 在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注]

（2017年3月6日）

稳步推进“去杠杆”不会在短期内剧烈调整

《华尔街日报》记者：我们知道，今年中国政府特别强调经济稳定，与此同时也将会加大措施减少经济中的债务，但是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是冲突的。比如说那些强有力的去杠杆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影响稳定。因此，请问钱委员，作为智囊，您如何向中央机构尤其是央行提出建议，如何平衡经济稳增长与去杠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钱颖一：从经济学上来说，在短期，稳增长和去杠杆之间会有一定的张力。首先，昨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立了今年非常重要的战略导向，就是稳中有进，所以稳定是第一重要的。同时，去杠杆是“三去一降一补”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所以在政府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时候，在去杠杆这方面，首先会稳步推进，不会在短期内剧烈调整。第二，《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对稳定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第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叫作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个政策对稳增长也非常重要。

我再补充一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很多来自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那里的去杠杆，很重要的是消费者杠杆。如果消费者杠杆去得很大、很快，确实对需求方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你提出这个问题的由来。刚才说的政策是指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些是指宏观政策。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杠杆高的性质

与不少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杠杆主要集中在企业，而企业去杠杆与消费者去杠杆有很大不同。比如，企业去杠杆可以用的一个工具是债转股，它可以在去杠杆的同时并不巨大地减少需求，这跟消费者的比如住房贷款去杠杆导致需求减少有着很大不同。在这点上，我们看到国外经验教训的时候，往往容易直接类比到中国的企业。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们知道，实体经济发展主要靠制造业，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成本问题是困扰一些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的难题。去年全国政协就实体经济降成本问题进行了监督性调研。请问钱委员，调研结果如何？发现了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下一步该如何发力呢？

钱颖一：关于降成本，政协在过去一年组织了多次调研，到广西、重庆做了实地调研，也对其他六个省市做了书面调研，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税费成本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成本，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调研，也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在此之前，关于降成本有很多报道，也有很多建议。我在这里想强调其中一个方面：除了我们容易看到的生产经营性成本，包括税费成本之外，还有一部分对企业运营非常重要的成本，就是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那些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不直接取决于价格参数，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它叫作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它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是可以度量，而且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里举几个例子。一是我们对产权保护制度的落实极其关注。去年11月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是以最高形式的文件发布的一个顶层设计。它第一次提出，所有产权形式都要全面保护、平等保护、依法保护，并且有很多具体的意见。比如

说，对以往产生的与产权相关的历史案件一定要解决，这对企业家们的产权安全预期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再比如，强调政府一定要守信践诺，特别指出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对创新经济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这些都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方面。

二是要素市场。要素市场中我们关注的是要素价格，这对企业的生产成本有直接影响。不过要素市场中还有很重要的方面是要素获取合同等方面的交易成本。比如说劳动力，不仅仅工资是成本，“五险一金”也是成本，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实施、调整的成本，所有这些都会产生交易成本。劳动力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如何有效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我们还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所以在这方面，不仅仅是价格问题、工资问题，也不仅仅是“五险一金”问题，也和交易成本相关。特别是现在工资上涨，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下降，完全可以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改变。再比如获得资本，利率是成本，但是信贷市场的运作、资本市场的运作，就是制度问题，降低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同样是企业非常渴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融资贵是价格问题，但是融资难就是交易成本问题。

在调研中有很多建议，我想强调一条，就是除了和价格相关的显性成本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人口红利，我们要转变过去的发展模式，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请问钱委员，您既是经济学家，也在从事高校的相关工作，您觉得中国如何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钱颖一：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必然的，同时也是一种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供给侧的主要推动力就在于能够持续不断地释放人才红利。在“十三五”规划中专门有一章讲人才发展战略，确立了人才发展的整体框架，这是有深刻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11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我们也看到，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另一个证据是工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在过去几年都超过了GDP增长速度，这是一个现实。

但是，我们也要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国人才红利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2015年，我国高校在校人数是2700万，现在每年高校本科专科录取是700多万。高校的所有在学学生，包括在职学生，有3600多万。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全球最高的。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0%。有意思的是，这些快速增长是在过去十几年间发生的，因为在1998年时，高校每年招生才100万。这就意味着在目前阶段，我们劳动力中的教育水平还不是那么高，但是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十几年会有非常快速的提高。因此从数量上来讲，我们的人才潜力是非常高的。但是光有数量还不行，还要有质量，这就对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说到人才红利时往往有一个误解，就是通常我们说人才的时候，往往集中于说杰出人才或者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才不仅仅是杰出人才，在供给侧增长的推动力中，人才进入增长有两种方式：一是人力资本，指的是全社会中普遍的教育水平；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由于人的创造力而实现的技术进步等。这两个方面，人力资本也好，全要素生产率也好，都是由人才推动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人才红利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需要在拔尖创新人才、人的创造性方面大力提高；另一方面，全社会能够大量培养各种层次的有技能的人，这是人力资本的部分。

说到底，要想实现人才红利，非常重要的还是教育，这就是教育受到全社会关注的原因所在。人才红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重要区别在于，物质资本投入马上可以见效，但人力资本不是，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水平的今天，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明天，它要有一个时间过程。但这更进一步说明，为了实现人才红利，提高今天的教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

1.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一次记者会上的问答。

第二篇 制度与转折

第七章 转折中的过渡性制度

企业的政府所有制：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注]

（1998年7月17日）

我在这里探讨一个转轨经济学的问题。在国外，一方面不少人对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历很感兴趣，另一方面又对这方面的研究很欠缺，这是件很遗憾的事。中国的转轨是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这么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却没有现成的理论解释。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对比较完善的经济制度有很好的描述和研究，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也有很多研究，但对如何从一种经济制度转轨到另一种经济制度，就缺乏很好的理论。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有许多非常丰富的经济现象值得探讨，经济理论值得开创。我的兴趣是希望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中国在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现象。

中国的转轨过程有很多方面，我在此谈一个方面，就是关于企业，特别是企业所有制。企业的所有制和控制权，是热门话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还是有意义的。

一、三种视角看企业的政府所有制

一个企业，所有者和控制者应该是政府还是私人，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按照传统的“市场失灵”思路，在一些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有其好处，因为政府被认为会使社会效益最大化。比如，政府可以纠正一个企业的垄断行为，如果让私人

控制企业，私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就会有冲突。又比如，当企业的经济活动有外部性时（比如排污行为），企业由私人运作，虽然利润高但社会效益低。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控制企业可以纠正市场失灵。原因在于政府是代表社会利益的，不追求利润目标。所以某些行业的一些企业由政府控制，社会效益就会好。这是一种传统的、教科书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最近一二十年比较流行，它认为政府都是腐败的，政府控制的企业都是坏的。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观点还认为，危机是政府参与了企业的结果，是“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后果。所有权应该交给私人，私有制给人以激励，市场可以把资产配置到最优。哪怕有一些垄断问题，外部性问题，也比把企业交给政府要好。政府的官员都是政客、官僚，他们的目标函数不是资产增值，而是其他目的，直接受贿只是一个例子。

这两种观点的对比很鲜明：根据第一种观点，政府在某些行业对某些企业的控制是应该的，而第二种观点说不应该，应该尽快私有化。但这两种观点包含了一些隐含的假定，对一些像我们这样的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制度来说，并不切实际。先来看第一种观点。政府真的就是为了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吗？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的。而且第一种观点只是讨论市场中的垄断问题或外部性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中更为严重的制度失灵因素。第二种观点假定了某种理想的市场制度环境。这种环境，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西欧，是经过了一二百年才形成的。比如，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制约，不仅有民主，还有法治，政府部门间的分权制衡，清廉和公正的法庭，等等。政府也不能随便增税，需要经过复杂的议会程序。所以，这些经济有一整套支持市场运作并保护产权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的确很难看到政府控制企业的好处。但如果用基于这类制度环境的观点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转轨国家，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很多制度安排。

关于政府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问题，我想提出第三种观点，它基于中国过去20年的实践，就是“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观点。这一观点包括了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说，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制度的环境中（包括法治、对政府的约束、对产权的保护等），政府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是没有优势的，而有相当多的劣势。

第二层含义是说，在转轨期间很多方面的制度相当不完善，比如法治建设、财产保护、税收制度、金融监管等。而这种不完善不会一夜之间改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原因很复杂，有的是政治因素，因为某些利益集团需要补偿，但又不能一下子补偿；有的是社会因素，比如人们的认识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调整。因此，制度环境的完善需要一段时间。给定这样的前提，我们就要具体分析在何种情况下，政府以何种方式所有和控制企业有它的“次优”（second best）道理。这里的关键是分析这个次优逻辑，因为在分析出了次优逻辑和机制之后，我们就会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他变量的变化，包括制度环境的变化，这一次优的道理也会随之消失，并不会永久停留在那里。在转轨经济学中，你不能假定昨天是1978年，明天就变成2020年。制度不会一下子就变得完善，变化需要过程。研究这一过程是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有别于其他经济学领域的方面。

第三层含义是说，既然我们知道政府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最多是次优，它并不是一种从效率角度上讲最理想的安排，这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机制容易使政府从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中撤出，比如使国有企业变成股份企业、民营企业？相反，什么样的机制会容易导致改革走不下去，陷在半路？

本文就是要详细分析这三层道理。在中国经济中，企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问题。在这三层中，主要

是后面两层，即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明政府参与企业或推迟私有化具有次优的道理？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诱导政府撤出对企业的控制？在分析这三个问题之前，先简要概述一下已有的企业所有权理论。

二、已有的所有权理论

国外有关于所有权的研究，早期的像科斯（Ronald H.Coase）、阿尔钦（Armen A.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威廉姆森（Olivel E.Williamson）等，大家已很熟悉。20世纪70年代后又往前发展了很多，形成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研究完备合同（complete contract）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研究集中在如何用合同的不同形式把信息揭示出来和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方面已有相当多的研究，特别是把它应用于企业的“委托一代理”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另一条主线形成，这就是研究不完备合同（incomplete contract）下的激励问题，主要代表有哈特（Oliver Hart）和穆尔（John Moore）。哈特有一本书，《企业、合同和财务结构》，写得比较通俗易懂，概括了他在这方面的看法，中译本马上就要出版。

不完备合同理论的出发点是假定合同是不完备的。任何做实际工作的人都知道合同不可能是完备的，很多情况下都会争吵不休。由于合同不完备，就引出来了所谓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问题。剩余控制权就是合同没说清的地方谁来做决定的权力。谁有控制权谁就来做决定。如果合同都写清楚了，这个意义下的所有权就没有意义了。这种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所有权与传统的用剩余收入定义所有权就不太一样。按照这一框架，企业所有权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剩余控制权，而控制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合同不完备。从这里就引出了有意思的分析角度。控制权（control rights）实际上是一种权力（power）。这就从通常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问题扩展到研究权力配

置问题。这十几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应用到非常多的领域，比如公司金融，甚至政治经济学。从合同不完备这个基本的假定出发，即使没有信息不对称问题，照样存在所有权配置问题。控制权会给控制者带来很多好处，这些好处可能不反映在工资、期权那种能写出来的收益上。每个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清楚，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最大收益是那些看不见的收益：对车子的使用，对房子的支配，可以送亲属去国外，可以改动账目从中给自己带来很多看不见的好处。谁有控制权谁就能较容易地得到这些好处。

所以，不完备合同的分析框架确实使有关所有权的分析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不觉得这是对完备合同分析的一种替代，因为这里面分析的问题不完全一样。在完备合同里，因为有关合同不完备时出现的问题被假定掉了，使得它可以集中地探讨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什么样的信息好、什么样的信息不好这样的问题。而在合同不完备的框架下，事后重新讨价还价造成的成本收益问题便是分析的中心。虽然最初的研究是诸如锁定（lock-in）这样的问题，但是文献发展到现在，已经跳出了这些问题。比如，其中的一个应用是研究债权和股权的差别。通常人们看到的是收益形式上的差别，即前者是固定的利息收入，后者是剩余收入。但从控制权角度看，两者又有另外的差别。就是说，在企业健康的时候，控制权在股东手里；一旦破产了，控制权就转移到债权人手里。

我的兴趣是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企业所有制和控制权问题。我觉得，这两条主线都非常有用。在转轨过程中，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很多合同更不完备。首先，在发达国家能写得很详细的合同，在我们转轨经济中就不会写得详细，因为人们还没有经验。第二，在发达国家有一个好的执法机构执行合同，因为那里有一套法治体系，政府是第三者。这就不是我们这里的现实情况。事实上，转轨本身就是从原来没有法治的状态，转向有法治的状态。因此，我们在多数情况下就不能假定政府会公正地裁判经济合同。我们通常说，政府不是一个第三

者而是一个经济的参与者。至少在我们还未完成转轨过程之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如果是这样，你对已签署的合同，能相信它会完全被执行吗？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完全被执行的。所以，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很多激励问题在成熟的经济中可以通过完备合同解决，但在转轨过程中则不会，因为基本的制度不一样。这就说明，不完备合同这一分析工具对于我们研究转轨时期的企业是非常有用的，运用这样一些分析工具来重新看所有制问题，会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三、政府拥有和控制企业的不利因素

在制度环境完善的条件下，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都很难说明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所有和控制有任何优势。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是信息问题。哈耶克的基本想法是，信息是分散在全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社会中的所有信息，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信息。相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利用权力分散的决策过程而充分利用掌握在每个人手中的信息。计划经济则试图把信息集中在某一个部门，然后做出决策，因而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这是哈耶克1945年的论文中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

但是，哈耶克只是比较市场与中央计划，并没有比较企业的国有与私有。政府拥有企业是否比私人拥有企业具有信息优势？考虑一个对等情况：国家作为一个所有者，聘用一个经理来经营国有企业，而一个私人老板也聘用一个经理。在两种情况下，所有权和经营权或控制权都是分离的，所有者都不可能有完全的信息，但谁可能有更好一点的信息呢？我们比较难说明政府有什么优势。因为任何政府可能有的监督经理的方式，一个私人老板也会有，还可能更多。为什么可能更多呢？这是因为如果企业全部是国有独资，那么信息监督来源只是国家一家。但是如果所有权是分散的，比如说一部分股份公开上市，那么就有很多投资主体在市场上对它进行监督、评价。市场上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以及评价公司就是靠搜集、传播这种信息为职业的。它

们有激励这样做，是因为企业的所有权是可以买卖的。有了产权交换之后，才可能出让信息，因为人们真的是在用钱买东西，不然只是对它做一个评价，没人知道这个评价是对的。如果国家垄断了一个企业的所有权，这种信息来源就少了。

第二个方面是政府行为的目标问题。我们不能假定政府永远只有政治目标。但是我们可以假定政府的目标不是纯经济的。比如，当银行是政府所有时，政府可以让银行接受退役军人。而私人的目标不可能是为了接纳退伍军人，他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对我有用。但是政府确实有安置退役军人的职责。军人是为了保卫国家这个社会目标，对军人承诺退伍后安排就业，也是一份合同，无可厚非。这并不是说政府不可以干预私有企业，当然可以。但是当政府拥有了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它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低成本地干预企业。由于政府不是纯经济的目标，所以相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它的很多决策从经济效益角度讲就有更多的扭曲。这并不是说政府是非理性的，而是就它的非经济目标来说，它是理性的。如果我们把经济效率作为主要的标准，政府行为的目标常常直接导致政府拥有企业没有优势。

第三个方面是政府的可信承诺问题（credible commitment）。政府不同于自然人和其他机构，是因为它的权力很大。这个权力大，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权力大了以后，可以做很多事。也正因为如此，事先承诺不做某些事，事后就变得不可信。比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应该采用事先固定的“规则”（rule），而不应使用事后“随意决策”（discretion）。与此相关的是中央银行的行长任期应该特别长，不受政府换届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希望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使得政府承诺的稳定金融的政策变得非常可信，不因一时的经济低迷而做出一些不利于长期经济稳定的决定。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本原理，要想使承诺变得可信，应该增加交易成本，使政策变化的成本上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似乎有悖直觉的原理。世界银行召开过一个研讨会，讨论制度在项目评估中的作用，主持人在这次研讨会的开场白中说：“我们最近从制度经济学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要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后来我评论说：“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当可信承诺是主要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增加信息不对称，增加交易成本。这是为了保证当时所承诺的过后不改变。在转轨经济中有两大现象与承诺问题有关：一个是软预算约束问题；一个是随意增税、乱收费问题。事先说“你要亏损，我肯定不补”；事后发现，问题出来了，还是非常理性地去补。事先说好了，“我保证什么税也不加，也不乱收费”；事后看到你的利润多了，又变了政策。这两种情况都会扭曲人的激励。权力越大，控制的资源越多，往往不容易做出可信承诺。比如当政府控制中央银行时，当它看到这么多企业破产，就想办法救助它们，如果没有钱，就可以印钞票。如果另外一个政府不控制中央银行（比如地方政府），也不控制这么多资产，那么它就无力救助。所以权力大在某种程度上是负担而不是资产。

最后，即使前面的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也还有一个政府负担过重问题（overload）。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应做那些私人部门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公司都有它的“核心强项”（core competence）。政府的核心强项应是诸如宏观稳定、执行合同和法律、提供公共品等。如果再让它去管企业，必然会走向报酬递减。即使没有其他问题，庞大政府的内部管理也是问题。

从以上这四个方面来看（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很多方面），政府的信息问题、目标函数问题、可信承诺问题以及官僚体系问题，都使得政府拥有和控制企业的成本太大。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同意，作为长远目标，可能除了一些极少数的特殊部门外，政府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在经济意义上并无优势。

四、转轨期间政府拥有和控制企业的次优原因

中国的企业私有化开始得较晚，只是在1994年以后，国有小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才大规模开始，而大型国有企业还在探索股份制。到90年代中期，纯粹私有企业在工业里不超过20%，对经济增长起主力作用的企业并不是私有企业，而是那些由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产权不太清楚、不太规范的集体企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政府所有或控制的企业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包括合资和股份制公司中国家占大头的企业。

有什么样的理论能说明这种情况呢？我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制度环境离理想状态还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非常规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有一定的“次优”道理。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期间，不仅仅市场制度，而且政府体制，都是不完善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十年、二十年内，政府和市场的制度都将不停地演变。因此，制度失灵，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方面，就使得非常规形式的企业的政府所有和控制有一定道理。这只是一个基本原理，重要的是研究其中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我下面给出五种机制。

第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没有很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因此产权是不安全的。产权的不安全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人之间，一方会侵犯另一方的权益；另一种是政府侵犯经济人权益，比如它可以毁坏自己的承诺而乱收费。在转轨期间，政府侵权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政府的权力很大却对它缺乏有效的制约。看一看我国的乡镇集体企业。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人说得很清楚，我们太“私”了，不够“红”，有风吹草动，总是我们先有麻烦。而乡镇集体企业，虽然激励比私有企业差，但是安全性更高。在中国，“太私”和“太红”都不太好，一边太不安全，另一边激励太差。我在一篇文章中，试图把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做成模型进行仔细分析。如果我们不能假定产权是安全的，也不能假定政府有可信的承诺，那么某级（或某部门）政府可以做到一些个人不能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可以提供一种安全的保护。这不是最优安排，而是一种次优安排。因为在法治比较好的情况下，

对政府的这种作用没有需求，而且政府干预还有成本。在中国的这个特殊阶段，很多看起来不规范的东西，却有一定生命力，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发挥作用。

第二，由于缺乏规范的税收制度，政府用对企业的直接控制作为替代。我们都知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税收体系必须大改造。在计划体制下，国家的所有税收都集中在国有部门，通过把投入品价格定得非常低，工业品价格定得很高，从工业部门获取利润。而市场经济是分散的、竞争的，需要一套新的符合市场规律的税收制度。而这套制度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的。当政府对企业有控制权的时候，就比收私有企业的税要容易。当政府没有控制权时，企业就容易做假账。当政府有控制权时，企业也可以做假账，但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政府可以开除经理。我们对中国的乡镇企业做了实证研究，发现一个省的乡镇集体企业相对于乡镇私营企业的比例与国家和乡村政府从该省收到的税费成正相关。这就说明，政府所有制和控制权与政府能拿到多少是正相关的。我们知道，乡镇政府很重要的财政来源是乡镇集体企业。无锡的乡镇集体企业多，乡镇财政比较好；而温州的私有企业多，税收的比例相对比较少。这可以从不完备合同来理解。乡镇政府对集体企业有了控制权之后，它对集体企业账目的了解就要多于对私有企业账目的了解，因为控制权导致权力，而权力导致信息。不完备合同理论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推出来信息多少是内生的，是由产权安排导致的。政府把产权给到私人手里，就失去了可以随时查账的权力。

第三，国有企业推迟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社会保障机制。这与目标函数和控制权有关。如果政府拥有企业，它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多雇些人，什么时候少雇些人，因为它是最终的所有者。而政府的目标函数里包括了解雇工人可能造成骚乱的社会成本，这些外部性问题政府要考虑。但民营企业家不太关注这些外部性带来的成本，只要工人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贡献，就会解雇。如果有很好的社

会保障机制，这是有效率的。但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由于私人纯粹追求利润的目标，从社会角度看，可能造成过多的解雇工人。如果大量解雇工人对社会造成不安定，从而导致对私人经济发展不利，那么推迟私有化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好处。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论只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才成立。

第四，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在发达国家，公司治理需要一整套法律的支持，比如对小股东的保护，因为51%的投票结果可以不考虑另外49%的利益。所以要有一套法律规定，到底小股东有多少权利，到底有多少信息必须披露出来，股东会规定有多少人参加，等等，投资者才愿意投钱。否则，就是内部人或大股东控制了。没有一套法律机制，公司的经理便拥有实际控制权，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很难撤换经理；二是很难吸收外面的融资，因为投资者怕被坑。事实上，有法律并不难，难的是执法，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的转轨经济国家，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未必会有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是推迟私有化的一个原因。公司治理结构的另一问题是股权过于分散，如果投资者都很小，就存在搭便车的问题。这是因为一个企业的决策对于企业所有股东来说是公共品，任何个人不会有精力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监督企业决策。所以公司治理中往往需要较大的投资者。大的投资者无非两种，外资和内资。如果以外资为主，容易产生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这牵涉国与国之间的利益问题。而国内出现大投资者需要一段时间，并不是马上就有的。政府作为一个大投资者，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它可以减少这种分散投资者带来的搭便车。

第五，特殊行业监管机制问题。比如银行业，它跟一般的制造业不同。即使在发达国家，对金融业都有很强的监管。银行的投资者都是一些小的存款者。他们跟一般的投资者不一样，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把钱取出来。这就使银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需要政府采取一种监管机制。在这种监管机制有效之前，政府要想对银行有

所控制，往往采取所有权控制的方式。因为所有权引出任命权。国家拥有“工”、“农”、“中”、“建”，因此政府可以任命、解雇它们的行长。虽然这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办法，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机制。还有一些特殊行业，比如国防工业。在美国，国防订货都是承包给私人企业的，因为它有一套程序和对信息控制的办法，所以既可以发挥私人企业在制造国防产品上的积极性和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又确保国家机密不泄露出去。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国防工业还能私有化？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一旦私有化了，信息的流通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私有化。

以上五个方面都说明了转轨期间的特殊制度环境使得政府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有次优的道理。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写出一个模型，把推理变得比较严格，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机制可以有功效，而这些原本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它们的局限性，因为这些机制的运作都是有条件的，一旦这些假定不成立，情况就会改变。

五、政府撤出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的机制

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张静态照片，在目前的环境中，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有一定道理。这是我们理解世界很重要的一步，但是不完全。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4年以后，我国的改革逐步开始向比较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私有化进程加快，特别是中小企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促使政府脱离对企业的控制和所有？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改革看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很多非常规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发挥了很大的、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中这些非常规的过渡性制度又转轨到比较规范且效率更高的常规制度安排。目前，后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我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是整体经济组织结构的灵活性问题。关于组织结构的灵活性，文献上有一些研究，主要是在企业层次，也有一些是在经济体层次。所谓结构灵活性，是说改革起来比较容易。首先我们用层级制（hierarchies）和多元制（polyarchies）做比较。在层级制下，做成一件事须很多人批准，任何一层都有否决权；而在多元制下，其中任何一个部门批准就能够做成一件事。这是两种很不同的组织结构。比方说，你要出国。在一种体制下，你出国要盖两个章，一个是公安局，一个是社科院，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否决。在另一种制度下，你只要一个章，或者是北京市的章，或者是上海市的章，任何一个部门都有批准权。这两种制度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后者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这边申请不到还可以跑到那边去申请。经济改革的原理是一样的。企业改制问题，如果每一个县都有批准权，即使在这个县推不动，在另一个县就可能推得动。所以，组织结构不一样导致经济中的灵活性不一样。

与此相关的是组织结构上的U型（unitary form）和M型（multi-divisional form）的区别。前者按“条条”原理组织，后者按“块块”原理组织。按条条原理组织时，协调能力较好，但要做出改变就很难，因为有一环不改，全都不能改。而按块块原理组织时，每一块自成体系，比如特区。虽然块块之间的协调很难，但它有一种灵活性，因为每一块可以自己行动而不影响其他块。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结构。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从一个地区先推动的。而俄罗斯就不同，因为它的经济整体上是U型的组织结构，是按条条来控制的。先搞一个条条是没有用的，必须所有条条都要动，所以非常困难。

国家体制上有联邦制（federalism）与单一制（unitary state）的差别，在财政体制上则有财政联邦制与财政统收统支制的区别。在财政联邦制下，地区财政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地区性试验、地区性的制度创新，有财政上的可能性和动力，不需要什么事都经过中央。日本政

府的经济组织方式相当中央集权，特别是大藏省（现改名为财务省）的权力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明明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很难改变，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组织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候就较少灵活性。

第二个方面是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激励的改变可以从两条来看。第一条是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变硬，这在1994年以后较为明显。这有多种原因，比如紧的货币政策，银行系统的收权，《预算法》的实施，新的税收制度等。非常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总是指责银行乱贷款，现在却指责银行“惜贷”。过去是国有企业从来不开除工人，现在是担心下岗人数太多。预算约束变硬对政府激励的改变很重要。如果政府可以期望对银行施加压力或从财政渠道拿到钱，它就没有出售企业或对企业改制的动力。

第二条是市场竞争的增加。现在听到很多的是“恶性竞争”、“不公平竞争”这类词。但这本身说明竞争在增加。竞争使租金下降。特别是当企业大面积亏损时，就不再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相反，它们已经变成了包袱。一旦变成包袱，政府的激励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把包袱甩掉。包袱越重，甩掉的动力就越大。而对一些利润特别丰厚的，比如电信，就没有人愿意放手。

因此，从一种次优状态转向最优状态，比如政府从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中撤出，并非不可能，它取决于政府的激励和组织结构的灵活性。这是研究内生制度变迁问题中非常有意思的课题，还有很多研究工作值得去做。

六、总结：作为一种过渡制度的企业的政府所有和控制

中国的转轨经历非常有意思，素材也非常丰富。作为一种实证研究，在企业所有制和控制权问题上，有一些重要现象需要解释。在中国，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府介入的非私人企业会有这样

大的正面作用？而私有企业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小？私有化的进程为何比较慢？为何在企业改制中，小企业推行得快，而大企业很慢？我们需要用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既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与观察到的现实相对应。研究要得到认可，就必须在已有的经济学框架里面进行。这样主流经济学才会明白转轨经济的模型与通常的标准模型之间到底有哪些不同。这里重要的区别是制度环境不同。因此，企业的政府所有和控制就有不同的机制和含义。我们不能用静态的观点来看问题，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这种机制最好被看作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

1. 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24期双周研讨会上的演讲。原载于《经济导刊》2002年第5期。

转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2002年6月28日）

转轨经济学研究在转轨经济中发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是已有的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的。比如说像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中出现的产出大衰退，以及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但是至少前者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还不能完全解释。罗兰（Gérald Roland）教授上午侧重讲的是东欧的情况，就是如何解释我们没有想象到的生产大衰退以及由此伴随的很多情况。今天下午我想讲中国，跟他上午讲的是相辅相成的。

今天，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历提出了哪些新问题；第二是提出关于制度研究的另一种视角；第三是如何理解转轨中的产权和所有制；第四是如何理解转轨中的政府行为。

一、中国经历提出的新问题

首先，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我们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对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认识不充分，相反，往往是在外面的人看得更清楚一点。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1978年中国是贫穷的计划经济。23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虽然我们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但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在过去20多年中，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增长中有2/3来自中国。中国有13亿人口，而过去说的“东亚奇迹”的8个高增长经济体，包括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加起来大概4亿人口，我们的人口是他们的3倍多。虽然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经

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一点我觉得在世界经济学家中，除了有极端偏见的人以外，都这么认为。

第二，中国的改革经历提出了什么新问题呢？多数经济学家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认为转轨成功有一个公式，或者说一个药方，即四个化——政治民主化、宏观稳定化、市场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四个化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要你把这四个化做好了，经济就发展了。更深入地思考的经济学家不太会相信这是充分条件，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会相信它们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它们未必就行，但是没有它们是不行的。政治不民主，怎么可能推动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没有宏观稳定，经济怎么能发展？市场是扭曲的，怎么可能有持续增长？企业不是私有的，怎么可能搞好？

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这四个化的必要性。不错，中国在宏观稳定化上，一直做得不错，除了比较短暂的宏观不稳定。但是中国的市场自由化，按照西方标准来衡量，一是进程缓慢，二是做得不彻底。企业私有化就更不要说了。奇怪的是，这些必要条件，在中国并没有完全做到，但中国经济是所有转轨国家中最好的。这就让很多经济学家感到非常不舒服。更不要说政治方面，根据东欧80年代改革的经验教训，如果政治不改变，经济改革就没有前提。

当然，也有思想比较深刻的人，比如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说的宏观稳定化、市场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都不那么重要，因为制度更重要。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比较火热，就是因为制度在解释很多问题上，要比简单的一个自由化公式来得深刻。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这里又有差距了。为什么呢？人们一说到制度，甚至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对制度的理解也是一套标准的制度，比如清晰安全的私有产权、独立的司法、透明的金融体系、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而迄今

为止，中国哪条具备了？基本都不具备。同样，俄罗斯也不具备。三年前，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说，制度很重要，俄罗斯改革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建设好的制度。坐在我旁边的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我同他说，中国也没有建设好这些制度。因此，即使从制度来看，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从探求真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在实证的增长研究中，解释变量有资本、劳动力，后来又加入了人力资本。现在把制度变量也加进去了。世界银行两年前有一份报告，题目是“超越华盛顿共识：制度是至关重要的”（Beyond Washington Consensus: Institutions Matter）。华盛顿共识太简单，要把制度拿进来，所以搞了一个制度发展指数，即治理指标（governance indicators）。这个指标包括：企业所有制、公司治理、法治、司法、政府监管和规制等。然后再做跨国回归，发现治理指标越高，平均而言，其经济增长越快。但是在这个回归里面，中国这个观察点距离回归线很远，中国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它的治理指标来讲太高。实际上不光中国，韩国也是，还有其他几个国家。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也不奇怪，在治理指标这方面，中国距离标准的制度确实都很远：司法不独立，公司治理结构不透明，法律体系不健全，执法不公正，政府官员不清廉等。你把这个指标拿来衡量中国，评分肯定是不高的，这并不奇怪。但这是现在时髦的实证研究方法，容易操作。想到制度很重要，就做一个指标。它本身是有用的，但如何用是有学问的。

由此可见，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是有局限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比较天真地认为转轨是公式化的。但正反两方面的转轨经历都证明了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中国增长非常之快，虽然宏观稳定做得不错，但其他方面很难受到夸奖；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四个化都实现了，但经济没有增长。俄罗斯是一个例子：政治民主化、宏观稳定化、市场自由化、企业私有化都实现了，但是在10年的时间中，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倒退。所以有人说，是它的制度不

行。但这仍然不能解释，于是就引出第二个局限，就是对制度理解的局限。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很多制度，平常想象都是有欠缺的，但是两者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对制度的理解要深化，不能停留在对制度的标准理解上。第三个局限是用横截面国家数据做回归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在我们做的跨国回归中，有很多不能解释却非常重要的剩余部分。因为用跨国数据的回归方法有局限，所以就很有必要深入到某一个国家中，做这个国家内的跨地区研究。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理论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可取的研究方法呢？在讲这一点之前，我先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常见的两个误区，这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经常观察到的。

第一，生搬硬套现有的理论。理论不能生搬硬套有三个原因：一是有些理论本身只是一个参照系和基准，与现实有很大距离。二是有些理论即使对理解发达国家也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当抽取掉制度因素之后。经济学最能解释价格。但是对于制度的影响，即使对发达国家制度是怎么运作的，经济学的解释也并不十分清楚，研究才刚刚开始。比如关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关于法律的监管作用，经济学只是在最近才发展到关注市场以外的非市场组织，以前都是研究纯粹的资源配置问题。三是转轨过程是一个新事件，即使我们对发达国家的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但转轨过程也提出了新问题。转轨是从一种体制转到另一种体制，与成熟经济不同。由于这三个原因，我认为生搬硬套现有理论，非常简单地来说明转轨中的事情是没有帮助的。

第二，看到了这些局限性，就完全否认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的用处。通常我们听到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批评经济学中的数学化和数据化，二是批评经济学中的假定与中国实际相去甚远，三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我自己认为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因为它们都会阻碍我们进一步做有意义的研究。我认为研究中国应该采用的科学办法有两条：第一条是要瞄准中国的现实，要符合中国的实情。经济学不是数学，它有一个客观对象，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一个客观对象，因此你就要了解中国的现实事情。90年代初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到转轨国家去，在对这些国家的具体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发号施令。科尔奈对社会主义国家研究非常深刻，但很多人对他的分析和研究熟视无睹，根本不予理睬，觉得转轨就是把公式应用一下，根本不需要知道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在了解国情方面，国内学者比国外学者有优势。

第二条，仅仅知道中国国情还不够，还应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为什么？1992年我们已经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就是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虽然任何事情都有局限，但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还是非常有用的，而且还没有可以替代它的。

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也会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我觉得有两个理由。一是虽然说中国面临的不少问题是特殊的，但是许多问题是共同的，具有一般性。比如企业问题，政府行为问题，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问题，都是全世界共同的。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对世界也有意义。所以，你不仅仅是在研究中国问题，也是在研究一般问题。二是虽然中国的很多做法有特殊性，但是其中的原理和机制有一般性。特别是对制度的理解，可以提炼出一般性的道理。下面我会通过例子来说明，经济学本身是发展的，而研究中国可以对经济学有所贡献。

二、关于制度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首先，需要用动态而非静态的视角来看制度。就一般而论，经济学研究静态比较成功。但制度演变是一个过程。我们想到的都是静态

的，什么是好制度，什么是坏制度，法治是好的，透明的金融体系是好的，这些都是静态的观点。事实上，制度演变有两个过程：一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发达经济，它们在历史上跟现在是不一样的。美国在19世纪的情况，跟现在很不一样。但是发达国家的很多人，没有在那个时候生活过，并不了解这个体制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其制度比较稳定，但是它们是怎么演化到今天的，很少人知道。

二是当代转轨国家的制度变化是一个剧烈的演变过程，我们身在其中，很多事情还一时看不清楚。制度形式上有多样性，这也是值得关注的。80年代的时候，说日本好得不得了，美国不行了。到了90年代，又说美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其他国家都不行。进入21世纪以后，又开始有新的变化。这几个月来，每隔几天，美国就有一家公司被揪出来。原来说美国的会计制度最好，现在美国也要采取国际会计制度。这两种会计制度是不一样的，美国会计准则基于规则，而国际会计准则基于原则。

如果我们承认制度是多样化的，就需要研究许多非规范的形式。在很多情况下，最优是达不到的，次优才是更有意义的形式。比如说拿中国和俄罗斯做比较。两国经济转轨的差别并不在于中国建立了规范的制度而俄罗斯没有。事实上，两国都没有建立规范的制度。差别在于“过渡性制度”不同，或“次优制度”不同。

改革起点的特征是什么？就是经济中存在巨大的扭曲，这些扭曲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人们没有积极性，价格是扭曲的，政府是无所不在的，因此就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当然，并不是说任何一个落后经济都可以自动变好。改革必须在经济上力度足够大，又必须在政治上可行。东欧在60—80年代的改革中就遇到了问题：政治上可行的改革经济上力度不够大，而经济上力度够大的改革政治上不可行。所以，当时东欧的改革没有走下去，是有其原因的。

中国的改革是如何起作用的？最终起作用的经济力量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正确的价格、经济的自由、企业家的创造力、改进激励、硬化预算约束、增强竞争，这些力量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释放出这些最终的经济力量？在我看来，在中国的改革中，成功的制度变革多数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提高经济效率，二是主要利益集团（包括当权者）的利益要相容。我下面通过两个具体问题来说明：一个是企业制度，重点是企业所有制和政府的关系；另一个是政府制度，重点是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的关系。通过这两个具体问题，来说明什么是我们要做的实证研究。

三、理解转轨中的产权和所有制

考察中国的产权和所有制，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发现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私有企业起步缓慢，这一阶段中间有多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算各种私有企业。第二是国有企业的进步有限。有进步，但是有限。第三是真正有意思的是非国有非私有企业，特别是乡村集体企业大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改革前15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90年代中期以后，私有企业快速发展，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逐渐转制。所以说，制度变化是一个过程。

从工业产值中不同所有制的份额来看，自1978年到1993年，虽然国有企业产值增长，但相对份额大大减少。有意思的是，非国有非私有的部分，份额从22％增加到42％，净增了20个百分点，这一块成为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再看农村，农村企业包括集体和私有两部分。至少在90年代中期以前，可以看到，集体产值所占的份额，都是在60％以上。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转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述现象与理论是有距离的。标准的产权理论是什么呢？是非私有制一定产权不清。政府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导致低效率，这是任何产权理论的基本结论。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这是非常标准的做法。但是你用这个标准理论来看现实，就会发现乡村集体企业是一个例

外；不仅是一个例外，它还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再来看看东欧的情况。在东欧就不存在这种非国有非私有的情况，所以造成了早期改革的两难：一个是国有企业困境，一个是私有企业发展受限，最终导致了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突变。相反，中国则出现了中间这一块，如果没有中间这一块，中国改革也可能搞不下去。

由此可见，非国有非私有这一块相当重要，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它又与标准理论不一致。所以，这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把理论加以延伸。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做理论延伸。首先是从经济效率上看。为什么这样一种产权，在通常情况下没有优势，在特殊历史阶段中却有优势？所有制与制度环境有关。所有产权理论都隐含一个假定，就是对制度环境的假设，比如产权保护的假定。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在中国，一有风吹草动，私有企业总要受到各个方面的打击。而政府的介入，比如通过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就会获得某种安全性。同样，在市场不完善的时候，集体企业可以比私有企业更容易集资。所以，如果考虑制度环境，我们对所有制的理解，对产权的理解，就会深入一步。

其次是利益相容问题。要把利益集团，特别是有决策权的利益集团，放到理论之中。政府本身是有利益的，比如说财税收入、创造就业、人均收入提高，都是它的目标。经济发展如何与政府的目标一致？这与企业所有制的关系怎样？这也是理论延伸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这里介绍我和金和辉的一项研究，发表在1998年《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标题是“企业的公有和私有：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我们的数据是1986—1993年的省级数据（28个省市）。研究目的是从数据中来看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制度环境与企业所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关联；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对企业

的控制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控制企业能给政府带来什么好处。

表7.1　制度环境与企业所有制

	乡村集体企业在农村工业就业人数中的份额			乡村集体企业在农村工业产值中的份额		
截距	－2. 076 （2. 547）	－1. 596 （2. 217）	－2. 195 （2. 069）	－0. 444 （0. 455）	0. 370 （0. 592）	－0. 577 （0. 476）
国有银行农村信贷供给	0. 274 （5. 200）	0. 480 （4. 687）		0. 363 （3. 650）	0. 538 （4. 365）	
国有工业规模	0. 746 （1. 324）	1. 322 （2. 170）	1. 487 （2. 902）	1. 866 （2. 529）	2. 957 （3. 972）	2. 846 （4. 523）
初始集体资产的对数	0. 698 （3. 838）	0. 563 （3. 318）	0. 690 （2. 929）	0. 522 （2. 444）	0. 292 （1. 625）	0. 506 （1. 928）
地方政治力量	1. 532 （3. 739）	2. 062 （4. 049）	1. 356 （3. 732）	2. 319 （4. 679）	2. 902 （4. 329）	2. 079 （4. 065）
私人金融资产	－0. 009 （0. 006）	－2. 785 （2. 375）		－0. 102 （0. 057）	－2. 506 （1. 507）	
产业市场发育	－7. 476 （5. 782）	－5. 452 （2. 998）	－6. 586 （4. 536）	－7. 503 （4. 441）	－5. 155 （2. 439）	－6. 375 （3. 247）
城市人口比例	－1. 977 （2. 627）	－1. 636 （1. 605）	－1. 574 （1. 938）	－3. 440 （2. 885）	－3. 137 （2. 220）	－2. 913 （2. 285）

注：括号中是t统计量。

资料来源：金和辉、钱颖一（1998）

我们的实证研究用两套变量。一套是制度环境变量：（1）国有银行的农村信贷供给，主要是乡镇企业贷款除以就业人数，这是金融环

境；（2）国有工业规模，采用人均国有企业产值；（3）初始集体资产，采用1980年人均集体固定资产；（4）地方政治力量，用来刻画乡村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采用1983年底仍不搞大包干的农户的比例。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变量。另一套是政府目标变量：（1）乡以上政府收入份额，乡、村政府收入份额；（2）非农就业人数；（3）人均收入。

表7.2　企业的政府所有与政府收入

	普通最小方差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乡以上政府收入的份额	乡、村政府收入的份额	乡以上政府收入的份额	乡、村政府收入的份额
截距	−0.066 （3.879）	0.001 （0.042）	−0.098 （7.356）	−0.074 （3.255）
乡村集体企业在农村企业就业人数中的份额	0.108 （3.690）	0.112 （4.292）	0.114 （3.896）	0.242 （4.316）
农村人均净收入	0.181 （3.741）	−0.055 （0.957）	0.285 （7.742）	0.006 （0.108）
地方政治力量	−0.073 （2.819）	0.026 （0.966）	−0.095 （5.468）	0.018 （0.811）

注：括号中是t统计量。

资料来源：金和辉、钱颖一（1998）

我们的回归有两组结果。第一组结果是：国有银行贷款、国有工业规模以及初始集体资产越大，越有利于集体企业，而不利于私有企业；而产品与农贸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城市化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私有企业；地方政治力量越强，就越支持集体企业，压制私有企业（见表7.1）。所以，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产权的不同形式，与它所处的制度环境有显著关系。

但是，光说制度环境本身还不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所有与政府收入之间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甚至你可以想出来是反向关系。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税收制度，政府直接征税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段时间里，集体所有制企业越多，政府收入份额越高。

具体看，如果一个省的集体企业在整个乡镇企业中的比例增加10个百分点，比如说由40％增加到50％，它对应的乡以上政府的收入份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乡以上政府的收入份额平均只有7.3％，在这个基础上增加1.1个百分点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国家从集体企业得到了好处。如果同样增长10个百分点，乡和村这一级政府的收入份额增加2.4个百分点，而它的均值是8.2%，所以收入增加就更显著了（见表7.2）。国家和乡、村政府都受益，但是乡、村两级政府受益更大。所以乡镇企业中的集体所有制是一个把更多钱留在乡、村政府的机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地方政治力量对国家收入的影响是非常负向的，就是说，地方政治力量越强，上缴国家的份额越少。

四、理解转轨中的政府行为

这个问题在最近的文献中非常受关注。现在大家基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差别，并不在于大型企业的改革，而在于新兴小企业的进入。在中国，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本地企业，但俄罗斯的地方政府就不热衷甚至摧残本地企业。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不同。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已有财政联邦制理论。已有的标准理论有几个特点：一是基于发达经济体中的问题；二是解决地方公共品的提供，其核心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人有不同的偏好，有的人希望小学建得好一点，有的人希望花园比较大一点，通过财政联邦制，用脚投票，达到有效配置。而我们关心的问题不一样，因此理论就要延伸。我们关心的是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发展有什么关系。这在发达国家不是问

题，因为它有很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责很有限。我们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激励。

按照地方政府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的比例计算，中国比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更加分权。从1970年到1979年，中国地方政府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49％，1982年到1991年上升到53％，而发达国家平均是34％，发展中国家平均只有22％。只是从这个比例看，中国改革前后的地方政府支出比重变化不太大。

但是改革后在1980—1993年实行了财政承包制。在这个制度下，地方政府获得了较高的边际收入留成率，在极端情况下，边际收入留成率是100%（即“包干”）。所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累退税率”。图7.1显示的是省平均边际收入留成率和边际收入留成率为100%省份的份额。当时财政部推行财政承包制有两个动机，效率和利益。中央政府要保证一个收入，同时，给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财政激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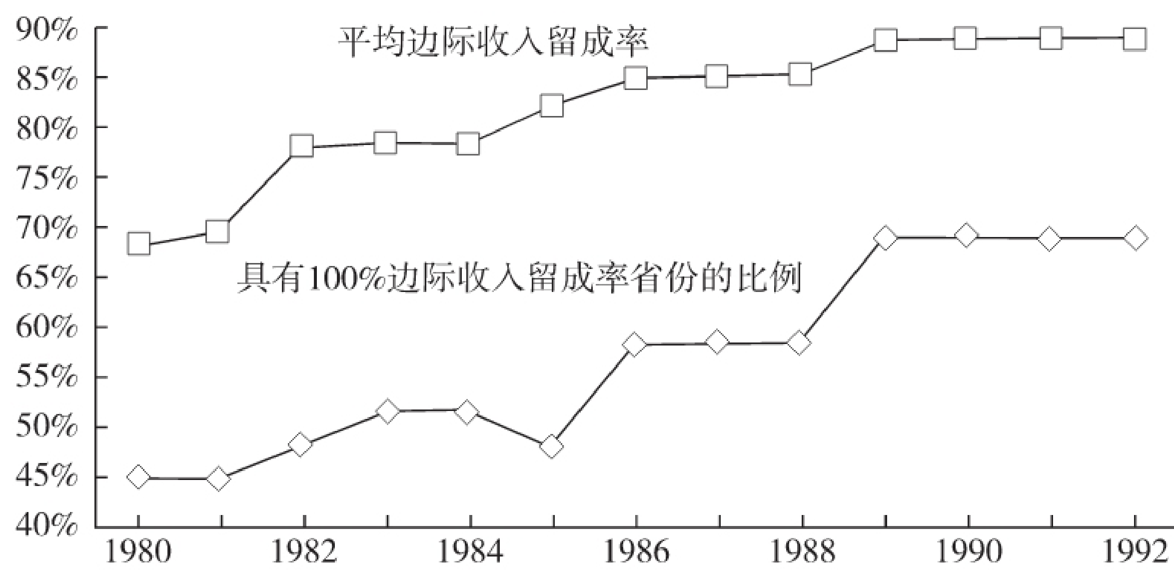


图7.1　地方（省）政府边际收入留成率（事先）

资料来源：金和辉、钱颖一、Barry Weingast（2000）

这里介绍我和金和辉、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2000年的一篇文章，《地方分权和财政激励：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我们采用的是1982年到1992年的省级数据。主要变量有：事先许诺的地方政府（省）边际收入留成率（即财政激励）、事后实现的地方政府（省）财政收入和支出、各省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我们关心的最终问题是财政激励对改革和发展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和非国有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原有的财政联邦制理论。

首先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事先的许诺（财政收入）与事后的实现（财政支出）之间有什么关系。从1982年到1991年，省级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内支出的相关系数是0.752；如果看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外支出，相关系数是0.971。0.75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来讲，所有的省平均1元钱可以留0.75元。而从1970年到1979年，这个系数是0.172。也就是说，平均而言，多收1元钱地方可以用0.17元。改革前后中间的差距是4—5倍（见表7.3）。

表7.3　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相关性（事后）

	1982—1991	1970—1979
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内支出	0.752（19.73）	0.172（6.172）
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外支出	0.971（32.25）	

注：括号中是t统计量。

资料来源：金和辉、钱颖一、Barry Weingast（2000）

地方政府对这种激励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关心的是这种激励对各个省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究竟有什么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是：假定地方政府的边际收入留成率增长了10个百分点，比如说从60％增加到70％，那么该地区非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提高大约1个百分点（平均增长速度是每年增长9％），所以增长1个百分点的影响是

相当大的，从统计上讲是显著的，从经济上讲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对该地区国有企业的改革影响不大，所以它的激励还是在于发展本地企业，这与本地政府的税收更相关。所以我们得到的经济含义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有利于地方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当然我们要处理内生性问题。我们要排除一种可能：不是激励越高导致增长越高，而是反过来，增长越高的地方获得越高的激励。我们发现，事实上，平均来看，较高增长的省份可能获得较低的边际收入留成率。

我们的结果可以同一篇关于俄罗斯的文章进行比较。这是2000年祖拉夫斯卡娅（Ekaterina Zhuravskaya）的文章《提供地方公共品的激励：俄罗斯特色的财政联邦制》。她用的数据是俄罗斯35个城市1992—1997年的数据。俄罗斯的财政体制与中国不一样。它没有财政承包制，而是另外一个体制，就是“自有收入”和“分享收入”。她得到的主要结果是：市政府自由收入每增加1卢布，与上级政府的共享收入就下降0.9卢布。这就相当于地方收入和地方支出的相关系数是0.1。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这里是市政府）是没有财政激励去发展地方经济的，因为最后的支出与最终的收入之间没有关系。将俄罗斯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做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因为我们的数据是中央和省的，俄罗斯的数据是地区和市的，不是完全可比。但是在中国，中央和省的关系与市和县的关系差不太远，因为财政承包制是一直延伸到下面的。所以这个比较还是有意义的。

五、结论性评述

根据上文所述来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研究制度的视角需要更新。为了真正理解改革，仅仅研究作为目标的规范制度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研究在转轨过程中那些并不规范但是可行的“次优”制度。比如乡村集体企业就不很规范，但是有它的历史意义。再比如财政承包制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在当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研究制度经济学和

历史的人，比如诺思，就知道制度演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但是，通常的经济学家都不能理解制度的演变过程。

其次，制度的形式与功能。在中国的改革中，创新形式的“过渡性制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同时可以达到两个目的：提高效率和利益相容。刚才讲到了乡镇企业和财政承包制。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我的另外一篇文章是与白重恩、李稻葵、王一江合写的，关于中国的匿名存款问题。现在匿名存款取消了，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匿名存款对保护存款者的安全非常重要。现在大家都要讲究透明。但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作“水至清则无鱼”，有它的道理。

关键点是什么呢？关键点并不是规范和完美的市场制度，而是能够改变政府对待创新企业行为的“过渡性制度”。在乡镇企业中，如果政府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它对私有企业就会非常有敌意。在某种程度上，农村集体企业可以看作是政府在其中有股本利益，这使政府的利益和本地经济发展连在一起。在财政承包制中，财政收入分配也使地方政府的利益与本地企业相一致。在这两个例子中，利益的形式不一样，一个是股本利益，一个是收入利益，但是它在经济上都是一样，都是相通的。

我们研究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改革中发生的问题，而我们运用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都是现代经济学的。所以我们的研究可以同已有文献中的研究做比较。因此，我们的研究反过来也对主流经济学有所贡献。

---

1.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不完善的制度[注]

（2005年12月）

今天我想探讨中国的制度问题。如果要用一个最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今日中国的制度，我想这就是不完善的制度（imperfect institutions）。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研究的兴起

在探讨中国问题之前，我先讨论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目睹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价格理论是经济学领域最大的成就之一，价格重要，而且很重要。在过去100年里，经济学家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价格上，大多数时候，制度只是作为研究的背景。尽管不时地也会涌现出一些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例如，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但是他们还没有登上主流经济学的舞台。这一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90年代。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这一变化背后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场转轨涉及世界1/3的人口。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回顾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疑是两次重大的转轨：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前半部分，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轨；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众所周知，转轨之初首要面对的就是制度的转变。其次是亚洲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曾经被视为经济奇迹的国家纷纷陷入严重的困境。当然，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制

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再次是发生在拉丁美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悲剧。人们发现虽然价格理论可以部分解释这一悲剧，但是其他重要的原因是制度，这是不可忽视的。最后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一系列公司丑闻。人们一致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然而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的丑闻警示世人，即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先进国家，其内部仍存在制度问题。

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都激起了学界强烈的研究兴趣。当然，需要提到的是，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为制度经济学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位是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然而他的贡献一直到几十年后才获得重视。另一位是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思，他的研究不仅对学界形成重大影响，同时也强有力地影响了政策建议者与政策制定者。

理论支持

首先，20世纪70年代开创的信息经济学和80年代兴起的合同理论，为制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合同不完备、产权保护不充分的世界，这一切为制度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其次，博弈论为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最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授予的研究者中有一位是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他利用博弈论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问题。实际上，博弈论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策略互动，包括国内问题，例如政府承诺的履行问题。制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为承诺提供保障，而有保障的承诺能够进一步提供激励。因此，博弈论为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实证支持

9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来源于实证研究。目前经济学家手头拥有大量的新数据，许多新指标也得以构建，这极大地促进了理论的发展。此外，学者们就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跨国数据的回归分析，这些数据分析不仅补充了传统的资本、资源、劳动力的研究，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制度变量。宏观层面的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其发展速度如此惊人，以至于这一领域的许多学者目前进行微观层面研究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政策建议

“华盛顿共识”目前广受批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忽略了制度的影响。目前，很多人都倾向于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就是关于制度建设的。目前，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建议与制定领域，制度变革已经成为一个标准化的建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二、制度与增长：初步研究

制度菜单

研究者的心目中往往都有一份“制度菜单”，其上罗列了一系列标准，用来描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制度，抑或说最优制度：法治、独立而有效的法院、清廉的政府、得到有效保护的私有产权、透明的金融体系、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公司治理、优质的政府监管……这个菜单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止于此，但是这里列出的几点足以展开问题的讨论。

这个制度菜单是非常有用的。首先，从实证的角度看，这一菜单以及相关的跨国数据回归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准来衡量最优制度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衡量与先进国家在制度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此外，对于政策建议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它能够为改革指出总体方向。从规范的角度看，这一菜单可以为推动改革提供战略支持。对改革而言，在改革之初，推动力必须比预想的程度要大一些，这样才有可能取得预想中的成果。

当然，也不能大得太多。如果在最初中规中矩，最后很可能收效甚微甚至一无所获。一个理想化的制度菜单，能够有效地促进改革。

表7.4　腐败感知指数

国家与地区	2004 年排名	2004 年评分
芬兰	1	9.7
新加坡	5	9.3
中国香港	16	8.0
匈牙利	42	1.8
墨西哥	64	3.6
中国台湾	64	3.6
秘鲁	67	3.5
中国	**71**	**3.4**
土耳其	77	3.2
罗马尼亚	87	2.9
俄罗斯	90	2.8
印度	90	2.8
乌克兰	122	2.2

资料来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不过，这个制度菜单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但是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只能拥有不完善的制度。经济学是探讨真实世界如何运行的，而制度菜单无法告诉我们制度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尤其是制度何时才能完善。而这正是研究人员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中国

在谈论中国的时候，以下几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首先，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弥合中国27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漏洞百出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冲突。1999年，世界银行举行年度发展经济大会，这

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是转轨经济，当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进行了广泛的比较。会上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相当好，而俄罗斯的状况却十分糟糕，这是因为中国对制度建设很重视。这是真的吗？根据下文要介绍的一系列制度评价指标，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其次，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就中国的制度改革提出令人满意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表7.5　营商便利指数

国家与地区	排名
新加坡	2
中国香港	7
日本	10
泰国	26
马来西亚	21
韩国	27
匈牙利	52
秘鲁	71
墨西哥	73
罗马尼亚	78
俄罗斯	79
中国	**91**
土耳其	93
印度	116
巴西	119
乌克兰	121

资料来源：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06 Report

中国的制度究竟有多差呢？这里可以用一些数据来说明。

表7.4显示的是腐败感知指数，这个指数的赋值是从0到10，其中0代表腐败情况最严重。2004年，中国的分数是3.4，列第71位，在100多个国家里是低于平均水平的。

表7.5显示的是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指数，中国列在第91位，优于土耳其、印度、巴西、乌克兰，但是劣于俄罗斯、罗马尼亚、墨西哥、秘鲁。这一指数说明在一国获取商业活动许可的难易程度，可以反映现状与最优情况之间的差距。

表7.6是法治指数，这仍然是世界银行的研究。从2000年到200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情况要优于秘鲁、俄罗斯、乌克兰，但是劣于墨西哥、巴西、罗马尼亚、印度、泰国。从时间序列上观察，中国的法治水平实际上在逐渐倒退，这很有趣。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在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有发生，像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这些都需要细节上的深入研究来加以解释。总的来说，中国的法治水平还是相当低的。

表7.7反映的是规制质量指数，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位置要好于印度，这与法治指数的情况相反，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里，中国的情况好于乌克兰、俄罗斯、印度，但是劣于土耳其、罗马尼亚、泰国、秘鲁、巴西。

表7.6　法治指数

国家与地区	2004	2002	2000	1998	1996
新加坡	95.7	92.3	98.9	99.5	99.4
中国香港	90.3	84.7	90.4	90.8	90.4
日本	89.9	88.3	90.9	90.3	88.0
匈牙利	78.7	77.6	78.6	76.2	75.3
韩国	68.6	76.5	73.8	76.8	81.9
马来西亚	64.7	67.9	71.1	76.8	82.5
土耳其	54.6	53.1	59.9	65.9	58.4
泰国	51.7	60.2	69.0	69.2	71.1
印度	50.7	55.6	62.0	67.0	56.6
罗马尼亚	48.3	52.0	51.9	49.7	44.0
巴西	46.9	45.9	53.5	56.8	46.4
墨西哥	45.9	47.4	46.0	40.0	54.2
中国	**40.6**	**48.5**	**48.7**	**52.4**	**37.3**
秘鲁	31.9	36.7	38.5	37.3	40.4
俄罗斯	29.5	21.4	18.7	22.7	19.9
乌克兰	23.2	21.4	26.2	23.2	28.3

注：从0到100，分值越高，法治越好。

资料来源：Kaufmann、Kraay and Mastruzzi（2005）,Governance Matters Ⅳ: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

表7.7　规制质量指数

国家与地区	2004	2002	2000	1998	1996
中国香港	99.5	89.3	98.4	98.4	98.9
新加坡	99.0	99.0	100.0	100.0	99.4
匈牙利	86.7	84.2	88.2	88.0	74.6
日本	83.7	78.1	81.8	69.0	82.3
韩国	71.9	75.5	69.5	58.2	78.5
墨西哥	68.0	66.8	76.5	75.5	74.0
马来西亚	64.5	69.4	64.2	70.1	82.9
巴西	58.1	63.3	64.7	57.1	60.2
秘鲁	57.1	62.2	73.3	81.5	76.2
泰国	51.2	64.8	77.5	56.0	69.6
罗马尼亚	49.8	55.1	35.8	58.2	30.4
土耳其	48.8	55.6	55.1	80.4	71.3
中国	**35.0**	**37.8**	**36.9**	**42.9**	**47.0**
乌克兰	33.5	27.0	11.2	17.9	23.8
俄罗斯	30.5	43.4	5.3	31.5	31.5
印度	26.6	43.4	38.5	41.8	44.2

注：从0到100，分值越高，规制质量越好。

资料来源：Kaufmann、Kraay and Mastruzzi（2005）,Governance Matters Ⅳ: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

三、不完善的制度

欢迎大家来到制度不完善的世界里。在这里，我们不仅会提供大量的数据，而且还有世界著名研究机构提供的评价指标。我认为，研究不完善的制度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研究的是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从完全信息到不完全信息，从完善的市场到不完善的市场。对于制度研究而言，我们应当从对完善制度的研究转向对不完善制度的研究。对于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整个学术界而言，对不完善的制度进行研究，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我们都关注发展的过程。

接下来我将提出一些初步的观点，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一些问题。

首先我将关注宏观层面上的一些发现。采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可以将世界上的经济体按照收入水平（2002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分为四类。2002年世界人均收入的均值为7804美元，以此为基准，高于均值的分为两组，分别为高收入国家（高于20000美元）和中高收入国家（7804—20000美元）；低于均值的也分为两组，分别为中低收入国家（3500—7804美元）和低收入国家（低于3500美元），如图7.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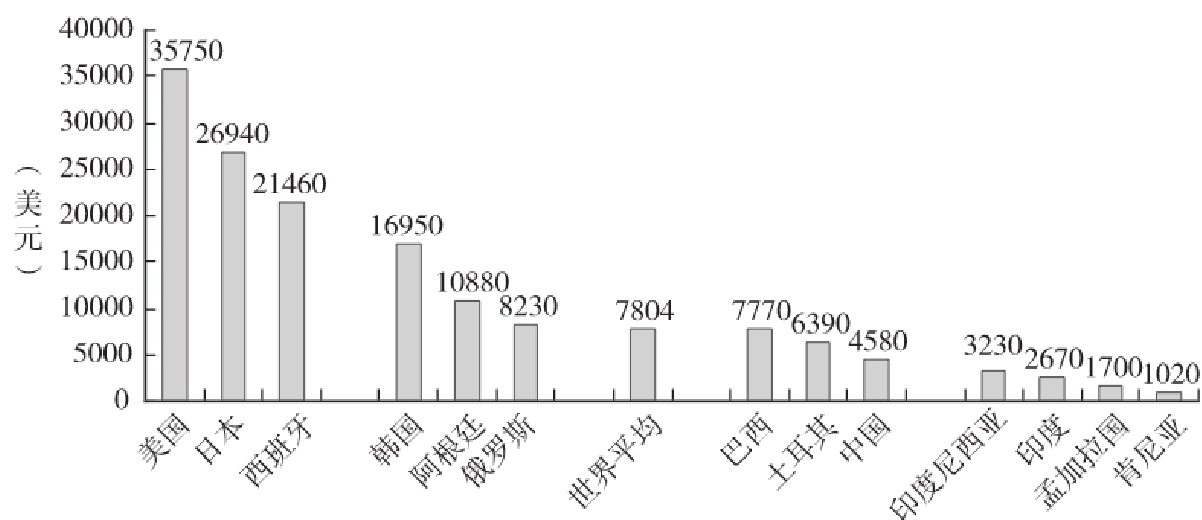


图7.2　2002年各国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2002年，高收入国家是从西班牙到美国，中高收入国家是从俄罗斯到韩国，其中韩国的收入水平略高于俄罗斯的2倍。而中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与巴西、土耳其同居一组，低收入国家则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以及肯尼亚。实际上，在过去2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就是从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迈入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

通过非常简单的回归，我们可以发现制度的优劣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如图7.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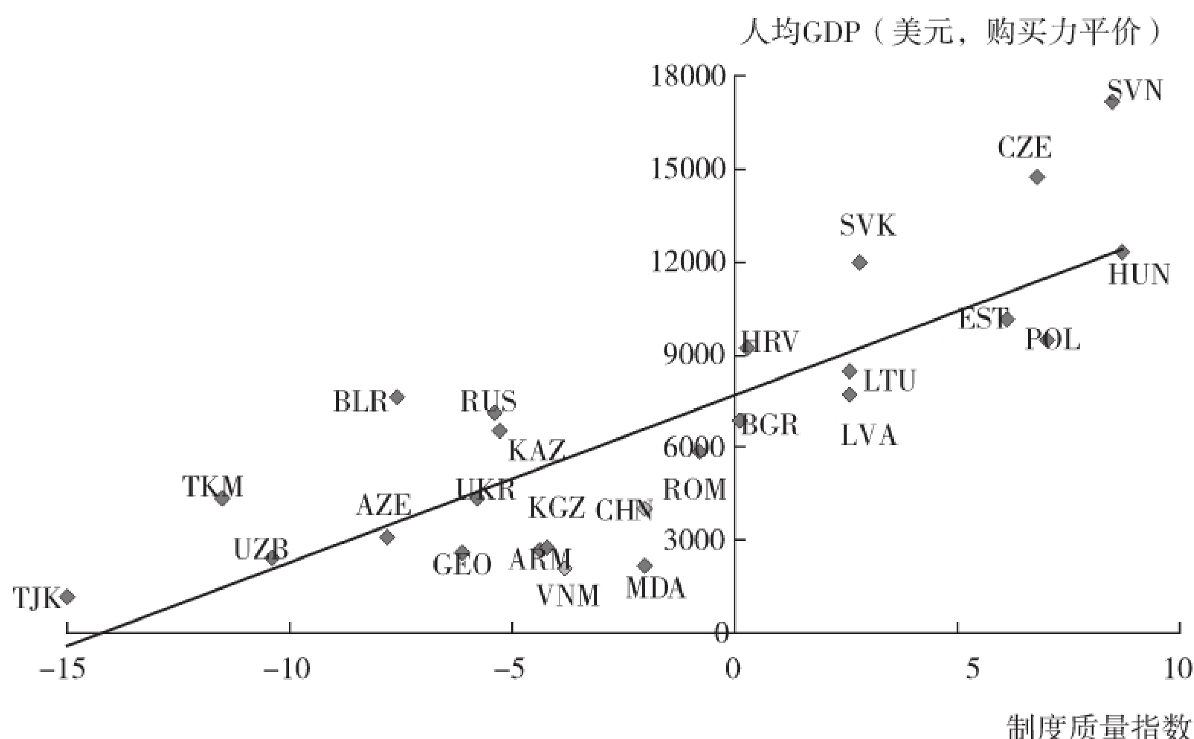


图7.3　制度优劣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回归，原因如下：其一，我选择的国家都是转型国家，例如匈牙利、波兰、捷克、俄罗斯、保加利亚、越南、中国这些前计划经济国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制度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二，中国的位置略低于平均线，这意味着相对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的制度质量高于回归水平，但仅仅高了一点。其三，从图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制度水平可以支撑6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速度，达到这一收入水平可能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中国的制度必须加以改变，以提高制度的质量。其四，从这张图上，我们只能看到人均收入水平与制度水平正相关，但究竟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根据这组数据，我的判断是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制度水平，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这

组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因此其收入水平实际上取决于转轨前的制度，而非转轨之后的制度。

因此，我认为有一个很简单却重要的观点应该提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的制度不完善应属于一种“正常”现象。所谓的“正常”，就是指在宏观上控制了人均收入水平。为什么这一观点经常被大家忽略呢？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建设水平的时候，人们往往关注的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GDP居世界第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居世界第二），某些领域的领先科技（例如，载人航天），经济的高增长率，以及未来的高预期，这些令人兴奋的数字使人们忘记了中国仍是一个人均收入不到5000美元（购买力平价）的中低收入国家，而不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更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国家。

其次，从微观层面上，存在更多的问题，这也是我认为微观层面的研究格外重要的原因。比如，为什么低水平的经济发展与不够完善的制度相关？哪一种不完善的制度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瓶颈？人们如何对不完善的制度做出反应？所有的人都是理性人吗？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吗？这里有许多行为需要我们去解释。为什么有些不完善的制度在某些时候起作用，而其他不完善的制度则在另外的时候不起作用？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中国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制度。有的时候这一制度是起作用的，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它会起作用，它发挥作用需要哪些限制条件。不明白这些，我们就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不完善的制度需要改进，如何改进？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提出政策建议，但哪一种是最为有效的？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将研究角度从宏观层面转换到微观层面。我们不仅要知道制度是重要的，还需要知道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力图从理论上找到制度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渠道。此外，我们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去确定制度发挥作用的条件。

对此，我有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时候，它不仅在技术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在制度水平以及其他很多方面也同样落后。后进者潜在的进步可能是巨大的，因为它可以学习先进者的经验和观念。例如，市场的作用、激励的作用，这些是早在50多年之前就被人们接受的观点。现在，我们对观念和技术的学习十分积极，但是制度理念的学习情况却不容乐观。当然，潜在的进步还来自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尚未饱和的市场，前者是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之一。

在后发优势这一领域，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我看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确实具有优势，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以最小的制度变革作为开端，改革的步伐不能太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像中国这样的中低收入或者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初始增长与东欧以及拉美那些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第二，很多研究者已经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时候，有的替代制度是起作用的，而且有时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声望和名誉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法治水平比较低，声望和名誉有时就会取代法律来保障合同的履行。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和伍得罗夫（Christ Woodruff）曾经就供应合同做过研究，得出了如上结论，只不过他们的研究是以越南作为对象的。这一研究指出，名誉和声望实际上对保障合同履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它们只能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名誉和声望，交易双方就需要相当高的转换成本，在缺乏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必须为了各自的未来而自动地信赖他人。

对于一些国内的公司而言，在国内法律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外国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本国法律的替代制度。例如，很多中国企业都到海外上市融资，如香港、纽约、伦敦。海外上市的公司需要购买外国的法律服务，这就是替代制度。

然而，这些替代制度是无法长期发挥作用的，转换成本的改变将会导致未来很高的边际成本，这一边际成本在初期尚可接受，然而长期看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理论上更有挑战性和更具魅力的，就是不完善的制度之间也不尽相同，有的即使相对于其发展水平也是不合时宜的，有的却能够适应并促进发展。故而对不完善制度，尤其是对所谓“适宜的制度”（appropriate institutions）进行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适宜的制度”并不是“最佳实践制度”。分析适宜的制度常常需要使用次优原则的理论。次优原则本身可以有两种不同角度的理解，而这两种理解引申出来的结论恰恰是相反的。

关于次优原则的第一种理解认为，在有其他资源扭曲的情况下，去除一项扭曲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相应的推论认为应该去除所有的扭曲。

假设收益函数为F（x, y），如果初始状态为（x_0, y_0），令最优解为（x^*, y^*），则F（x_0, y_0）< F（x^*, y^*）。而次优解理论则认为F（x_0, y_0）> F（x_0, y^*），且

F（x_0, y^*）< F（x_0, y_0）< F（x^*, y^*）。

结论是如果只做局部改变，它会比改革前更糟糕。

关于次优原则的第二种理解认为，虽然在有其他资源扭曲的情况下，引入最佳实践制度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但设置适宜的制度可以提高效率。比如说，我们希望提高一国的法治水平、规制水平，但问题是该国政府机构的腐败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进行制度改革呢?

我们设收益函数为F（x, y, z），初始状态为（x_0, y_0, z_0），令最佳实践制度为（x^*, y^*, z^*），则F（x_0, y_0, z_0）< F（x^*, y^*, z^*）。考虑到短期内z_0 无法改变，那么次优解理论就意味着F（x_0, y_0, z_0）> F（x^*, y^*, z_0）。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相对于z_0引入适宜的制度变量（x^{**}, y^{**}），从而使

$$F(x_0, y_0, z_0) < F(x^{**}, y^{**}, z_0) < F(x^*, y^*, z^*)。$$

结论是某些形式的局部改变（“适宜的制度”）会比改革前要好。

下面我以公司所有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当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时候，私有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通常是最具效率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所谓的最优解。但是，当私有产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混合所有制形式，例如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也许能够更好地面对不够理想的环境。在那种环境中，它们的绩效要优于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但是它们永远都是次优选择，随着形势的发展，它们的优势会逐渐丧失。如图7.4、图7.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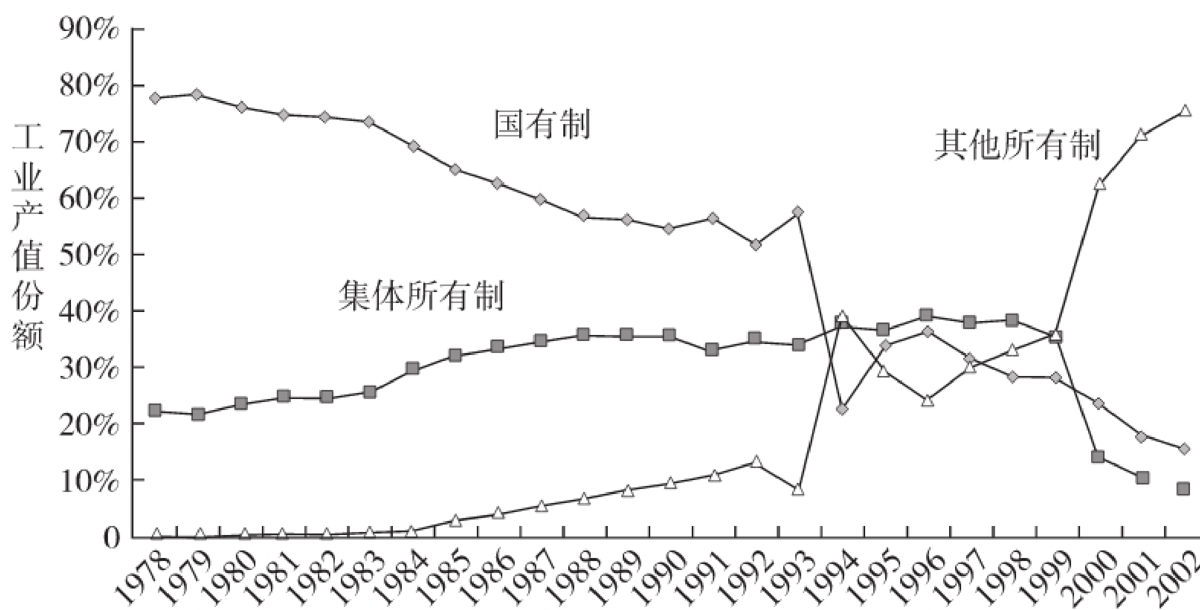


图7.4　本国企业所有制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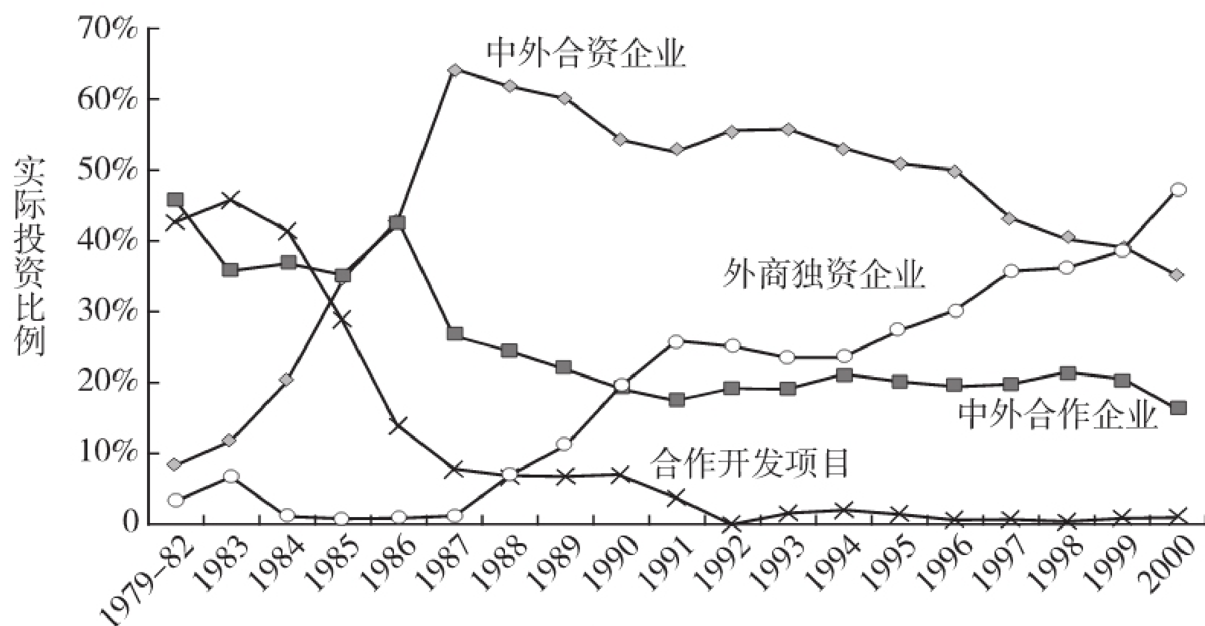


图7.5　外国企业所有制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以上两图可以看出，随着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比重逐渐下降，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比重逐渐上升。对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再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混合所有制的增长出现了逆转的局面。从图7.5上我们可以看出，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中外合作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中外合资企业的比重则是先升后降。这一事实说明，随着投资环境对私有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不断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出现了逆转。

信息透明也是可以解释次优理论的一个有力例子。在法治环境中，金融交易中的信息披露、信息透明是最优选择。然而，当政府没有受到法治有效的约束时，情况就不是这样的。网络实名制将会降低人身的安全性，银行账户实名制将会降低财产的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不透明反而是更有效率的。

四、结论：关于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不完善的制度需要改善和改革，那么改革应该如何进行呢？单纯列举出最佳实践制度的一个标准菜单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因地制宜地

设计出既符合长远目标又兼具可操作性的“适宜的制度”。因此，政策建议者在给出相应的建议时，需要在不完善的制度框架内考虑问题。

中国热切希望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意味着中国需要摆脱近200年来屈辱、落后的历史地位，重新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导者。但问题是，中国现实发展的中期目标是什么？所谓的中期目标，即定位在15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

到202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将位列世界第一，但是按照人均收入计算，中国可能才刚刚跨入中高收入水平的门槛，与墨西哥、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并驾齐驱。而目前，中国仍然与秘鲁、乌克兰同居一组，中国需要赶超的下一组国家是土耳其、泰国、巴西，然后才是俄罗斯、墨西哥、马来西亚。中国需要将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才能赶上俄罗斯，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未来的15年里人均收入每年比俄罗斯净高出5个百分点。这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

对于向中期目标奋进的中国而言，墨西哥、马来西亚、俄罗斯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或者说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面对的困难，对中国而言更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一个好的政策建议一定要考虑到中国正在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现实，一定要考虑在未来的10—15年里，中国还将面临很多挑战。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即使那些中高收入国家，像马来西亚、墨西哥和俄罗斯，它们也仍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制度。

---

1. 在《比较》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看待转轨成败需要第三种视角(注)

（2006年1月）

如何看待中国和东欧转轨成败的问题？当前国内学术界、企业界、思想界存在三种不同视角。

第一种视角认为，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战略是正确的，而东欧的激进主义改革战略是错误的。这种视角不能令人信服。首先，它没有回答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其次，它将东欧各国的改革一概归入激进主义路线，没有看到东欧各国在转轨中的差别。

第二种视角认为，中国改革战略有问题，而东欧改革战略更为正确，因为长痛不如短痛，短期成本可以换来长期收益。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只是触及了那些相对容易解决的、浅层次的问题，这种短期收益不可持续，甚至为深入改革制造了困难。具体来讲，目前中国正受到深层次的政治体制制约和利益集团的压力。

这种视角在国内响应者相当多，国内企业家、学者经常援引这个观点，对中国的改革表示担忧。由于国内一些亲历改革的人介入改革很深，自然而然会看到更多问题。但他们这种比较视角同样过于简单，不能让人信服。

首先，中国持续20多年的增长来之不易，不能低估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其次，这种视角仅仅因为将来长期收益不确定，就否认眼前的收益，忽略了改革过程的重要性，忽略了过程和目标之间的差别。此外，中国现在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制度上滞后，这些问题理应指出来，但与此同时，不能无视不同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中国和东欧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至今仍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而东欧国家

在转轨前已经是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和制度的质量相关，所以选择比较的参照系时应尤其谨慎，否则很容易推导出错误结论。

在比较中国和东欧转轨的时候，还有第三种视角，那就是在仔细研究初始条件和当时环境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比较。这些初始条件和环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地域等因素。

这是一个让人更加信服的视角。只有在对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政治、地域初始条件的差异进行仔细研究比较的基础之上，才能找到真正的外生变量。对中国和东欧国家转轨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转轨战略这个层面上。东欧各国采取的转轨战略不一样，有的比较激进，有的比较缓和，但不管怎样都经历了大衰退，这种大衰退一定是由某种共同原因决定的，而并非仅仅由于转轨战略不同。此外，东欧各国复苏的程度和速度都不同，这取决于各个国家自身的不同条件。

学术界、企业界和思想界在将中国的转轨成就同别国进行比较时，应采取第三种视角，在对初始条件仔细研究之后再进行比较。只有把中国至今成功的真正原因研究出来以后，才能看清未来道路的艰难。

---

1.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俄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译自英文。

第八章 市场、政府、法制

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注)

（2000年2月26日）

吴敬琏教授20年来致力于推动市场经济，被人们称为“吴市场”。上个星期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时提及要来北京参加吴敬琏教授经济研讨会，在座的一位中国通向其他外国人解释说，吴敬琏在中国被称作“Mr.Market”。由此可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吴敬琏的名字与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连在一起。

我个人在经济学的求学和研究过程中从吴教授那里受益匪浅。相识近20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吴教授指引我阅读了科尔奈教授的《短缺经济学》以及其他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这还是在1984年改革高潮到来之前。后来，我由数学统计学转入经济学，科尔奈就成了我的导师之一。在此之后与吴教授的交往就更多了。

今天我们开这样一个学术讨论会，很有意义。吴教授在学术和政策两方面都有建树，对中国经济学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推进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我在这个简短的发言中，想就吴教授的核心贡献，即“市场经济”这一问题做一些新的探讨。我的发言中心是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经济学要讲法治问题。我就是要向大家论述，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游戏规则（rule of game）就是法治的规则（rule of law）。

一、三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传统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一词在我国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已经建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能说我们的经济学家、领导干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已经比较全面准确。相反，长期的计划经济和传统小农经济的意识常常对正确认识现代市场经济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今天，世界上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而后者多于前者。从历史上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绝大多数国家是长期停留在坏的市场经济中，迈向现代市场经济是人类近代史上的重大突破。

那么，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呢？市场经济的对立面是计划经济。市场的显著特征是根据价格协调资源配置，而计划经济则是依靠数量的计划发布指令。但是在深层次，市场经济是自由的企业制度，而计划经济的核心是国有经济。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看市场经济。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传统的市场经济”，一种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新东西，它早就存在于计划经济之前，传统的市场经济的特点不仅仅是小规模经营的问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有两大特点：（1）经济实体之间合同的执行靠双方信誉与关系而非专门的机构，比如国家；（2）对企业和产权而言，国家或政府不受制度的约束，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之间没有距离。

许多经济历史学家如诺思（Douglass North）、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把西方的崛起归因于国家在与个人和企业的关系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政府与经济的保持距离型关系；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开始，皇家的权力开始逐渐退出商业经济领域，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规定政府与经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是“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基于法治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源。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企业是重要组成部分”和“依法治国”。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把这三个概念联系起来。我们应当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以法治为基础，

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主体的自由交易经济。就当今世界而言，计划经济与传统的市场经济都不是基于法治的。坏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好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是国家与经济人（包括企业）的关系不对，而问题就出在没有好的法治基础。

二、法治的两层经济含义

民主与法治两个词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在此不谈民主。法治本身也有独立的道德价值，我在此也不谈。我要谈的是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谈法治对经济效率、发展的作用。

现在我们都认同经济体制的根本是一种游戏规则（rule of game），而现代市场经济游戏的根本规则就是法治的规则（rule of law）。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法治有两层含义：第一，法治是为了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discretionary intervention）；第二，法治是为了约束个人（企业）的经济行为并创造一种环境：有秩序、稳定、公平竞争、产权界定、合同执行。本质上这两个方面讲的都是在制度上如何界定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关系，目的在于使经济发展既有活力又可持续。

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这就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与“法治”（rule of law）的根本差别。前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皇帝可以通过法令的形式来管理老百姓；而后者的重要成分是老百姓通过法治约束政府。这是本质差别。因为只有后者才可保障经济自由。如果政府行为不受制约，就没有经济自由可言，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下的市场经济。

下面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为什么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力至关重要。第一，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个人，因为政府可以有各种手段而百姓没有，比如使用警察；第二，给定这一权力，政府对经济随意干预的倾向是很难自我抑制的，比如乱收费，这只是一例；第三，老百姓理性

地预期到政府的这种行为，便不愿投资，或做扭曲投资（短、平、快），或贿赂官员，这是经济没有活力落入“停滞陷阱”的首要原因。事实上，这是“双输”局面，不要以为不受约束的政府对政府自身有多大经济利益，相反，这会损害政府自身的利益，比如政府的税收反而会减少。这样一种状态被经济学家称为政府的“不可信承诺问题”。

反过来，通过法治约束政府的行为可以达到“可信承诺”，并带来“双赢”。它的逻辑正好与刚才的“经济停滞的陷阱”相反。第一，政府受法律约束，不能对经济随意干预，比如，政府不可以随意限制经济活动，也不可以随意收费，经济政策也不可以朝令夕改。第二，预期到“政策稳定”的环境，个人与企业就会理性地放心投资。第三，由于个人积极性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力，政府反而可以从中收取更多的税，好比减税率反而增加税收总额。当然，这里并不是简单的税率问题，而是不可信承诺问题。

在这一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权力的悖论”。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可以我行我素，这就使得政府的任何承诺都变得不可信，结果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将来的政策，就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反过来，法治限制政府的权力，约束政府的行为，使得政府承诺可信，政府也可受益。英国17世纪的光荣革命削弱了皇家收税权力，权力转向议会，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国反而可以发国债征集大量军费，而中央集权的法国却没有做到这点。

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让政府起到公平执法的作用，但这只有在政府与经济保持距离时才可行。我们都知道界定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反垄断和执行合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为这是解决个人的“可信承诺”问题。不执行合同，个人的积极性照样不会被激发。但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执行合同、维护公平竞争要靠法治而不是靠人治，不能由政府随意定义什么是不正当竞争，什么需要加强管理。政府要当好裁判绝非易事。比如，任何执法都会出错，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

有意的，有利益所图。因此，在法治下个人和企业有权挑战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执法。我们通过了《行政诉讼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远远不够。执法的另一大障碍是司法腐败。显然，司法腐败造成的合同、产权不确定性迫使企业回到传统市场经济的交易方式，而不使用法律手段，这是窒息经济的原因之一。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不能只靠“抓”，要从制度上想办法。总之，法治对经济产生影响的第二层含义是政府在经济交易双方间起不偏不倚的“第三方”作用。

三、两个与当前有关的例子

由于篇幅关系，我在此只举两个例子说明上述理论观点的相关性。

第一个例子：近年来“加强规制”、“加强管理”、“许可证”、“证书”等，打着“规范市场”的旗号来势汹汹，除了一些是必要的之外，大多数是与法治精神相违背的。法治的经济目的，是尽量减少寻租，加强竞争。在西方，许多政府的经济管制不成功，其原因是政府规制机构被商业利益集团“俘获”（capture）。在那里，至少政府的初衷还是消费者利益，但经受不起商业诱惑。而我们就走得更远了，某交通管理局本应代表乘客利益，鼓励竞争，相反，却理直气壮地搞价格垄断；各城市纷纷限制农民进城，创造各种“证”，我们的粮票、油票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开始收集许可证、上岗证。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部门以国家安全为名，实则是为了谋取垄断利益。我在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写的《硅谷的故事》中说过，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没拿到大学工程师证书，而苹果电脑当初也不会被认定为高科技，根本就是玩具。

现在企业、个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根本原因是政府行政部门在“加大市场管理力度”的旗号下，开展大规模“造租运动”。这样下去，就会成为拉美或印度的“制度性腐败”，那就真的沦为坏的市场经济。我们不能一方面大搞反腐败，而同时又为造租创造条件，为腐败敞开新的

大门。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许多国家，包括印度，都在放松管制，增加经济自由，而我们却有走回头路的倾向。有趣的是，印度改革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前十几年改革的成功”。

法治比“私有化”还重要。俄罗斯的例子很说明问题：私有化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根本变化，政府依然不断骚扰企业，使得企业无法有活力。所以，我也同意“不能一卖了之”，关键是卖了之后政府要远离企业。

有些规制要搞，特别是证券市场，有些许可证也要发。但是，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对我国的情况而言）首先是政府与经济要保持相当的距离。在此前提下，绝不能层层搞“宏观调控”，每个部门都要加强管理。其实，从政治经济学比较悲观的角度看，搞加强管理，力度越大的地方，腐败的嫌疑越大。

第二个例子是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这不仅是公平问题，也对效率有影响。过度不平等会造成社会动乱。但对此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一种是加强政府干预，增加累进税，抽肥补瘦，这是很危险的，又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另一种则不同，在当前，人们最不满的是腐败和权力造成的分配不均。美国硅谷产生亿万富翁没有什么人抱怨，而通过腐败和权力，哪怕几十万，人们却愤怒不已。而腐败的根源是政府任意权力过大，不受约束。解决的办法不是增加政府干预，而是相反，减少干预，减少造租、寻租的机会。因此，法治是减少腐败、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手段。

四、把市场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

中国在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20年后应有新思维：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是我们下一个10年至20年的奋斗目标。外部条件，如加入WTO、经济全球化，更使得实现这一任务充满紧迫感；从内部

压力而言，经济缺乏活力、就业压力增大、腐败、收入不均等社会问题最终要靠建立法治来解决，而不能靠走回头路解决。

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要做技术性和操作性的工作，但不应认为我们在观念上、概念上就没有误区。实际上误区很多。吴教授在经济政策上常有可操作的建议。但我觉得他更是在经济学和经济改革问题上的“三讲模范”。哪三讲呢？是讲大事、讲方向、讲全局。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大事，是方向，是全局。这不仅要打破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框框，更要打破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框框。法治基础的“有限政府”概念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是缺少的。依法发展经济更是新创举。但是，华人地区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在法治建设上的成功使得经济腾飞，给我们开了先例，因此我们应该有信心。

---

1. 在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于《财经》2000年第3期。

市场、政府与法治[注]

（2003年8月5日）

一、如何造就好的市场经济

从改革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可看成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期间最主要的理论争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此后可看作第二个阶段，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是我们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一旦我们确定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把视野放到全世界之后，我们就发现市场经济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场经济中其实也有好有坏。

市场经济搞得是好是坏，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中有两种政府：一种是“支持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orting government）；另一种是“摧毁市场的政府”（market-destroying government）或“扼杀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ressing government），即政府通过种种干预，或将已有的市场摧毁掉，或把即将出现的市场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不同的政府，会产生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察世界各国的经济，我们发现支持市场的政府都是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或者是无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无效政府。

那么怎样实现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呢?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目前人们所实践的、能够维持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

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们所讨论的如何实现好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法治的概念非常宽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我们这里集中讨论法治和经济的关系，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什么样的政府，以及如何应用法治来造就这样一个市场和政府。

二、经济学家论说法治

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分析价格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后来人们发现，价格固然重要，但经济运行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价格，还有深层次的产权问题。比如说，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人们就没有激励去投资和工作，即使价格正确也没有用，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正确的市场价格。产权研究进一步深入，人们就发现法治和法律的重要性。有无法治，不同的法律体系都会导致产权界定、执行、保护以及合同的实施，乃至市场秩序的不同。

这一学术上的演进过程恰与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进程非常吻合。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认为企业搞不好的原因是管理落后。到了80年代末人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产权问题。从那时开始诺思（Douglass North）、科斯（Ronald Coase）等人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到了90年代，我们的认识又深化了，从产权扩展到整个制度环境。进入21世纪，我们的认识则已经深入到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法治大环境了。

经济学家研究法治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众多优秀经济学家以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从

不同角度探讨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问题。

经济学家对法律、判例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的知识，可能不如法学家多。但经济学家在研究法治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时，有他们的一些长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分析工具有助于将问题的分析推向深入。经济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问题，容易理解在不同选择间应做的权衡取舍，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比如，是通过法庭监管好还是通过行政监管部门监管好，就需要比较这两种机制的成本和收益而进行取舍。这样的分析方法确实有一致性，而且不大会走极端。很多经济学家在法和经济学上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几年来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推动法治建设的三种力量

法治不会自动实现，建设法治需要有推动力。同任何制度变迁一样，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首先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自身利益，这其中包括经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对于经济人而言，有财产了，财产多了，就要求更多的法律保护。比如说，当住房由过去的公房变为现在的私房，人们就对物业公司有需求，又进一步对保护房产的法律有需求。又比如，公司可以上市了，老百姓可以投资股票了，那么人们就对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有需求，希望对媒体曝光公司恶劣行为的权利提供法律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在不断扩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利益相关者对新的法律的需求也不断扩展，对法治和对政府约束的要求就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也有了建设法治所需的经费，因此供给也会增加。

法治会给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好处，这比较容易理解。法治经济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为什么政府会有积极性建设法治

呢？实际上法治也会提高政府的利益，这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法治可以促使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政府税收；二是法治促进社会稳定，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三是政府由很多地区、部门的官员组成，法治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监督和控制。因此，基于法治的政府，将会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对政府整体的长远利益会有好处。

第二种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是来自外部的压力。现在的中国处在WTO的环境之中，更广泛地说，是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WTO的规则就是法治规则。在这种环境中，整个经济的游戏规则就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外部压力不仅对小国重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同样重要。虽然大国相对于小国而言在国际事务中回旋余地较大，但是违反规则带来的损失也大。所以外部压力是推动法治建设的一种力量。比如说，外企对律师和透明规则的要求比国内企业要高，外资的增多就会增加对法治需求的压力。

第三种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来自知识，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力量。学者和媒体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者是互动的。媒体传递信息，但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它本身也起到创造知识的作用。因此，学者和媒体共同推动知识的发展。

虽然利益是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知识的力量不可低估。比如说，计划经济这一想法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20余年。而市场经济这一想法带来了随后20多年的经济繁荣。现在，市场、竞争、价格、激励、产权等重要经济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类似的，法治也是一个想法，与之相连的关于有限政府、程序、透明化等观念，也在逐渐深入人心。又比如说，人们通常会以为法治约束自己（包括政府）总是对自己不利的。其实不然。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会告诉人们，这种约束从长远来看对经济人和政府自身都是有益的。因此，要想理解自己利益的真正所在，离不开知识。

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加上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将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

1. 原载于《财经》2003年第15期。

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注]

（2004年12月19日）

今天，我要讲三个内容：一是新比较经济学，二是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三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一、新比较经济学

我研究转轨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大家都生活在中国，我们的报刊、企业家、领导干部，都很喜欢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确实有特殊的问题，特殊的事情，特殊的约束。但我想强调的是，倘若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不仅看中国，也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时还看历史，就会发现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比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金融市场问题、劳动力市场问题、腐败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为什么？我想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正在经历，在其他国家或者是正在经历或者是曾经经历。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过多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它的历史。斯坦福大学由美国实业家利兰·斯坦福夫妇成立于1891年。斯坦福本人曾经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美国联邦参议员，同时还经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斯坦福赚了不少钱，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其间也相当腐败。他从联邦政府拿到了2000多万美元的政府补贴，但这些钱没有用于铁路工程，基本上进了自己的公司。他把债务放进一家公司，把盈利放进另一家公司，并

且让放债务的那家公司破产。这样的事在当今美国可能不多，但在美国的历史上可能也不少。这也是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所谓的“进步运动”，对垄断的限制等。所以，中国的事情其实并不特殊。

第二，中国的经济现在日益与国际接轨并融入全球化体系。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所以，现在我们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且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此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多是与其他国家相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我们非常关注当今的美国和发达国家，这没有错，因为这能让我们了解在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经济是怎么运行的。但是从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更像发达国家100年前、50年前的情况，正如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

讲到比较经济学，我们就需要讲一下旧比较经济学和新比较经济学。过去的比较经济学是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仅仅在20年前，这个世界上有1/3的人生活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所以那时比较经济学主要是比较计划和市场。而今天世界上将近200个国家中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的所剩无几，再比较计划和市场就没有意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比较经济学本身没有意义。因为人们发现市场经济在各个国家也是有所不同的，这就促使比较经济学开始比较不同的市场经济，更多地去研究深层次的问题。于是，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出现了跨国的、历史的、制度的比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过去，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价格理论受到很多批评，其中一个批评就是没有政治经济学分析、没有制度分析。这一情况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事实上，现在比较经济学都是研究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只不过这个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仍然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换言之，虽然研究的对象发生了一些变化，扩展到我们所讲的生产关系方面，但分析框架是一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是对事实和数据的分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过去，现代经济学受到的另一个批评是只有理论而没有经验分析，现在，情况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今天讨论各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就同100年前、50年前的非常不同。我们发展了新的理论，不仅看价格的扭曲、垄断和外部性造成的扭曲，还研究对人的激励的影响。此外，我们积累了许多国家长期的经验教训，说明在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下或者不同的政策下会造成什么后果。现在的很多研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者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以数据和证据来说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比较经济学不仅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也让我们领略到现代经济学的与时俱进。现代经济学在不断发展，所以，我们在学习它的时候要深入地理解。以下试举10个例子来具体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变化和新比较经济学。

第一个例子，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这一点其实并不显而易见。经济学家对100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了研究，经验数据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开放政策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多增长2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就是每35年翻一番，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所以，开放的好处不是一个理论争论，而是一个经验事实。

第二个例子，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经济效益较低。我们可以找到优秀的国有企业的例子，比如空中客车与波音的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也就是说平均来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的效率更高。

第三个例子，新生的私有小企业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动力。我们往往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大公司、几百强，因为它们引人瞩目，也容易获得数据。但是经验证据表明，新生的小企业、小的私有企业，才是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抑或

秘鲁、印度，正是这些小的新生企业，而非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的大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

第四个例子，高福利、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50年前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一个高福利、大锅饭的体制是不好的。“二战”以后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它们认为这样更能体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很多证据表明这种制度是难以为继的。例如，北欧国家发现，福利制度刚开始几年很好，但是它对激励的影响以及给财政带来的负担是难以承受的。这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一个现实问题。

第五个例子，受管制的行业没有竞争力并缺乏创新。我们现在也有了很多证据，比如电信行业、航空行业、电力行业在过去一二十年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管制，至少放松了管制。有线通信管制很多，无线通信则管制较少，而无线通信发展迅速。

第六个例子，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企业失去竞争力。在很多国家，连私有企业都不能随便解雇工人，比如印度的《劳资争议法》规定，凡是雇工50人以上的企业，解雇工人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经济学家对印度的各个邦做了非常详尽的经验研究，发现实行这一法律的邦，对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现在经济学家将经济理论和非常详细的数据相结合，对劳动力市场管制做了很好的学术研究，并得出了相当多的结论。

第七个例子，政府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快。在过去十几年中，经济学家包括金融学家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把政府对金融的监管量化，如信息披露到什么程度，多少股东可以召开董事会，有多大的权利，信息披露的形式到底是邮寄还是通知等，从中获得不少发现。政府的监管，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是不一样的，它对金融、资本融资的大小有很大影响，对股权的分散程度

也有很大影响。转轨国家也一样，波兰和捷克监管不力，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就非常低。

第八个例子，没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经济不能繁荣。一些国家，比如非洲国家，长期处于战争和种族冲突状态，或者像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政府功能失调使黑社会猖獗，都直接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所以，一个稳定的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九个例子，法治和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跨国回归分析发现，法治和产权保护对促进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不如法治有更明显的证据。

第十个例子，土地所有权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碍经济发展。我们经常讲分配与效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很难找，因为这两者经常是同时决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北美（加拿大和美国）的发展比南美快得多？有意思的是，南美事实上资源比北美更丰富。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南美的土地资源分配高度不平等，这极大地阻碍了教育的投入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而阻碍了后来的经济发展。

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有很多数据支持。我想通过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现在关心的很多问题，经济学家都在做研究，而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上，建立在对数据仔细分析的基础上。数据并不等于知识，对数据的分析要非常小心。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在做研究时要有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

二、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经济决策分散的状态，并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经济活动。哈耶克在几十年前就说，正是分散化决策使得

市场经济具有潜在的力量。但是这一潜在力量要想转化成实际力量并不是没有条件的。

我们考察世界各国后会发现，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这样的说法在刚提出的时候令改革者感到很震惊。为什么？因为改革者在80年代到90年代主要的想法就是要提倡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怎么现在突然又说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呢？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我们不再讨论市场和计划的问题，而是都接受市场这个分散化决策机制。但是，现在我们也要正视，现实中坏的市场经济很多，好的市场经济是少数。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效率、有活力的经济，而坏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无效率、无活力的经济。此处有必要把效率与活力稍作区分。效率通常是指资源配置，而活力更多的是指创新。

我们现在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自然希望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但这不是必然的。我们学习的多数教科书把市场经济等同于价格机制。这有一定道理，但它忽视了制度。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问题不是简单的垄断或者价格扭曲。比垄断或价格扭曲更基本的问题是，在任何市场经济中，不管是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还是转轨国家，不管是今天的市场经济还是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均潜在地存在两种掠夺（expropriation）。由于掠夺的存在，经济人没有激励去创造财富。这比价格扭曲更致命。

哪两种掠夺呢？第一种是私人掠夺，可以是私人之间的，也可以是私人对国家的。邻居偷了你家的东西；生产者许诺一个高质量，却给了一个很次的质量；你许诺付钱，最后却没有付；欠农民工钱；消费者拿到货物但不给钱；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金融市场上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诈骗等。

第二种是政府掠夺。政府掠夺有好几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政府作为一个组织，比如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门，甚至是政府整体对老百姓的掠夺。我们经常说的摊派和乱收费就是一例。另一个非常普遍的

政府掠夺的例子是恶性通货膨胀。第二种形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取贿赂或其他好处，即腐败。第三种形式是私人通过政府的权力进行掠夺，比如说很多企业或者行业寻求政府对市场竞争加以限制，如关税保护，或许可证保护。美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出租车许可证，价格非常高。美国的糖、棉花有非常多的补贴。寻求政府的帮助也体现在濒临倒闭的企业或者金融机构希望得到政府的补贴，政府的补贴是从老百姓那里的转移支付，也是一种掠夺。这样的情况既可能发生在强势个体或者群体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弱势个体或者群体身上。《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讲述的就是即使在今天的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多强势和弱势群体反对市场，他们的做法很类似，都是希望能够限制竞争，能够利用政府的权力来为自己牟利。

讲到这种掠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太不公平了。经济学家想强调的是，掠夺不仅仅是公平问题，它对经济的影响是效率问题。例如小偷偷东西，这不仅是财富转移，而且也会造成效率损失。这个损失是什么呢？是为了防小偷，人们需要花钱买防盗门，这是一个效率问题。由于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所以掠夺会弱化人们创造财富的激励，增强人们寻租的激励，甚至掠夺的激励。由于掠夺的存在，整个经济的饼变小，这是效率问题。比如在公司治理中强调保护小股东，不要被大股东或管理层掠夺。为什么经济学家要站在小股东的立场上？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可信的机制保护小股东，他们就不会投资，或者不愿意更多地投资。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效率问题：掠夺导致一个低效率的、没有活力的经济。所以对于掠夺，不能单看它的表面，简单地说这是不公平的，还要看它对整个经济造成的影响。

坏的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就是对这两种掠夺没有约束。一是对私人掠夺没有约束，这往往要么由于政府无能，社会混乱；要么由于政府有能力但是无所作为，该做不做。二是对政府（包括通过政府权

力）的掠夺没有约束，这往往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大，做太多它不该做的事。

在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三个例子都比较直观，能反映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发达国家的。即使像美国这样总体来讲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有问题。乔治·阿克洛夫和保罗·罗默（George Akerlof and Paul Romer，1994）在10年前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协会（S&L）危机，这场危机导致了将近5000亿美元的损失。他们在研究中反复论证的是，这不是定价问题，或者说不是因为高风险高回报的问题。通常经济学家会认为，储贷协会投资于高风险的房地产业务，随着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储贷协会就陷入了困境。但是，阿克洛夫和罗默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这场危机完全是所有者的“破产牟利”，也即有意识的、故意的掠夺。这就相当于明知道是一个负净值的项目，也照样上马。比如，一个项目的所有者出了10元，储户出了90元，共计100元的投资。如果这个100元的项目第一年可以带来20元的回报，但以后每年是零回报。显然，这是一个负净值的项目。理性的投资者通常不会投资于这样的项目，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却发生了。为什么？阿克洛夫和罗默利用很多间接和直接的证据证明，三个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一是有限责任，二是政府保险，三是放松监管。最终是纳税人承担了掠夺的成本。

第二个例子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默克等人（Randall Morck、Bernard Yeung and Wayne Yu，2000）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各公司股票价格之间的波动非常同步，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完全是同步的，中间有很多差异。后来他们发现墨西哥的股市也是这样，印度的股市也是这样。在收集了很多国家的数据之后，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股价波动确实不一样，在发展中国家，公司股价对该公司的基本面信息没有什么反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用了一些通常

我们认为可以解释的变量，比如公司治理、法律、会计准则等，但都不能解释。而一个叫作“政府掠夺”的变量，就是衡量产权安全性的变量，和这一现象最为相关。当然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经验研究结果。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证券公司。不少证券公司都有两个账户：一个是自有账户，一个是委托理财账户。这里可能的掠夺形式就是挪用客户资金。理论上在自有账户和委托理财账户之间应该有一道防火墙，限制两者之间的资金往来。但在证券公司的实际运营中，并非如此。据报道，辽宁证券挪用委托理财账户中的资金，用于自有账户的投资，最终亏损40亿元，1亿元的自有资金根本无法弥补亏损，最后由政府出面救助，而这实际上是老百姓埋单。

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掠夺最终影响人们的激励，影响人的投资或者工作的积极性，使得经济无效率、无活力。

三、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就是要防止这两种掠夺：既要防止私人掠夺，又要防止政府掠夺。防止私人掠夺就要约束私人，防止政府掠夺就要约束政府，这在逻辑上很清楚。

那么如何实现呢？第一，我们想约束私人，可以把政府引进来，政府可以维持秩序。但是逻辑上立刻产生第二个问题，谁来约束政府？事实上，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制度设计上的一个根本性两难。你希望政府来约束私人掠夺。但是，当你把这个权力给了政府，让政府去约束私人掠夺的时候，政府也可以用这个权力去掠夺。不管政府的初衷如何，你没法防止它有意无意的掠夺。因为第一，政府的权力是垄断性强制权力；第二，政府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由人组成。这都使得约束政府非常困难，除非有特殊机制。

亚当·斯密强调市场经济在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的情况下照样可以达到效率。但是，当我们讲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时候，就必须认识到，好的市场经济是不能自我维持、自我实现的。它需要好的制度来支持。所以，一旦我们深入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就不能把好的制度的支持当成是现成的，英文叫“take for granted”。我们现在看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在100年前出现过，后来大部分解决了，虽然还有问题，像刚才举的储贷协会中的掠夺问题，但不是主要的。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就不能忽视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诺思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就是好的市场经济的产生相当偶然。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市场经济体制起源于英国，而且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1215年自由大宪章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间相隔400多年，反反复复，直到1688年以后才稳定下来。光荣革命的结果使议会的权力对政府的掠夺有了约束，这是很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上都是从英国来的，并通过其殖民地传到全世界（包括美国）。

维持好的市场经济也是艰难的，它会受到利益集团的颠覆，譬如阿根廷。强势集团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让政府限制进口、提高关税，或者限制竞争者进入。弱势集团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俘获政府。阿根廷在20世纪40年代采用了“均贫富”的民粹主义政策，把工资提得非常高，结果压制了经济发展。阿根廷由原来的发达国家变成现在的中等收入国家。所以颠覆好的市场经济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法治。法治的高明之处就是把政府和经济人都置于法治的框架之下，这样，法律既通过政府实施，同时也约束政府。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这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与法治（rule of law）之间的根本区别。以法律为工具来治理国家，这是中国法家的思想，与法治是不同的概念。法治的第二个作用

是约束私人。因此，法治可以约束两种掠夺。但是“以法治国”只能约束私人，不能约束政府。

所以在法治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一定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有限政府是说对政府掠夺要有约束，有效政府是说对私人掠夺要有约束。用这个分析框架来看，转变政府职能，就是从一个全能、无限的政府转变到一个有限、有效的政府。

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一个法治的制度基础。而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况呢？第一，26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绝对是真实的，但今天我们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我们的人均GDP按照汇率比价是1000多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是4000美元左右，在全世界仍然排在100名左右。第二，我们的制度仍然处在一个低质量的水平上。很多关于市场制度建设的指标，比如政府的透明度、司法的独立性、法庭的有效性、产权的保护程度、政府的监管能力等，我们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后的。从今天讲的两种掠夺的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社会治安问题，也不是通货膨胀问题，甚至也不是高税收问题。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官员腐败。

从长期来讲，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维持好的市场经济的方向。当然这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能建好的。我国加入WTO已经进入第四年，还有两年，过渡期即将结束。当前重要的是要抓住时机，加快改革。

总之，今天我讲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并不特殊，应该汲取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教训。第二，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努力建成好的市场经济。第三，坏的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它不能约束两种掠夺，即私人掠夺和政府掠夺。第四，掠夺表面上是公平问题，但深层次是效率问题，是经济活力问题。第五，好的市场经济能够约束这两种掠夺，它的制度基础是法治。

---

1. 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演讲。

《物权法》的经济逻辑[注]

（2007年4月2日）

法治基础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它由多个重要方面组成，关于财产权利的法律是其中最基本的方面之一。那么，近日通过的《物权法》是否有助于“好的市场经济”形成呢?

过去几十年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家比较一致地认同这样一个逻辑，即产权决定激励，激励主导行为，行为影响效率。经济学中讲的效率表现在“蛋糕”能否做大，经济发展是否比较快，以及是否可持续。界定清晰且安全的产权，使人们有激励从事增加社会价值的活动，从而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

但现实世界中，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简单易行。经济学家发现，在任何经济中，产权都受到两方面威胁，即来自私人的和来自政府的侵权或掠夺。这两种掠夺是造成“坏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近来的很多研究进展显示，走出“坏的市场经济”的共同途径是保护产权，其实质是既要防止私人掠夺，又要防止政府掠夺。因此，制定一部好的法律来保护产权的安全，是有助于“好的市场经济”形成的基本逻辑。

《物权法》确认的基本原则是各种财产的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就意味着私人财产免于其他私人的掠夺，也免于政府的掠夺；同时，公有财产免于私人的掠夺，也免于其他公有单位的掠夺。尽管不太可能一步到位，但从过去的公有权利优先到现在的平等保护，这已经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中的一个显著进步。

在中国，财产平等保护还有其特殊意义。中国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政府决定一切经济活动，没有私有产权可言。改革后虽然逐渐

有了私有产权，但没有法律来保障它的安全。政府权力天然地大于个人权利，几十年的思维惯性也导致人们对私有产权的歧视。对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来说，财产平等保护原则的意义也就更为重要。

财产平等保护还体现了“公平性”原则，对国有资产保护也是有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在公有和国有产权享有特殊地位的时候，国有资产产权并不清晰，掠夺和流失经常发生。而在平等保护下，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有效形成，经营者侵权行为不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还受到市场竞争制约。因此，平等保护会更好地保护各种产权，而对某一类产权特殊保护，不利于平等竞争机制的形成。

具体到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物权法》也有其特殊意义。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第一次在宪法中提出私有产权保护问题，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它需要具体法律来落实，《物权法》就是这方面的一部重要立法。

如果向前看的话，中国在当前阶段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能否较长时间地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能否不断降低发展中的制度成本？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目前中国已经从改革初期的低收入国家，整体进入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人均收入离世界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已经不是很远了。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即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国际比较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向中等收入行列迈进时，人们对产权界定、保护、交易的需求会大大增加。

首先，中等收入阶层有保护个人财产的需要。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也是整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逐步扩大，并逐渐成为各种收入群体的中坚力量的阶段。中等收入阶层有了一些财产，他们对通过

法律保护财产权利的需求会增大，因为以这一途径保护产权的成本较低。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会带来对公平、透明的法律环境的需求。

第二，私有企业有做大、做强的需要。现在，中国私有企业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也面临更大的国际挑战，有待于做大、做强。相对于许多国家很长的积累过程，我们的私有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才大规模起步，需要加速追赶。因此，我们要尽快纠正对私有产权的各种歧视，使本国私有企业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国际竞争。

第三，反腐败和发挥企业家精神的需要。近年来不少政府官员下台、企业家落马，都与法治不健全有关。在经济转轨期间，市场规则不清楚、产权不清晰，既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又遏制了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这些都需要以法律形式来保护财产。法律规定相对于政策规定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减少经营和创业的制度风险，也减少腐败的机会。《物权法》的出台，正有利于实现这样的好处。

---

1. 原载于《财经》2007年第7期。

再谈《物权法》的经济逻辑[注]

（2007年4月16日）

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谈到，《物权法》确立的各种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有利于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在其他国家，财产法是私权的立法。但在中国，《物权法》的很多内容涉及公法。理解这个问题只能从历史的角度看。

在改革前，中国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绝大多数是国有制。比如1978年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占78％，集体所有制占22％，私有制占比是零。在相当长时期内，在产权界定不清晰，特别是私有产权受到歧视、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我们发掘出了各种各样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内部“搞活经济”的变通办法。例如，国有经济内通过下放权力，产生出各种实质上不同的产权主体，即各级的地方国有制。这演变成了现在“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的状况，即法律上仍然是中央政府所有，但实际上容许地方政府行使产权的制度安排。这是历史条件形成的，对经济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同国家公有财产的演变历程是不一样的。例如美国政体是联邦制，各级政府是不同的法人，所以公有产权的财产组织方式一开始就明确界定，联邦政府财产有别于州政府财产，州政府财产又有别于市政府财产，即没有国有财产，只有各级政府财产。

中国的政体是单一制，而非联邦制。但经济学家认为，这并不妨碍对公有产权的界定，一些经济学家就曾提出“公有财产、分级所有”的建议。目前的“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是一种折中，既承认现状，又不放弃国有的概念。但在操作中，特别是涉及对外商务时，可能会出现尴尬局面。比方说，如果一家地方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受到

了外国的制裁，外国就有可能对中国任何一家国有企业进行制裁，因为它们都是国有的。

《物权法》仍然沿用了“国家、集体、个人”财产权利的提法。但其中有一条是，“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在前述背景下，这一规定就很有意义，它朝“法人所有”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可以纠正“国家所有”带来的一部分问题，尽管还不能完全解决。

例如，中央和地方国资委所属企业应该是市场中的平等主体，应按平等地位得到发展。但这种平等地位能否得到保障？总之，新的矛盾可能出现，需要通过修订法律，一步步加以解决。无论如何，从过去的“国家所有、统一经营”，到“国家所有、分级经营”，又到“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直到今天的“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每次都往前迈进了一步。

由于涉及体制和观念转变的重大问题，《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争议。应当说，不少意见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经济学家分析问题是以经济效率、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的，这也应该是《物权法》立法的主要目的。

当然，经济学家强调效率，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公平。事实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比想象的复杂，它不仅仅是通常的“得失替换”（trade-off）关系。

第一，世界上的很多问题表面上是公平问题，实则为效率问题，或者公平问题以外还有效率问题。例如产权保护，看起来是公平问题，但如果没有产权保护，人们的激励被挫伤或扭曲，最终会导致效率低下。

第二，实现公平存在各种途径，其中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方法通常成本都较高，而寻找成本较低的方法，必须通过研究效率才行。仅

仅有追求公平的良好愿望是不够的，如果只关注公平，可能不仅会降低效率，有时甚至会更不公平。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经济学家区别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机会平等对效率通常有正向作用，所以，经济学家赞成机会平等。虽然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关系，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一定反对结果平等，其关键取决于平等和效率之间得失替换的比率。

总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受保护的、界定清晰的产权给人以激励，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这一认同是有根据的。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研究都表明，在世界各国的不同历史阶段，产权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结果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改变。

经过一年多的争议，《物权法》终于出台。中国从过去近30年改革中所获得的巨大收益，当是其最重要的原因。经济学家支持“改革不动摇”，支持“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仅是因为相信经济理论，更是基于几十年来各国经济发展正反两面的事实，包括中国自己在过去半个多世纪走过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前后的对比所得出的结论。

---

1. 原载于《财经》2007年第8期。

法治是制度的基础设施㊟

（2010年12月17日）

10年前，2000年2月，我们为吴敬琏先生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我以“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为题发言，随后在《财经》杂志2000年第3期刊登。后来，我又扩充为一篇文章《市场与法治》。《财经》杂志也专门开辟了一个以“市场与法治”为题的专栏。经济学家关注法治，是很有意义的。

我在当时的这篇文章中有三个观点：第一，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而法治是根本。第二，法治对经济发展来说有双重含义：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同时，政府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得经济有秩序、稳定、公平竞争，因此政府要界定产权、执行合同。第三，法治的经济目的是使经济发展既有活力又可持续。

1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很大。按照人民币当年价格，2000年不到10万亿元，到2010年估计将近40万亿元，是2000年的4倍。若按照美元汇价，2000年是1.2万亿美元，到2010年，由于人民币升值，估计将近6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5倍。另一方面，法治建设虽然有进展，但是与经济发展很不对称。在上述两个方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近年来有所增加，客观原因是金融危机；而政府在维持经济秩序、稳定和公平竞争上，进展不大。这些观测也反映在系统的数据中。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中的“法治”指标（Rule of Law），中国在这10年间有上有下，总体而言没有什么变化。在0到100的区间内，中国在40左右摇摆。

有一种解读是我们不需要法治，照样可以干得很好。我不认为如此。虽然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增长上做得不错，但是法治是为了产权的安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以及创新的活跃。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差得远。政府的干预，有一些在短期看有好处。但是长期呢?

我仍然认为一个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不然经济发展就不能可持续。特别是现在，我认为比10年前更紧迫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没有比较健全的法治的情况下仍能持续发展的，从国际上看还没有先例。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它的政治体制是什么可以有争议，但它是法治国家，它的法治指数是80以上。

这里有一个长期与短期的问题。长期眼光和短期眼光看问题是不一样的。首先，从长期眼光看，今天我们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整体较低水平上，这时高速增长的潜力很大，所以我们能够支付得起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成本。但是中长期来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经济增速必将放慢，这是经济规律。因此，要想经济发展能够持续，目前的这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其次，从长期眼光看，就要做一些眼前成本高，但将来收益大的事情。很多体制改革，特别是大的改革，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一项好的改革，虽然眼前投入的成本较大，但是它使将来经济发展的边际成本变小。法治建设就是这样的改革。法治搞好了，产权是安全的，就不需要去拉关系，不需要去贿赂，不需要寻求保护，照样可以做生意，经济照样能发展。社会稳定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就不需要大量的维稳费用。这就减少了交易成本。

我们以物质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速公路做比喻。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基础设施很差。当时决定大量投资于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这种投资的特点是一次性付出较大的固定成本，但是之后使用时

边际成本就很小了，而且最终的平均运输成本比没有高速公路的时候要小得多。不修好路，短期也能走，但边际成本较大，而且平均成本也大。这在经济回报高的时候，也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当经济回报下降时，就会出问题。

类似的，法治就是制度的基础设施。这里的建设成本是制度改变的成本，这是游戏规则的改变，包括观念的改变、利益的调整。如果从短期来看，可能成本很高。但是法治的建立会大大减少将来的交易成本，最重要的成果是带来产权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和创新的活跃。这在眼前的高速增长期好像不重要，但是到了中速增长期，而这必然会发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需要较低的交易成本。因而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就是必不可少的。

10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很大增加。这使得建立市场的法律基础变得更加重要。最后，我想引用10年前我那篇文章的结尾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很适用的。10年前我说：

中国在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20年后应有新思维：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是我们下一个10年至20年的奋斗目标。

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大事，是方向，是全局。这不仅要打破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框框，更要打破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框框。法治基础的“有限政府”概念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是缺少的。依法发展经济更是新创举。但是，华人地区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在法治建设上的成功使得经济腾飞，给我们开了先例，因此我们应该有信心。

---

1. 在2010年财经年会上的发言。

法治的决定性作用 注

（2014年4月21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是对中国经济改革35年以来的争论、探索和实践的一个总结、提炼和升华，也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更高期待提供了一个根基、平台和跳板。

其实，这也是全人类探索经济运行机制100年来最终达成的共识。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不仅1/3人口的国家曾经实施了计划经济，即使在其他没有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中，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也或多或少地走上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模式。这是因为，在100年前，人们从市场的缺陷和问题中引发对非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强烈向往和追求，期望它们能带来经济效率更高、社会更公平的美好未来。20世纪的这个思想对教育程度高的知识分子和对生活贫困的劳苦大众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但是100年来的实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计划经济国家，无论是在立志赶超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人们最终发现，那些美好的愿望和设想带来的却是相反的结果。今天，我们获得这样一个共识：至少在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比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经济运行模式。这就是我们比100年前聪明一点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认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那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又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法治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我要说明，要想

真正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前提条件是要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从全球的经验事实来看，虽然高速增长的经济不一定是发生在以法治为基础的经济中，虽然低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也不都是法治的经济，但是，高收入水平的、发达的、现代的经济都是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也是过去100年来的实践说明的，不管是前期的发达经济，还是新兴的发达经济，都是如此。这些经验事实也是我们比过去聪明的地方。这些不是偶然的事实。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是不能自我持续的（self-sustained），必须要有制度支撑。这个制度是什么呢？人类至今的探索发现，法治是对市场有效的并且是唯一有效的制度支撑。这一判断正在成为另一个共识。

法治在市场经济中起双向作用。一方面，经济人——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的自我约束能力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外在的共同认可的规则，即法律的约束。产权的安全性要防止其他经济人的侵权，合同的执行也需要法律的保障，经济环境的安宁需要秩序的保障，竞争的市场必须要有法律的保护。我们说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没有法治，是不可能的。统一的市场，就不能是分割的市场和有地方保护的市场；开放的市场，就不能是封闭的市场；竞争的市场，就不能是垄断的市场；有序的市场，就不能是混乱的市场。维护所有这些，都只有在法治基础上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通常是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障碍，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当今中国。如何在制度上防止政府的任意行政干预？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并且逐步缩小其范围是一个正确途径。政府所有权力都在清单上列出，除此之外的事项，都由企业、家庭、市场决定。这与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是同一性质的，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清单之外的权力都归市场。而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只有在法治的规则下才能实施。

因此，法治既约束经济人，又约束政府。在法治之下，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时，标志性的问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保持距离型”（arm's length relationship）。只有企业与政府都在法律之下，才能谈得上保持距离。如果政府在法律之上，企业在法律之下，那就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企业远离政府，要么企业亲近政府。两者都不是保持距离型。前者是企业对政府的躲避，并不容易；后者则带来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除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之外，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也需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维护市场秩序要靠法律约束，纠正市场失灵要靠适度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要靠依法征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要靠可预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社会公正要靠公正的程序。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法治。

建设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挥法治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关注三个方面。

第一是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既体现在正力量，也体现在负力量：正确的思想带来巨大的正力量，错误的思想带来巨大的负力量。中国古代文化中法家的思想也强调法律，但是核心思想是“用法律来统治”，英文是“rule by law”。我们长期受这个思想影响。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法治。我们今天说的法治理念、法治观念，虽然也强调法律，但是核心思想是“法律的规则”，英文是“rule of law”。它的意思是说，所有社会成员，包括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等，都要在统一的法律规则之下，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以超越这个规则，政府也不例外。因此，法治不是指政府用法律工具来治理国家、治理经济。法治是所有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因此，要理解现代法治观念的精髓，就要破除我们的传统思想中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这一观念。法律的“政府工具论”是法治建设的思想障碍。

第二是制度的保障，特别是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法治是一个大概念，具体落实必须要有精致的制度安排。比如，为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地方法院、检察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就十分必要。这其中的制度设计的道理是：如果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的管辖区完全重合，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之下，司法就很难不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法律无法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再比如，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是非常自然的。异地审判是一种对策，但是更加根本有效的制度设计应该是双层司法体制：中央的司法问题归中央司法，地方的司法问题归地方司法。比如一个省生产的汽车不能在另一个省上牌照，就是中央的问题，因为它妨碍了统一大市场，这与问题的大小无关，与问题的性质有关。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取决于这种司法制度的安排。

第三是企业家的推动。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生存的土壤；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积极推动者。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限制企业的法律太多，约束政府的法律太少。企业家们都明白，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中，企业家是弱势的，在权钱交易中，更多情况下是迫不得已。所以，从保护自身的利益出发，企业家应该积极推动市场的法治建设。

在更高的层次上，我认为，企业家积极推动法治建设，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应该作为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企业家关注的问题在变化，从开始时的管理问题，到后来的产权问题，再到今天的法治问题。这是时代的进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绿公司年会，多年来坚守企业家个人的道德操守，坚守企业的伦理是非，从事各种公益慈善事业。这些都非常重要。不过，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家们责无旁贷，它应该是企业家社会责任中的重要部分，更应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绿公司年会的社会责任之一。

最后，我想说，以上关于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话都是围绕经济问题中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谈的，因为这是我们当前关心的重点。然而，法治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加深刻的一句话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我相信法治也占据核心位置。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仅仅靠经济学家的知识就不够了，还更多地需要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多方面专家学者的智慧。不过，我相信，如果市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法治也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大有希望。

---

1. 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的演讲。

第三篇 学理与中国

第九章 经济学家的思想

哈特：基于不完备合同的企业理论(注)

（1998年8月）

哈特（Oliver Hart）教授的这本专著用非数学的语言汇集了他10年来的产权、企业和财务结构方面的理论贡献。哈特教授是运用现代合同理论研究企业理论的开拓者，这本书无疑将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经典之作。

哈特视企业为实物资产的集合。他的理论基础是合同的不完备，即合同双方不可能详尽地把全部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的责任和义务写进合同。在合同没有写明的情况下，对资产有控制权的一方便行使权力，由此便引出权力和控制权的配置问题，这一配置问题将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率。在本书的第1篇中，这一基本想法被用来发展关于企业边界、企业合并的新理论。这一理论的目的是回答科斯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有的交易通过市场进行而有的交易在企业内部完成？在本书的第2篇中，这一基本想法被用于研究企业的财务结构问题，即股权和债务的特征及其激励作用。

贯穿于全书的基础是合同的不完备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和控制的有效配置问题。这是哈特的“新产权理论”与“旧产权理论”的重要差别。旧产权理论强调对资产的剩余收入的索取权，而哈特强调的是剩余控制权。哈特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基本。况且，对剩余收入的索取权通常有众多人共享（比如工人的奖金，甚至政府的税收都可算作剩余收入的一部分），相比较而言，剩余控制权就少共享。

企业是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和制度形式。理解企业是理解其他组织和制度形式（比如非营利性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基础。本书的基本想法和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研究企业，也可用于研究其他形式的组织和制度。当合同不完备时，权力的配置将影响效率，我认为由此可以解释各种组织形式和行为。

产权和企业是我国目前经济研究和经济改革的热点。哈特所开拓的新的企业理论对当前主流微观经济学有重大影响，这本书是现代经济理论的前沿著作。中文版的及时出版对开阔我们的思路，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产权和企业的理论水平将有积极的影响。

---

1. 为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中文版）所作的序。

米尔格罗姆、罗伯茨：经济学运用于组织和管理[注]

（2004年7月）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两位教授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企业组织和管理的开创者。他们合著的这本书也是第一本把有关企业组织和管理的理论前沿研究汇整为一体的著作。

这本书有三个特点。第一，它的理论内容广泛，包括了这一领域几乎所有的重要专题，并对这些专题提供了全面的、最新的理论方面的介绍。这对于关心理论前沿的学者极具价值。第二，本书引用了大量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既用于阐明理论，又进一步延伸了理论。在这个方面，本书不同于其他的经济理论著作，对企业的实际工作者十分有用。第三，尽管本书介绍了许多研究前沿，但使用了较通俗的语言，使得任何大学本科和MBA（工商管理硕士）都较易读懂。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本书出版后深受好评，并被美国许多学校采用为教科书。比如，在斯坦福大学，米尔格罗姆教授用此书教过本科生，罗伯茨教授教过MBA学生，同时，它也被用作高管培训的教材。该书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包括日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捷克文，并被欧洲、亚洲、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许多大学广泛采用。

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特别是博弈论，以及应用这些理论研究企业和市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理论、产业组织和企业管理领域，他们合作或独立发表了许多论文。他们最近的研究包括企业的商业战略、企业组织结构、国际商业、拍卖的设计，以及新创造的产权（比如通信频率）的市场制度的设计。由于他们与商学院的紧密关系以及对实际案例的关注，他

们研究的理论问题大多与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的研究对日常的公司管理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本书介绍的经济原理普遍适用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这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更有特殊的价值，而且很及时。企业改革已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关键。过去20多年的经历表明，企业改革需要对产权、所有权、激励机制、协调机制、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内部组织等诸方面有新的思维。本书把企业看作一个完整的体系，为我们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运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读者不仅可以获得对问题的深刻认识，也可以学到不少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方法。本书包括的许多案例介绍了企业如何更好地设计激励机制并实现更好的协调。这本教科书同时兼顾理论与实践的各方面，这是极其难得的。

1994年夏，米尔格罗姆教授曾访问中国，在北京参加了企业改革研讨会（即“京伦会议”），并会见了朱镕基副总理，探讨了中国的改革。在那次访问中，他也参观访问了广州、顺德、中山、珠海和深圳的一些企业和银行。罗伯茨教授在1997年秋也访问了中国。两位教授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展有浓厚兴趣。

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教授是我在斯坦福大学执教时的同事。在那段时间里，同他们的接触使我在学术上受益匪浅。我们三人也曾合写过一篇论文。随着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我相信中国的学生、学者、经理和干部也会从中获得学术上的收益。

---

1. 为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经济学、组织与管理》（中文版）所作的序。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贡献[注]

（2007年3月）

中国金融出版社推出中文六卷本的《斯蒂格利茨经济学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展示了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对现代经济学科的学术贡献。10年前的1997年5月，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在中国面市时，曾经掀起购书热潮，销量达10万册以上，创下当时的销售纪录。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是1998年陪同斯蒂格利茨教授来中国人民大学讲学时目睹他签名售书的盛况。中国的广大读者多是通过这本《经济学》教科书认识斯蒂格利茨的。时隔10年，《文集》出版，这使得中国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他的论文原文，来理解《经济学》教科书背后的严谨理论。阅读经济学论文原文，对于深入理解现代经济学并以此为基础从事前沿经济学研究，是不可替代的。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是最为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至今发表了数百篇经济学的学术论文，而这次收集在六卷本《文集》中的107篇论文还不到总数的1/4。另一位当代多产的经济学家是萨缪尔森，他是斯蒂格利茨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的导师。有趣的是，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都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盖瑞市（Gary，Indiana）。一个不大的美国中西部城市，出了两位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在为斯蒂格利茨写的一封推荐信中说，“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纳州盖瑞市出来的最好的经济学家”。不知情的人会以为这是一句不太恭维的话，但知情人便知道这也许是萨缪尔森写出的最强有力的推荐信了。

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现在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某个领域，但斯蒂格利茨则不同，他对很多经

济学分支不仅有兴趣，而且也有研究。有一次在美国经济学会会议登记时，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一栏中填写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涵盖了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他的学术研究的广泛性充分体现在这本《文集》中：《文集》的第一卷、第二卷是信息经济学，第三卷是微观经济学，第四卷是宏观经济学，第五卷是公共财政，第六卷是发展经济学。在每一个领域，他的研究既有奠基性的理论工作，也有对于具体问题的应用。

斯蒂格利茨对现代经济学的诸多贡献中，公认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面，特别是对不对称信息的研究。这使得他成为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因此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也因此在1979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的克拉克奖（Clark Medal）。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一次只颁给一个人，是除诺贝尔奖之外经济学界荣誉最高的奖。

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对市场交易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制度安排。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们发现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更是不对称的，这会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不对称信息由此成为经济学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并对经济学的各分支产生了巨大影响。斯蒂格利茨在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把他在理论上的洞察力，应用于看上去没有关联的不同市场。

举例一，土地市场。在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是普遍流行但又费解的一种合同形式。他的研究发现，如果考虑到实际中农民比地主掌握更多的有关生产的信息，那么比例分成制就比固定地租的合同形式更有优势。举例二，信贷市场。斯蒂格利茨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即借款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之别，但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而贷款人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推导出降低利率反而有可能使贷款人的利润上升，因为借款人群中低风险类型的

比例会因此而上升，这可以缓解贷款人面临的逆向选择。由此而来，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不受干预的市场均衡利率上仍然可能造成需求量大于供给量。举例三，劳动力市场。斯蒂格利茨将不对称信息引入劳动力市场，比如雇主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雇员工作的努力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会出于利润的考虑，给雇员高于市场价格的工资，以激励雇员努力工作。这种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被称为"效率工资"。其结果是市场均衡时的工资会使劳动力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造成失业。这一结果是在工资是灵活的条件下得出的，因此很有意义。

以上几个例子的原始论文都已经成为经典论文，都收集在这次出版的《文集》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率的。但是，这并不能立即推出其他的资源配置方式，比如计划或政府干预，就一定会比市场更优越。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即信息不对称，反而会限制，通常是更大程度地限制计划或政府干预的作用。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第一卷的引言中所说，理解信息不完全性的影响，不但有助于我们厘清市场为什么失灵的原因，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他替代模式，比如计划和政府，通常也会失败的原因。引入不对称信息，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发现市场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发现市场的一些还不为人们所知的潜在力量。在市场经济中，决策是分散而非集中的，这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有效地利用分散的信息，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可以导致新信息的提供。所以，引入不对称信息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市场和非市场的运作，更加现实地比较各自的有效性。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改变了我们认识经济行为和现象的方式，也为我们分析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我个人有幸同斯蒂格利茨教授相识近20年。在我从哈佛大学即将取得博士学位找工作时，斯蒂格利茨正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他当时曾经面试我，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兴趣。后来我们在斯坦福同事多年，对我的研究非常支持和关心。在课堂上，我讲授过他的多篇论文。在研究中，他的论文和同他的交谈对我都有很大帮助。我和他一

起合作完成一篇论文，这次收录在《文集》的第六卷中。斯蒂格利茨教授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极为关注。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不久，我和他一起从香港到珠海、深圳、广州等城市考察。我特别带他参观了广州的农贸市场。当他看到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极其兴奋，说这不能叫作高增长，应该叫作超级增长。他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演讲时，发现一个本科生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后来我们一起推荐这个学生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这位当年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杜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我们还一起到岭南学院王则柯教授的家里做客，这在王教授后来的文章中被提起。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

1. 为《斯蒂格利茨经济学论文集》（中文版）所作的序。

马斯金：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注]

（2007年11月）

10月15日，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他们分别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Leonid Hurwicz）、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马斯金（Eric Maskin），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迈尔森（Roger Myerson）。

可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的距离从来没有这样近过：其一，三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有一些中国学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是赫维茨的得意门生；马斯金共有五位中国弟子，目前全部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分别是院长钱颖一、特聘教授许成钢、人力资源系教授王一江、金融系系主任李稻葵和经济系系主任白重恩；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朱天是迈尔森的高足。其二，借助于机制设计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研究在过去十几年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一支，而用机制设计理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为比较经济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和参照。在这方面，马斯金的五名中国弟子做了大量有影响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已成为比较经济制度研究主流文献相当重要的部分。

10月23日，曾经师从马斯金的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和白重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就机制设计理论的原理、如何用机制设计理论解释中国经济、马斯金的风格及学术贡献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理解机制设计理论

记者：对于大多数国内学者来说，机制设计理论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请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理论以及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

贡献。

钱颖一：机制设计是指给定一个组织的目标（比如企业的利润、政府的税收、经济的效率、社会的公平），是否可以和如何设计一套游戏（或博弈）规则，使得每一个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在掌握私人信息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行事，其最终博弈结果能够达到该组织设定的目标。

三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是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它包括了三个基本概念。其一是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就是在设计机制的时候，要考虑一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人们会利用自己的私人信息为自己的利益去做选择。也就是说，你设计的机制必须要与人们的自身激励相一致。赫维茨最早把激励相容作为一个约束条件引入机制设计问题。

其二是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在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下来设计最优机制通常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学问题。迈尔森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一个较为简单的数学问题。它所对应的是一组特殊的机制，即直接显示你的私人信息的机制，它们被称为直接机制。迈尔森证明了在寻找最优机制时，只考虑直接机制与考虑全部机制是等价的。

其三是实施理论（implementation theory）。给定一个目标，是不是可以设计出一个激励相容的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呢？通常在一个机制下有很多均衡点，有的均衡点能实现目标，有的则不能。马斯金研究了所有均衡点都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这被称为实施理论。

机制设计是一套分析问题的思路、框架和方法。机制是学术上的说法，对应到现实中就是制度和规则。你要达到一个社会目标值，就要设计一套制度，我们叫作机制，就是一套博弈的规则。当你设计这

套规则的时候，要考虑所有人都会对你的这套规则做出反应。就是平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是在知道下有对策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设计出一套机制来实现企业、政府或社会的目标。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是可能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这就是机制设计理论要回答的问题。这里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严密的论证。

在获奖后的电话采访中，马斯金举了税收的例子。税收设计是机制设计的一个应用。政府想通过税收来改进收入分配，帮助穷人；但是又不想扼杀人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所以就必须在考虑人的积极性的情况下做平衡，设计出既能帮助穷人，又能使由此带来的对人的积极性损伤最小的机制。

白重恩：一般的博弈论是给定了博弈的规则，来预测博弈的结果。而机制设计正好是反过来：先有一个目标，希望得到某个结果，然后找一个博弈规则来实施这个结果。从这个角度讲，机制设计是一般博弈论的一个逆过程。当你要找这个解的时候，有很多种博弈规则可供选择，需要搜索的范围特别大，基本上没法入手。显示原理把搜索范围一下子缩小了，本来你要在一片大森林里面找一棵正好符合标准的树是很困难的。显示原理说，你不需要在整片森林里面找，只要在某个小山包上找就行了，在这个小山包上找到最好的，就一定是全部森林里面最好的，而且这个小山包很特殊，它可以用数学表达式来刻画。马斯金的工作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目标是可以实施的，什么样的目标是没办法实施的。就等于说你提供一个方程，马斯金的工作告诉你这个方程什么时候有解，什么时候不可能有解。当然这个方程很复杂，因为它的自变量是机制，机制有很多很多，而且你需要考虑所有人，他们知道你要设计这个机制，对你有对策，难就难在你知道别人有对策，还能设计一个能达到目标的政策，或者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没有办法达到既定目标。

钱颖一：从历史上说，机制设计思想的源泉得追溯到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兰格就计划与市场进行了一场大争论。计划经济到底可行不可行？哈耶克说不可行，兰格说可行。为什么哈耶克说不可行呢？他说因为信息太复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等信息传导到计划体系的中央部门，就太迟了，而且也不可能准确。而市场经济可以充分利用分散在个人和企业中的信息，并通过市场价格整合信息，这是对信息最有效的利用。这就是哈耶克的主要洞察力所在。

有趣的是，赫维茨正好在十月革命那一年（1917年）出生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之后移民到美国。他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理论上怎么证明市场经济可以有效地利用信息，而计划经济则不能？他比那些仅研究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要宽，他要比较所有机制，其中既包括分权式的市场机制也包括集权式的计划机制，看到底哪个更有效率。到了70年代，赫维茨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任何其他机制都不会好过市场机制，尽管市场经济本身也有很多毛病。他的研究工作是思想非常深刻的工作，同时他又能用数学证明他的结果。

我们通常讲的制度，把它变成数学模型之后就是一个机制、一套游戏规则，在这套游戏规则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为自己谋利益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之下，研究最优机制的设计，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可以想象它的应用是极其广泛的。

王一江：市场本身就是制度，这个制度能不能充分使用信息，达到社会最优？这本身也是需要设计、需要证明的。市场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除了这个机制以外，其他机制有没有可能来代替它，比它运作得更好？比如在市场中，对公共品就没有办法设计出一个有效率的分权式机制，既让所有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付费，又能达到社会最优的公共品供应量。所以，社会往往采用税收的办法来筹款，用来支付公共品。

马斯金的思路就是思考经济制度时，要放在这个框架里面。考虑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去使用信息，然后为了达到某个目标，你能不能有一套规则来实施你的目标；而且实施目标时，成本是不是最低。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看整个中国的改革。

钱颖一：马斯金和他的合作者对“软预算约束”的研究就是他结合制度设计与改革现实的一个范例。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概念是我们研究和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重要概念。这同标准教科书中的“硬预算约束”形成了强烈反差。科尔奈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权威，他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畅销中国。从1985年开始科尔奈到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成为马斯金的同事。尽管“软预算约束”已被广泛应用，马斯金仍想从理论上搞明白究竟为什么市场经济产生“硬预算约束”，而计划经济产生“软预算约束”。

在90年代初，从机制设计的角度，他给出了一个有关“软预算约束”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首先把预算软或硬转化为博弈论中的标准概念，即停止再贷款威胁这一承诺的可信性。然后追究这一承诺在不同体制中可信性的不同。他论证，其中的原因是对资本或信贷的集权和分权。相对于集权式管理，分权的一大优势是承诺的可信性，这是因为在分权情况下，信息的传递不够好，这就使得事后的重新谈判变得困难，从而使事先的威胁成为可信，也就使得预算约束是硬的。

马斯金发展的这一模型成为对“软预算约束”研究的重大突破。他把现实中观察到的普遍现象变成了博弈论模型；他把预算约束的软与硬同集权与分权联系在一起。有了这一模型，对“软预算约束”就有了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我和许成钢在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

马斯金的中国学生

记者：请谈一下你们对马斯金的认识和他对你们的影响。

钱颖一：马斯金在他为科尔奈编辑的一本书的前言里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对我个人来说，和科尔奈交往的最大回报——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极大亮点——就是我们一起指导了一拨中国学生，他们都对中国经济体制怎么运作深深着迷，这些学生去找科尔奈，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有无以伦比的专业知识；同时他们找我，是来求助于现代经济理论的工具。对我来讲很荣幸和科尔奈一起来培养这些学生。"科尔奈对社会主义中的体制问题有敏锐观察，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正好为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特别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这个问题的最佳导师组合。

马斯金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学者，他不但对数学上很抽象的经济理论研究有很大的成就，而且对货币、拍卖、政治制度，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集权和分权等问题都有研究，因为这些都牵涉机制和制度。他非常有兴趣地把他的机制设计理论用于观察这些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他遇到了科尔奈，遇到了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我们和科尔奈一样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计划经济制度有着切身感受。马斯金非常喜欢和我们这些人一起交流、一起探讨，同时他在理论上又极其严格。他一定要把所有这些讨论都归结到一个可以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上，所有结论必须从最基本的假设推出。

马斯金1984—1985学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这一年是我在哈佛大学读书的第一年，我当时到麻省理工学院去听他的博弈论课。他从1985年秋季起到哈佛大学任教，直到2000年。我先找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做导师，他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顶尖人物。后来我发现我有兴趣的有关中国经济体制的问题，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没法研究，因为在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下，所有问题都只是价格问题。我当时看过科尔奈的书，知道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有很多制度性的问题。但怎样把这些问题变成博弈论的模型呢？我觉得激励问题和机制设计问题跟我们关心的问题更贴近，而马斯金的机制设计和博弈论

这一套理论应该是我要寻找的研究框架。所以我就去找了马斯金做导师。回过头来看，我是很幸运的。

1990年我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另外四位中国同学也找了马斯金做导师。1991年是王一江和许成钢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是李稻葵，1993年是白重恩。我们五人都是马斯金亲自指导的学生，毕业后又都到大学任教。目前，我们五个人又都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稻葵：是钱颖一告诉我们马斯金是一位好的导师。我从马斯金那儿学来非常严谨的思维，首先他对一个问题要反复考验，有时我选了五六次题，都写了十来页纸了，还是会被他推翻，说你的问题很好解释，不用做了。他对设问抓得很严，对假设抓得很严。这方面他严格把关，对我影响最大。

白重恩：马斯金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学生去找他，要跟他谈什么，要先给他一个文章的初稿，他会把这个初稿从头读到尾，每个句子都读一遍，这是其他老师很少做到的。因为对学生的文章看得仔细，他就能提出很准确、很有用的意见。他给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的训练是追求严谨，做任何假设都要问为什么，这是不是最基本的假设？为什么要做这个假设？能不能做一个更基本一点的假设？一直推到最基本的假设。在最基本的假设下建立模型，解释你想解释的事情。

王一江：马斯金对学生特别好，但是有一条，他很严格，很较真。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体会，到他办公室讲论文，推到某一步推不下去了，想跳过去，他的眼睛就瞪着你，十分钟一句话也不说，或者就是一个字“why”（为什么），让你解释。所有他的学生都有这个体会，这是最可怕的时刻。然后回去吧，下礼拜再来。

钱颖一：他虽然是研究理论的，但是对现实的证据高度重视。你必须要找各种研究资料来证明自己的假设。

王一江：马斯金是我们见到过的最谦虚的一个人，他永远都是讲从学生那里、从同事那里得到多少回报，包括科尔奈。对赫维茨也同样，得奖之后马斯金在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我没有在教室里直接做过他的学生，但是我认定他就是我的老师，这个奖我们三个人一起得，我们都是朋友、合作者。我跟他们两人都一起写过文章，但是赫维茨是机制设计理论之父，我现在可以承认每年问我谁应该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都提名赫维茨。但是我最近感到忧虑，是不是太晚了，毕竟他已经90岁了。虽然我得奖也很高兴，但是我更为他高兴。”他得奖首先不是想到自己多么多么有成就，而是首先想到别人。

在收到我们的贺信之后，他回信说：“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讲，有你们作为我的学生是我一生中的极大亮点，所以你们的祝贺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这么两行字，每一个词都那么平和而准确。

理解中国改革

记者：作为马斯金的弟子，你们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钱颖一：我们试图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框架，分析制度在中国怎样演变，分析制度的各种表现形式如何解决一般的经济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要么觉得不可理解，要么理解得非常肤浅。在80年代，中国的私有产权没有法律保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便由此推断，中国没有可能发展经济，因为不保护产权哪来的积极性？生产出来的东西随时都会被拿走，谁会愿意去生产呢？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比如说模糊信息、地方竞争、对外开放等很多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产权，弥补了法治不健全的缺点。这其中的机制，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一般人认为马斯金是技术非常强的人，他的数学好得不得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站得很高、看得很深、很有思想的人。如果只是弄

些技术性的东西，他就不会愿意跟我们这些人谈了。我们所用到的技术性的东西并不是那么深，我们更关注的是现实问题。

我们做的研究和他的有什么不同呢？他研究的通常是一个抽象框架，而我们更关注一些具体的约束条件，不少是中国特殊的约束条件。比如，中国的私有企业经常受打击或遭排挤，这就是我们的特殊情况；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是给定的条件；国有企业职工不能被轻易解雇，这也是国情，等等。你把这些因素放在他的框架里就会出现好多新结果。很多在国内改革中出现的看上去五花八门的机制，双轨制也好、乡镇企业也好、模糊信息也好、各地区争抢外资也好，都可以用特殊约束条件下的机制设计理论来解释。我们的分析框架是一般性的，即考虑到人的激励问题，但加进去了中国特殊的约束条件和起始条件。

记者：有了机制设计的思想，对于理解中国现实、中国的改革有什么帮助?

王一江：理解了机制设计，可以避免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几个坏习惯：第一个是只看目标、不谈机制的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比如说一些倡导民主、倡导市场的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走入那个状态，马上就能采用理想状态的最优体制。提倡要达到理想社会、乌托邦的人，只谈理想，而不考虑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种极端主义思维很容易主导社会舆论。

另一个极端是沉溺现实社会，垂头丧气，无所作为。经常有人会说我们做不了，因为现实是这样的。很多人强调中国的现实而无所作为，强调中国的现实是不错的，但是你要有作为，要去设计机制改革。几年前在国有银行改革之初，当时几乎所有外国人都说中国的金融系统没戏。但是中国找到了一个机制——注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你说这些办法是不是最完美的？肯定不是，但是国有

银行改革毕竟做成了。所以不要随便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没有办法。有机制设计这个思想，很多事情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白重恩：另一种误区认为机制是不可变的，给定这个不可变的机制，结果也就不可改变了。但机制是可以变的，我们在想怎么改变这个机制。我们这些人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其实都贯穿了这个主题。我们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不那么极端。

王一江：国内一些学者强调，西方经济学是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机制设计说明合适的工具是很有力量的。现代经济学有了机制设计这个理念之后，一大批学者都在用这个概念和工具，关注和分析中国制度演变的经验，解释职工下岗、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一系列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借助机制设计理论，我们对很多现象都是可以解释、可以理解的，甚至对这些现象的演进都有相当的预测，比如说乡镇企业，随着条件的变化它可能要消失，这是在当时条件下设计出来的最佳产权结构——模糊产权。在当时的思想、政治和其他约束条件下，非公经济容易感到不安全。乡镇企业因为成功借助了地方政府的保护，上面就不好随便干预了。而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这些手段就越来越没有必要，所以乡镇企业在跨越一定的历史阶段后就会消失，这在当时就是有预测的。

白重恩：我们这些人的研究很多都是关于过渡机制的，因为机制设计理论的视野很广，它不是只考虑纯粹的市场机制，或者只考虑纯粹的计划机制，在这两种机制之间还有很多变动，很多人根本不考虑这些中间机制。我们最主要的贡献是考虑过渡机制，就是给定中国的情况、过渡时期的具体情况，什么样的机制是相对最好的，是最适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随着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正机制，最后过渡到理想状态。这应该是我们这几人的研究工作的一个共同点。

水至清则无鱼与模糊信息

记者：现在公众都在强调信息应该公开透明，从而有助于相关方做出选择。但是我记得你们曾经提出，在当前阶段的中国，在有些情况下模糊信息比信息透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什么意思?

王一江：为什么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浑水是怎么在其中起作用的？中国曾经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长官意志高于一切。考虑到一些缺乏法治观念的领导者有可能用他的权力来谋私、来侵犯企业与个人的利益，你有一个什么机制来防范他？这是一个关于信息问题的讨论。

西方现代国家是用民主法治来限制任何一个当权者的行为空间。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还处在创建的过程中。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其他很多机制。不久前诺思（经济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清华大学演讲，就讲到了国家之间的竞争。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特点，哪个君王做得过头的时候，技术人员带着资金和技术就跑了，这也是一个机制，是竞争的机制。在中国历史上，碰到苛政猛于虎，人们就会到深山里去搞生产。

这些机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都不大好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模糊信息的机制来限制一些地方领导乱来，就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一般说的是信息越多、越对称越好。但是如果你把激励考虑进去，把制度不完善考虑进去，结论就不一定如此了。所谓制度不完善就是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

白重恩：即便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如果决策者能力有限，他看到什么事情就想做决策，也往往会做错，有什么办法呢？你可以限制他做事的能力，这样也就限制了他过多干预市场的可能性。比如说香港地区，当时英国人在那里的时候，他们知道没有办法管住自己干预市场的冲动，又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市场管好，干脆就不收集统计信息。不收集统计信息就是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在那种情况下是最优的。

王一江：你要求信息透明的时候，对决策者有两个要求：第一，他是好心的，他总是想做好事；第二，他想做好事的时候有能力做。这两个条件他都要具备，只要一个条件不具备，他就可能利用他掌握的信息做不利于市场的事情，可能是出于好心，可能完全是出于私利，这就是制度和机制上有缺陷，成了好心做坏事。还有动机问题，你要说他动机坏这也不一定，但政府有多重目标，它就可能会有损害别人的激励。

在一定条件下，如果信息模糊，产权反而可以保护得好，因为政府失去了干预的依据。1950年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共同签署了一份命令，要求加强现金管理。为什么要实行现金管理？这可以及时掌握经济生活中的动向，使得税收更加平等。加强现金管理，加强银行对企业流动资金的控制，主要目的就是获得信息来收税，而这个收税恰好是政府损害激励的表现。回过头来看80年代，中央发布了关于改进现金管理的意见，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当时可以看到大家提着大笔现金，天南海北去做生意，做完了以后政府没有办法查到谁赚了多少钱，也没法及时征缴税收，躲税避税就变得严重起来了。为什么躲税避税的行为变得严重起来了我们说它是好事情呢？这是因为当时政府也看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很多企业老老实实交所有的税费以及当地政府暗示你应该赞助的事项，已经超过了企业的营业总额，企业就无法生存了。所以改进现金管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有意鼓励避税。这是从激励机制的角度做的，如果不这样做，经济就搞不活。

50年代的想法是我不这样做就收不上来税，结果经济就搞死了。我在什么情况下既能收得到税，又能搞活经济呢？这就是刚才说的你的政策和他的对策来来回回博弈，最后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模糊机制在两个方面是很理想的，就是它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让政府收到了更多的钱，虽然政府收钱比以

前难了，但是保护了积极性以后，饼做大了，政府的实际收入也就大幅度增长。但同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腐败。

钱颖一：这个例子最难理解的一点是和人们倡导的主流想法（即信息透明）相违背。模糊信息既保护了你想要保护的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也会保护你不想保护的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这个机制的原理是一样的。

设计与自发演化

记者：说到机制设计，通常机制是由什么人来设计的?

钱颖一：有的机制是有意设计的（比如拍卖），有的机制是自然演化出来的，有的是两者都有。比如乡镇企业这种机制，有一部分是设计的，而另一部分是演化出来的。当时国有企业激励很差，私有企业很受歧视，这是给定的情况。有没有设计过机制呢？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要发展小钢铁、小化肥，就搞了集体所有制，既不同于国家所有制，又不同于私有制。但是，当时的设计者把乡镇企业局限在与农业相关的行业。后来发展到这么大，谁也没有想到。发展到这么大是包括企业家、村干部、村民在一起不断磨合，在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下面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的结果。它有红帽子，比私有企业要安全，同时又市场导向，不像国有企业那样被政府管得那么严。所以这种机制就变成了一个在当时情况下有生命力的机制。经济学家用“机制设计”来描述不同机制在比较中选取最优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一个人来设计。

白重恩：这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人们要记住历史。如果人们那么容易忘掉以前我们没有成功的事情，这就麻烦了。本来是失败了的东西，因为听上去太好了，就有可能又回来了。

王一江：是的，大家对计划经济怎么导致了贫穷、饿死人、人均GDP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又开始忘记了。现在只记得计划经济下的平等、安全感，记住那个时期犯罪率低，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产生了一些为富不仁、坑蒙拐骗的现象，这时一些人就开始想念起计划经济平等的、干净的、有序的状态。但计划经济激励是低的、生产力是低的、创造性是缺乏的。

钱颖一：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就是我们解放思想，不断推出新机制的结果。关于政府怎样约束自己的行为，机制设计理论中也有不少常见的机制，比如政府不要搞那么多机构，不要搞那么多人，有意不让政府有那么多手脚、那么多人去做事。

王一江：芝加哥学派的看法就是让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你让政府的钱很少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税收很少就雇不了很多人；雇不了很多人，政府的力量就不够去监督别人。一味强调加强政府的执行力，加强政府的调节能力，很可能都出于好的动机，但是效果也许不如初衷。

李稻葵：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方面有一些基本机制，比如我们会搞买断工龄。为什么要买断？机构改革的时候，每一个人手里都控制着一些信息，如果你让他个人的利益受损，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掌握的各种信息来给你说事儿，来说你的改革方案不对、不可行。改革必须要考虑大部分人的动机。双轨制比较好的一点是激励相容，在这种情况下，让潜在的受害者不要反对改革，利益不会受到伤害，甚至会有微弱的提高。这个思想跟机制设计完全相符。

竞争也是一种机制

记者：刚才王教授谈到了中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机制。在中国，如何通过引入竞争来建立机制？

钱颖一：大国与小国不同的地方在于，大国有很多不同的地区，地区之间也可以竞争。管理一个大国，永远会有一个集权和分权之间的权衡。集权的代价是容易扼杀地方的积极性，是信息集中导致的信息扭曲。虽然计算机可以处理很多信息，但这些信息是要人输送进去的，你怎么知道他输送的是正确信息？哈耶克早就看到了集权的成本。但是分权也有它的成本。如果你全都分权的话，一些有外部性的公共品就不能很好地提供。所以从机制设计角度讲，应该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平衡。这就是经济联邦制、财政联邦制的想法。

这里有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真正牵扯全国利益的问题，一般地说是像外交、国防、跟环境有关的一些问题，就是所谓外部性非常强的公共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提供。那么一般意义下的地区、本地的公共品提供，应该由地方政府来负责。还有一条就是：产品、资本、劳动力在各地区的流动，必须要由中央来管。跨地区的司法问题，比如跨地区的商业争议，应该是中央来执行。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一个不同，就是地方政府通常有很多个，它们之间有竞争，这个地方不好的话，人和资本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在这个意义下，竞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可以互相制约它们的行为。

但是没有类似的机制制约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唯一的，除非和其他国家竞争。所以开放比不开放要好，因为开放之后中央政府要考虑国家之间的竞争。引进外资为什么好呢？外资可以自由流动，不高兴就可以走了，这种情况下就和不开放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现在的改革和历史上的改革有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历史上通常是在封闭中搞改革，而现在是在开放中搞改革。只要一开放，所有背景就不一样了，所有博弈的过程也全都不同了。在开放状态下，资本可以走，人

可以走。自由流动产生竞争压力。开放以后，政府的行为就会受到竞争压力的制约，就会同不开放时的情形不一样。

---

1. 《经济观察报》访谈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白重恩。记者李利明、实习记者杨洋。

吴敬琏、科尔奈：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注]

（2010年1月27日）

今天我来参加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的国际研讨会，心情非常激动，也深感荣幸。虽然我不是吴敬琏教授的正式学生，但是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的经济学，比我从任何其他一位中国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都要多。今天，我在这里评论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吴敬琏教授、一位是科尔奈（János Kornai）教授——的两篇文章，我深感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我在1983年同时认识吴敬琏教授和科尔奈教授。当时我在耶鲁大学做研究生。那一年的秋天，吴敬琏教授到耶鲁大学做访问教授，我同他相识。从那个时候开始之后的将近30年时间里，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很多关于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的知识。其实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也有他的人格。也是在1983年，科尔奈教授到耶鲁大学访问，做了一个学术演讲。从那时候开始，我也认识了科尔奈教授。后来科尔奈教授到哈佛大学担任教授，我也到哈佛大学做博士生，成为他的正式学生。今天评论他的文章，我有点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坐在我身边的马斯金教授，也是我在哈佛的博士生导师。

应该说，在1983年我认识吴敬琏教授和科尔奈教授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从过去的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为一名经济学者。这两位教授首先都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东欧/苏联和中国这两类计划经济体制都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和研究，是在这方面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两位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我也想说，这两位又都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都有更为广泛的对人类命运、社会发展的关注，也都是坚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理念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们刚才演讲的两篇文章中，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他们不仅仅关注物质繁荣，也

关注人类文明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我同这两位教授不仅是学术上的同事，而且也是挚友。

刚才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对中国改革30年历程的回顾和反思，另一篇是对东欧转轨20年历程的回顾和反思。这两位学术大师的思想，应该说影响了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研究。下面，我想分三个部分来做评论。第一部分先对吴敬琏教授的文章做一些评论，第二部分对科尔奈教授的文章做一些评论，最后把他们这两篇文章综合起来，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吴敬琏教授的文章比他刚才的演讲更为丰富和全面，实际上讲述了中国过去60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历程。在刚才的演讲中，他只是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过去30年。他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他最后讲到“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时有四个方面：第一，经济的市场化；第二，经济的发展模式；第三，中国要建设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第四，中国要搞宪政民主。

整体来看他的文章，跟几年前相比，我感觉到他的忧虑相当之多。我想，这也是很能理解的。回顾过去1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也看到了其中的问题。

我们先看市场化这一维度。应该说在过去10年中，有进步的方面，也有倒退的成分。这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在舆论中，都有非常多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吴老师没有展开，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看的。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一些短期非常必要，也是有效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也不可避免地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甚至干扰了改革的整体方向。它会让人们将一些短期的政府举措误解为长期趋势，对市场化本身确实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个维度是发展模式。吴老师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呼吁，中国应该改变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在演讲中，他特别强调了东亚模式，并把它作为与西方模式相对立的另一种发展模式。现在几乎没有人认同计划经济模式，但仍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东亚的以出口为导向、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另一种是西方比较自由的发展模式。今天他特地把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提出来。发展模式转变，最开始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后来也得到了官方的赞同，并写进了五年计划、《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文件之中。但是，转变起来仍然非常困难。所以这里可能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探讨。

我有一个想法，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就是中国实行的开放政策对改革的作用。中国的改革，说起来很复杂，但在我个人看来，实际上就是“开放”和“放开”两个部分。改革，简单一点说，就是放开，开放就是对外开放。过去我们一般认为，它们是互补的，也即是互相促进的。比如，80年代初期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等改革者就是通过开放来促进很多改革。比如当有些改革很难在整个经济中实现的时候，就通过搞特区等开放的办法来推动。后来再把深圳特区的一些办法，把外企的一些办法应用到国内的企业。加入WTO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开放对改革很有促进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银行业改革。当中国加入WTO以后，承诺五年内开放金融业，这就成为促进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是一个承诺。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当后来出现了一些反对银行股改上市的声音时，正是由于我们的WTO承诺，使我们这项改革没有倒退，而且成功了。但是，现在出现了另一种迹象，就是我们的开放太成功了，变成了进一步改革的替代。恰恰是因为出口情况好，恰恰是因为国外市场大，有力地推动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国内改革的激励反而减少了。这恐怕也是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维度是法治建设。这让我回想起整整10年前，我们庆祝吴敬琏教授70岁生日举办的国际研讨会。那时候我还在国外，赶回来参

加那个研讨会。刚才李剑阁先生说，这是国内第一次为一位经济学家，以国际研讨会的形式来庆祝生日。这个会议我印象很深，会上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当时，我做了一个发言，强调法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把“法治”（rule of law）与“以法治国”（rule by law）进行了对比，强调现代市场经济应该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这个观点当时就得到了非常多与会者的认同，后来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法学界也都有不小的影响。

那么我们来看这10年的法治建设情况，则有喜有忧。这10年来，应该说在有些方面，中国的法治建设进步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法治建设在不少方面也有倒退的现象。在理念上，现代市场经济是否应该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共识已经不那么明确。这是一个很值得担忧的事情。吴敬琏教授一直批评的权贵市场经济就是一个缺乏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第四个维度是宪政民主。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很难评判。但是，吴敬琏教授的文章中，特别提出了当前的两种倾向，确实值得关注：一是民粹主义，二是民族主义。如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在知识分子、在执政者、在老百姓中都比较强烈，就很难想象宪政民主可以实现，甚至连启动都会非常困难。吴敬琏教授的文章和他的演讲，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未来中国发展趋势的元素。我想强调一下，供大家进一步思考。

下面我对科尔奈教授的文章做简短的评论。刚才青木昌彦教授对科尔奈教授的文章做了非常好的评论，我很赞同他的意见。所以我不想做特别详细的评述。作为研究东欧、苏联体制的权威，也是研究东欧、苏联转轨的权威，科尔奈教授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当然包括中国，都是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刚才李剑阁先生特别提到一些他最先提出的非常关键的经济学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考。

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自由、平等、博爱”本身很有意义，就是他并没有讲那些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关注的增长等经济指标。我非常想说明的是，他不是今天才关注这些问题的。记得在1986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见他，他给了我一篇他刚写好的文章，是关于经济自由的。我记得我们两人之间还有一次小小的争论，因为他那篇文章中特别讲到自由的“内在价值”不同于自由的“工具价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作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我们接受的教育、我们的传统文化，使我们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时候，至少是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就从来没有想过自由还有超越工具价值的内在价值。

所谓工具价值，就是利用自由作为工具，你可以实现某一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比如物质繁荣、经济增长等，这就是自由的工具价值。内在价值，是说自由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即使它没有给你带来其他结果。比如在他的文章中，他说个人创业本身就有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创业提供了就业，促进了增长。作为一个人，他有创业的机会和创业的权利，这就是有价值的。说实在的，在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我想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读者、中国听众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上的提升。因为中国的特殊历史，即历史上曾经是世界第一，但过去100多年灾难深重，使得中国人对民族独立、经济复兴、国家强盛的需求，超越了所有其他可能是更根本的价值。所以，我们只知道自由可以带来经济强盛，但忽视了它的内在价值。

这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的。在国内上课的时候，当我问到民主有什么好的时候，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民主可以保证决策科学、可以减少腐败；当我问到民主有什么不好的时候，所有回答都是民主会降低办事效率。由此可见，我们的很多观念，不管是自由、民主还是其他，都是看它们的工具价值，而且局限在经济结果的价值上。我们很少思考

甚至没想到思考它们的内在价值。所以，科尔奈的这篇文章，应该说对我们很有启发。

但是我也想说，虽然我评论说中国人对自由的内在价值没有考虑，专一地重视其工具价值，但在改革初期，这对改革还是有益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它避免了很多争论。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注的全是工具价值。我想这种结果主义或者实用主义，对突破当时的思想束缚，突破那种完全不讲实际的僵化思维，应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因此受益。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思想解放，并上升到新的思维高度。

最后，我想把两篇文章合起来评论。这两位大师讲的背景非常不一样，一位讲的是东欧20年转轨，一位讲的是中国30年改革。历史环境不一样，走过的路径也不一样，现在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不一样。中国是在高速增长，虽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而东欧国家受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较大，在物质上受的伤害可能更大一些。把这两篇文章合在一起，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东欧在西欧看来是东方，但在中国人看来是西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至少我觉得从中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虽然我并没有答案。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个问题，科尔奈教授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吴敬琏教授提出的市场、法治、宪政民主，这些价值究竟是普世的，还是只属于西方的？对这个问题，国内有争论，西方也有争论。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人类共同追求的根本价值，跟地域、历史和文化无关？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规律和原则，是不是普适的？是说东西方就是不同，中国有中国的转轨经济学，而西方有西方的转轨经济学，还是说基本规律是一样的，只是初始条件不一样，所以转轨路径各有不同？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即使我们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们还要回答，中国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是发展阶段的不同，还是历史文化的不同，还是其他的什么不同？进一步来说，中国的发展与东欧或者其他国家的发展，最终是殊途同归，还是分道扬镳？这也是值得思考的。10年前，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很流行。那么10年后，这是不是已经成为终结的历史？值得我们思考。

我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是从阅读这两篇文章中得到的感悟，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如果这样的国际研讨会能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它就一定会有长远的影响。

---

1. 在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国际研讨会暨吴敬琏教授80寿辰庆祝会上对科尔奈和吴敬琏文章的评论。

威廉姆森：经济变迁中的企业组织㊟

（2010年6月30日）

卢迈：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次研讨会。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教授第一次来中国，就参加“《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新书首发暨经济变化中的企业组织”研讨会。这是威廉姆森教授的研究领域。在他发言之前，我首先邀请钱颖一教授对他做一个介绍，因为钱教授对威廉姆森的理论和他的生平都有更深的了解。让我们欢迎钱教授。

钱颖一：今天我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去年的诺奖得主威廉姆森教授。自2001年起我们是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同事。这也是一种缘分。威廉姆森研究的经济学领域是与我们的企业最相关的。经济学有很多领域，比如说宏观经济等，但他研究的问题对企业的影响非常大。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他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法学院和商学院的三聘教授，这与他研究的领域相关，他把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管理学三个学科结合起来，并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而这个名词就是他命名的。他的贡献在哪些方面？经济学从古典的研究市场开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市场交易，买卖双方，有买有卖，有价格，这就是经济学。但是在经济活动中，我们发现经济组织实际上比这个要复杂。经济中有公司，有的公司还非常大，这是过去经济学没有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要有公司？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内部的组织与市场交易又有什么不同呢？20世纪30年代时，科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后来也因此获得诺奖。但是，从30年代科斯提出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一直到60年代，并没有太多人跟进他的研

究，经济学的主旋律依然是研究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到了70年代，通过威廉姆森的相关研究，有人说他重新发现科斯定理，实际上他做的工作远远不止是重新发现。

为什么说他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呢？制度经济学早就有，但是制度经济学直到威廉姆森教授之前，没有太大生命力的一个原因，是它缺乏分析，更多的是描述。这是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缺陷。人们会说，你描述的是很对，但这是同义反复，不能成为理论。之所以要成为理论，就是能做出一些预测，且预测要准确。威廉姆森把分析工具引入了制度经济学，所以就叫新制度经济学或者也称为制度分析。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他分析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它由哪些因素决定。

交易成本是一个概念，威廉姆森将这个概念具体化。交易成本体现为在市场上谈判、签约都会带来很大的成本。所以，在选择市场交易还是选择公司内部交易的时候，中间就会出现企业的边界。他提出的最简单的例子有：航空公司是不是也应该办旅游公司，汽车制造商是否也要办钢铁厂，钢铁企业是否要买铁矿？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交易成本来分析、预测。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测到企业是一体化的，它既办航空公司也办旅游，既生产汽车也生产钢铁，既生产钢铁也要拥有铁矿石开采权；什么情况下不需要这样，是分开的。为什么交易成本是核心呢？因为假定没有交易成本，根本不需要企业，所有交易都可在市场中完成。因此，交易成本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概念，还在于具体的、非常切合实际的分析。

威廉姆森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非常重视实践。60年代末他曾供职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那时候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概念很简单，除非因技术原因企业需要一体化、上下游联系，否则都应该拆分。他为什么还是法学院教授？是因为企业是不是构成垄断、是否要拆分这些问题都牵涉法律问题。他从这些现实案例中，

提出了企业一体化或者规模经营，除了技术原因外，还有重要的组织结构上的原因。而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不这么想问题。因此，他的研究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而诺贝尔奖就是要授予那些改变了人们思考方式和分析方式的人。

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很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重视经验的、数据的、现实的预测，这样它就可以检验。什么情况下企业采用外包的形式，什么情况下采用代理的形式，什么情况下采取一体化集权的形式，什么情况下采取分权的形式，这里有多种组织形式，但都可以用统一的理论框架来分析。

在来参加会议的路上，我也跟威廉姆森教授讲，邓小平开启中国经济改革做了两件具体事情，在这次他的中国之行中，都可以体验：一件事情是1979年成立一个公司，那就是中信；另一件事情是1980年设立一个特区，那就是深圳。从这两件事中可以体会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所以，虽然他对中信才刚刚了解，但兴趣极其浓厚。今天讨论的经济变迁中的企业组织问题，也正好就是他获奖的领域。我很高兴参加这次研讨会，也是在这位学术大师、常总和中信之间起桥梁作用。

威廉姆森：非常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也非常感谢刚才钱教授对我的背景介绍，他讲到了我的一些情况。我研究的是经济组织，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做一个解读，有时候我的解读会花很长时间，但我确实认为，经济组织的形式是有其经济学逻辑的，我现在仍在研究这个领域，并涉及我的工作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包含了世界上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比如钱颖一。

我最喜欢的就是“谜”。在来中信之前，我并不知道中信是家什么样的企业。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中信，我在车上问了钱教授一些问题，也和常振明总经理谈了一些情况，在这里我们又听董事长谈到了中信的历史。我没有想到，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我同意访

华的时候，我主要想讲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能了解中信。中信有很多有意思的谜值得研究，希望这本书能够尽早翻译成英文，这样我就可以更详细地了解中信，进行更具体的解读。

现在，我回过头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为什么要研究经济组织的历史情况。首先，我受过工科方面的培训，喜欢接触实际，我在斯坦福上了商学院，开始研究管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开始关注经济学。我的目标就是研究公司组织，而且，我试图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公司。经济学中标准的公司组织理论，是围绕着价格理论展开的，关注企业的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而实际上企业管理者有很大的自由度，他们在经营公司的时候，虽然追求利润，但同时也会追求自己的一些利益，这样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现象。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研究是否会有很大的成果。

成为教师后，我又读到了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著作《看得见的手》。他主要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在他的这本书中，讲到了企业的组织创新，谈到了现代企业的转型，现代企业内部有不同的职能部门，比如生产部门、财务部门、销售部门等，形成了一个层级结构。在这个方面，有些组织非常成功。他对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企业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通用汽车，它不仅有不同的部门、利润中心，还有不同的业务板块，其中每个不同的业务板块有自己的目标，形成了科层制，但它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竞争。所以，在竞争的时代，企业可以利用内部竞争，使得管理人员有激励去追求利润目标，而不是单纯利用自由裁量权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工作，希望改变研究方向，更多地研究组织创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时候，我们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开始研究组织创新，从历史上看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将来又会怎样。今天，我在这里听到，中国正在创造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很有意思，也非常有挑战性，我听到了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我也希望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解读和分析。

来自我过去经验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我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的工作，分析一些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和合同。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工业企业中，会建立起一些合同和联盟。新的组织形式有自己的技术来源，而技术是为了提高效率。但是，当时的假设认为，如果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缺乏技术和实体的话，会有反竞争的目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出现了，新的合同出现了。那时候，我们发现，不仅要从普通法的角度分析问题，还要从反托拉斯的角度分析问题。我发现，组织既可以创造效率，也会带来无效率。因此，反垄断局应该从更宽泛的角度来对待垄断问题，我试图传达这个观点，但并没成功。

后来我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教书，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对我早期的一些想法和20世纪30年代其他人引入的一些概念进行讨论。当时，我考虑的是，交易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而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分析复杂的经济组织时，应该考虑这一成本。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以前并没有找到答案。当一个公司需要一些部件来支持其生产活动时，它可以外包，也可以自己生产。那么，企业的这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呢？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前主要研究的是生产部门的设置，单位部门的设置，但是我们也需要从合同的视角，把企业看成是一种治理结构，建立这种治理结构是为了实现一些目标。也就是说，这种治理结构能够建立起一些手段，给公司内部带来一定的秩序，从而减少风险，实现互赢。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也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长期以来，人们都没能分析治理结构的目的。我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的治理结构，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我们还可以有混合型的治理结构，合作、规制、国有企业，这些都是不同的治理结构。我们需要分析这些治理结构的优点和弱点是什么，什么样的活动需要由市场来组织，什么样的活动需要由企业来组织，

什么样的活动需要额外的政府支持。这就是我从70年代初开始的研究工作，一直延伸到今天。

中信公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其实，没有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最佳治理结构，我们必须分析不同治理结构的长处和短处，然后看一下，中信这样一个企业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中信这种组织形式使我们意识到，组织的创新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要加深对组织创新的理解和研究。

钱颖一：刚才威廉姆森教授非常简略地介绍了他开展研究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他的背景不太一般，他本科在麻省理工学院念的是双学位，化学工程和工商管理。所以他说，他喜欢接触实际。因为他曾经学过工程。后来，他在斯坦福念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对很多理论问题以及公司组织很感兴趣。那时候，他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念经济学博士，当时非常好的环境就是交叉学科，有经济学、组织管理学和运筹学等。在当时非常奇特的另一点是，那时的教授中有四五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Herbert Simon）、莫迪格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米勒（Merton Mill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当时他们都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教授，威廉姆森是学生，另有两位学生后来也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基德兰（Finn 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ton Prescott）。同一时期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而且是交叉学科，这对威廉姆森教授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威廉姆森教授在谈到他的贡献时说，他很喜欢“谜”。他在70年代看了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一书，钱德勒是前年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商业企业史。钱德勒以20世纪20年代通用电气的组织结构为研究标本，对当时的通用汽车采用多部门制的利润中心，进行比较分权。这样的组织形式和这样的大公司，他觉得非常有意思。威廉姆森1975年的著作《市场与科层制》对钱德勒的书做了很多重要的介

绍，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后来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他讲到，企业里面的组织结构，到底是采用部门制还是采取职能部门比较集权的制度，可以用经济学的办法来分析，这是他讲的一个研究思路。

第二个思路就是他刚才讲的关于反垄断问题。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有的是合同形式，有的是代理形式，特别是企业纵向一体化，当时人们的态度非常不友好，无论是律师还是经济学家都认为，只要公司一体化或合并，找不到技术上的原因，就都应该打散，这是当时的整体思路。威廉姆森教授觉得这是个谜。他认为，除了技术原因外，还应更多地考虑组织方面的原因，组织既可以创造出效率，也可以带来无效率。他特别讲到中信这样的公司。他觉得，中信公司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案例，需要了解中信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行业，中信公司的这种组织形式必定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他会带着这个谜，继续思考、研究，跟他过去一贯的做法一样，碰到一个谜他就会研究它，有时甚至花10年以上的时间。

卢迈：我们请常振明总经理讲一讲关于“经济变化中的企业组织”。

常振明：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威廉姆森教授和钱颖一院长为我们这本书做一个研究课题。中信30年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企业组织变化，可以说，中信30年等于见证了全世界独有的企业组织转变的过程。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中国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有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不过，这个问题还在争论之中。

首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的转型是很艰难的，中信也仍然在艰难的探索之中。80年代的时候，中信所有项目在当时都叫拾遗补阙，也就是说在计划之内没有中信的，只能在计划

之外寻找资源、开拓项目，因此可以说，中信的资源配置是在计划经济之中，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为什么中信的发展、转型那么艰难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既不给中信配置相应的资金，也不提供相应的贷款，中信必须从海外融资。随着中国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随着国家配置资源转向市场配置资源，随着汇率机制的并轨，中信从海外借来的资金到了还款期的时候，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2元兑1美元，一下子变成了8元兑1美元。这使中信面临着一个相当艰难的时期。

其次，中信是一家国有企业，但是中信的DNA（基因）与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不是一个概念。30年前，我们都是国有企业，没有任何私有企业。我们的转型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向国有企业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而不是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产生的国有企业，这样的国有企业有三个职能：提供公共服务，保持经济环境的稳定，保证国家安全。而我们的国有企业，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向新时期下的国有企业，虽然仍是国有企业，但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我们的国有企业天生还有一个职能，就是谋求生存、追求利润、参与竞争。在中信30年的历程中，其中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竞争中发展。在国家配置资源转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很多国有企业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消失了，而中信则存活了下来并取得了发展。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二，得益于中信管理层，从荣毅仁到魏鸣一、王军到孔丹，从总公司到子公司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着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而言，中信公司从上到下都要比其他企业更深刻一些。

再次，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概念。除了中信是国有企业之外，中国的国有企业有14万多家，有中央的、地方的，甚至还有清华大学的校办国有企业。每个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可能都不一样。我为什么说探索呢，是因为我也想解这个谜，也希望能够得到威廉姆森教授和钱教授从理论上给予我们的指导，然后我们能够进一步在企业组织形式上

有更多的创新。昨天，我们全集团召开了业务协作会议，成立了协同部，把我们的铁矿石生产、运输以及上游的有色金属、特钢制造、物流、煤炭等所有公司都聚集在一起，探讨如何通过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来协调不同业务，发挥协同效应，使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我们更希望理论界、学术界、知名人士能够对中信的组织形式创新提供指导、提出建议。

---

1. 在中信集团成立30年之际举办的《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新书首发暨经济变化中的企业组织研讨会上的对话。

科斯与中国㊟

（2011年1月17日）

2010年12月29日是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100岁的生日。这一天的上午，中国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了“科斯与中国”的学术研讨会，在祝贺科斯教授百岁寿辰之际，研讨科斯的学术思想和它对中国的意义。科斯教授在美国芝加哥的家中通过网络视频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虽然会议召开的时候芝加哥时间仍然是28日晚，但是伦敦时间已经是29日凌晨了。对于出生在伦敦郊区的科斯而言，在中国为他举办的这个百岁生日活动一定是他在生日当天收到的第一份祝福。

科斯教授长期在芝加哥法学院任教，并非经济系的教授。然而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于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两篇论文，一篇是1937年他27岁时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另一篇是1960年他50岁时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对经济学以及法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他的名字永远地同交易成本、产权、企业边界、新制度经济学等术语连在一起。

科斯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科斯的学术思想自从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似乎比对西方的影响更大。也许是因为他的论文没有用到数学，浅显易懂。也许是因为他的理论基于直观的观察，使人容易接受。我以为不仅如此，其中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在我看来，科斯在中国有巨大的影响，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科斯的经济思想的深刻性，二是科斯所关注的问题同中国经济改革中面临的挑战有直接相关性。这两者的结合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对科斯的学说情有独钟。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科斯与中国。首先，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的研究侧重于市场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而科斯的研究超出了这个范围。科斯学说是研究权利（rights）和权力（authority）的配置问题，其中包括产权问题。由于权利和权力的配置往往是资源配置背后的因素和条件，因此科斯的思想是深刻的。同时，权利和权力配置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目前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来说，远比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更为基本，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多以清晰产权和健全法治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在中国恰恰原来并不存在，是需要通过改革建立的。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的转轨问题，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离不开研究权利和权力如何重新配置的问题。科斯的学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第二，科斯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新制度经济学不同于“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是分析性的学说，而不是描述性的学说。分析性的，就是指学说里面有推理、有命题、有度量、有检验。而分析中有一个核心抓手，那就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可观察的，可度量的。交易成本不仅局限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也包括组织中的交易成本，有时候也称作组织成本。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切入点，当我们研究制度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描述现象和探讨概念，而且是在理论上有推论，在实证上有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旧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注，但它的影响远超过后者，就是因为它是分析的，不是简单地对制度进行描述。正因为如此，它的理论是有力量的，既有解释力，又有预测力。这对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制度问题，极有意义，因为它指导我们摆脱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集中于通过推理导出可检验的命题，再去搜集经验证据，检验这些命题。这是研究制度问题的科学方法。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为了研究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交易活动和价格机制方面，为此也就把市场中的企业简化成

一个生产函数和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假定。所以，我们对市场的理解就是价格。但是科斯的学说让我们对市场制度的认识超越了仅仅是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认识。在科斯看来，市场交易、企业内部交易，甚至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等都是不同的合同形式或组织形式，哪种胜出是根据竞争和效率的原则决定的。这就让我们对市场制度的整体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解。这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极为重要。因为转轨本身就是重新界定企业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斯的学说让我们在分析制度转轨的时候，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已今非昔比。不过，中国经济的制度转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斯的学说对我们思考中国的制度转轨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他的学说是对权利（包括产权）和权力配置的研究，是以交易成本为切入点的分析性研究，同时又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整体分析框架。这就是科斯的学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中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基本原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他的思想在中国，不仅在改革初期，而且在目前和未来，都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

1. 原载于《财经》2011年第2期。

哈耶克：自由和市场的力量㊟

（2013年6月29日）

刚才两位从英国来的演讲人谈了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影响，三位从美国来的演讲人谈了里根总统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在座的多数都是中国人，我们对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邓小平先生的贡献，有亲身经历和体验。这三位领导人，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邓小平先生，他们有一些类似的想法和做法。而他们三位发挥作用的起始点又是在同一个时间：撒切尔夫人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里根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而邓小平推动的改革起始年是1979年。也许这是一个巧合，其实不是。伟大的人物之所以做出有巨大影响的事情，一定有其历史背景。这三个国家——英国、美国、中国——国情非常不同。但是，它们当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因此也是一个共同的历史机遇。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人类历史，就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在20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有过一种非常强烈的理想和追求，就是对计划经济、对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有着非常高的期望，希望能够通过政府来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使社会变得更公平。带来这种追求的背景是因为对“自由市场”的不信任，对它带来的经济不稳定和社会不公平的不满。应该说在100年前，这样的想法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教育程度高的人中，是很普遍的，而且这种思想发源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同时，这种思想对贫困人群也极具吸引力。

20世纪见证了这种思想的实践。不仅有1/3人口的国家完全实施了计划经济，即使在另外2/3人口的国家也实施了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除了少数之外，大

多数都走了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另一类是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的经济思想在相当长时间内占了上风。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中，政府主导经济的思想的影响远远超过今天经常谈到的诸如哈耶克和熊彼特的思想。即使在发达国家，不少经济学家都认同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甚至一定程度的国有制，认为这不仅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会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干预的另一种形式是建立福利国家，在高峰的时候，有些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率超过90%。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也是一个历史背景。计划经济尽管从理论分析上似乎是一种比市场经济更有优势的经济，因为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发现，计划经济都搞得不好，甚至出现很严重的灾难。这是一个事实。在那些并非完全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出现了非常多失败的例子。而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在70年代的时候也出现了种种问题。20世纪这些试验的结果，并不是像之前很多学者期望的那样。

当时有没有学者做出过不同的分析？有，一位重要的学者就是哈耶克。1942年，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都在认为一定程度的计划和政府干预是改进市场的好办法时，他写了《通向奴役之路》一书。1945年，他发表了一篇经济学文章，登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这是过去100年中被引用最多的20篇经济学论文之一，也是他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引用文章之一，标题是“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1960年他的著作《自由宪章》出版，传递了同一个思想，认为市场经济中人的经济自由极为重要，它使得原本分散的信息，通过市场，得以有效使用，因此，经济自由是有效利用资源和分散信息的必要条件。计划经济听上去很有道理，有计划按比例，但是，它不能有效地使用这些分散的信息，所以是没有效率的。

同样的先见者之中还有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62年他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传递的是同样的观点。这本书并不是他作为货币主义者的学术论著，而是作为对社会和经济整体看法的一本大众化、影响很大的书。即使在西方，这些观点和分析在80年代前还很难说是主流观点。

之所以现在人们认为他们的分析是深刻的，是因为过去这几十年的经验事实提供了证据，这些事实说明了哈耶克的理论预测是对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比100年前有什么地方更聪明一点，那就是这100年来积累了很多的事实和证据。尽管中国的情况、英国的情况、美国的情况非常不同，邓小平、撒切尔、里根在各自国家中面临的国情很不一样，但是人类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共同点，我觉得是相通的，因为面临相同的历史背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做了方向上一致但具体措施不同的事情。

这就进入了“20世纪的大逆转”时期，开始于1980年左右。撒切尔当时的顾问跟她说，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走中间道路最好。这个建议听上去很有吸引力，但是她回答说，“不，我们要走的是哈耶克说的道路”。当里根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说我们期望政府为我们解决经济问题，他说“不，政府才是问题”。在中国，我们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当人们要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邓小平的回答是：不要争论，先做起来，关键看是否三个有利于。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很多方面，但我觉得用两个中文字组成的两个中文词就可以概括其实质内容。这两个字，一个是“开”，一个是“放”；这两个词，一个叫作“开放”，一个叫作“放开”。1979年的时候，中国的情况与英国和美国非常不同：那时中国企业百分之百公有制，民营企业百分之零，外资也是百分之零。30多年来，我们从贫困、落后的极端，发展到现在，开始步入中等收入。我们现在与发达

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和调整力度，与美国和英国相比，要大得多。

回忆100年历史，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从追求和理想，到经过实践发现问题，然后再转向和调整。在这里，观念层面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学家争论的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个人，当然还有平等与自由这样深刻的问题。这里既有制度问题，也有价值观问题。最近看了一句话觉得很有意义。这不是一个理论命题，而是一个经验性的观察，是对过去这么多年实践的一个经验性概括，据说是以色列现任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说的。他说：

By and large, those in the world who placed freedom above equality have done better by equality than those who placed equality above freedom have done by freedom。

翻译成中文是：

一般来说，在这个世界中，那些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国家与那些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国家相比较，前者在平等方面要比后者在自由方面做得更好。

我觉得100年前我们没有办法说出这句话，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经验证据。经济运行是非常复杂的，你可以从理论上说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机制，但是到最后，是要看经验的证据。这么多年来我们比过去增加的不仅是理论上的洞见，更关键的是增加了经验上的观察，也就是历史的事实。我觉得他的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是一个重要的经验观察。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20世纪的凯恩斯主义也好，计划经济思想也好，都想解决两个问题（至少是初衷）：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不稳定，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例证；另一个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今天，

我们刚刚又经历了一次很大的金融危机。同时，我们也看到收入分配在几乎所有国家内部都比20年前变得更不平等（尽管在整个世界中收入分配变得更平等了，主要是因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的整体收入水平上升很快）。所以，这两个问题仍然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仍然是一个还没有结束的故事。

---

1. 在博源年会上的发言。原载于《财经》2013年第25期。

吴敬琏：用现代经济学讲述中国经济改革故事(注)

（2013年9月）

吴敬琏教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一书是一本具有国内外影响的，并被广为用作大学中讲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教科书。我10年前在美国大学中讲授“中国经济”一课，就向能够阅读中文的美国学生推荐这本书。2005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我把它列为教科书。过去10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EMBA课程时，这是我的唯一指定教科书。

这本书有几个重大特点都是其他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专著所不具备的。

第一，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之前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了解这段历史，就不能深刻理解改革的困难所在和改革策略的选取。这本书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概述，特别是对这期间某些改革尝试的描述，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对改革历程的讲解十分详尽。作为从一开始就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作者在这本书中全面概述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各个阶段的各个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作为市场经济的最早也是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作者在这本书中对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各方面的观察、评价和分析的水平，都是其他人很难达到的。

第三，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比较制度分析来贯穿全书。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本质的变化是制度的变化，是经济运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正是这个制

度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运用比较制度分析这一分析框架来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让似乎没有关联的事件变得具有共同性。同时，它也把中国经济改革放在了全球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中，在比较中发现一般规律，并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特殊性。

第四，正因为以上这些特点，带来了下面的这个特点，就是这本书是很少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书，它所讲的“中国故事”不仅让中国人觉得接地气，而且也让国际上的经济学家信服。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本书可以为真正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读者提供一幅全面的、有见地的、有学术价值的当代中国经济画卷。据我所知，如此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是前所未有的。”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说：这本书“运用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方法分析了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实践，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本重要的而且不能忽视的书”。他们都对这本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最后，作为一名教师使用此书作为教科书的体验：这本书对学生而言通俗易懂，使用效果好。

---

1. 为吴敬琏所著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所写的推荐文章。

哈耶克：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注

（2014年6月14日）

我仔细阅读了江春泽老师的这本书。这本书有26章，我只想谈谈第一章。因为我想很多人对第一章读得比较快，但是我觉得这一章非常重要，而可能熟悉这个话题的人并不多。

第一章是讲西方经济学界的一场争论，一直追溯到1902年。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的。1902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也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提出问题的这些学者和经济学家都是西方人。学术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和知识界对这样一个大问题的关注。这个争论后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本书中介绍了一部分。

作者在这本书里说了，计划和计划经济是两个概念。我想说的是，一个是学术概念上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和计划，还有一个是现实中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是两组概念，区分两者也很重要。在100年前的这场争论中，有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他是意大利人，有他的学生博洛尼（Enrico Barone），还有泰勒（Fred Taylar），他做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泰勒在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所做的主席演讲专门讲计划机制可能是有效率的。兰格（Oskar Langer）——他后来担任过波兰副总理——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研究，来论证计划的有效性。他们都是西方很主流的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计划可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持反面意见的一边像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罗宾斯（Lionel Robbins），特

别重要的是哈耶克。这是纯粹学术探讨，很有价值，对后来也非常有意义。比较经济体制就源于这场争论。20世纪经济学中有很多争论，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就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是市场还是计划。这场争论过程在书中有很多描述。

这场争论到了40年代造就了哈耶克的一篇著名论文，题目是“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于194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这篇文章是极其经典的，应该说是那场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要想回答为什么市场比计划更有效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直观上讲，市场经济是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自己做决策，而且自己做决策时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这看上去很混乱，怎么会有效率呢？效率是一个社会概念，不是个体概念。相反，“有计划按比例”听上去非常有道理。所以想证明市场比计划在资源配置中更有效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大程度上是反直觉的。

哈耶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分散信息和知识的有效使用。这是我们，特别是专家们，没有想到的。事实上，越是有知识的人，越不容易想到，越难以证明市场经济更有效，更容易证明计划经济更有效。但是，哈耶克想到了经济中的每一个人、家庭、企业拥有很多分散的本地信息。本地信息不是专家信息，这是关键。而且这些本地信息是随时随刻、因地因时在变化。哪怕是一个街头卖食品的人，卖伞的人，都知道因为气候的变化，冰激凌的需求怎么变化，知道因为天气变化雨伞的需求会怎样变化。哈耶克认为在一个经济中，只有最能有效利用这种本地信息的体制，资源配置才有可能最有效率。当然，仅靠本地信息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公共信息，那就是市场价格。他以此来证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

这样一个思路确实令人信服。但是，一般来说，越有知识的人越想不到这一点。我们太重视专业知识，那当然是计划经济就有优势，

因为它可以用专家知识来理性地制订计划。这是三四十年代的争论。

哈耶克的这一思想后来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突破。怎么能用严密的理论证明、完善和发展哈耶克的思想，是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最早探索这个问题的是赫维茨（Leonid Hurwicz）。1984年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请他到北京来讲学，让我给他做翻译。他在北京讲课时用的就是他那几篇论文，这些论文运用比较深奥的数学，来明确地比较两种体制，两种资源配置机制——计划和市场。他非常重要的突破性贡献，就是引入了信息，特别是不对称信息。之后又有包括马斯金（Eric Maskin）和迈尔森（Roger Myerson）在内的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做了很重要的基础理论工作，所以他们三人在2007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02年到1945年期间的那场学术争论，以及哈耶克的论文。

经济学中的信息经济学以及激励相容等概念都是从当时的争论中衍生出来的。这些概念一旦引出，它所覆盖的就不仅是用来比较市场与计划了，也可以用来研究企业内部问题、政府内部问题、市场监管问题等一系列不对称信息下人的行为问题、多人博弈问题等等。

所以我认为第一章很重要。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历史很遥远，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遥远。知识的学术发展脉络是极其重要的。这个背景折射出整个20世纪人类对经济制度的探索，就是希望能有比市场经济更好的资源配置机制，更好的分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19世纪那种资源配置机制和分配机制的不满，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改进。当时想到的是用计划来代替市场。

但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一般来说，计划不如市场。20世纪对计划经济的探索是失败的。但是，这个探索引发的学术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后来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下，利用数学工具，把争论中关于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严谨化、严密化，这又带给我们新的知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学术演变过程，在当今的国内和国外经济学教育

中，都关注不够。这是因为我们容易局限于一些具体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窄的问题，而对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既缺乏了解，也缺乏历史知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一章很重要。

---

1. 在江春泽所著的《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麦金农与中国经济改革[注]

（2014年12月19日）

我在1990年秋季学期到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在几个月之内，青木昌彦教授就有一个研究项目要研究各国的银行体制和金融体制，他让我做一个关于中国金融体制的研究。我把我写的论文初稿给了麦金农教授，同他一起讨论，这就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他看了我的文章后，对中国在1988年的保值储蓄很感兴趣。后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觉得这一措施非常重要。

麦金农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观点，中国所有金融学的学生可能都知道，即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天敌是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利率为负，由此导致金融压抑。我在论文里面讲道，即使在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值储蓄使居民存款的实际利率为正。正利率恰是麦金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坚持的，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他痛恨通货膨胀，这是我最初读他的金融著作中体会非常深的一点。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是通货膨胀。一直到去世之前，麦金农还很坚持的一个观点，但并非主流观点，就是他坚持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浮动汇率制度。这背后的原因也与控制通货膨胀有关。

1992年，他第一次到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我在里面起了一些作用。我特别清楚地记得1992年夏天，我和吴晓灵、麦金农一起坐火车从北京到南京。当时的火车很慢，一路上我给吴晓灵和麦金农做翻译。当然不是简单做翻译，实际上是几个人一起讨论。在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我们去了一些江苏的乡镇企业，到了上海后，我们去了浦东，当时那里还是一片空地，但是上海市的相关负责人向我们展示了一份规划图。从那次以后，麦金农对中国情有独钟。他的很多想法、

学术思想和政策建议都有操作性，也容易被中国接受。我仅举三个例子。

第一，他认为在改革的顺序中，财政改革非常关键，应该置于金融改革之前。他很强调改革要有顺序，在他之前，“改革顺序”不太受人关注。我们往往把很多注意力放在金融改革方面，但是作为金融专家的他，却反复强调改革顺序中财政改革的重要性，认为财政改革应该排在金融改革的前面。原因是他通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发现，金融之所以出现问题，产生通货膨胀，根本原因是政府收入不够，所以才需要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获得收入。所以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财政改革为基础，金融改革不可能成功。

他举出东欧转轨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出现很大的宏观不稳定问题。政府的财政问题往往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体制问题。主张有顺序的改革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这在他1993年的著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控制》（*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中有详细阐述。

第二，他对中国财税改革提出过一个至关重要的具体建议，对中国的今天有巨大影响，但人们不是很清楚。1994年我们的财税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引入了增值税，这是直到今天所有税收中最大的税种。在90年代初我同他对中国税制改革有过很多讨论。在发达国家中，所得税是最主要的。就间接税而言，美国有各州的销售税，但没有增值税，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在州，都没有。但是欧洲有增值税。麦金农不是美国人，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在1991年引入了联邦增值税，叫作商品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他说，增值税与销售税在理论上是等价的，但在实际中，从操作角度看，就不等价。

我还一直记着他当时的分析。他说，90年代的中国零售都是小商小贩，还没有大的连锁店，而美国早就全是大的连锁店做零售，所以政府可以在最后的零售环节把税收上来。但在中国要实施销售税，征收成本就太高了。而增值税就不一样，生产者的数目远远小于零售商的数目。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更是难征收。所以，中国应该以征收间接税为主，而且应该以增值税为主。我们在1994年财税改革中，确实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问题是税收太少，通过增值税，彻底改变了这个状态。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是可能税收太多了。这也说明这个改革太成功了。

第三，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假如麦金农今天在这儿，我猜他会说，在做金融自由化、市场化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中国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任何经济模型中，只要加进软预算约束，很多肯定的结论都会改变。因为在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与在硬预算约束下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相竞争中一定会出现扭曲。所以，在把价格参数自由化并加上竞争后，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扭曲，而不是更少。这就是所谓的“次优原理”，就是说，在有某种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纠正另一种扭曲可能会更糟糕。我相信麦金农关于金融改革的观点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总之，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今天，经济学理论直接或更多是间接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也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国际交流分不开。

20多年前，在中国能听懂外国经济学家前沿理论的经济学家没有多少。但是现在情况非常不同了。国内已经有了很多受到很好经济学和金融学训练的人。现在国际上的学者说到中国问题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能带来全新的框架和工具。可以说，在我们过去20多年取得巨大进步之后，经济学方面也进入了一种“新常态”。

在这种新的条件下，怎么继续开展更加充分深入的交流和提升，的确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新课题。比如规制问题，或者说监管问题，

都还需要深入研究，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需要对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以及他国的实践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现在我们对概念和名词都知道，对简单的方法也熟悉，比如都会做回归分析。但是，在更深层次，比如模型的含义，特别是跟中国的国情如何结合，到底哪些约束条件是中国的特殊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地方恐怕还非常多。经济学与物理学不同，很少做实验，很多情况不能做实验。怎么办？看其他国家的历史，看中国的历史，看中国的不同地区的情况，会给你提供一些类似从实验中得到的信息。这需要我们以更开阔的胸怀学习各国的经验和教训。

---

1. 在2014财新峰会麦金农与中国经济改革学术专场上的发言。

青木昌彦与比较制度分析[注]

（2015年10月25日）

我是在1990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时结识青木昌彦教授的，至今年整整25年。7月16日我去哈佛大学参加马斯金教授65岁生日的学术研讨会，在7月15日从北京到波士顿的途中得知青木昌彦教授去世的消息。而就在几小时之前我还给他的太太令子（Reiko）发邮件，希望在我两天的研讨会结束后去斯坦福看望他。没想到的是他突然离我们而去，终成遗憾。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出生于1938年4月，在东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于1967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赫维茨（Leonid Hurwicz）。赫维茨在2007年与马斯金（Eric Maskin）以及迈尔森（Roger Myerson）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是他们在机制设计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青木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他早期致力于微观经济理论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回日本到京都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与日本经济和企业相关的经济理论。1984年起受聘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担任讲座教授。

我最早听到青木这个名字是在80年代后半期在哈佛经济系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对企业组织结构感兴趣，我的导师马斯金让我去读青木198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Horizontal vs.Vertical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the Firm）。时隔近30年后，青木去世的消息也是我在哈佛的研讨会上第一时间告诉马斯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

***

我是1990年秋季学期到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从那个学期开始，在青木和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 ）的设计和推动下，斯坦福经济系开设了一个新的研究生学科领域，叫作“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CIA）。取这个名字颇有讲究，其中三个关键词是“比较”、“制度”和“分析”，刻画出它的“新制度经济学”特性。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都是研究制度，但两者的差别在于旧制度经济学多是描述性的，分析性不足。要有深入分析，非有较强的理论基础不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理论获得重大突破，为分析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80年代的另一特点是经济更加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逐渐显现，比如日本的崛起，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改革等，为制度比较，特别是跨国比较和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大量素材。这是建立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学术和现实背景。

青木是“比较制度分析”最积极的推手。除了青木和米尔格罗姆二位资深教授外，最初斯坦福经济系参加这个领域的有三名年轻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另两人分别是一位经济史学者和一位苏联问题学者。这是一个有趣的组合：其中有三位将经济理论应用于日本、中国、苏联等不同地区，还有一位研究欧洲经济史，而米尔格罗姆是微观经济理论学家。每个星期有一场学术研讨（seminar），邀请经济学家围绕这个主题来讲论文，主要是来自校外的经济学家。刚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仍处于顶峰时期，东欧和苏联的转型已经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开始呈现高潮。这些地区自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尤其重视。所以这个领域从一开始就相当活跃。

在学术方面，这个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科斯（Ronald Coase）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Douglass North）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都是新制度

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们的获奖对“比较制度分析”领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之后另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要贡献者是2009年获奖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他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的发明人，他就在附近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也是来参加“比较制度分析”研讨会的常客。

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有特殊地位，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突出的位置，远比在发达国家受到更大重视，这也很自然，因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已经经过较长时期的演变，相对比较完善。我在1992写了一篇文章《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前沿》，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其中就介绍了斯坦福的“比较制度分析”这一领域的情况。吴敬琏老师对此特别关注，经常引用其中的研究方法。1994年夏天，我同米尔格罗姆到珠江三角洲访问，参观乡镇企业，访问大学。之后我又同他和青木到北京，参加了“京伦会议”。这两位推动“比较制度分析”的资深教授都对中国有了接触。

这是我第一次同青木一起来中国，我把他介绍给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陈清泰、李剑阁等中国经济学家。1994年8月23—26日，国家经贸委与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楼继伟领导的“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有人将它与“巴山轮会议”相提并论，如果说“巴山轮会议”推动了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改革中的研讨，那么“京伦会议”就推动了微观经济学最新发展在中国的传播。

为了推动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研究，青木还推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开设了“比较制度分析”系列丛书。这个系列中的第一本是罗兰（Gérard Roland）在2000年出版的《转轨与经济学》，第二本是下面要讲到的青木在2001年的著作。

下面我来简要介绍青木在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主要学术研究贡献。

青木的开创性贡献是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理论研究和比较日本经济与日本企业的制度结构。他那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是重要的原创性研究。这篇论文比较了两种信息结构和相应的决策模式：美国企业中的纵向信息结构和等级制激励及决策机制，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和“准树形结构”及横向协调机制。这篇论文推导出这两种信息结构导致的效率不同，取决于“基层”信息处理能力（即一线工人的水平）、信息传递技术、经理人员的专业能力等因素。与这一理论相对应的经验证据是日本丰田生产方式中的“看板制”（Kanban），即基于“精益管理”（lean production）和“准时生产”（just-in-time）的库存控制系统。这篇论文以美国和日本企业为比较对象，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企业的不同特性，在组织和制度经济学中有很大影响，并为“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必读内容。

在此基础上，青木在198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一书，中文版是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的《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这本书不仅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还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层级制的激励方式，公司股权结构和银行作为持股人的监督作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机制，企业集团组织，以及政府组织和官僚体系与企业关系中表现的“官僚多元主义”等各种制度安排的经济含义。在这本书中，文化虽然重要，但是分析文化现象完全可以从经济理性和效率角度来进行。

这本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青木运用取得最新进展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来研究快速崛起的日本经济和企业——这个看上去与欧美经济和企业非常不同的组织和表现。这应该是运用微观经济理论解释并比

较不同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开先河之作。在此之前，人们既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感到振奋，也对日本经济的组织方式感到很神奇。人们通常会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与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模式完全不同，更有不少人用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来解释日本经济和企业的运行。但是青木的研究工作是用一般性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来细致地比较和分析日本的微观经济结构。

这一研究不仅使我们对日本经济和企业的运行获得了深入理解，同时也扩展和丰富了微观经济理论，因为他对企业的内部结构做了深入分析，而在80年代或之前，除很少数的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威廉姆森、钱德勒）外，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是研究市场，而不是企业。青木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产业组织理论。

进入90年代，青木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究所合作开展了四项跨国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从比较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政策具有影响。

在我刚到斯坦福后不久，青木就同我谈关于开始一个企业与银行关系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背景是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主银行在监督公司管理层上具有特别的作用。这种监督机制不同于美国式的监督机制，后者通过资本市场和收购兼并来监督大公司的管理者。在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由于资本市场通常都不够发达，而银行系统通常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所以通过银行监督公司管理层就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这项研究后来形成了他主编的《日本的主银行体系及其对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的启示》（*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and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es*）一书，该书于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青木主持的第二个研究项目是关于公司治理。在1994年的“京伦会议”上，青木宣讲了他的论文《转轨经济中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治

理结构》。会后我又陪他和哈特（Oliver Hart）去上海访问。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我和他决定以世界银行研究所在1994年出版的*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Insider Control and Roles of Banks*一书为基础，编辑出版一本中文的关于公司治理的书。这就是1995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本书应该是最早在中国出版的专述公司治理的书，并首次提出了“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应用，它通常发生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大公司中，或在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中。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制度安排，提供了解决“内部人控制”的改革思路。这本书在90年代影响了不少中国的经济学师生和经济学家。

青木主持的第三个研究项目以若干东亚高速发展经济为对象，分析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经济学论著很多，主要思路都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看政府如何通过纠正市场失灵，从而提高效率。但是青木从比较制度的分析框架入手，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分析视角，就是政府的市场增强型作用（market-enhancing role）。它超出了由于垄断和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的框架，侧重分析在制度不健全、产权不安全、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监管不到位等情形中，政府干预不是为了简单地弥补市场不足，而是为了增强市场的作用。所以，政府是通过市场发挥作用，而非替代市场发挥作用。这项研究体现在1997年青木等人主编的《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一书中，该书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青木组织的第四项研究是后来在200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社区与市场》（*Communities and Marke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这样，基于这四项研究的四本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比较制度分析的应

用研究系列：从金融到公司治理，从政府到社区和市场。这也是青木的一个长期规划，从市场经济中的各个方面来分析制度，比较制度。

与此同时，在90年代青木一直致力于运用博弈论来概括有关制度的一般性理论。这既是他在之前所做的理论研究的延伸，也是对他的四项应用研究的概括。它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比较制度分析》（*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中，英文版于2001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同年出版。

这是一部宏大计划的书，试图用博弈论来全面概括制度研究。第一部分描述和分析制度的基本类型，从最原始的习俗性产权和社区，到中世纪长途贸易中私人秩序的交易合同，到现代企业组织和治理结构，以及作为政治稳定均衡的国家。第二部分引入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把观察到的制度现象解释为某种博弈的均衡，并由此研究制度的动态变化。这部分高度抽象，并连接文献中对制度的多种不同的研究成果，体现了青木的主要理论贡献。第三部分分析制度多样性，比较多种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多种融资方式（比如银行与资本市场），比较不同的创新模式（比如硅谷）。青木对制度多元化的解释基于各种制度之间的“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并预测这种制度多样性将持续演化。

***

在1994年之后的21年间，青木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访问，同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同肖梦的友谊。在他们相识之后，我记得有一天在斯坦福，他兴致勃勃地拿了一本日文的有关中国“文革”的书来找我，给我看密密麻麻的日文中有她名字的汉字。青木年轻时曾是日本大学中的学生领袖，很有革命激情，并心怀天下。这也许是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chemistry）吧。

在青木的直接推动下，在丰田公司的慷慨支持下，2005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了“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由陈清泰出任理事长，青木与吴敬琏担任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今天我们纪念这个中心成立十周年，唯独缺少了青木教授，实在是巨大的遗憾。

青木是在今年7月15日去世的。在此之前的3月和4月间，他三次访问中国：3月21—22日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近年来他每年都参加）；4月5日参加“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第14次学术委员会会议（10年来他每次会议都参加）；4月21—24日他与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起访问中国，到外专局、《比较》辑刊、清华公管学院做学术交流，并在4月23日会见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4月24日上午又到清华大学参加了学生社团的交流活动，并为学生们写下了“新结合：Innovation for Students of Qinghua”几个大字。他从中国回日本与百寿高龄病重的母亲做了临终告别，然后返回美国，之后就住进了斯坦福大学校医院。

令人震惊的是在他住院后仅仅两个多月就离开了我们。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推动比较制度分析领域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一位热衷于建立中日友好关系的日本人。清华失去了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今天在他所创立的“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缅怀青木昌彦的学术贡献，制度建设贡献，以及对中日关系的贡献，是对他人生贡献的最好纪念。

---

1. 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纪念庆典之青木昌彦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于《比较》2015年第6辑，总第81辑。

诺思的遗产[注]

（2015年12月28日）

诺思（Douglass North）于2015年11月23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去世。我最后一次见到诺思是在2010年2月17日，我与他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斯坦福大学附近门罗帕克（Menlo Park）的Left Bank（左岸餐厅）一起午餐。诺思那时已经年近90。在此之前不久，他与沃里斯（John Wallis）和温加斯特的新书《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有记录历史的概念框架》（*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刚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温加斯特是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多篇论文的合作者，沃里斯是我在马里兰大学任教时的同事。所以我一直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完成这部著作。这也是诺思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我们从他们的新书谈起。这本书把人类社会历史归纳成三种状态：原始的无秩序状态、“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的“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s）状态，以及“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的“现代社会”状态。自然国家状态比无秩序状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国家垄断的暴力阻止了无秩序的暴力，这使得社会比较有秩序，有利于人们的生产激励。但是，在自然国家状态下，国家不受限制而个人受限制，因此私人产权在本质上是不安全的，市场竞争也不公平，经济发展因此受限。在现代社会的开放准入秩序下，由于国家权力受到制约，私人产权得以免受国家的侵犯，由此私人有激励进行投资和生产，市场公平竞争，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每一种状态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相互决定并互为增强的。比如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开放准入与政治的开放准入并存，经济上的竞争与政

治上的竞争也一同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从自然国家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它首先发生在欧洲，并逐渐传播到全球。

我们由此谈到当代中国。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和开放引发的高速经济增长，让诺思十分兴奋。一方面，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印证了他关于产权、交易成本、激励等一系列论说。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上的不同步与他的“开放准入秩序”并不一致。诺思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还不是一个稳定结构，一切都在发展过程之中，因此不能太快下结论。他推荐我阅读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这是一本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并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是他仍然对我不知道这本如此经典的著作感到惊讶，我也乐意承认自己的无知。

我最早认识诺思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1990年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在那里结识了温加斯特，并通过他认识了诺思。温加斯特曾经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Louis）任教，与诺思曾是同事。诺思在20世纪60—70年代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任教，与张五常是同事。他在80年代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教，与前面的华盛顿大学是在两个不同州的两所大学，前者是州立大学，后者是私立大学，尽管都叫华盛顿大学。进入90年代，诺思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教的同时还兼任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该研究所独立于斯坦福大学）的资深研究员，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在斯坦福见到他。90年代初，先是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年后的1993年诺思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是很大的促进。1997年我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参加了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的成立活动。那次会议

科斯、诺思、威廉姆森三位大师都到场，科斯当选第一任主席。之后诺思和威廉姆森分别也担任过该学会主席。

90年代初我读到温加斯特与诺思1989年发表于《经济史杂志》上的论文《宪政与承诺》（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Century England），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运用博弈论和“可信承诺”来解读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实现的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如何保护个人激励，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君主的经济利益。在他们的论文中，在君主与贵族或私人的博弈中，如果君主不受任何限制，他的任意权力太大，他事先做出的承诺（比如减税）就是不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贵族或私人就没有激励去投资，因为害怕事后被君主剥夺投资回报。但是，当君主的权力受到限制后，承诺变得可信，贵族或私人的投资激励上升，君主反而可以从做大的饼中通过税收或发债获得更大的利益。从数据中他们发现，在英国光荣革命限制君主权力之后，英国资本市场上的借贷利率下降，融资成本下降。这反映在英法战争中英国政府能以较低利率发行大量国债为战争融资，而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力则阻碍了他的发债能力。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运用博弈论解释历史和制度的论文之一。

诺思是经济史学家，本科（人文学，1942年）和博士（经济学，1952年）都毕业于伯克利加州大学。他在20世纪50—80年代研究经济史，聚焦于产权、政府、交易成本和制度演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他的几本著作，比如1961年出版的《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化》（*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都是开创性和奠基性的研究工作。他最为广泛流传的是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总结概括了他的前期工作。这本书中的第一句话给出了他对制度的定义："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规则用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结果是制度提供了人们在交易中的激励结构，不管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制度变迁影响社会随着时间的演变，因此是理解历史的关键。"[注]这是目前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对制度的定义。

诺思对我关于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一直非常感兴趣并热情支持。1992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高潮，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诺思毕竟是经济史学家，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事件都不放过，尽管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这与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们更多地关注发达经济中某一个专门领域中的细节，并用最新的方法和工具做精致的分析，却较少关注其他经济体中的重大变化。诺思对我研究的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一是当时兴起的乡镇企业中的产权问题；二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特别是对地方官员热衷于经济发展的激励与行为。产权和政府行为是诺思研究经济历史中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与这两点关系很大，但是中国的具体形式却与西方历史上的发展又有不同之处。他虽然能够理解中国许多制度安排的特殊性，但是他始终问一个最终问题：如果没有正式的、基于法治的合同和制度安排，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长期来看产权在中国是安全的吗？如果没有安全的产权，中国经济增长能够长期持续吗？我无法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2007年7月12日诺思访问清华经管学院，就"人类历史与制度变迁"做学术报告。在那次报告中，他首次介绍了他同沃里斯和温加斯特研究的主要思想，那时他们的书还只是手稿，尚未完成，但是基本思想已经形成。在那次会上，已经在清华任教的我、李稻葵、白重恩、王一江和正在清华访问的李宏彬、杨涛以及北大的林双林等与他对话，探讨中国发展路径的特点，引发学术争论，十分有趣。

产权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80年代开始张五常和杨小凯的介绍与推广分不开。张五常和杨小凯认为产权、制度、交易成本是市场取向改革中的根本性改革。张五常是1969年诺思在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之时被聘前往任教的，直到1982年离开美国到香港大学任教，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执教十多年。在我和诺思的交谈中，多次听到他赞赏张五常的才华和经济洞见。科斯、诺思、威廉姆森三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各自的侧重不同。科斯最为深刻，科斯关于企业实质的阐述第一次提出企业与市场边界的问题，科斯定理则第一次阐述了产权、交易成本和效率的关系，对经济理论和法律实践都影响巨大。诺思的研究侧重西方经济发展史，用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解释西方经济的崛起，既有理论，也有实证。威廉姆森的研究重点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内部结构，他把企业组织放到了经济学的中心。这三人的贡献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威廉姆森发明的）的学科基础，也使他们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远超出其他经济学分支，诺思在中国的影响远超出在美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制度在中国的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一般均衡理论，这一研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价格理论，并没有像制度经济学那样深入人心。这也形成一种现象，就是在中国，关于价格扭曲和市场扭曲的问题往往说不太清楚，而关于制度缺陷和激励扭曲的问题却能够得到很多评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制度相对健全，激励相对正确，所以多数的经济学分析把制度作为给定的事实（taking for granted），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资源的市场配置以及市场扭曲带来的成本上。中国作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经济，市场扭曲和制度缺陷同时出现，而后者更为根本。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更大，就不足为奇了。

经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从一个穷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大的社会变动时期，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兴趣随之增大，不仅对中国自

己几千年的历史，也对世界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历史特别关注。诺思以一个经济学家的严谨，以经济增长为切入点，研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以制度经济学特有的视角和分析方法，获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他对中国经济崛起提出的一系列尚未解答的问题，都是留给我们的智识遗产（intellectual legacy）。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随着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逐步迈入高收入，制度和制度变迁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在中国的历史性转型过程中，诺思的遗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并帮助我们继续探索。

---

1. 原载于《财新周刊》2015年第50期。
2. 英文原文：Institutions are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a society or, more formally, are the humanly devised constraints that shape human interaction.In consequences they structure incentives in human exchange, whether political, social or economic.Institutional change shapes the way societies evolve through time and henc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

拉丰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贡献(注)

（2016年12月）

从2006年9月起至今，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整整10年。这些年在推动教育改革中，我时常会想到一个人，因为在我心中他一直是我的榜样。他就是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

拉丰英年早逝，在2004年去世时年仅57岁。他不仅对经济学研究贡献重大，而且是上个世纪后20年在欧洲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先驱者。2007年4月8日，在我刚刚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后不久，我到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本科生组织——斯坦福中美交换论坛（Forum for American/Chinese Exchange at Stanford, FACES）的活动，我在那天的开幕晚宴的发言中曾经这样说：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这件事是什么？许多人都这样回答：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眼下，我还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在一所学院——清华经管学院。这并不容易。我的好友、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在上世纪70年代中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法国。他曾告诉我，他的一生梦想就是要改变法国的教育体制。他经常访问斯坦福和中国，我们在斯坦福还一起合写了一篇论文。三年前他去世了，留下了未圆的梦。

这些年来，拉丰的榜样一直都激励着我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的教育改革。

拉丰对经济学的贡献

我最初认识拉丰是从他与梯若尔（Jean Tirole）合写的论文开始的。拉丰与我的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在上个世纪中期同时在哈佛读博士，他们两个人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Kenneth Arrow）的同门弟子，也是同住一个宿舍的好友，而梯若尔则是马斯金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时的第一个博士生。拉丰和梯若尔同是法国人，经常在一起合作写论文，他们写的论文是以Laffont-Tirole命名的。梯若尔获得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14年12月8日，梯若尔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发表诺贝尔奖演讲“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这个题目脚注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此演讲是为了纪念让-雅克·拉丰。”在这篇演讲所引用的36篇论文中，其中有8篇是梯若尔与拉丰合作写成的，足以看到拉丰对经济学的贡献。再加上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了梯若尔一个人，难怪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如果拉丰多活10年，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可能就是梯若尔与拉丰共同获得。

拉丰的主要贡献是在信息经济学，特别是激励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经济学、产业组织、规制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中的应用。他一生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包括《激励与政治经济学》（*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2000）、与梯若尔合著的《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1993）和《电信竞争》（*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1999），以及与马梯芒（David Martimort）合著的《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2000）。令人可惜的是，本来计划与马梯芒合作三卷本巨著，只完成了第一册，第二册只完成了一部分。

为了很好地理解拉丰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还要从20世纪70—80年代微观经济学的演变历程说起。1971年，阿罗和哈恩（Frank Hahn）出版《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书，这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同样

是阿罗，在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这是他从保险业的术语中引进的。在70年代，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获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最早的贡献者有在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维克利（William Vickery），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由于维克利获奖三天后不幸去世，应该由他做的诺贝尔奖演讲改由拉丰来做。拉丰曾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经历”，但经济学界都知道，这无疑是一种荣誉。到了2007年，赫维茨（Leonid Hurwicz）、马斯金（Eric Maskin）和迈尔森（Roger Myerson）又因在不完全信息下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4年，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成功地将不完全信息理论应用于产业经济学、政府规制（regulation）等方面，其中的很多研究工作正是与拉丰合作的。至此，阿罗—马斯金—梯若尔弟子三人获奖。正值本文撰写之际，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哈特（Oliver Hart）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由于他们对合同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奖。

正如梯若尔在诺贝尔奖演讲中所说，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作为研究必备的两种工具，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就为研究产业组织问题，即建立反垄断和规制理论，提供了机会。正是使用这些分析工具，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诞生了，由此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突破都是使用数学模型的。这些数学模型对我们理解市场结构，以及制定相应的规制，都是必要的。理论模型的建立是为了简化，聚焦最重要的问题。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构建数学模型的意义。由拉丰和梯若尔建立的不对称信息模型是一个经典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合同是完备的，但信息是不对称的。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合同的双方中，一方

比另一方掌握的信息更多。比如被监管的企业比政府监管当局的信息更多，再比如企业管理者比投资者的信息更多，等等。这是显然的。但是如何深入研究呢？拉丰和梯若尔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揭示了信息不对称时在资源配置决策中面临的一对矛盾，就是为有信息的一方提供信息租金（从而提供激励）和资源配置扭曲之间的矛盾，以此为切入口，就可以用模型来分析许多经济问题。

很多问题，比如公司治理和电信管制中，都存在这一矛盾，而这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因为价格调节就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不会产生扭曲。但是当信息不对称时，为了给掌握信息一方足够的激励做出正确决策，没有信息的一方就不得不故意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资源配置。这是为了提供信息租金从而提供激励，让掌握信息的一方把真实信息披露出来。以这个模型为基础，就可以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很多问题，推导出最优或次优的规制政策。以此为基础，还可以扩展到动态情况。比如人们熟悉的“棘轮效应”或称“鞭打快牛”就在这个模型中完全被解释了。从中又引出“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的效率意义，得出“反直觉”的结论，比如，在限制一个人的权力之后，反而可以增加他的收益，而不是减少，因为承诺变得可信了。如果没有数学模型，这些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

拉丰对法国和欧洲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贡献

1975年，拉丰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获得威尔士（Wells）奖，这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授予的最佳博士论文奖。作为一个法国爱国者，他获得学位后立即回到法国。在法国服完兵役之后，开始在巴黎的大学教书。为了他的学术理想，面对法国僵化的教育和学术体制，他不得已而参加并通过了法国的国家考试，成为国家认可的教授。而不少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梯若尔在内，都由于没有参

加国家考试，所以都不是国家认可的教授，而只是当地大学的教授，这也是当年拉丰常常哀叹的一件事。

在巴黎任教的经历，让拉丰意识到法国官僚体制的顽固性，他感到在巴黎推动大学教育改革无能为力。于是他毅然决然回到了他的故乡，位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对很多人来讲，图卢兹以空客飞机的总部所在地闻名。在当地，拉丰家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家族，他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可谓家学渊源。在图卢兹，拉丰开始了他传奇的学术生涯和经济学教育使命。起初，因为当时法国的经济学教育非常落后，甚至没有合适的法语经济学教材，他不得不花费了很多时间编写教材，这些教材后来都被翻译成英文，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之后，由于法国的体制无法与现代经济学教育相容，他开始了一系列试验，先后创建了几个不同性质的研究机构，有的在大学体制内，有的是完全独立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990年创建的，既与公立的图卢兹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又完全是私立的“产业经济研究所”（Industrial Economics Institute, IDEI）。他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和个人魅力，通过各种方法创造条件吸引人才。其中最典型的也是让拉丰最为得意的是成功说服梯若尔放弃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职回到法国，来到他创办的产业经济研究所工作。经过10年的发展，到2000年，这个研究所已经闻名全球。2006年，在这个研究所的基础之上又成立了“图卢兹经济学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由梯若尔担任第一任院长。今天，拉丰从零开始建立的图卢兹经济学院，已经成为欧洲乃至全球顶尖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机构。

很多经济学界同人不仅敬仰拉丰惊人的学术成就，更加敬佩拉丰在经济学教育实践方面的成功。在拉丰回到法国之前，法国的现代经济学研究，除了与法国优秀的数学传统比较密切的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等少数领域外，其他领域都比较松散且不规范，更谈不上成体系。拉丰通过一己之力，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博士培养模式从美国传到法国。图卢兹不仅产生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梯若尔，而

且成为欧洲大陆培养经济学博士的重镇。拉丰的学生马梯芒就是在法国理工毕业后在图卢兹获得的博士学位。现在清华经管学院任教的白亚来（Alexander White）也是在那里获得的博士学位。

拉丰在法国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图卢兹，甚至波及整个欧洲。传统上，欧洲经济学研究重镇主要集中在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但是现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教育开始具有世界竞争力。在拉丰和图卢兹榜样的影响下，我在哈佛的同学、比利时人德瓦特里庞（Mathias Dewatripont）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比利时，于1991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欧洲经济学高等研究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Economics, ECARE）。我在哈佛的另一位导师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辞去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于2006年在西班牙创建了“巴塞罗那经济学研究生院”（Barcelona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BGSE）。2006年在巴黎成立的“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更可以看作是巴黎学界或者说法国传统领地对图卢兹经济学院崛起的直接反应。参与创建巴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中就有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他担任了首任院长。他的《21世纪资本论》在近年成为全球畅销书。这些研究机构已经成为欧洲大陆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阵地，吸引欧洲流失到美国的人才回到欧洲。

拉丰在美国，特别是在欧洲的经济学界非常有影响。由于他对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1991）、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主席（1992）、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1993）、欧洲经济学会主席（1998）等。值得一提的是，在1993年，他同梯若尔一起获得了欧洲经济学会与芬兰的一个基金会联合首次颁发的于尔约·杨松奖（Yrjo Jahnsson Award）。在美国，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是美国经济学会从1947年开始每两年颁发一次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做出显著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自2009年起每年颁发一次）。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1947年获得首次颁发

的克拉克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相对应的，欧洲经济学会自1993年起，每两年颁发一次于尔约·杨松奖给45岁以下对经济学做出显著贡献的欧洲经济学家。在梯若尔同拉丰一起获得首次颁发的于尔约·杨松奖的19年之后，梯若尔在200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拉丰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和经济学教育的贡献

拉丰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是在1990年。那一年在北京的奥林匹克饭店举行了纪念颐和园研讨班10周年学术研讨会，拉丰作为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的当选主席，应邀来中国参加此次研讨会。早在1980年，在邹至庄和刘遵义等华人经济学家以及此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Lawrence Klein）的组织和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在颐和园龙王堂举办了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这是改革开放后现代经济学最早系统性地被介绍到中国，是以数学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形式引入的。这在当时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从数学和统计学切入现代经济学可以避免意识形态之争。我记得1984年，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邀请赫维茨来北京在北京友谊宾馆讲学也是讲数理经济学，就是他的机制设计理论。我那时在美国读研究生，夏天回国休假，为他全程做翻译。虽然那时我刚刚开始学习经济学，但由于我是数学出身，所以他讲的数学我还能听懂并能翻译。

拉丰在这次研讨会上做了有关新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发言。由于他当时还不是很了解中国听众，所以他的演讲充满了数学公式，估计当时能听懂的听众寥寥无几。但从此之后，拉丰结下了他的中国之缘，经常来中国做学术访问，并且越来越深入地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实践。1994年初，他第二次来中国访问，当时他正承担一个OECD研究中国改革实践的项目，同时他的新规制经济学著作也刚刚出版。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拉丰安排了长达两个星期的访问时间，在清华、北大、社科院、电信研究院等机构举行学术讲座，通过访谈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情况。正是通过这次访问，拉

丰结识了社科院的张昕竹。当时张昕竹刚结束在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回国，根据社科院的安排参与接待他。通过两个星期的密切交流，张昕竹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成为他最终选择的研究合作者。在拉丰的积极推动和帮助下，张昕竹于1995年去法国图卢兹留学，正式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也是他唯一的中国弟子。

1996年8月31日至9月2日我参与组织的“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主办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参加者除了拉丰以外，还有马斯金、霍姆斯特朗、穆尔（John Moore）、博尔顿（Patrick Bolton）、罗兰（Gérald Roland），他们都是活跃在微观经济理论和应用前沿的经济学家。应该说这是90年代在国内召开的学术水平最高的微观经济学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马斯金宣讲了他与梯若尔合作的挑战不完备合同理论基础的著名论文的初稿，而穆尔作为长期与哈特合作的不完备合同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做了精彩回应。有趣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的整整20年之后的2016年10月，哈特与霍姆斯特朗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会议期间，我同拉丰有不少交流。他对参加会议的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型官员印象非常深刻，其中包括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他说，中国的经济学界虚心学习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有历史使命感，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他还特别拿中国的情况与俄罗斯的情况做了对比，他感到俄罗斯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就非常不同，虽然当时他们也在推进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我介绍了他在法国图卢兹办学的经历。他特别谈到中国改革、文化和现代化历程。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把美国先进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引入法国和欧洲，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欧洲人，并不想照抄美国的一切。他对中国的文化非常尊重，结识了不少知名的中国画家和文化名流，并收藏了一些中国书画。他同我说，中国是非宗教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传统下搞现

代化不同于宗教传统下的现代化。但他相信是可以走出来的。他希望我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事业，并邀请我去图卢兹访问。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到了90年代末，正值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在全球化和放松管制浪潮的背景下，中国借助开放为推动力，加速了改革的步伐。2000年，在朱镕基总理的主导下，中国开始对垄断行业进行系统改革，在电信、电力、铁路和航空等行业，通过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基本思路的改革，试图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规制框架。作为中国垄断行业改革试验田的电信业是当时改革的突出案例。

电信业是一个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变化，特别是80年代美国的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拆分，电信行业面临重组，其中有很多经济学的道理都是在改革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拉丰正是这个领域的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他那时非常关注和关心中国的电信改革，并想以电信改革为例来推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中的规制制度。而那时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对电信行业改革的争论大多停留在政府垄断还是自由市场的主张，没有深入到政府如何监管和规制这个层面。拉丰和梯若尔的著作《电信竞争》的英文版在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在2001年出版后，立即成为国内的热销书，电信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当时几乎人手一册，有点像去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热销的《从0到1》一样。那时正是一个电信改革的火热时代和黄金年代。

2000年，在社科院举办颐和园研讨班20周年纪念会时，拉丰又一次来到中国。针对中国当时的改革实践，他向时任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建议，加强规制方面的研究，并愿意提供帮助。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启动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规制新框架的一系列资助计划，使得中国也被纳入这个计划，获得了世界银行赠款和技术援助。

2001年，拉丰又一次来中国访问。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之后又访问了武汉大学。他再一次深感中国经济学界对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认识的欠缺，并萌生了要系统地为中国学生和青年老师讲一门激励理论课程的想法。2002年夏季，在邹恒甫的安排下，他结束在非洲的访问后来到武汉大学，连续讲了四个星期的课，其中前三个星期面向全国的学生和教师讲授激励理论，包括安排一周讲解文献并讨论；最后一周连续五天，面向全国电信行业的官员和企业管理者讲授规制理论，全程由张昕竹翻译。正是在那段紧张的讲课期间，他还同张昕竹合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发表在2004年《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

在武汉大学讲课结束时，拉丰发现身体有些不适。他显得非常疲惫。这似乎有些异常，因为他从来都是效率奇高、身体超棒的人，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体会出什么问题。非常不幸的是，在拉丰此次访问结束回到法国后，不久就被查出患了癌症。但即便如此，他在开始治疗的同时，并没有放下研究工作和事业，仍然一如既往地高强度工作。

在拉丰患病期间，他还一直惦记着中国的电信改革和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那时，中国电信改革正好如火如荼，长期困扰中国电信行业的互联互通问题开始得到治理，中国电信业规制的新框架开始搭建。拉丰多次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改革走到这一步，也很得意当初的努力开始看到效果。非常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国来了。在被查出患有癌症之后不到两年，他就于2004年5月1日在法国家乡去世。

2014年6月，为纪念拉丰逝世10周年，马斯金、梯若尔、张昕竹组织在南昌的江西财经大学举办了一次规格非常高的研讨会，不但邀请了很多世界顶尖的知名经济学家莅会，还邀请了被认为当今世界最有前途的一些青年经济学家。我未能参加，深感遗憾。马斯金后来告诉

我，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4个月之后，梯若尔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拉丰对我的教诲

20世纪90年代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时，拉丰经常来访，我们在那里相识。但是与他比较多的接触，还是在1997年访问图卢兹。在拉丰的邀请下，我于1997年8月30日至9月7日期间访问图卢兹。那时，他所创建的产业经济研究所已经有6年了，并聚集了不少一流的经济学家，包括克莱默（Jacques Cremer）、雷伊（Patrick Rey）、梯若尔以及拉丰在那里培养的博士生马梯芒等。我在那里访问的几天中，与这些经济学家有较多接触，让我切身感受到，拉丰付出了多大努力，在欧洲的一个地方，用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方式，创造出一个“特区”的发展。

在那期间，我目睹每天他的办公室前都有见不完的学生在等待，每天都有见不完的资助者和来访客人。他说他的白天时间全部去做行政管理，包括筹款。他与法国电力、法国电信、巴黎银行等法国国有企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也对他的办学提供很多长期稳定的支持。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之外，他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做研究。他说每天只有晚上8点到11点这三个小时，才是自己不被打扰的研究时间。正是每天这三个小时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使得拉丰做出了惊人的研究成果。他因繁忙的行政工作少写了一些学术文章，少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他一直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他同我讲了不少法国教育体制的问题。法国的教育体制非常集权，一切都要经过教育部。这也使我意识到，与法国相比，中国的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倒显得灵活些。

我在那里有机会与他的学生张昕竹长谈。张昕竹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当时正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也是最早在

西方学习政府规制的中国经济学者。我其实早就认识张昕竹。他1992—1994年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在拉丰的帮助下，他1995年到图卢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拉丰。他是第一个在图卢兹大学用英文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为此拉丰付出了很多努力，需要与很多教育部门周旋，打破当时法国教育当局规定的博士论文只能用法语完成的规定，这也是拉丰推进法国大学改革和国际化的一个例子。后来，在1997年底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是他的博士论文外部评审人之一。1998年，张昕竹学成回国，在图卢兹和中国经济学界之间，特别是拉丰和梯若尔与中国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银行发展学院联合成立“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张昕竹担任主任，对规制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电信改革上，做出了贡献。

拉丰一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经济学有很强烈的兴趣。我们在斯坦福的时候，就开始一起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在图卢兹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作完成了一篇短论文，后来发表在《欧洲经济评论（论文集）》。[注]这本来是我们一个长期研究项目的开头，可惜在那以后我们没有时间继续研究下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拉丰是2003年初在伯克利。那时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任教，他到斯坦福和伯克利访问。他告诉我他已经到南加州大学任教。他对他在图卢兹的成就感到满意，认为可以由其他人接班了。但是，他也向我感叹，他无法改变法国的教育制度，尽管他可以让图卢兹在经济学教育上崛起。他同我讲了他在武汉大学讲课的情况。我也告诉他我在2002年组织了一批海外华人经济学者到清华经管学院系统性开设现代经济学课程的情况。他对我的这一工作非常肯定，希望我能够坚持下去。当时他已经查出癌症，但是他对自己的康复很有信心。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自2002年开始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特聘教授，讲授现代经济学课程，主要讲授本科一年级的《经济学原理》。我于2006年9月起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至今已经10年。拉丰在图卢兹创建产业经济研究所，从1990年到2000年也是10年。我想他如果活到今天，看到我在中国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一定会感到欣慰。在拉丰去世之后，我曾经试图在清华经管学院建立一个以拉丰命名的讲席教授席位，但遗憾的是此事至今一直未能实现。

作为经济学家，拉丰对信息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很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贡献足以让他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法国经济学家，他在法国图卢兹创建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已经成为欧洲现代经济学的重镇，从那里培养造就了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作为关心和投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改革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影响，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尽管不太为国人特别是经济学圈外人所知，但是值得我们感激和珍惜。他对我本人而言，更是长者加挚友，在我研究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探索经济学教育改革，推动大学改革的征途上，他都是我永远的激励和榜样。

---

1. 原载于《比较》2016年第6辑，总第87辑。

2. “The Dynamic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with Jean-Jacques Laffo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April 1999, 43, pp.1105-1114。

哈特、霍姆斯特朗：合同理论的中国意义注

（2016年12月3日）

今天我们讨论合同理论，当然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直接相关。而他们两人的研究与我们的很多理论研究和政策思考也是直接相关的。

合同理论同中国问题的相关性

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哈特和霍姆斯特朗的研究如何延续到我本人的学术研究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学术研究都是延续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向前，而不是和前人的研究毫无关系。

第一个例子是我和车嘉华对中国企业所有制的研究。哈特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合同是很难完备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时间很长，有一些事件不可预测。在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中，没有很好的法律体制，产权本质上不像成熟经济中那样安全，所以有额外的理由使得合同更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权的配置就变得更为重要。这是逻辑上非常自然的延伸。基于这样的假定，我和车嘉华的研究要说明收入所有权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或是在企业家手里，对企业的效率和企业的表现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从研究的思路和理论的框架来讲，我们的研究和哈特的是一致的。但是，在哈特那里，其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经济里，制度比较完善，产权能够得到保护，不需要有政府的太多干预，除非有外部性等原因，否则，政府的控制权从效率上讲确实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只要改变一个假定，比如说产权从根本上是不

安全的，从这一假定出发，我们就可以导出不同的结论。这个例子说明不完备合同在我们的制度环境中是可以用来研究很多问题的。

第二个例子与霍姆斯特朗的完备合同有关。霍姆斯特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完备合同下的最优激励合同设计是与描述不可观测行为的充分统计量有关的。我和马斯金、许成钢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分析在M型和U型的不同组织形式中，这种充分统计量的比较。这实际上也是沿着霍姆斯特朗的路线在研究，得出了一些以前没有过的结论。

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合同理论，对我们思考中国的激励问题或者是由产权产生的企业问题或者是政府中的激励问题，都是非常相关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两次会议

这两位经济学家及其理论同中国改革非常相关，还在于他们曾经参加过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两次学术研讨会。一次是1994年的“京伦会议”，一次是1996年的“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哈特参加了1994年的京伦会议，霍姆斯特朗参加了1996年的会议。这两次会议我和许成钢、肖梦都是全程参与组织并参加会议的。从1996年的会议到现在正好是20周年，我们一起来回忆90年代中期的这两次会议对我们思考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

这两次会议的宏观背景当然是9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1992年9月，中国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并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十条”，这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整体设计。1994年1月1日中国开始推行全方位的改革，首先出台了汇率并轨，引入了分税制，以此开始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可以说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是在这个基本框架

内运作的。当时还特别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对于到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是有很大理论需求的。

京伦会议是在1994年8月23日到26日召开的，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因为在北京的京伦饭店举行，所以简称为“京伦会议”。这次会议由两个课题组联合举办：一个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一个是“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如果说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是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那么“京伦会议”就是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线。

会议有四场讨论，主题分别是：企业改革、公司化、公司治理与所有制；银行与企业的财务重组、破产程序；财税改革；1995年的改革前瞻。与会的海外学者有哈特、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刘遵义，以及波尔（Roy Bahl）、黄佩华等。

哈特主要在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的破产程序这场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并做了评论。他当时把不完备合同理论应用到破产程序，特别是区分了“第七章破产”和“第十一章破产”，前一种破产是清盘的概念，后一种破产是重组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第一次引入当时的中国。当然，哈特不仅引入了这些概念，还用剩余产权的配置来解释这两种破产之间的差别，因为不同的程序涉及不同的产权权利的分配。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在会议期间的8月25日会见了与会者，听取了他们对企业改革特别是企业债务重组的意见。

两年之后的1996年8月31日到9月2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主办了“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他是我和许成钢、白重恩、李稻葵、王一江等人的共同导师，还有霍姆斯特朗，那时候他已经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此外，还有来自欧洲的约翰·穆尔（John Moore），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热若尔·罗兰（Gérald Roland）、拉

丰（Jean-Jacques Laffont），他们都是活跃在微观经济理论和应用前沿的经济学家。应该说这是90年代在国内召开的学术水平最高的微观经济学研讨会。1996年9月2日，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会见了参会者。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马斯金（2007年诺奖得主）讲他和让·梯若尔（Jean Tirole，2014年诺奖得主）合作的工作论文初稿，挑战不完备合同的理论基础。

穆尔是哈特的两个长期合作者之一，另一个合作者是格罗斯曼（Sanford J.Grossman）。哈特最早的文章是和格罗斯曼合作的，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就跟穆尔合作。穆尔参加了1996年的会议，并作为答辩的一方。

从这两次会议中可以看到学术界真正的争论。学者们之间，比如马斯金和哈特，在很多学术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严谨，但他们又是非常好的同事、朋友，一起探讨学问。我觉得这种治学精神在这两次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20年之后，即今年的10月哈特和霍姆斯特朗两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后我给两位教授写了贺信，在回信中他们都分别提及对这两次会议印象极其深刻。

这两次会议还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来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人都是90年代活跃在微观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学者，为中国带来了新一代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思想框架和分析工具。像哈特、米尔格罗姆、马斯金、霍姆斯特朗、穆尔、博尔顿、拉丰等经济学家，都是最顶尖的微观经济学家。其中有三位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拉丰不去世，他完全有可能在2014年与梯若尔一起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其他的学者也有可能得奖。

在中国的微观经济学领域，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的影响很大。他们可以说是第一代产权和企业组织的创始人。科斯在概念上，诺思从历史上，威廉姆森在企业内部组织和产业组织上，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来研究。第二代人继续他们的研究，特点是使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进行更加精密、更加深入也更加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而且工具和框架一旦形成，可以对其他研究产生影响，比如对产业组织，对微观金融，对公司治理，对转轨经济，对国际贸易等等。这就是科学发展的路径。

第二，这些经济学家开始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并以此为对象进行研究，来中国访问讲学。马斯金就是在这次访问后对M型和U型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产生兴趣，后来与许成钢和我合作，写了一篇论文。拉丰的故事更是突出。在会议期间，我同拉丰有不少交流。他对参加会议的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型官员印象非常深刻，这其中包括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他说，中国的经济学界虚心学习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有历史使命感，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他还特别拿中国的情况与俄罗斯的情况做了对比，他感到俄罗斯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就非常不同，虽然当时他们也在推进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我介绍了他在法国图卢兹办学的经历。他把美国的先进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引入法国和欧洲，还把梯若尔延揽到图卢兹。

2002年夏季，拉丰到武汉大学，连续讲了四个星期的课，其中前三个星期面向全国的学生和教师讲授激励理论，包括安排一周讲解文献并讨论；最后一周连续五天，面向全国电信行业的官员和企业管理者讲授规制理论。2014年6月，为纪念拉丰逝世10周年，马斯金、梯若尔到南昌参加张昕竹组织的研讨会。在这次会议的4个月之后，梯若尔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合同理论的现实意义

哈特和霍姆斯特朗的理论和研究对现在也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现在和20年前不一样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还有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哈特提出的不完备合同的分析框架是一种产权理论的分析框架，他特别强调剩余控制权的重要性。实际上，无论是私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有很复杂的控制权配置问题，国有企业可能更复杂，简单的合同无法完备地写清楚利益的分配，但是这里面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不完备合同理论对我们思考和分析企业问题，进而思考和分析更广泛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问题，都是相关的。

霍姆斯特朗关于完备合同下的信息度量，实际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含义。在激励合同设计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如果有两个变量，一个可度量而另一个不可度量，如果给可度量的变量提供非常强的激励，不可度量的那个变量就不会有激励。这个理论最简单的应用就是教育，其中有两个变量：一个是容易度量的，如发表论文或者高考成绩，还有一个是不容易度量的，比如育人，培养人的素质、人的创造力。如果只给容易度量的高考成绩或论文发表提供特别强的激励，那就可能会摧毁育人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有意地减弱对容易度量的变量的激励，不让它那么强。霍姆斯特朗的这个理论很有洞见，它表明，并不是所有激励都越高越好，它取决于变量的可观察度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我在做教育，发现在我们的教育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正是由于在育人和论文发表之间，在培养创造力和考试成绩之间的激励不同而导致的扭曲。霍姆斯特朗的理论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总之，哈特和霍姆斯特朗都是合同理论：一个是不完备合同，一个是完备合同。他们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用，而且也是经济学科的基础。除了有用的事外，作为学术研究，也应该在理论层面把问题搞清楚，因为理论基础很重要。

---

1. 在2016财新峰会合同理论与中国下一步改革学术专场上的发言。原载于《中国改革》2017年第1期。

阿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注]

（2017年6月）

阿罗（Kenneth Arrow）于2017年2月21日在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帕罗阿图（Palo Alto）去世。我在当天听到这个消息，仍然感到很意外，虽然他已是95岁高寿了。不到一年之前的2016年5月9日，我在斯坦福参加有关中国经济的研讨会时，他坐在下面听我发言，之后我们一起拍照。他那时看上去身体很好，思路敏捷，问了我几个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还谈到此前不到一年的2015年6月，他到重庆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兴趣。

我第一次见到阿罗是在1990年1月。那时我正在博士临近毕业期间找工作，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做“工作演讲”（job talk）。阿罗从1949年起就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中间只有1968年至1979年间在哈佛任教。他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70年代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导师。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是科层等级组织中的激励问题。在去斯坦福之前，马斯金同我说，阿罗对非市场组织内部激励问题很有兴趣，因此会对你的研究有兴趣，并且说“他是一个会认真读别人论文的人”。这句话我后来才明白它的意思，因为不少经济学家只听但不读其他人的论文。果然，在那次访问中，他对我的研究工作十分肯定，还在一起晚餐，愉快交谈。

我后来决定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之后与阿罗的接触就多了。虽然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也没有与他合作写过文章，但与他共同指导过博士生，中国学生李波就是其中之一。阿罗在斯坦福的标志性动作有两个：一是每天戴着头盔骑着自行车来办公室；二是参加学术讨论会时，前一半时间总是在低头看刚收到的邮件，人们以为他没有

在听，可是放下邮件就马上提出最尖锐的问题，令在场人都感慨万分。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不仅是经济学，多是在讨论会上或者是在闲谈中。他的博学总是让人惊讶。还是在90年代中期，当时个人电脑兴起，计算能力飞速发展，互联网也已经兴起，信息技术发展远远超越人们的预期。因此，在我看来，好像技术发展都是超出人们预期的。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有哪个方面的技术发展远远落后于人们100年前的预期。他马上回答说：电池。这不是我当时的知识所能想到的，给了我很大启发，那就是我们的视野很有局限，非常缺乏历史的厚重。电池技术在近来有了重大进步，但仍然是一项技术制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颁发。阿罗在开始颁奖后的第四年，即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至今保持着两项纪录：他获奖时51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获奖年纪最轻的；同时，他也是在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获奖之后活得最长的，44年。早于他两年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也是获奖的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80年代我在哈佛读书时曾经到麻省理工学院拜访过萨缪尔森。他向我问起浦山，时任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浦山是40年代哈佛的经济学博士，同萨缪尔森一样，也是熊彼特的学生。在《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萨缪尔森还特别感谢了浦山的帮助。阿罗和萨缪尔森是现代经济学泰斗级的人物。这两人还有亲戚关系：阿罗的妹妹嫁给了萨缪尔森的弟弟，他们的儿子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拉克奖获得者，担任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萨缪尔森说过阿罗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理论家。说阿罗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一点也不夸张。打开任何一本严谨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都有两部分核心内容：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这两部分内容是分别关于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民主政治中的投票选举机制的基础性分析，阿罗都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

在社会选择理论中，阿罗开创性地运用严格的数学推理研究社会偏好与个人偏好之间的关系，推导出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揭示出投票选举这一集体决策机制中会遇到的基本难题。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影响深远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经济学，也为政治学奠定了科学基础。以阿罗的这一工作为起点而继续这方面研究的森（Amartya Sen）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介绍，我不再赘述。

一般均衡理论是有关在充分竞争、完备市场中商品供求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的一整套理论。虽然这一理论背后的经济学思想是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描述过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但是阿罗等人通过严谨的数学模型，精确地描述了消费者偏好和选择集合、生产者技术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均衡存在的条件，还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在建立均衡条件中需要用到数学的不动点定理（fixed point theorem），在证明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时需要用到分离超平面定理（separating hyper-plane theorem）。但是，并非数学的深奥性，而是经济学的深刻性，使得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支柱。

一般均衡理论受到的批评很多。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批评这些假设的非现实性。记得在一次斯坦福的研讨会上，阿罗对一般均衡理论有如此评价。他说，一般均衡理论有五组假设，而每一组假设从五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是错误的。但它是经济学中最有用的理论之一。他当时讲这句话时，对我冲击很大。因为这是我从教科书中没有看到过的，而是亲耳从阿罗那里听到的，也正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我很为之震撼。

这是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特别是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受教育的人而言。我们的文化中缺乏科学传统，尤其是缺乏社会科学理论传统。我们判断一个理论，很容易先看它的假设是否“现实”，往往以假

设不现实来否定理论的意义。正是我们的经验主义传统，使我们无法发展出建立在抽象假定上的理论，阻碍了我们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中，有人的理性假设、充分竞争假设、完备市场假设、生产技术没有外部性假设、没有收益递增假设等，现实中当然都可以发现这些假设是不对的。恰恰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仅可以应用于许多现实问题，而且后来的许多新理论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比如投资学和金融学中的证券定价理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理论还运用到公共经济学中，计算税制改革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运用到环境经济学中，在有外部性的情况下研究环保政策的有效性，等等。

事实上，后来许多新的经济理论的发展，都要以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参照系或作为起点，包括阿罗自己的研究工作。我下面举两个例子，它们是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开创的两个新领域。无论是社会选择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阿罗都使用了在当时被认为很抽象的数学来做经济学理论研究，但如果就此认为阿罗只会用抽象数学来建模，那就错了。相反，这两个例子恰好说明了阿罗如何把现实中的经验观察上升到经济学理论的创造性过程，对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很有启发。

1963年阿罗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在这篇论文中，阿罗开创性地分析了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市场。他首先以完备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参照系，对照发现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市场中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包括患病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事件，同时治疗结果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事件。从这里就引出风险分担的问题。但是他发现，现实中这些风险并不是能够全部被分担的，所以就会得出偏离均衡点是福利最优的结论。

正是在这篇研究医疗保险问题的论文中，阿罗首次引入了“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这两个重要概

念。他用一小节专门分析“道德风险”带来的问题。在有第三方保险的情况下，投保人就会减少预防措施，导致就医增加。他分析道，这是投保人的激励问题，因为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和控制投保人的行动。阿罗接着分析了医疗保险中的几种费用支付方式。如果是完备市场，这些方式应该是等价的，但是在现实中，它们并不等价，由此说明市场的不完备性。特别是，如果医生的收入与保险支付挂钩，那么医生也有“道德风险”问题，比如为病人开过多和过贵的药，这是医生的激励问题，而保险公司无法确定病人的真实情况和真实需要的治疗。

他在这篇论文中谈及了保险公司遇到的另一类问题，即“逆向选择”问题。投保人中有低风险和高风险的人群，但是这个信息只有投保人知道，保险公司不知道。如果市场是完备的，那么高风险和低风险人群会被区别对待。但是在现实中，他们是无法被区分的，所以在同一保费下，就会更多地吸引高风险的人，导致“逆向选择”。

阿罗就是这样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两个重要概念引进经济学，并开创了信息经济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也对医疗和保险业有着实际的重要影响。已经有若干位经济学家因为信息和激励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201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他的最重要的两篇获奖论文的标题正是“道德风险与可观察性”（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和“团队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in Team）。阿罗的重要贡献不仅是引入这些概念，关键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的系统性分析，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962年阿罗在《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干中学的经济含义》（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早在50年代，经济学家已经从经验数据中发现，经济增长并不是仅靠人均资本的增加，还要靠技术进步。但是在当时的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只是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模型内部产生的。阿罗在这篇开创性的论文中建

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他描述了一种“技术进步”的过程。具体地说，技术是由“学习”获得的，而他给出的机制是，学习是以往经验的结果，也就是说，干得越多，经验越多，人均产出也就越多。因此，在他的模型中，人均生产率随着经验的积累而提高。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因为由此推导出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不是一般均衡理论中假定的规模收益递减。当然，由于“学习”的外部性没有被市场作价，所以投资的私人回报低于社会回报，竞争市场的均衡并不是有效率的，这有别于一般均衡理论所推出的结论。但是，这是第一个“内生增长”的模型，是我们真正理解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开始，阿罗因此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80年代和90年代罗默（Paul Romer）等人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正是以阿罗的这个模型为起点和基本要素的。由此可见阿罗研究的影响力之深远。

回顾并理解阿罗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可以帮助反思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中常见的误区和软肋。一是我们对理论的忽视甚至鄙视。这里说的理论是抽象的，看上去与现实有相当距离的，通常以数学符号为语言的逻辑系统。无论是社会选择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都是这样的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中的假设与现实不符合，但是它们对我们认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和基准，是我们探究社会问题的入口，更是我们发展出与现实更为贴近的理论的起点。而我们急于求成的心态，我们的经验主义传统，容易造成我们对抽象理论的拒绝。但这只会使我们永远不能摆脱浅薄的陷阱，无法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行。

二是如何把在经验观察中发现的现象和问题变为精确的概念，并转化为可分析的模型，使经验上升为理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都是源于对现实的观察。阿罗把它们上升为精确的概念，前者是不可观察和控制的行动，后者是不对称信息，并把它们纳入可供分析的

模型中，推导出不同于标准模型下的结论，这才是重要的突破。类似的，把“干中学”这样的经验观察转换成人均生产率取决于经验积累的条件，并植入生产函数，推导出不同于在标准生产函数下的各种结论，这也是重要的突破。在这些突破的背后，都是对比参照系，引入新因素，分析出新结论，为后续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这样一个科学研究的路径，也是我们十分缺乏的。

当我们回顾阿罗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贡献时，我们更加能够欣赏和理解像他这样的经济学巨人对现代经济学的根本性价值，并从中受到启发。阿罗的经济学研究路径应该激发和引导中国的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并由此获得深刻的学术思想和洞见。

---

1. 原载于《比较》2017年第3辑，总第90辑。

第十章 链接现代经济学于中国经济

一个经济学家的思考[注]

（2003年9月10日）

肖梦：今天我们请到钱颖一教授来新浪网做嘉宾，非常荣幸。我先对钱颖一教授做一点简单介绍，虽然对许多网友来说，我的介绍可能是多余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梁晶工作室这周刚刚出版了钱颖一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书，正如吴敬琏教授所作的序中所说："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梁晶工作室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本书收集的是钱颖一自1987年至2003年间所发表的中文论文，而我参与了其中许多文章的编辑工作。我更深的感受是读者可以循着书的轨迹看到作者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经历和作用，那些介绍性的短文、论文都及时为我们国内的经济学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知识。比如寻租理论、比较制度分析、激励机制、企业理论等。读者可以在这部文集中回顾中国经济改革波浪式前进的步伐，更深刻体会到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做出的贡献，这是这本书非常鲜明的一个特色。

可以这么说，钱颖一教授的文章中有部分是为中国经济学界搭建一个平台，去了解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在实践上，自90年代以来，你也一直与国内院校有很多交流，请说一说你在推动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上都做了些什么。

钱颖一：10年前，即1993年的五六月间，我在北大经济学院开了一门课。课的内容包括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以及它们在制度经济学中的应用。这也许是在国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作为一门经济学的课来讲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国内的数学家们虽然早已开过博弈论，但他们讲的博弈论多是零和博弈和数学证明，与经济学的应用没有什么关系。信息经济学当时在国内则是全新的。当时来听课的学生，除了北大1990级本科生外，还包括了北大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当时在我班上的学生中，后来有十几个出国留学，其中有的已经拿到博士学位，有的已经回国任教。

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大学讲授现代经济学课程。国内学生，相对于美国学生，有更大的学习热情和更高的求知欲望。同时，由于条件限制，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不多。我对这次教学很有感触，我第一次深切感到在中国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

在此之后，我与北大经济学院一直有密切联系，是他们的客座教授。比如，我同当时的院长晏智杰共同主编了一套《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由我推荐了一批我认为较好的国外教科书，由北大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翻译。从1995年至今一共出版了12本，包括著名的《微观经济学》、《动态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动态的递归方法》、《时间序列分析》等。据说这套书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推进了国内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又比如，2001年6月，当时任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的刘伟请我为经济学院的学生做一次讲座，他给我出的题目是“经济学科在美国”。这是后来我的那篇在国内颇为流行的同名文章的起源。

我在国内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另一个活动就是参与组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2002年聘请28名海外华人学者担任特聘教授的事情。这件事情通过媒体变成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确实是在预料之

外。这件事的实际意义在于用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在中国推动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

事实上，我并不是第一个在中国用系统开课的方式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人。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学邹恒甫从1996年起在武汉大学开办实验班，致力于现代经济学的教育。这个班系统地使用国外教科书，并且不时聘请一些国外学者做短期讲学。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有不少学生从武汉大学的实验班毕业，其中一些到了美国留学。除了武汉大学之外，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南开经济学院等国内高等院校，也都在不同层次上开设了各种现代经济学的课程，并聘请海外教授讲授。

在北大讲课也好，在清华讲课也好，都是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我意识到，仅在一两个学校讲课是不够的，还应让更多的国内学生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教育模式和理论框架。在2002年这一年中，我在国内二十几所大学（或学院、研究所）为学生和教师举办讲座。我的三篇论文《经济学科在美国》、《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和《理解现代经济学》在网上被转载多次，可见它们适合学生们的兴趣。同时，我也同这些学校的师生一起探讨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思路。虽然我的力量有限，但这是我能做的。

肖梦：最近这两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钱颖一更把目光投向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法治问题。2000年2月他在“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上，首次发表了关于市场与法治关系的演讲，后来以此为基础写成了著名的《市场与法治》的文章。文中涉及了许多重要概念，首次提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是影响非常大的一篇文章，特别是对政府部门。2003年继续深入讨论了相关的法治社会，写了《政府与法治》的文章。这里，我们有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关注法治建设；二是为什么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限制政府，而不是管理市场；三是为

什么在民主、公民社会和法治这三个约束政府的机制中，你特别强调法治优先。

钱颖一：我近年来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这一问题做了比较多的思考，想来想去感到法治（rule of law）是最为根本性的。这不仅对发达经济如此，对经济转轨中的中国，也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因此，对照通常的民主与法治的提法，我有意识地把市场与法治相联系，把文章的题目叫作“市场与法治”。现在国外的经济学家对制度问题的研究，相当重视法律、法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侧重。对发达国家，主要是比较不同的法律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对发展中和转轨国家或地区来讲，主要研究如何在法治框架下调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最近又写了一篇姊妹篇，叫作“政府与法治”（参见《比较》第5辑）。

在任何国家，政府都不可能和经济活动彻底分开，不然的话就不需要政府了。即使在最小政府的国家里，政府和经济活动也密切相关。在一个运行较好的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和经济虽然有关系，但这种关系通常是一种“保持距离型”的关系（arms length relationship）。保持距离型的概念，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起裁判者的作用而不是充当运动员。这样做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都会提高，政府和其官员的利益——比如社会稳定、税收、国防建设等——也会提高。确定政府与经济的这种保持距离型关系的制度基础不是别的，就是法治。这是人类社会至今能找到的最不坏的制度安排。

讲到市场的制度基础时，我只讲到法治并没有提到民主。民主与法治之间通常是正相关的，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民主与法治在理论上可以分开，有没有民主的法治国家，也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国家。法治而不是民主对经济有更基本和直接的影响。这不是说民主对经济没有影响，比如民主对于限制政府腐败有作用。经验研究发现，法治对

经济发展特别重要。交易规则、合同执行、不腐败的司法对经济有更直接的影响。对中国来说，要改革的方面很多。我们现在把法治建设从政治改革中分出来，是非常明智的。从广义上讲，法治建设当然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把政治改革的含义限定为政府领导人的产生方式，这样可以在触及这一问题之前仍能做许多其他方面的改革。事实上，法治就是这之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提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区别，是为了打消一个通常的误区，就是以为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好的。这种误区在我国容易存在，是因为我国是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的。我们为推动改革，就尽力宣传市场经济的好处。这并没有错，因为搞得好的市场经济确实有。但是，不能以为所有市场经济都是好的。看一看全世界的国家，很多市场经济都不行啊！怎样才是一个持续稳定增长的好的市场经济？主要在于经济要以法治为基础。

法治有两条：第一条，法治要约束政府，这是许多政府官员不爱听的，但是我要先说。政府在法治的约束下是一个有限政府，没有这种约束就是无限政府、全能政府，这通常是导致坏的市场经济的原因。第二条，法治要约束经济人。如果认为自由市场就是不要政府的自由，那就太天真了。市场要运作得好，是要有一套制度来约束经济人的，要通过合同的形式、法律的形式，甚至监管的形式来约束经济人。而执行这种约束靠的正是政府。

在讨论在中国建立法治这一问题时，经常会听到教条式的推理：中国怎么可能有法治呢？没有政治改革，司法就不可能真正独立；司法不可能独立，法治就不可能。从理论上论证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需要抽象。但是现实并不是非零即一。说到司法独立，任何懂得中国现实的人都会告诉你，在目前的环境中司法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但是，难道这就意味着没有改革的余地吗？现实往往是有很多空间的，比如，即使没有最终的司法独立，也可以有低一层的司法独立；即使

没有低一层的司法独立（比如导致地方保护），也可以在上一层找到出路。重要的是，即使没有完全的司法独立，也有司法改革的空间，尽量推动的话，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因此，不能因为司法不能完全独立就马上得出结论说中国就不能搞法治建设。

这使我联想起一个在学者中的一般性问题。那就是，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和逻辑上的跳跃成了很多人的一种潜意识教条，它阻碍了我们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改革，也耽误了很多可能的探索。我们回头看看中国自己走过的路，就不难发现这种教条式逻辑的结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比如，在企业改革中，教条的观点是不搞彻底的私有化，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出路。事实是怎样的呢？中间的可能性有很多，比如非国有非私有的可能性。又比如在新闻改革中，教条的观点是在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事实是怎样的呢？报刊的自由度确有很大改进（看看《财经》杂志），尽管仍有很多不可跨越的界限，但这种界限本身也在移动。而用教条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预测到的，也不可能解释我国的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

20年前有谁能想到中国的人均GDP翻了两番，谁能想到国有工业下降到全国产量的1/4？谁能想到中国现在有3000多种报纸、5000多种杂志？《北京晚报》从四版变为几十版，中央电视台从一个频道发展到十几个频道？10年前能提倡发展私有经济吗？五年前能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吗？所有这些都是在有禁区的条件下发生的，迄今为止改革仍在向前走。这条路是否一直走得通？不知道。最后是不是有关键的一跃？有可能。但是我要说，我们能够走很远，远远超出人们通常的想象。即使需要最后的一跃，有了前面的基础，成本可能就小多了。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有比较开放的思维，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然后用它来判断现实。

---

1. 在新浪的访谈。

理性的激情㊟

（2004年1月）

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

记者：您在研究转轨经济方面硕果累累，是公认的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转轨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您关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请您对中国20多年来的渐进式改革做一个总体评述。

钱颖一：首先，我不同意用渐进式改革来简单概括中国的改革，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仅不确切，而且会误导。中国的改革，有时候渐进有时候激进。用渐进式这一说法，会引出来一系列问题，比如使人感到是时间快慢的差别，同时也使人忽略渐进或者激进方式的形成原因，以及改革中间的丰富内容。

我对中国改革的总体评价，与大多数没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经济学家是一致的：在过去的24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存在问题，也有失误，但是综合而论，它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成功的标志就是经济发展了。虽然一直有说法，认为中国的GDP增长率被高估，因为物价增长被低估。但是也有理由认为增长率被低估，特别是在服务业和灰色经济中。即使中国的增长率被高估1—2个百分点，20多年来人均GDP增长仍然是至少6%—7%，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20年内翻两番。中国增长这样一个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不看GDP的数据，看实物数据也是好的证明。不说在大城市，即使是在一个县城，你看看有多少公路在修建，有多少楼房在建起来，还有家庭生活的改变。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印度的经济学家说，过去20年印度的经济年均增长5.6%—6%。大家都说印度的统计体系继承了英国的体系，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而中国的统计不可靠。我原来对中国经济增长9%还有怀疑，听了印度的数据反而对中国的数据增强了信心：印度都增长了5.6%—6%，中国比印度每年多4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我想太可能了。20年前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水平大致一样，4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呢？20年才比它多1倍。我没去过印度，但所有去过印度和中国的人都告诉我，现在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差别不止1倍。从各种信息都可以看到，虽然不能否认有些年份有虚假成分，但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

说到这儿，有两点需要澄清：一点是在改革过程中我们确实有失误，也犯过错误，这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发生了这些错误，发生了这么多失误，还是有这样的成绩。比如说，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如果更早地行动，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另一点是我们不否认中国未来仍然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国有企业问题、金融风险、收入分配不平等，以至将来的政治改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些不确定性和问题来否认已经取得的成绩。看看最近一位美籍华人在美国出版的书《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就会发现他说的任何问题我们都知道，说实在的，我们知道的比他还多。但是他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这些问题即将导致中国崩溃。当然，如此耸人听闻的书名可以帮助销售，也让一些不相信中国改革成就的人心里感到舒服一些。

整体而言，我们对中国改革的理解还非常不够，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现象值得研究。外面的人往往是看不清的，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往往熟视无睹。比如我们有太多时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外人看来都不可思议。比如储蓄率高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认为是自然的事，但实际上是需要理解的。

关于“激进”与“渐进”改革，我想澄清一个误区：转轨和改革并不是一个“渐进办法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激进办法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的过程，通常是反过来的。比如，改革的深层问题之一是建立法治，这能用激进的全盘照抄的方式来改革吗？第一，这在几乎所有国家，政治上根本不可能；第二，即使在特别例子中可能，比如民主德国，情况也不是想象的那样：民主德国照抄了联邦德国，但很不理想。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仅就其立法速度而言，是全世界最快的之一。但法治建设中比立法更为重要的是执法，而改进执法在任何国家都没办法急，除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的时候联邦德国可以把法官、警察派到民主德国以外，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做不到。就算是所有的法律都照抄别国，但执法过程就无法照抄了。人们有时说日本明治维新就是照抄西方，其实不尽然。日本人研究了许多西方国家，最后选择德国为主要学习模式，然后根据日本的具体国情，决定什么拿来什么不拿来。即使日本这样极端的例子，都不是像拷贝磁盘一样照抄。其他国家更不是这样。就算你把所有“最好的”法律全拷贝了，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也是不能进口的。

我们希望中国尽快成为法治经济，但是从这些方面讲，可能越深层次的东西变得越慢，越表面的东西——比如宏观稳定，可以来得越快。改革的速度问题很复杂，有些需要激进一点，有些需要渐进一点。深层次的需要更慢一点，浅层次的需要更快一点。为什么？浅层次的问题我们对它的理解比较清楚，一剂猛药下去烧就退了，比如宏观稳定，治理通货膨胀，就是浅层次的问题。对于采用激进的措施解决这种浅层次的问题，大家并没有异议。而对于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

记者：为什么外国人看待中国问题的视角总是让人感觉到明显的偏见？而为什么国内许多人士对中国的改革也持悲观或者部分否定态

度?

钱颖一：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偏见并不奇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改革走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标准想法太不一样，在路径与人们所熟知的不同时，人们产生怀疑是很自然的。其他的原因包括媒体炒作、国际政治、中国的潜在力量等。

有意思的是，质疑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往往是国内的人。这也并不奇怪，国内的人倾向于低估国内的经济增长，有几个原因。

第一，身在其中，往往更容易看到里面的问题，因为得到的东西大家都认为已经得到了，没有得到的，大家都来关心。多数国内的人是连续生活在国内，他们对很多正面的变化很难察觉。1999年夏天，我带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在北京访问。两年后2001年7月份我又带他来北京。他说两年之间北京完全变了。他的具体例子是：自行车明显减少了，交通变得拥挤，私家车增加。楼房不仅增多，而且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前多是办公楼（没有阳台），现在多是住宅楼（有阳台）。他就在北京的三环路走了一圈，马上就注意到这些变化。另一个变化是，1999年用的还是旧首都机场，2001年的时候已经启用新机场，但最令他惊讶的是，只用了5分钟就通过安检和海关从机场出来了。因此，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一个人连续生活在国内，这些观察是不易发现的。另一方面，对看到的问题往往认为是中国独有的，别的国家并没有，因此容易夸大其严重性。比如腐败，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在美国的19世纪，也许更恶劣。

第二，参照系。中国在历史上曾是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人有很强的民族雄心。1000年前的宋朝，中国的人均GDP是全世界最高的。GDP总量到1850年我们还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就其整体实力一直到1850年都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在过去150年落伍了。因此我们总是希望

与世界的最强国比，也就是说同美国比。要求高是好事，但是看问题的时候也容易看不到真实的状况。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现在仍是中低收入国家，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国外拿你对比的国家就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而不是韩国，更不是日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是增长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我们以前老说亚洲的8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但是我们在过去20多年中的增长不比它们差，而且我们的人口比它们的总和还要多3倍！

第三，经济学家或者媒体对现状更多的是批评，而不是赞扬。这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问题是主要的，危机正在到来。我们有时候也愿意把问题写得严重一些，为什么？只有把问题说得更严重一些才能让领导更关注，才能有效地防止更严重的危机出现，这是博弈中的策略。头脑清醒的人不会因此而影响他对改革的整体评价，但是头脑不清醒的人就会被迷惑，以为全是问题，就会失去一个平衡的判别。

这几个原因加起来使得我们自己判断自己的时候容易把成绩低估，把问题高估。我不是说官方的数据没有高估。往往国内的人知道官方数据的高估，就自动打折扣，问题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人们心里打的折扣过多了。

记者：相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请您评价一下东欧和苏联的转轨过程。

钱颖一：对于这么大规模的转轨过程，首先要面对现实。东欧和苏联的转轨非常不平衡，大致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像斯洛文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这些国家现在的目标是加入欧盟，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即使在这一组国家中，情况也不同。前一段波兰表现得非常好，最近以来匈牙利似乎更好。让人困惑不解的是捷克，它原来的工业基础最好，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似乎非常彻底，但是经济表现低于预期。

第二类情况包括俄罗斯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虽然改革全面展开，但并不很成功。俄罗斯的情况，到2000年之前问题比较多，改革不太成功，这一点上没有争议。这不仅仅表现在生产指标下降上，其他社会发展指标比如人的平均寿命也在大幅减少，男人的预期寿命大概只有59岁，下降得有些离谱。问题是，为什么它不成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究竟原因是什么，大家都在研究。普京上台以后，俄罗斯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这值得我们注意。他吸取了中国的一些经验教训，包括恢复稳定和建立激励，尤其在财政税收方面做了大力度的改革。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有明显好转，但是对此的衡量仍是说法不一。比如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现在的复苏主要是借助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提高，经济能力的真正恢复还有限。

第三类情况是改革还未全面展开的国家，比如白俄罗斯、乌克兰等苏联的一些共和国。这些国家恐怕是经济表现最差的了。

以上的“转轨经济”并不包括民主德国，因为它的情况非常特殊。但是民主德国的例子非常有说服力。民主德国照搬了联邦德国的一切，法律全部是联邦德国的，人员也是联邦德国派来的。此外，联邦德国是全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而民主德国又是原东欧国家中最发达的地区，况且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人口之比是1:3，可以说能够想到的条件都对民主德国的改革有利，相比之下，朝鲜和韩国的情况就不利得多。但是民主德国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虽然民主德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它强有力地说明了转轨过程中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不能用一种觉得自己都懂的态度来看待转轨中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

记者：您的很多文章中多次提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请您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钱颖一：之所以用“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这个词，是因为这是西方财政学里的一个标准用词。实际上它的含义超出财政学。我和许成钢写了一篇文章，研究所谓“M型”的组织结构，这与财政联邦制有关联。我国在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跟苏联比，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我们是“条条”“块块”中的“块块”力量更强，而苏联是“条条”力量更强。在苏联，它的各个工业、专业部不仅数目多，人员多，而且权力大，相比之下地方政府的权力很小。而我们的“块块”力量比较强表现为地方党政的权力比较大，省委书记的级别和地位往往要比部长高。我们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办事能力，都非常强，这是从1958年后就形成了。过去，经济学家批评毛泽东的这种行政性放权并非市场取向的经济性放权，是有道理的。但是当我们再进一步考察这样一种“块块”结构、行政性分权结构对后来改革的影响，发现它有很多我们（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学者）原来都不理解的功能，而这些功能甚至可以说对我国的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这是奠定我国改革道路的一个基础。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需要跳出中国，因为只看中国可能看不清楚。你看东欧改革，看匈牙利，它们60年代末就尝试改革，各种办法都试过了，但没有实质性突破。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国有制企业不能突破，软预算约束问题难以解决。在所有制问题上，只能有两类，要不就是国有，要不就是私有，而私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有各种政治障碍，国有企业改革受中央政策的影响太大。一旦中央的政治摇摆，改革马上就倒退，这是一种非常死板的状况。匈牙利当时是苏联的卫星国，改革要看苏联的脸色。而苏联自己也是这种集权模式。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不想改革，他确实试了，但是没有试成功。当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苏联僵化的集权体制使他无从下手，除非一下子在中央做大动作，但结果可能不可收拾。

我们呢？改革的成功是中央和地方的互动造成的。没有中央设立特区、放松意识形态的大方向和政策，地方政府不可能致力于经济发

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广东、福建先走一步，大胆探索，改革也不可能如此成功，也难有“南方谈话”。不要忘了，正是因为我们80年代推行的改革造就了南方的几块市场经济“特区”，才使得1992年改革从低谷中重新启动。我1991年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时候，看到那里相当沉寂，心里特别难受。记得当时去社科院经济所看望樊纲，上班是开政治批判会。他把自己刚买的一辆小面包车停在老远，生怕同事看到，会引起麻烦。吴敬琏对我说，你去南方看看就不会悲观了。我随后去了江苏、浙江、广东，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地域和分权，就不会有蓬勃发展的地方乡镇企业，中国在1989年后就很有可能陷入东欧式的改革困境。所以从历史回顾来看，我们的分权为地方政府、为乡镇企业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市场经济在一些地区先成长了起来。

这样的情况是我们以前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任何一个只看教科书上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描述的经济学家也是不可能想到的。人们过去一想到计划经济就是苏联模式，“条条”的专业部把各方面都管死了，市场不可能从“夹缝”中钻出来，因为没有夹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改革呢？要改就必须从上到下一揽子改革。中国这种改革模式过去大家没有关注。尽管1958年的“大跃进”和行政性分权、1971年的再度分权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即使后来改革中的分权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地方保护、重复建设，这些都不能否认。但是，分权最重要的正面结果是为计划经济框架下创造市场提供了空间和条件，特别是在政治上比较保守、有反复的时候。政治上出现反复时，邓小平的个人作用不可否认，但是他的作用不能脱离经济基础。

根据这些新的观察，我们把以前的财政联邦制概念扩大到整个经济中，因为传统的财政联邦制只讲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这只是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包括其他经济权力上的放权。在我国，地区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省和省之间的竞争、城市和城市之间的

竞争、县和县之间的竞争，构成了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觉得这很自然，但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看一看，就会发现不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中国的财政联邦制就是西方式联邦制的结论，实际上它不是。其中至少有两点重要不同：第一，我国在法律上不是联邦制政体和联邦制财政；第二，在我们的体制中，中央在人事任命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不能把我国的分权体制等同于西方的联邦制，虽然有些机制相似。这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内，但是需要说明。

研究中国的这种“块块”结构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这样一条改革道路走到现在还走得通。20年前，没有经济学家，更没有政治学家认为中国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从当时的教科书出发，你也很难想象中国的今天。80年代中期我做科尔奈的学生，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非常悲观，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使改革走出困境：在所有制问题上，国有制是死路一条，但私有制既没有精英支持，又没有资本支持，还在意识形态上受排斥，在政治上受挤压。在匈牙利或者整个东欧和苏联，都没有一个主要由地方政府支持的，叫作非国有、非私有的所有制部门成为增长点。这在他们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要理解中国，就要跳出中国，把视野放宽。经济学家对事物的认识都是抽象的，抽象的结果便是要么苏联的计划模式，要么美国的市场模式，没有其他可能。而现实是，我们虽受过苏联影响，但是我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组织结构上、制度安排上后来都与苏联有很大不同。而这些不同在后来的市场发展上恰恰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需要理解的。理解这些作用会丰富经济学。

中国特色的双轨制改革

记者：您对中国改革中的双轨制很有研究。很多学者对双轨制改革有很多批评，认为它很不彻底，并且导致了诸如严重的腐败等很多

社会问题。您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双轨制的？又是如何看待那些批评的？

钱颖一：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双轨制（dual-track）。我们谈到双轨制首先想到的是80年代中期的工业品价格双轨制，具体讲是从1985年起政府对工业品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由于它和改革中首次出现的腐败在时间上前后连接，所以人们对价格双轨制有很多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几个事实需要说明。第一，后来90年代的腐败事实上要远比80年代严重得多，而90年代已经基本上没有价格双轨制了。第二，价格双轨制并不是从工业品开始的，也不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价格双轨制是从农产品开始的，早在1980年我们的农产品就有一个计划价和一个议价。没有人把它提高到"制"的高度，是觉得它只局限在一个产品，而且是农产品，并针对农民。而那时的城市居民就只有一个价格。这种情况更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后期。工业品的双轨制就涉及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影响面就不同了。第三，双轨制不仅仅是"价格双轨制"，还包括了"体制双轨制"。在经济学原理上体制双轨制与价格双轨制有着同样的机制。事实上，价格双轨制早就并轨了，工业品和汇率的并轨最为明显，但体制双轨制还没有，例子多得很。比如，我国的城市、农村管理就是双轨制，城市的做法是一轨，农村的做法是另一轨。经济特区或开发区就是双轨制，特区或开发区里面是一轨，特区或开发区外面是另一轨。雇工的办法也是双轨制，正式工是一轨，合同工是另一轨。大学招生仍旧是双轨制，计划内招生不收钱，是一轨；计划外招生收钱，是另一轨。经济学教育在一所大学中甚至也有双轨制：比如在北大，它在经济学院是一轨，它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另一轨。所有这些都还没有并轨。

批评双轨制的出发点是双轨制改革不如单轨制改革彻底，它引发两大问题：一是保留计划轨将继续保留无效率的扭曲，二是计划和市场并存导致腐败。而这两个问题在单轨制中都不存在。任何学过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的人都会对双轨制有这样的批评，这一点也不奇

怪。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即双轨制是改革过程的产物，对它的理解要放到改革的制度和政治的环境中，而价格理论是不考虑这些因素的。这就要求我们仔细分析双轨制的机制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

双轨制中的一个轨是市场轨，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引入双轨制的第一效果是要把市场这一轨开出来，比如在价格改革中是引进市场价格，在招工改革中是引进市场取向的合同工。由于计划下的效率很低，市场轨开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这是没有争议的。双轨制中的另一轨是计划轨。但是，既然计划导致低效率，为什么计划仍然要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呢？原因是要使改革获得政治支持，即所有的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要得到满足，这才是核心问题。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但改革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现代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改革要成功，除了经济效率提高（即把饼做大）以外，还要保证利益相关人、相关集团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否则这些利益相关集团就会动员起来阻止改革的推进。这既是改革的现实操作问题，也是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比如，为什么不能对农村和农民解除限制，取消城市和农村在就业、居住、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双轨制？暂时行不通的原因是这会使城市居民的利益下降。所有双轨制都是如此。在双轨制下，一件商品两个价格，计划价格和指标是为了保持既得利益不受改革的影响。低价钢材用来生产汽车，低价汽车再卖给计划使用部门，尽管市场已经发挥作用了，但过去的利益得到了补偿，不会受到损失。仔细想一想，任何改革中的补偿都需要相当大量的信息，信息成本非常高，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称受到很大损失，而政府是不知道这些信息的。双轨制下的利益补偿机制在于它巧妙地利用了包含在计划价格和指标中的信息，并通过继续执行计划轨来对潜在的利益受害者做补偿。这是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保护既得利益的办法。经济理论家并没有想到，而改革实践者想到了。

如果我们承认当权者有当权者的利益，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利益，城市居民有城市居民的利益，国有企业职工有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们在改革中既提高效率又保护或者尽量减少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呢？这就是改革的一般性问题。比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苦，生活水平也比农民高，但是还得保护他们，因为他们在改革前的生活水平比农民高。改革必须考虑到政治现实。在改革的设计中，这种考虑被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改革要成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率的问题，也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既然改革可以把饼做大，那么从理论上说，改革可以让所有人都获利，补偿是可行的。但在现实中往往很难做到。要想做到，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饼增得很大，所以分起来容易；二是改革的方式巧妙，补偿时的成本低。

双轨制，不仅仅是价格双轨制，而且是制度双轨制，确实有它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上的道理。如何回答对它的两种批评呢？第一，关于计划轨的存在会保留计划带来的低效率，因此双轨制改革是不彻底的。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忽略了一个因素。保留计划轨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低效率，原因是“买卖计划指标”可以弥补计划轨下的低效率。城镇居民把粮票卖给农民，国有企业把计划内的生产包给乡镇企业，都是“买卖计划指标”的例子，抛开道德问题，显然这些做法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二，双轨制带来寻租和腐败。仔细分析，寻租和腐败是双轨制执行不严造成的。在严格执行的双轨制中，计划轨是延续计划时代的指标，任何新增量都只能通过市场轨。把计划轨中的指标以高价卖到市场上，是弥补计划轨的低效率的必要途径，这本身不构成寻租和腐败。构成寻租和腐败的是一些政府部门新批了计划指标给那些“官倒公司”，使它们无本赚到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价，引起大众的不满，成为最早的腐败的起因。如果严格按照双轨制原则，计划指标是不能新批的。

双轨制应当在条件成熟时并轨。当市场轨发展得很成功时，计划轨的比重就下降到没有以前重要了。这时候把计划轨取消掉就是经济

成本和政治成本较低的一种改革了。即使这个时候再做补偿，成本也不会像改革初期那样大了。比如，改革国有企业，在国有工业的比例占78%时和占30%时是不同的概念。

企业的研究需要借鉴什么

记者：您曾在1989年写了《企业理论》一文，向国内读者介绍企业理论的前沿研究成果。后来您也发表过关于企业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并且和世界上顶尖的企业理论大师哈特（Oliver Hart）等人有很多交往。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对于企业理论的研究很有热情，也很有需求，您认为在中国进行企业问题的研究应该借鉴哪些方面的成果?

钱颖一：关于国外对企业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国内学者来学习，一个是理论框架和理论分析，一个是实证或经验分析。从理论上来讲，国内学者对企业和企业制度有足够的关注，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重要的是要学习现代经济学提供的分析视角、框架和方法。我这里说的主要不是概念。受过去的意识形态影响，国内的很多讨论太过注重概念——什么叫产权，什么叫产权清晰、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过多在概念上纠缠没有意义。概念只能给你一个词。真正帮助你从理论上理解问题的，是你对现实的观察，是你的理论推导。这方面有很多理论我们可以学习，不光是产权，它也包括了一些博弈论、机制设计、组织经济学的东西。

国内熟悉的“新制度经济学”，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的成果。而对于80年代、90年代的研究，特别是组织经济学，知识较少。实际上，研究组织经济学的学者更注重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我觉得在研究企业理论或者组织经济学上，重要的不在于引用它的概念，而在于理解它在理论推导和分析上有哪些重要的环节。这样便可以联系中国的情况，考虑中国有哪些制度环境是不一样的，把一些新的因素考虑进来，你就会得出新的结论。比如，中国国有企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

素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党管人事”照样管上市公司，这是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实证或经验研究方面，现在有很多关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国内有不少关于企业的实证研究，多数是案例研究。真正基于理论，对数据小心仔细地推敲，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的研究不多。所谓“小心仔细”（careful），就是在数据分析上要小心求证，要考虑很多技术上的细节，使得计量估计较少偏差。在实际的经验求证中，盲目地做统计回归是很容易出偏差的。目前，在公司金融中、在微观经济学中，经验研究都有很多发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之中离我们比较近的是对东欧和俄罗斯的企业转轨的实证研究。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有关东欧各国企业转制，包括私有化和重组改造方面的实证研究结果了。它们的问题与我们关心的问题相似，其研究结果更值得我们参考。比如在东欧普遍存在法治不健全、执法不健全、法庭有效性比较差、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等问题。这些方面，就是所谓的企业外部环境，我们和东欧有很大相同之处。尽管在私有化方面东欧比我们更快一些（当然有的快有的慢，但是总而言之我们比较慢），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问题，包括企业改造、企业转产、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东欧和我们共有的。

总之，我觉得国内学界对企业的研究不缺乏热情，不缺乏关注，甚至不缺乏概念，但是需要在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分析方法上下更多的功夫。应当参照国外相关研究的方法，但要考虑国内企业面临的特殊环境，来做一些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中国金融稳定与改革

记者：在过去10年中，国际金融市场极不稳定，爆发了许多次金融危机，从这些金融危机中我们能够得到哪些经验和教训?

钱颖一：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触动极大。我们之所以对这次亚洲金融危机这么关注，有两个原因：第一，过去我们很封闭，现在比较开放了；第二，相关各国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不少情况与我们相似。但是，金融危机由来已久，根本就不是新鲜事。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每10年就有一次金融危机，而且很严重。在当代，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会有金融危机。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北欧也经历了金融危机。所以不管什么样的国家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现在的金融危机确实有些特点是以前不具备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爆发的金融危机有一种连带或传染效果，即在很多国家几乎同时爆发。金融自由化是整个80年代、90年代的世界性趋势。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在开放金融市场。在金融自由化的风潮中，国际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大。结果就使现代的金融危机具有连带性或者说传染性，而以前的金融危机比较孤立化。现代金融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双重危机，即汇率危机和银行危机并发。有很多证据表明双重危机的危险更大。

对我们触动特别大的是我们周边像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饱受金融危机之苦，特别是印尼的情形。印度尼西亚基本上是30年的政绩毁于一旦，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记者：您认为中国逃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这次危机给我们什么警示?

钱颖一：中国逃过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金融方面还不大开放，有汇率管制，根本的是有资本控制，即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而不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如何健全，所以才没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金融危机给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加入WTO后的承诺带来的新挑战。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以什么形式开放以及用什么样的步骤来开放，从而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金融危机可以引发政治风险，影响社会安定，因此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之内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有多大?

钱颖一：关于中国将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问题，我有两点说明。第一点，只要加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当中，不管你本来的经济状况是好是坏，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特别是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哪怕经济的基本面很好，就像中国香港，照样可以出问题。这就是说，基本面有问题的会有金融危机，基本面没有问题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市场是连通的话，也会有金融危机。当然大国和小国有点不太一样，小国有点像大海里的一条小船，来一点风浪它就会翻。大船虽然翻的概率小，但是一旦翻船，后果就非常惨重。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的确很多，很多时候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金融危机是内因和外因加在一起的产物。

第二点，具体到一个国家，比如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策以及应对的方法。如果政策合适，如果应对措施想得清楚，采取得果断，那么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可以下降很多。如果你没有看清楚或者误以为没有问题因而采取的措施不得当，那么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就会升高很多。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非常脆弱，这是众所周知的。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更取决于我们现在做什么和怎样做。

记者：现代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业和证券业，银行体系与证券市场哪个发生危机的危害更大?

钱颖一：虽然金融危机可以有多种，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真正的危机有两个，一个是汇率危机，一个是银行危机。我们当前的情况是仍然有资本管制，即使将来汇率有所浮动，这种浮动也是受限制的。因此，在两个危机之中，更为可能的是银行危机。但是银行问题在媒体中却不像证券市场那样是热门话题。

银行业不同于证券业，它有很多特殊的性质。证券市场同实体经济之间的很多传导是间接的，有距离的。但是银行不是，银行和实体经济的连接比较直接。银行有结算功能，这直接影响到每天的大量交易。银行和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不一样，储户任何时候都可以去银行取钱。因此，即使是健康的、没有坏账的银行，都具有潜在的挤兑风险，更不要说有坏账的银行。

以美国为例。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大崩溃，并没有直接引起美国的经济危机。后来是1932年、1933年的银行危机影响美国的实体经济，导致大萧条。我们现在说要发展证券市场，减少银行的融资比例，这是正确的。但是，当谈到金融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银行上。虽然在媒体中，在危机到来之前，银行没有证券市场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新闻，但是银行业里面的潜在问题是极其严重的。所以在我看来，媒体应该把注意力适当地转向银行业的问题。

最近十几年的经验证据也表明，大多数经济危机是由银行危机造成的。在那些东亚国家，危机往往是从汇率危机开始的，汇率危机导致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导致利率升高和银行危机。当银行有外债并且很脆弱时，货币贬值和利率升高使得银行资不抵债。银行一旦出了问题，马上连锁反应，实体经济就出问题。因此，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讲，如果银行搞不好，对整个经济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在西方的金融学里面，对银行（或金融机构）的研究不如对证券市场的研究受重视。主要是美国培养的学者对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研究最多。美国有什么特点呢？第一，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业是以证券市

场为主，而其他国家大多以银行为主。在美国研究金融的那么多人都在研究证券市场，有它的现实背景，因为美国的证券市场太重要了。第二，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都不一样，它对银行危机最不在乎。为什么？虽然它的经济实力很强，它的银行监管较严，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全世界都用美元，而且所有国家都用美元做外汇储备。任何一种货币都存在被投机者攻击的可能，只有一种货币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美元。任何时候美联储都可以印美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美元不会被投机者攻击。任何其他国家，即使再强大也不行。

因此，在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法上，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而其他国家都应该从另外的角度考虑金融危机的问题。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美国培养的，因此也就容易忽视银行的问题，殊不知美国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国家。很多国内学者说我们要学习美国的金融模式。美国模式是好，但是它的存在有很多特殊条件，我们要明白哪些条件支撑着它。这样就会头脑清醒。

当我们讨论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应该更加灵活，资本控制应该逐渐开放的时候，这里面的一个基本权衡就是效率与风险之间的权衡。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系统，不同于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中，通常是竞争越多越好。不错，银行业也应该增加竞争，更加开放，但是在考虑这方面问题的时候，要考虑潜在的金融风险和成本。

记者：谈到银行业的改革，如何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是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1999年财政部组建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接收了四大国有银行的14000亿元不良资产。国内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能否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一直有很多争论，我记得在1993年的时候您就和刘遵义合写过文章，建议采取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解决不良资产问题。那么您认为在现行情况下不良资产问题能否用资产管理公司的办法解决?

钱颖一：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我认为过去几年的金融改革进度不令人满意。是的，在1993年夏天我和刘遵义写过一篇关于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的文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可惜的是当时政府并没有决定要解决这一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接受我们的或其他人的建议。一晃10年过去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在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了，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因为有WTO的承诺，要对外资开放银行业。

用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来解决银行的坏账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做过，包括美国和东欧国家。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是这样来解决储贷协会（S&L）的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是：虽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不良资产划过去了或者债转股了，但是银行的治理结构没有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也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钱就有可能白浪费了，新的坏账继续出现，还要再次剥离。这在其他国家已有教训。比如匈牙利在90年代，坏账剥离一次以后不解决问题，又再次注资，就是因为没有更新银行的治理结构。这些教训早就摆在那里。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吸取。

过去几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险恶环境中，我们保持了金融稳定，这是政府的功绩。现在面对WTO，金融形势面临新的挑战，而且时间紧迫。为什么？从2001年12月10日我国加入WTO开始算，两年内要允许外资银行从事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内允许外贸银行从事个人的人民币业务，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金融风险概率有多大，取决于这几年的工作。做得好了，可以把风险降低，做得不好，风险是非常大的，这就叫作金融风险的“内生性”。首先，它取决于政府和部门领导的认识、魄力和做法。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经常叫喊金融危机，无非就是想提醒决策者们注意这一问题。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金融危机可以爆发在宏观基本面没有问题的国家。以前拉美国家过度消费，导致双赤字（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宏观基本面有问题，发生了金融危机。但

是，这次亚洲国家并非如此，这些国家不是消费过度，而是另外的问题。这与我们的情况非常相近。中国的幸运在于这些亚洲国家的危机发生在我们的前面，因此我们可以引以为鉴，如果我们聪明的话。

记者：那么，您认为国有银行的前景是什么样的呢?

钱颖一：这很难说，因为它们都在改革之中。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容易从技术上找原因，认为银行业的问题是一个管理问题。我们过去讲要加强管理，加强监管总行下面的分行，比较重视从技术上找新的指标来监督，比如说研究国外是怎么考核对银行官员腐败的监督，用几个指标来监控，等等。这些技术性的东西，可以比较快地借鉴，也不触动高级管理层的利益。但是经济学家会说：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它一定要牵扯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结构。

比如说，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都是副部级干部，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看看他们前任的职业道路就可知道，今后他们几乎都要进政府。因此，这些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是银行家，而是从事银行工作的政府官员。并不是说政府官员一定办不好银行，而是说他们周围的环境使得他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政治因素在四大国有银行的管理，比如人事安排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还是要从银行的治理结构着手。

加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记者：2002年清华大学邀请了15位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和9位金融学家加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经济系和金融系。您是其中一位，据我们所知，您也是这次行动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之一。您认为这个举措对于中国国内经济学和金融学教育与研究的现代化会有什么重大意义?

钱颖一：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分析我国目前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教育的现状开始。正如我国的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我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也处在转轨时期。原来的经济学是建筑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基础变了，中国的经济不仅变成了市场经济，而且还要进一步变成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这里面有两次跳跃，一次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次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

但是现在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跟不上变化了的经济，就整体而言，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有一个滞后。这几年来，国内的高等教育方面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学校的经费有了大幅度增加。据我的观察，现在国内重点大学教师的平均校内收入比1991年至少增加了10倍，同时，学校硬件设施的建设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之下，学校的“软件”方面，特别是教师质量和课程内容，就更显薄弱。应当说近年来国内外的经济学学术交流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包括一大批国外经济学教科书的引进，一些著名的国外经济学家来国内访问和讲学，以及在一些高校中实行了现代经济学教学试点。但是，也正是因为改革太成功了，经济学家的机会成本上升很快，因此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知名经济学家，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就不够多。总体而言，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基础的现实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表现在经济学基础教育方面还比较落后，研究方面还不规范。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已经有一些留学海外的经济学者回国任教，但是人数还不够多。在国内的大学里，即使顶尖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都缺乏比较系统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训练。

培养懂得现代经济学的专家很重要。现代经济学对推动我国的改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经济学家通过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市场与计划的争论中，在90年代关于产权、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体系的讨论中，还是在目前关于法治与经济发展的讨论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学家除了从事经济学的研究

和教学之外，还有普及经济学知识、为政府出主意、为企业做咨询等作用。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发生了变化，社会和市场对毕业生的质量的要求在迅速提高。正是这样的矛盾产生了需求，对教育改革的需求，对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需求。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有大批留学生出国。开始时几乎全部都是学习理工科，后来有一些去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留学生中开始有人在北美的大学中攻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博士学位，其中一些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欧美等地的大学任教。这些人在国内受大学教育，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又有较长的时间在海外大学任教和从事前沿研究的经验。如果有一种机制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就能够比较系统地开设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这对满足国内的需求将有所帮助。

很多在海外工作的这一代华人经济学家对此都很认同，大家都非常愿意为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尽力。这些人大多数年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不少刚刚拿到终身教职，他们现在所做的研究正是当今最前沿的问题。另外，他们比起“老外”来还有一些优势：他们都是在国内上的大学，对国内情况很熟悉，而且现在都和国内有很多联系，也深受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的影响，他们的中国情结都相当重，还可以用中文讲课。国内学生的英语水平有限，一时还难以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需要用双语教学作为过渡。

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造就了这样一个契机。这就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2002年聘请第一批特聘教授的背景，也是理解这一举措的潜在意义的根源。这些教授基本上都是在北美的一流大学拿到经济学或金融学的博士学位，并在海外研究型大学任教多年，相当多数具有终身教职。过去，海外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回国主要做的事是开会，各种各样的会。这些会不是不重要，它们对引进新的想法，开阔思路，让中国人了解外面，让外国人了解中国，都非常重

要。但是开会不能替代教学。基础教育要从本科一年级、二年级开始，延续到博士的一年级和二年级。我们在清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设课程，每人教一门完整的课。这些课程大都是我们在国外大学教授的，把这些课程合起来将构成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教学体系。

因此，这件事情的入手是为学生服务。学校基本的一条是要培养出好学生，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让进来时是一流的学生，出去的时候还是一流。如果这件事做好了，不仅对清华，而且对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建设，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开始对不少高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1. 肖瑞、李利明采访，收入肖瑞、李利明主编《理性的激情：国际经济学殿堂的中国建筑师》。

连接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

（2008年8月10日）

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

马国川：你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你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的一员，1981年你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统计学。是什么机缘让你走上了经济学研究的道路？

钱颖一：其实，不管我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数学，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统计学，都是和经济学比较相关的学科。后来我到耶鲁大学学习运筹学的时候，还去经济系旁听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经济学。

马国川：在国内根本没有学过？

钱颖一：没有，因为当时国内的经济学还属于“政治经济学”，和数学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而在西方国家，现代经济学与数学息息相关。当然，我之所以后来转入经济学，根本原因还是时代使然。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改革大潮汹涌，农村改革正在转向城市改革。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有非常浓厚的改革情结。我没有赶上红卫兵的时代，当时还在念小学，不够大到当红卫兵，但也足够大到对这段经历和过去的体制印象深刻，感触颇深。在上大学之前，我在农村生活了七八年的时间。一开始跟随家人一起到黑龙江和贵州的“干校”生活了三年多，这些“干校”都设在农村。等我高中毕

业后，又到北京郊区密云县农村插队四年。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贫苦的真实现状，自然对社会问题非常关注。

马国川：你们这个年龄段的许多人后来都对经济、制度有兴趣，似乎都跟这段经历很有关系。

钱颖一：确实如此。对我个人而言，在时代因素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学习数学、掌握了一些数学工具以后，也很想把它运用到过去没有运用到的地方。我接触了经济学课程后发现，现代经济学不仅研究经济问题，而且还用到很多数学的方法。我就觉得，这两门学科的结合，正好是我的兴趣所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时候，恰巧吴敬琏老师在耶鲁访问。

马国川：1983—1984年，吴敬琏先生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半的访问研究。他回忆说，这段时间他主要是“补课”，补现代经济学之课，经过学习，他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

钱颖一：我那时候在耶鲁大学攻读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认识了吴老师后，听他讲了不少关于中国经济、中国历史发展的情况，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当然也包括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情况和改革中的问题。从吴老师那里，我听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病，也第一次知道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一书。这使得我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更浓厚的兴趣。这几个原因加起来，促使我在1984年转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成为一名经济学的博士生。

马国川：你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现代经济学吧。

钱颖一：学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当然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经济学。就是基于当年马歇尔的供给需求理论，后来又逐步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行、效率如何得到保障的理论。另一方面，我也认真研究了先于中国改革的一些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它们的，所以受到它们非常大的影响。中国和这些国家有很多共性，当然中国也有很多特殊情况，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中国跟苏联东欧国家在计划模式上不一样。我仔细研究了东欧改革的情况后，深刻地了解了计划经济的问题和改革的艰难。在学习了现代经济学以后，这一认识逐渐加深。

我感到，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人来说，市场经济的很多规律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人们常说，计划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听上去是很不错的，而市场经济听上去是很混乱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去做事，又浪费，又混乱，怎么可能最后效率又高、发展还快呢？这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需要大量的经验证实，不然的话是不太容易理解的。特别是，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批评，有的看来是错误的，有的也还正确。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市场确实会失灵。但批评没有看到另一面，市场经济也有自身完善的过程。比如说污染问题，如果纯按理论来说，市场经济里每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做事，污染应该更大，而计划经济应该更加关注污染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计划经济的污染远远比市场经济要多。为什么？因为当市场经济中发现污染是很大问题的时候，它可以通过明确产权、运用排污交易等办法减少污染。这都是基于市场机制的办法，远比基于计划的办法强令一些企业关闭要好。这些都让人们懂得，经济学原来是这样一门学问，它可以指导经济的发展、资源的配置，如果不认真学习这些指导性的规律，不理解经济规律，就可能犯巨大的错误。

马国川：在你悉心学习现代经济学和研究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时，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么，你在学习和研究之后，对中国的改革有了哪些重要认识？

钱颖一：通过学习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结合中国改革的先例，从它们遇到的困难和教训中我认识到：第一，计划经济必须要改，没有别的出路；第二，我看到，东欧国家有的改得不错，有的出现了很多问题。这说明，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近距离观察中国改革

马国川：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精髓、关注东欧的改革进程的同时，你也写了一些文章，在分析、研究改革的历程中有过很大影响。

钱颖一：这些文章都是介绍与我国经济改革有直接联系的经济学说。当时，科尔奈的经济理论在国内影响很大，1987年我发表的《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一文，就系统介绍了他的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1988年中国经济遭遇了腐败的挑战。腐败的根源何在？有的观点认为这是市场惹的祸，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引入了资本主义从而带来了腐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要走市场取向的改革，腐败不可避免。但也有学者从改革滞后的视角得出政府过度管制是腐败的根源。争论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方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刊登了克鲁格（Anne Krueger）的文章，我为这篇文章的翻译做了校订，并写了《克鲁格模型与寻租理论》一文，还参加了有关寻租理论的座谈会。此后，寻租理论被我国政府官员、学者和一般民众广为接受，成为一个流行概念。

马国川：你还回国做了不少关于企业改革的调查。

钱颖一：1988年夏天，我到过沈阳金杯客车厂，那是国内第一个股份制改革的典型例子。我也调研了大型国有企业湖北的“二汽”，看到了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带来的困惑。我还实地考察过当时设于上海静安寺储蓄所一个营业厅的最早的国库券交易情况。这些调查让我近距离观察了中国的改革。更幸运的是，我还有机会参与了四通公司改革方案的设计。参与四通改革方案设计的，有吴敬琏老师、我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

马国川：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了“四通企业改革小组”，研究企业制度改革问题。但是在开始阶段，许多研究者对企业理论和公司实践缺乏必要的准备，因此只能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不那么具有根本性的改革建议。在你加盟之后才以学习企业理论和公司法为起点，重新开始。

钱颖一：那也是1988年夏天，正值国内企业改革拉开序幕，承包制、股份制、交叉持股等各种思路、方案被热烈讨论。而在此之前，我刚好在哈佛大学学习了合同和企业理论，还写了一篇论文《企业理论》，所以在加盟“四通企业改革小组”后，就介绍大家学习相关理论，然后再结合现实设计具体的改革方案。四通公司是民营企业改革的典型案例。1984年几名科技人员借款2万元创立四通公司，当时注册的是“集体所有制”。在中国当时的政治法律环境中，很难找到一家纯粹的民营企业。

马国川：必须戴一顶“红帽子”。

钱颖一：当时，还不仅仅是“红帽子”的问题。仅仅是“红帽子”还简单呢，一脱就掉了。集体所有制比“红帽子”还厉害，它规定，集体就是集体，不能转成个人所有。在还清2万元借款后，公司到底是谁的？法律上说是集体所有制，但是产权不清晰。当时四通是中关村一条街上非常有名的企业，也是一批比较有改革理想的人做大的。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因为产权不明确，在进一步发展中就产生了一系

列问题。当时我们就设想，对四通公司做股份制改造，做到既能够体现员工的贡献，又能够体现管理者个人的贡献。后来，我们完成了《四通公司股份化改制方案》、《四通股份公司招股章程以及招股说明书》等，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马国川：但是，这些方案并没有得到实施。

钱颖一：没有得到实施，是因为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波打断了改革进程。但是若干年后四通公司成功实现改制时，事实证明这套方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参与四通公司改制，让我得以近距离地考察一家新兴企业，而且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件事和当时我所从事的一系列研究，使我对激励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因为所谓产权问题，最终就是人的激励问题。

马国川：但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谈论的核心问题是价格问题。

钱颖一：价格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激励问题更重要。比如说，不管是股份制，还是后来讨论的产权，最终是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当然，激励有两种：一种是正向激励，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另一种是负向激励，把人们引向相反的方向。例如，在公社制下面，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出工就睡觉，可是回到自己家的自留地就拼命干，为什么？因为集体劳动，不管你干不干、干多干少都挣那么多工分，农民当然没有积极性，去了就睡觉呗。包产到户为什么就有用呢？也很简单，地是自己的，收得多自己留得就多，积极性自然就高。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奥妙。包括财政的“分灶吃饭”，为什么它能够极大地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奥秘也在于此：经济发展好了，税收得多了，收得多了留得也就多了，地方官员自然就很有成就感，还不排除里面的个人利益。所以，不管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还是财政上的“分灶吃饭”，虽然一个发生在农村，一个发生在政府，看似不同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决人的激励问题。

所以，我认为，如何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在认识到激励的重要性后，我就找到博弈论大师马斯金（Eric Maskin），跟随他做博弈论研究。博弈论就是研究人的激励问题，只不过它是一个比较高层次、高度理论化的学说，但是博弈论的核心就是激励问题。它研究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利益时人们怎么博弈。

马国川：2007年，马斯金和其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因为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钱颖一：机制是学术上的说法，对应到现实中就是制度和规则。你要达到一个社会目标，就要设计一套制度，我们叫作机制，就是一套博弈中的规则。当你设计这套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所有人都会对你的这套规则做出反应。就是平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是在知道下有对策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设计出一套机制来实现企业、政府或社会的目标。有时这是不可能的，有时是可能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这些就是机制设计理论要回答的问题。

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

马国川：尽管每年大多时间你都在海外教学，但由于研究兴趣与中国相关，所以与国内的联系一直很多。

钱颖一：从1990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开始，我在海外的教学生涯长达16年。但是在这期间，每年我都回国，并且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担任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等。早在1993年夏，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设课程，成为最早在国内开设博弈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课程的学者。此外，我还陆续介绍了许多海外学者来国内讲学，讲授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比如不完备合同理论等。

马国川：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钱颖一：虽然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是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具体内容并没有细致规定。当时，政府机构十分注重吸收海外学者的意见。除了讲课，我在国内还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体改委／体改办、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政府机构展开交流。1993年我几次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讲课，主要介绍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理，市场经济的框架是什么样的，还有东欧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企业改革中产权的重要性，金融体制是怎么回事，财政体制，分税制，等等。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划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纲领。

马国川：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吸收了经济学家的意见，是经济学家和经过多年改革历练的经济官员通力合作的结果。虽然你没有直接参与《决定》的起草，但是你通过讲课的形式对《决定》的起草发挥了影响。

钱颖一：我只能说，我以教授的身份讲过几次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一些理论前沿和其他国家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50条规定确实比较系统，对市场经济的整体把握比较准确。应该说，当时从以前的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时，我们还是非常虚心地学习世界上先进的东西。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描绘了市场经济的蓝图，此后经济学家纷纷为当时国内开展的诸多改革出谋划策，这些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汇率改革等。我记得，1992年我到上海开会，同行的有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和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吴

晓灵。一路上坐火车，大家谈金融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货币政策等。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果后，银行和企业改革就更显得相对滞后。我和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针对银行呆滞贷款和坏账，将企业财务问题一并考虑，写了《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的建议》一文，讨论实施银行与企业改革的财务重组方案。这是当时政府考虑的债务重组的数个方案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所有的方案都没有被采纳实施，改革一直拖到90年代末。我们的文章提出的一些思路，对后来的改革思考可能有些影响。

马国川：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重点和难点。

钱颖一：是的。1993年夏，我回国参加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国际研讨会，那时人们已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十分迫切而艰巨的局面，但是对什么是规范的公司制和如何进行公司制改造仍存在误区。会后经过与一些学者讨论，由我与吴敬琏合作写成《关于公司化》一文。文章在《经济日报》上发表后激起了很大反响。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都以不同方式实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私有化又都遇到了一个新的共同问题——私有化后的企业经营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理——并不为股东而为自己谋利益。在我国，国有企业并没有被私有化，但企业经理的实际控制权日益增大，同时政府对企业仍然行使很多权力。结果仍然是国有资产流失，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突出。1993年下半年，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委托我做一些企业改革现状的研究。1994—1995年，我又参加了世界银行的一个关于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课题，部分文章译成中文后便形成我和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教授共同主编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一书。

马国川：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多项改革，为构建市场经济框架奠定了基础。

钱颖一：虽然也有曲折，但是中国在90年代还是致力于推动改革的。从观念上来讲，也是如此。例如，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就把“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报告，“依法治国”也是中共十五大提出的，第二年还写进了宪法。特别重大的里程碑式事件，就是2001年加入WTO。假如那时候不加入WTO，后来的好多事情根本不可能去做。我认为，90年代的改革和新世纪之初加入WTO，为现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

马国川：在改革的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腐败、贫富分化等现象日益严重，社会矛盾相对激化，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也遭到了严厉批评。

钱颖一：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2000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上，我发表了题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的演讲。我提出，当今世界上既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而后者多于前者。坏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原因是国家（或政府）与经济人（企业与个人）的关系定位不对，问题的根源是没有好的法治基础。我呼吁认真思考在中国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防止陷入坏的市场经济的问题。

马国川：你的这篇演讲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也得到吴敬琏教授的很高评价。此后，国内对“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形成了热烈的讨论。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两个概念?

钱颖一：这两个概念在2000年初提出，缘于我国当时的环境变化。我们知道，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一直到90年代初，理论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计划与市场之争，因为这是当时经济现实中的主要矛盾。计划经济有很多问题。因此，那时候要论证的是为什么市

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在整体上具有优势。理论和政策争论的焦点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弊病，搞得好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以及市场经济的潜在制度优势。当时，所有改革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计划经济不行，市场经济好。在以市场—计划的视角来看问题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很自然的。但只是从这个维度看问题的话，就不会想到市场经济还有好和坏。

马国川：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后来也承认，“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

钱颖一：对于多年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内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学习背景是以市场—计划的视角来看问题，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学习背景不同，我既看到了中国的情形，又把它放大到苏联东欧体系下来研究，同时我也看到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多数是市场经济，但并不是所有市场经济都搞得很好。从世界范围来说，只有很少经济学家研究计划经济怎么改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只研究市场经济，他们研究了一辈子市场经济，很自然就发现，市场经济里既有比较好的方面，也有它的问题。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增长很快，有的停滞不前，有的甚至倒退。

马国川：国内的经济学家认识不到，国外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却不以为奇。

钱颖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计划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基本结束，而且以失败告终。苏联和东欧各国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也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但是在90年代，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还是比较含混的。对于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归结到改革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但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回避了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来研究不同市场经济的

差别。我的研究对象很多都跟中国经济中产生的问题，特别是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是，我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一定要运用现代经济学，或者是理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来剖析中国的问题，从而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因此，在新世纪之初，我提出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对我来说，这是基于我学习的一个很自然的延伸。但是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从来没这么想过。

马国川：大有振聋发聩之势！许多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些概念，呼吁建设“好的市场经济”，避免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可以说，从此，人们对改革的认识进入了新的阶段。

钱颖一：确实，人们对“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没有争议，而且都希望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一概念除了可以对现存问题有更好的解释外，还可以在应对别人攻击的时候，更有说服力。如果只有计划—市场视角，当有人攻击市场经济的时候，“改革不彻底”的辩解是很苍白的。有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概念以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呼唤市场经济没有错，但好的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制度来保障。

马国川：问题在于，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钱颖一：我的观点是法治。为了实现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济人必须被约束。这种约束至少包括三项内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否则，市场就是无秩序的，经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互相伤害，而不是互相有利。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需要一个执行规则的第三方，这便是政府。但是如何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就成为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受约束，它就容易用自己的权力换取利益，它所做的事情就会对社会不利。什么制度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两难问题，既约束经济人，又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同时又约束政府呢？没有

完美的制度，但目前人类发明的最好的制度叫作法治。所谓法治，就是经济人和政府都置身于法律的框架之下，都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通过政府保护产权，实施合同，维持市场秩序，但同时法律也约束政府。法治造就一个有限与有效的政府。因此，法治是建设好的政府、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

马国川：据了解，目前，研究一国法律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和政府的治理结构问题是国际上比较经济学的热门题目。

钱颖一：国内的研究热点转移对此也有所呼应。国内对企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的热点是“管理问题”，80年代末开始转为“产权问题”，到了90年代又进一步转为“体制问题”，现在又上升为“法治问题”。这说明问题的研究在深入。过去，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总是处于两难，不是政府对企业干预太多，就是企业不受约束。在法律和法治的框架下来讨论问题，就有新思路，那就是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作为不偏不倚的第三方发挥支持市场的作用，这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所在。我先后发表了《市场与法治》、《政府与法治》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对法治、市场、政府这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探讨。

共性与特殊性

马国川：我觉得，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你与国内的其他经济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钱颖一：我在海外接受了完整系统的经济学教育，关注并参与中国改革进程，所以我希望借助这一特殊位置和时机，在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两方面进行思考。

马国川：如何把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联系起来，很重要也很难。如果偏于前者，可能胶柱鼓瑟；如果偏于后者，可能坐井观

天。

钱颖一：我认为，必须把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连接起来。当然，我并不主张盲目地把现代经济学现有的模型简单地放在中国问题上，这样并不能够真正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中国有一些制约因素是别的国家没有的。但是有基本的一条，就是说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是一个基准或参照。当我们看中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特殊的。并不是什么都特殊，有特殊的地方，同时又有很多是共性。整体来讲，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就是一部共性与特殊性交织的历史。

马国川：哪些是共性，哪些是特殊性呢?

钱颖一：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是一个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成绩。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宽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中国并不是第一例取得这样经济增长成就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在60年代、70年代，后边还有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就持续的速度来讲，它们的经济增长不亚于中国，有的甚至还高于中国。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国比中国更“奇迹”。你想想，韩国4000万人口，和朝鲜的军事对峙严重，60年代初的时候那么贫穷，又没有资源，人家从这么低的基础发展到现在的高收入水平，而且还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稳过渡，这难道不更是“奇迹”吗?

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的高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高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有共同之处。实际上，中国的改革颇受“亚洲四小龙”的刺激。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深受启发。中国并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印度也正在追赶。

马国川：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高速发展的共性在哪里呢?

钱颖一：我认为市场经济的精髓有两个：一个是把激励搞对，调动人的积极性；一个是让市场起作用，依靠价格和竞争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这两者是互补的。因为只有价格，没有激励，是没有用的；如果只有激励，没有价格，人的激励就扭曲了。所以市场经济有两个轮子，一个叫“激励”，一个叫“市场”。这两个轮子最终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把人的积极性发挥到最大程度。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这两条就是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三条就是开放。开放对中国的作用非常之大，是许多人所忽略的。开放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开放不仅仅是贸易、外商投资。中国的开放几乎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人员的流动。我自己是留学生，到国外学习，1989年发表了《企业理论》一文，到现在我碰到的许多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生还说，都读过那篇文章，受到了启发。由此可以看出，由开放而带来的人员交流、思想交流的影响远远超过贸易上的交流。

所以开放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和开放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比如银行改革，为什么进步非常之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2001年在加入WTO时我国做了银行改革的承诺。为了实现承诺，政府制定了一个时间表来推动银行改革。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开放，银行改革会有今天的力度吗?

马国川：在你看来，中国改革30年成绩巨大，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是共同的，没有特殊之处。

钱颖一：在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上没有特殊之处，全世界都一样。印度为什么现在的经济比以前好了？它也是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实行对外开放。至于那些不成功的国家，无非是压抑人的积极性，关闭市场，搞闭关锁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是这样，只是中国走得比较极端。苏联东欧国家从来都有奖金，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而中国当时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把奖金都取消了。再如，中国实

行单位制，不许人员自由流动。而在苏联，人员是可以流动的。中国的闭关锁国也是很极端的。苏联还组织了“经互会”，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往来。而中国既不参加西方国家的经济组织，也不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互会”。我们当时看到的外国电影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和朝鲜的。

马国川：在共性之外，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或者说中国的特色是什么？

钱颖一：中国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发展阶段不同。改革初期的中国非常贫困，绝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农村，隐性失业严重，资本短缺；而苏联、东欧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它们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短缺。第二，体制不同。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和苏联很大的区别是，在改革之前中国的经济更加分权化，而苏联是高度统一，权力都集中在莫斯科。在政治体制上，1989年以后东欧、苏联相继变了，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的一大特色，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安排。

法治是民主的基础

马国川：随着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渐建立，也开始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钱颖一：社会问题是有的，而且这些社会问题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说实在的，中国现有的条件比较容易解决这些问题：第一，增长速度非常快，解决这些问题远比增长慢的情况下容易得多。因为“饼”在增大，有很多资源可以分。第二，相对来讲，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比民主体制更容易解决某些问题。关键在于需要开动脑筋去解决，不能掩盖问题，更不能制造问题。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迈进，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初步的市场经济，我

们要看到它的问题，要用积极的、前瞻的、创新的、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中国现在改革任务很艰巨，同时改革也很困难，因为大家认为现在形势太好了。以前人们说，只有危机才能促改革。当人们感到没有危机的时候，很难改革。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危机感也可以催生改革，但是需要政治家有一些远见。一个英明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不仅应该看到现在的危机，还应该有预见未来危机的眼光，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我们现在虽然是繁荣时期，但是从静态来讲，确实存在改革的动力问题，不能只看到现在10%的增长。问题总会暴露的。

马国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停滞?

钱颖一：原因很多。目前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舆论批评多。倾听批评是应该的，但问题是，不能因为社会批评多，就采取停滞甚至倒退的办法。应对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向前看，要有创新的办法。更应该相信经济规律。如果不遵守，最终会被经济规律惩罚。例如，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就出台一个文件五年内不许涨学费，医疗不能放开，有的地方甚至明文规定一碗拉面的价格！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也有不少问题。这些做法为什么有市场？我们以为搞了30年改革，改革又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大家应该对市场经济很认同，现在发现不是。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的手段给人感觉很直接，价格一控制它就不涨价了，这不很好嘛？这是短期取悦民众的办法，但是最终民众的长期利益将受到损害。这种做法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很多国家也有，比如拉美一些国家。

马国川：这么看来，中国改革确实面临挑战。

钱颖一：所以我说，后30年比前30年挑战更大，因为前30年，中国是从很落后、很贫穷的状态，发展到现在的水平，起点低，后发优势明显。其实，当时的改革也很艰难，特别是思想上的飞跃，现在想

一想真是不可思议。当时人们的观念是“阶级斗争”，公有制神圣不可动摇。我们居然能够在这里面闯出一条路。邓小平说，“不要怕”，“谁不改革谁下台”。在旧思想禁锢下，邓小平就敢说这些话。

今后30年，中国肯定要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进入高中等收入行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高中等收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变成城市居民，意味着中国将与阿根廷、俄罗斯、巴西这些国家处于同样的水平。到那时，整个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中国又这么开放，所以挑战远远超过过去。我觉得，应对未来30年的挑战更需要勇气，更需要远见。

马国川：不乐观。

钱颖一：不乐观在哪儿呢？第一，能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能不能把自己放在全世界的范围，历史性地来看我们的发展水平？第二，中国现在制度成本很高，将来能不能建立起与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水平发展相一致的法治？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未来30年，中国会和世界日益融合，面临的挑战也会很大。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在开放的情况下如何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马国川：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钱颖一：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二是私人利用政府权力的掠夺。它们的根源都是政府权力过大。对于上述两种掠夺，法治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法治既能限制政府掠夺，也能限制私人掠夺。从长期来讲，法治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但另一方面，建设法治不是几天，甚至几年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马国川：在你看来，民主和法治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钱颖一：这两者之间有正相关性，但是也都能找出反例。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法治指标排第一、第二，民主指标排得很靠后。但是，经济上它们确实发展得很好。印度是民主国家，但是它的法治指标不那么高。当然了，多数发达国家，民主、法治指标都比较高。

民主的问题在哪儿呢？假定法治不健全，民主是可以侵犯产权的。所以，在民主制度下，一定要界定什么东西能靠投票决定，什么东西不能靠投票决定。

马国川：民主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钱颖一：对，法治确定了什么可以由民主决策，什么不可以。中国的优先选择应该是建立法治的基础。我不是反对民主，我只是说，制度建设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里面有轻重缓急。目前我觉得法治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而且它也是健全民主的基础，所以我目前更强调法治。

---

1.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采访。

致谢

感谢吴敬琏教授三十多年来的教诲。感谢马斯金（Eric Maskin）、科尔奈（János Kornai）、哈特（Oliver Hart）、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麦金农（Ronald McKinnon）、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罗文（Henry Rowen）、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教授的友谊和指导。

感谢收入本书文章中的合作者白重恩、谢长泰（Chang-Tai Hsieh）、高建、青木昌彦和谢维和教授以及肖梦女士，共同接受采访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白重恩、李稻葵、王一江教授和常振明先生，以及主持人卢迈先生。

感谢本书中的采访人杨燕青、胡舒立、肖梦、肖瑞、李利明、马国川。

感谢多所大学、机构、媒体、论坛给我的演讲机会和发表我的文章，恕不在此一一列出。

感谢中信出版社，特别是肖梦、吴素萍、孟凡玲、包敏丹为编辑此书尽心尽力。